西方外交思想史

陈乐民 主 编
周荣耀 副主编



XIFANG WAIJIAO SIXIANG SHI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课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基金项目

西方外交思想史

陈乐民 主 编
周荣耀 副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北京·1995

（京）新登字 03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方外交思想史/陈乐民主编.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9

ISBN 7-5004-1726-8

Ⅰ.西… Ⅱ.陈… Ⅲ.外交史-思想史-西方国家 Ⅳ.D 8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07869 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3.25　插页：2
字数：337 千字　印数：1—3000 册
定价：20.00 元

本书主编及撰稿人

陈乐民(主编):绪论、结束语和各章的小引,全书统稿和课题设想。

周荣耀(副主编):协助主编初审部分初稿和统稿,各章的法国部分,全书稿技术处理。

王振华:各章的俄国和英国部分。

潘琪昌:第五、六章的德国部分。

赵俊杰:第三、四章的德国部分和各章的俄国部分。

肖元恺:各章的美国部分和英国部分。

这本书是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课题,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基金赞助项目。书稿完成后,我们曾举行了一次征询意见的书稿讨论会。应邀参加讨论的同行有:钱能欣,张也白,资中筠,杨祖功,吴国庆,刘颖,罗红波,刘绯,田德文等。同志们提出了很好的修改意见和建议。据此,我们又作了相当大的修改、删减和补充。在此,谨向这些同志表示感谢。

目　录

第一章

绪　论

内容提要

外交的属性——外交是政府行为——外交思想史不同于一般政治思想史——两方面的影响和压力——外交思想是历史进程中多种因素的综合——外交思想史的阶段性——外交与国家内部结构——大国、强国的外交与小国、弱国的外交。

外交和文明——文明发展程度与外交——基督教文化与外交——意识形态与外交：围绕法国大革命的意识形态问题，“冷战”与意识形态，“冷战”结束后西方与非西方价值观。

外交与主权——外交与主权问题中的悖论——国家的“个体性”——“国际合作”与主权——“集体干预”与主权——“全球化”与主权。

近代西方外交史述要——中世纪与民族国家的形成——“梦中的事实”和“现世中的事实”——欧洲人的认同感——两类联盟——康德的观点——民族国家是近代欧洲的特征——黑格尔论欧洲形势——“力量均势”的动摇和被打破——两次世界战争间西方外交的彷徨——二战后“东西方关系”总框架取代传统均势理论——西欧“向内看”和外交自主——“冷战”后“西方帝国”的理想复活——外交思想史的五个分水岭。

欧美大国外交特征——英国，世界性海洋国家的衰落——“实用主义”的三个基本点遇到的挑战——法国的民族荣誉感——

立足点在大陆——“欧洲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结合——德国，“晚熟”的国家——改变民族分裂的历史情结——东西南北之交——需要一项东西贯通的外交——俄国，从小到大的扩张——马克思谈彼得大帝传统——今日的俄罗斯外交——美国，从美洲到世界的200年历程——托克维尔的预言——美国外交的全球影响。

外交的属性

外交和国际政治的关系是很密切的，甚至是相互依存、相互包容的。但两者还是有区别的。“外交”一般指的是国家政治，所谓“内政外交”。所谓外交是指一个国家或一个国家集团同外界打交道时的政治，办外交时依据的政策便是“外交政策”，即“对外政策”(Foreign Policy)，一般说来是政府行为。国际政治偏指国际关系中体现出的政治，“国际”政治是客观存在，而不是一国政府的行为。一国政府针对国际政治的现状和趋势所做出的回应就是“外交”了。

外交思想史不同于一般的思想史。一般的思想史大体是有代表性的、有影响的思想家的思想史。那些思想家当然都要受到他们各自所生活的时代的影响，但是他的思想却并非就是那个时代的统治者的思想。一般说来，思想家们所想的不一定直接反映某种清楚而明确的利益。他们提出的构想，往往也不是很快就能够实行的。他们都是思维很敏捷的，有些现象刚刚出现，他们就抓住了，而且能很快就超越这些现象，进而给人们预示出发展的前景。霍布斯写《利维坦》、孟德斯鸠写《法的精神》，都是这样的。思想家们可以进入到看来与现实毫不相干的时间和空间去，或进入到人的认识领域里去。这方面的例子，从古到今，浩如烟海。

而外交思想则一般是指处于执政地位的政治家的思想，它具有比一般的政治思想大得多的现实可行性，它更加直接地代表这个国家的占主导地位的意图和这个国家的“总体利益”，在涉及主

权、领土之类的民族权益等问题上，外交思想并不具有明显的“阶级特色”，外交思想具有较大的连续性。诚然，政府更迭，外交政策可能要有调整，有的甚至有很大的变动，侧重面会有很大的不同，但一般说来连续性是主要的，不能以政府更迭为由推翻前任所承担的国际义务。在野的反对派和在朝的当权派，可以有意见的分歧，一派之内不同的政治家也可有不同意见；但是，不同的政治力量在当权时都不免要服从类似的准则，当然并不是在所有问题上意见都一致，有时还很不一致。然而，此一国和彼一国打交道时，作为外交行为，总是和当时的执政者打交道；无论其立场何等不同，总是把对方执政者的外交当作处理国家关系的依据。因此，外交思想必定是现实的思想，它必定使人一目了然地反映一定的利益观和权利观。所以，一国的外交思想，总是指当权派的外交思想。所谓外交关系具体地体现为政府之间的关系；政府以外的机构无论何等重要、何等对政府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和制约力，都不能代表政府行使外交职能。

然而，任何当权者在制定外交的路线时，通常要考虑到两个方面的影响或压力。一是国内各种较显要的“压力集团”和舆论的要求。这种状况有时对执政者的决心可以产生很大的影响。例如 1993 年年底正当“乌拉圭回合”的农业谈判几乎陷入僵局时，法国农民举行了声势很大的示威游行，这对政府同美国的斗争无疑既是一种支持，也是一种促动，使法国政府在谈判中必须反映农民的要求，同时也从农民那里受到鼓励。再如历届英国政府在欧洲统一问题上，总是与欧洲联盟其他成员国的立场理不顺，主要原因之一便是国内的留恋和坚持英国特殊地位的力量仍然很具实力，同时倾向于欧洲统一的力量也有很大的实力，以致无论持何种政见的外交决策人进入唐宁街，都难以固守自己的观点和立场。至于国内舆论的呼声和政治文化的因素，在西方国家制订对外政策的过程中，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这在美国尤为显著，常可见白宫和国务院都时时受到这方面压力的制衡。

再者，一国民众的普遍情绪也常常可以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这种倾向一旦发展到十分强烈的程度时，就会带有民族主义的感情。因此政府必定要适当地在政策中加以考虑而不能弃之不顾，特别是在大选之前更是如此。民众情绪和政府的政策不合拍，政治上的表象与人民感情不一致，是常有的事；在矛盾不激化的情况下，两者可以有不同程度的相互容忍和相互默认。例如，法国普通百姓当中对德国的动向每每因历史经验的惯性而抱有微妙的芥蒂心理，但并不妨碍法德合作在欧洲联盟中的核心作用。

二是来自国际政治方面的影响。战争与和平的交替转折，一种新格局的形成，一个突发的国际事件，等等，都会迫使一个国家改变其外交政策的思路。外部压力可以促进国内的团结，由于需要“一致对外”而取强硬立场；也可因外部压力太大而内部的“抗压力”不足以相抵而取“妥协”姿态，或在对外政策上作相应的若干调整，新生的苏维埃俄国签订布列斯特条约即属此；国际局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原有格局被打乱，外交政策则随之作相应的调整，最现成的例子就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东欧巨变和苏联解体导致国际格局的大变化，世界上几乎所有大国都不得不调整对外政策的思路。当然，为了掩盖和缓解内部矛盾而求助于“强硬”的对外政策，在历史上也不乏其例。

外交思想通常指的是一些大的方面，例如，这个国家在国际关系格局中占据怎样的地位，起怎样的作用；已经到手的，要保持，要发展；没有到手的要争取；在被迫要失去时，要力争少些损失，等等。

这样的目标具有民族性，它不是哪一个人拍拍脑袋想出来的。它是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基于多种因素的综合而浮现出来的；是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本能。当然，历史人物由于他们各自认识客观事物的角度和水平不同，对事物的判断不同，可以对事态的进程起促进或促退作用；也可以因形势所迫而事与愿违；但是，任何一个民族在历史进程中自然树立起的目标和为达到它而产生的

意志，总是时隐时现地存在着。换言之，一个民族在对外关系的舞台上如何动作，是同它的成长史联在一起的，因而有相当程度的必然性。试比较一下例如俄国从莫斯科公国扩大为俄罗斯、彼得一世寻找出海口的历史，英国参与欧洲大陆角逐、开拓海外市场的历史，法国作为一个走出中世纪的第一个中央集权大陆国家建立和巩固“天然疆界”的历史，德意志民族分多于合、为划出一个相对稳定的边界而努力的历史，……或许可以想象得出它们各自是从怎样的起点来观察自己外部世界的。“起点”很重要，不存在没有“起点”的历史。从这些国家今天的状况跳回去同它们的“起点”相比，当然接不上茬。然而当沿着历史的轨迹回溯时，就会发现它们是怎样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从几百年前不可能一下子跳到今天，中间有许许多多不间断的进化着的连接点，因此从古到今的发展，借用美籍华人史学家黄仁宇先生的话，是体现了“历史的长期合理性”。在对待外交思想这样的问题时，这种历史因素是不可忽视的。

但是，一个国家的外交不可能是、也一定不是始终如一的，它随着主客观条件的变化发展而有阶段性的侧重点。因此，变化是常态。这样的例子几乎俯拾皆是。例如，二战结束后10年“冷战”时期的美国和它的西欧盟国的对苏政策，到60年代就有了很大变化，而苏联的对美对欧政策显然也有很大变化。再如，联邦德国“新东方政策”的孕育、制定和执行，虽然与勃兰特等政治家个人的作用有很大关系，但更反映了“新东方政策”所依据的主、客观历史条件发生了变化。它不可能产生于50年代，也不可能等到80年代。历史条件是客观存在的，它必然地对一国的外交产生重要作用，一个国家外交政策的制定者总要对自己国家所处的历史条件作出判断，并据以制定政策，问题在于由于对历史条件的观察视角不同而作出的判断可能不同。常有这样的政治家由于没有看到、或足够地看到历史条件已发生变化而仍然坚持自己先验的政策观点。这不能说明历史条件的作用不存在，只能证明

这个政治家对所处的历史条件了解得不准确或不正确。

因此，历史地来看，某一国的外交思想可以有前后联贯的几个阶段，每个阶段又都有其侧重的方向。这个问题在下面说到关于西方大国外交特色时还要述及，此处不赘。

一国的外交思想与这个国家的“内部结构”也有直接关系。所谓“内部结构”（internal structure）主要指的是：一，政局的稳定性，政府能否最大限度地控制局势，并取得国民的支持，能否在对外政策上代表本国的基本利益和各种政治力量的最大限度的共识。二，它的经济实力，如生产力水平（工业化程度和科学技术水平），国民生产总值和人民生活水准，对外经济贸易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等。三，国防力量的可信性，如军队的实力，政治、技术素质，现代化的程度，等等。一国的“内部结构”巩固到什么程度，既是政策制定者的内部依据，又是政策执行者的必要后盾。一种有效的外交政策离不开这三个条件中的任何一条。换言之，一国外交的定格，取决于这三个条件所能达到的水准。任何一个环节出了大毛病，外交的效力都会受到影响。理由并不复杂，因为从本质上说，任何一个国家的外交都不可能不是它的内部政策的反映；用美国史学家查尔斯·比尔德的说法，“不管怎样按照某种世界面貌来构想，对外政策总是国内政策的一个方面——一个不可逃遁的方面。”[①] 当然，国家的资源、幅员、人口的条件也是构想外交政策必须照顾到的因素，它的水平如何可以对外交政策起不同程度的支持或制约作用。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外交。不过，大国或强国的外交与小国或弱国的外交不同。大国或强国的外交有两重任务：一是尽量保护自己的利益；二是尽可能地扩大自己的影响。小国或弱国则只有尽量维护自己的利益一条。大国或强国的外交时常能对世界局

---

① 转引自〔美〕肯尼思·沃尔兹：《人，国家和战争——一种理论分析》，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54年，第80页。

势和国家关系产生较大的影响，因而在外交上可以掌握较大的主动权，小国或弱国外交的主动权相对要小得多，被动性要大得多。俗话说“小国无外交”，意思就是说它在国际关系中处境的限定性较大。如果这个国家是严重分裂的，则它甚至不可能有完整意义和集中意义的外交。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看，主动的外交思想只能属于大国或强国。这并不是轻视小国或弱国，而是说的是事实。拿破仑战争后的欧洲之所以形成五个权力中心，就是因为在当时只有这 5 个国家能够左右欧洲局势。其中的法国是战败国，然而为了稳定和平衡战后格局，维也纳会议在剥夺了法国在拿破仑战争中兼并的领土之后，还是要保持复辟后法国“正统主义”的固有边界。

这个道理其实是很平常的，一国外交的影响力最终是同它的现实的或潜在的实力成正比的。彼得大帝以前的俄国绝对不可能加入任何真正的“力量均势”的俱乐部。普鲁士如果没有经过腓特烈大帝的文治武功，它就不可能在受到拿破仑惨重摧残之后几年就恢复了元气，并且反过来参与对拿破仑战争并取得决定性胜利；而若没有对拿破仑战争的反法联军的胜利，则普鲁士连保全自己的独立都不可能，更不用说加入“力量均势”的行列了。

这就是说，从 19 世纪的西方外交看，大国或强国的外交和小国或弱国的外交，不同点就在于大国外交的任务有两条，一是保全自己，二是扩张势力。而小国则只能有力求保全自己这一条。一个国家只能当它变得强大起来了，它的外交才能从以被动态势为主转为以主动态势为主。而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里，这种主动态势便往往带有扩张自己的实力和影响的意义。美国从建国初始的华盛顿、杰弗逊的对欧政策发展到门罗主义，就增加了“主动”的成份，及至提出机会均等的亚洲政策，直到把“门罗主义”推向全球，做着“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RICANA）的梦（不管这个梦在多大程度上切合实际），那“主动”姿态就发展到了极点。当然这并不是说小国或弱国就不可能有“主观能动”的外交。

但是这种“主观能动性”更多地是表现在怎样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利益，使之少受或免受大国、强国或局势变动的损害。

外交和文明

下面让我们探讨一下西方外交与文明的关系。

乍一看，外交与人文条件并没有什么直接关系，深究起来，它们之间是有条“暗线”牵着的。而所谓资本主义之作为一种体系，则必定是在与之相应的人文背景下形成的，作为政治的外交自然不能脱离开文明对它的影响。对此，拟作如下两点简要的探讨。

第一，本书所用“西方”这个概念，说白了就是泛指欧美实行资本主义体制的大国，因此这里的外交亦是这些国家的外交。资本主义实行最早最完备的是英国，荷兰虽更早有了资产阶级革命和近代生产关系，但是具有全欧影响，继而远播海外的是英国。从政体上说，1688年的“光荣革命”就基本上解决了，此时霍布斯的《利维坦》已经出版了好几年，它代表着一种“气候”，表明英国在跨入近代的时候需要构建起“巨灵”般的近代国家机器。17世纪是英国大体完成资本主义政治构建工作（虽然“资本主义”这个词语是近两个世纪以后才有的）的世纪，这大体可以以洛克《政府论》的出版为标志。英国用了差不多两个世纪的时间，终于在经济上确立了第一个完整的近代资本主义体系，在“光荣革命”百年之后贡献出亚当·斯密和李嘉图这样的新“经济制度”代言人。这里勿需多说英国这一时期在殖民开拓方面的进展和对西欧大陆诸殖民主义国家的威胁。英国此时不仅是第一强权，而且是这种新制度的传播者。

英国的经验迅速传到西欧大陆。伏尔泰、孟德斯鸠把英国的哲学和政治学传到法国，卢梭的“民约论”继承和发挥了霍布斯和洛克的政治学。遍及欧洲大陆西半部的启蒙运动至少有两个来源：一是笛卡尔的传统，再就是英国的影响。英国革命是法国革

命的预演；虽然作法不同，结果却相同，即：最终使西欧的民族国家巩固地营造成型，同时使代表着生产力和商业繁荣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于 19 世纪中叶成为西欧的制度。

欧洲文明于是现出了新面貌，植根于希腊、罗马和基督教的传统价值观的欧洲文明在当时是最具楷模性的文明。这些国家在同别国打交道时，在它们的意识里有两点十分清楚明确：它们每一个都立足于自己所属的“民族国家”；它们每一个都作为“先进文明”的代表。至于当时还没有具备这两个条件的民族，它们的任务则是要竭尽全力去争取(如 19 世纪的德意志民族)这种资格。因此，近代欧洲文明是充满竞争的文明。

如果说世界进入近代史期以来，确实曾经出现过所谓“欧洲中心论”，那在很大程度上说，是因为欧洲确曾是唯一产生先进文明的地区，其他地区在同欧洲接触以后都不能不处在它的影响范围之内。

“欧洲中心论”曾是 19 世纪末以前的事实，那时的西方外交也只限于欧洲列强之间，严格地说当时还没有名符其实的“世界政治”。19 世纪末的美西战争和日俄战争发出一个信号：欧洲专美于前的时代即将过去，美国和日本走进世界政治的前列来了。这对于欧洲颇具挑战性，“欧洲”文明便扩延为广义的“西方文明”。

如果说 20 世纪前半叶还延续着列强间战争与和平的交替，其间甚至发生过两次世界大战；那么到 20 世纪后半叶，尤其是在苏联解体东欧巨变以后，西方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则更多地是努力显示其文明的“现代性”和“示范性”，努力使西方文明（从高科技到市场经济，到价值观等上层建筑）起“领导”世界潮流的作用。

新时期的外交，当然还要花很多精力去解决那些大大小小的具体国家间的问题，这方面的斗争有时还会是十分激烈的。然而从世界总体而言，西方外交以其先进科学文明为依托居于某种主导地位，乃是不能否认的事实。当然由此也可得到一点启示，任何一个民族今后若要在世界政治（外交）中取得主动并且发挥任

何别国不能小视的作用，必须使它的文明能自立于世界前列，或使之具有足以使别人刮目相看的强大潜力和挑战性。

第二，西方有同源的基督教精神。这里不来谈基督教的教义本身，也不谈宗教内部在历史上曾分成多少派别和它们之间的斗争，甚至不谈宗教革命对于资本主义诞生的意义。这里说的只是一种指导人们行为的精神和观念，也就是一种所谓“天职感”、“使命感”。基督教自认为是唯一能体现神的意旨的，其他宗教以及无神论都属于“异端”；因此基督教从诞生之日起就为自己规定了要感化天下非基督徒，使之转化为基督徒的任务，而且形成了传统。基督教作为一种传统文化精神渗透到西方的每寸土地；作为一种道德行为的习惯准则，使每个人从出生起就认同于它，受它的规范，同时又加以传播：把自己所谓的“善”传导给别人，“己所欲者，必施于人”，在西方文化中已成为本然的东西。这种“布道”精神就像中国人讲“孝道”、讲“中庸”一样，成为不言而喻的品格。基督教诚然在政治上曾经在法国大革命时遭到过一次沉重打击，但是没有多久又被拿破仑恢复了。基督教文化直到今天仍属于西方的“文化自性”(cultural identity)。西方人只要一提基督教，就像对于希腊哲学、罗马法学一样，立即产生一种“认同感”，其价值已不仅停留在宗教信仰层面上，而且成为区别自己（西方）和他人的标记。

这种基督教精神（进取的、进攻的性格）对西方外交的目的性和宗旨有着相当深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当把这种精神同宣扬自己的价值观结合起来，以之为“天职”和“使命”的时候，外交就同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了。此时的外交绝不只是为了解决国与国悬而未决的争端而运用的具体谈判技巧，而是文化价值传播的航道。

以上讲的是文明或文化对政治的一般影响，下面专门谈谈意识形态与外交的关系。这个问题比一般的文明与外交的关系容易说清，因为它在现实中经常提出，没有那么曲折和隐晦。谈到这

个问题时，最容易唤起人们记忆的，莫过于二战结束后的“冷战”时期，两个阵营的分野和对峙是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立为特征的。一方是资本主义阵营，这个阵营里的国家实行的是资本主义制度，它们把自己称作“自由世界”；另一方是社会主义阵营，这个阵营里的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即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后来，社会主义阵营里发生了变化，中苏分道扬镳以后，原社会主义阵营的欧洲部分遂称自己为“社会主义大家庭”。总之，总有一道意识形态的墙。那个时期，特别是战后的最初十几年当中，这个界线是极为分明的，自己都说自己的制度是最优越的，两个阵营相互视为“非我族类”。指导一国外交的，是它的政治信仰，政治上的归属和认同是带有决定性的准则。在谈到一国利益时，这个利益观是把意识形态因素也包括在内的。

用意识形态作为对外关系的准则，其实不可能是纯而又纯的，它经常会用来掩盖其实并非意识形态的意图。例如，苏联对原来阵营中的盟国的许多大国主义、干涉主义，就都是打着“国际主义”的旗号干出来的。最昭著的如武装占领捷克斯洛伐克。这就是说，意识形态的某些准则每每可以用作实现某种政治意图和施加政治压力的工具。所谓“人权”外交，其最终目的也是迫使“异类”变为“同类”而附合其政治意图，认为全世界都应该实行他们自己认为“最优越的制度”和价值观。于是对于不实行这种制度的国家，他们就以最高仲裁者的姿态，用自己的是非标准加以衡量评判。

二战结束以来，特别是“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问题的内容主要是两种社会制度之间的斗争。国家关系受它的影响很大。其实，这种现象应该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就出现了。那时只有一个苏联，所以那时作为两种社会制度和两种意识形态的斗争，是众多的西方列强同苏联一国之间的斗争。发展到最尖锐的时候到了兵戎相见的程度，即大家都知道的 14 国武装干涉。而在苏联方面，列宁的共产国际学说也是要把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作为最先

进的制度推广到西方的。列宁在解释共产国际基本任务的提纲时即说，这个提纲的主要之点就是“把我国革命经验的某些基本点和我国革命运动的教训传播到许多西方国家去，传播到西欧去。”[①] 当然列宁说的“共产国际”的基本任务，没有说这是苏联外交的任务（在外交方面，列宁提的是两种制度的“和平共处”）。但是“共产国际”是苏联领导的，因此，西方国家一直认为列宁的“和平共处”外交是一种政策（手段），把共产主义推向全世界才是目的。西方国家因而视之为危及资本主义制度的“洪水猛兽”，必欲扼杀之而后快，于是便有了上面说的 14 国联合干涉。

所以西方国家有些史学家写“冷战”史便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开始的。

至此，我们所讨论的意识形态斗争指的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斗争。因为进入 20 世纪以后，除了没有独立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以外，资本主义已成为统治世界的制度，猛然出现了一个社会主义制度，所以斗争便不可避免地在这两种制度之间展开了。

然而，如果把眼光往外交史的深处看，在社会主义与政权结合起来以前，也可看到意识形态在国家关系中的影响；只不过不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问题，而是欧洲进入近代史期以后各国在资本主义道路上迅跑当中出现的不同思想的斗争。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所引起的国际反响就是这种斗争的反应。丘吉尔在比较英国、美国和法国革命时说了这么几句话：

> 英国革命完全是英国国内的事情；美国革命基本上也是美国国内的事。但是，法国革命却跨出巴黎而遍及全欧陆。这场革命诱发了一代人的战争，其反响甚至延续到 19 世纪及其以后：每一次大规模和全国性的运动，直到布尔什维克赋予

---

① 列宁：《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摘录）》，《列宁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1972 年，第 315 页。

1917 年的事件以新的方向，都不免要援引 1789 年在凡尔赛提出的那些原则。[①]

于是反法联盟便以恢复“旧秩序”和所谓正统主义的名义、防止法国革命影响蔓延的名义组织起来。同时以拿破仑为代表的革命后的法国则以革命名义向外大举扩张，对峙很快发展成为战争。随着战争的进程，拿破仑战争随即衍为压迫弱小民族的帝国主义掠夺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拿破仑打的旗号是把法国革命的成果推到法国以外；以英国为首的反法联盟打的旗号是要恢复被法国革命摧毁的“旧秩序”。当时能够提出同法国的原则相抗衡的，是议会史比法国早得多的英国，英国在对欧洲大陆政策中一直以“榜样”自居，19 世纪的英国政治家们虽然在北美败在美国人手里，在欧洲大陆却击败了激进的法国人。马克思在评述帕麦斯顿勋爵时说他“继承了英国负有在大陆上推行宪制的使命的学说”[②]，“迷恋‘光荣的英国宪制’的奥秘和‘英国自由体制的好处’”，因而要“力图在整个大陆上推行这些事物”[③]。所以那时的外交也披了一件意识形态外衣。

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以后，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为界的“一分为二”的格局消失了，战后雅尔塔体系彻底瓦解。至少在欧美，那种战后政治的意识形态化不复存在。事实上在苏联和东欧发生巨变以前的若干时期，东西方关系的意识形态色彩已经逐渐淡化了。70 年代的赫尔辛基会议实际上标志着东西欧北美地区开始在价值观问题上实现了某种程度的认同。在以后的几次续会上西方文明的价值观都一次比一次更加明确得到与会国的确认。战后初期各种社会制度的势不两立局面，在苏联解体东欧巨变前就

---

① 〔英〕丘吉尔：《英语人民的历史》，Greenwich House，纽约，1955，第 298 页。

② 马克思：《帕麦斯顿勋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9 卷，人民出版社，1965 年，第 391 页。

③ 同上书，第 397 页。

已经改观了。

然而，意识形态在国际关系中的淡化，并不意味着西方的外交也因而摆脱了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只不过针对的对象有了新的侧重。以前特别集中于以苏联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现在则除了针对共产党掌握政权的少数国家而外，也针对着与欧美文明不同体系的其他文明。前面说过基督教文明从来就自认为负有教化非基督文明民族的“使命”，从十字军东征到传教士的遍布天下，都说明了这种世界文明观。这种历史文化的基因经过欧洲中心主义的冶炼，深深地渗透进西方政治文化的血管里，及至帝国主义扩张时期来到这个世界上以后，这种必欲对其他地区施行“教化”的心理就变成了政策，必欲世界各地都实行西方的制度。美国学者麦克·亨特有本著作，题目叫作：《意识形态和美国的对外政策》，他写了这样一段话：

> 到20世纪，（美国）出现了三个直接与对外事务有关的核心思想，三者加在一起开始对政策发挥强有力的影响。用以规范美国未来的首要思想，是寻求与促进自由事业密切相联的民族伟大感。这种思想是经历过并克服了三度坚决抵抗——18世纪90年代，19世纪40年代和90年代——之后，在世纪之交牢固地定了位的。用以规范其对其他民族的第二个意识形态因素，是一种种族的级别观念。这种关于种族的观念，源于美国白人为无论在何种不同的地区准则下都能取得和维护其至高无上的权力而进行的斗争，所以在为获取优胜地位的核心思想中居第一位。第三种因素在于规范它对海外政治社会变革可以接受的程度，坚定不渝地确认，革命，即使可以是一种取得好结果的力量，也能够很轻易地转变到危险的方向上去。对革命的态度，一如对种族问题的态度一样，在前一个世纪中是相当一贯的；但不同于对种族的观点是，在这个时期还只是偶然提及。直到本世纪第一个10年，这个因

素在意识形态的构建中表现出的力量和地位才由于要回应国外革命活动的爆发而确定下来。[1]

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概括麦克·亨特的表述，那就是：第一，美国把“自由”传播到世界其他地区去看作是美国的“民族使命”。这就为干涉别国内政提供了借口。第二，把其他民族根据其同美国的亲疏关系而加以政策上的区别。因此，也就导向对有色人种的歧视。第三，对不同于美国模式的革命，特别是对由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领导的革命，采取敌对态度。

亨特的这几点概括是很中肯的，事实上，这些根深蒂固的观点对美国的对外政策的影响是很深的，而表现在行动上就往往成为对别国内政的干涉，甚至发展成为侵略性的战争。

综前所述，西方（特别指中世纪以来的欧洲和近代史期以来的美国）文明，在其形成过程中就培育出了一种以基督教文明为正统和居于世界文明“中心”地位的传统。它以为自己是理性的代表、真理的代表、“天意”的代表，因而负有上帝赋予的使非基督教民族皈依基督教义的“神圣使命”，于是凡属教外的其他文明——如伊斯兰、儒家等——以及它视为非基督正宗的东正教派，都不同程度地被划为“异端”的范畴。进入近代史期以后，实行怎样的政治体制之争也具有意识形态的成份，而这种负有“使命感”的意识形态在外交上不能不产生影响。对于这个问题，近两个世纪以来总括起来说，可以按历史顺序得出以下的“三段论”：

第一，意识形态在对外政治的作用，在以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前，基本上属于资本主义时代的新旧体制范围内的问题，最突出的表现是法国大革命以后法国与反法力量之间

---

① 〔美〕麦克·亨特：《意识形态和美国对外政策》，Yale Press New Haven and London，1987，第17～18页。

的争斗，是反法联盟要遏制法国革命影响的蔓延，这是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当然，更重要的是要打掉法国独霸的野心，不管法国实行什么样的政治体制。到了拿破仑战争时期，作为斗争由头的意识形态已无足轻重了。以制度而言，英国议会制且早于法国，王权已经受到限制；问题在于方式，英国保留了王权而削弱之，法国革命则采取了十分猛烈的方式，直至对王公贵族采取了恐怖政策。纵使如此，若法国革命后的政府，特别是督政府以后，不向境外扩张、不进而危及欧洲平衡，则拿破仑战争不会像历史上所表现的那样，也许会绕过一个拿破仑战争。当然历史是不允许“假设”的。这里是讲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对峙以前意识形态在对外关系中的反映。

第二，世界上出现了势力日渐强大的共产党，并建立了政权以后，性质就不同了。实行了资本主义的欧美一些国家认为资本主义是人类先进文明的代表，要把西方的议会民主制度推向全世界，而共产主义的最终任务则是要在全世界范围内消灭一切剥削制度。两者在根本上就是绝然对立的，所以苏维埃国家建立以后，意识形态的对立就立即反映在对外关系和对外政策上。这种性质的斗争到反希特勒时因形势需要而暂时冲淡了，到战争后期盟国在战争结束后安排问题的几次会议，主要表现就是三个大国（实际上是美苏两国）如何分割势力范围。战争尘埃落定，意识形态之争重又抬头，人们习以称之为“冷战”。在东西方尖锐对立的时期，意识形态和分割势力范围互为因果。双方都尽可能向对方扩散自己的价值观。二战后的头10年，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从战争中组成，从资本主义世界分离出欧洲大陆的一半（不算亚洲地区的中国、朝鲜、越南等），资本主义世界内的共产党的力量大为增加，因此，在这一时期，从意识形态的斗争态势看，社会主义方面取“攻势”，资本主义方面取“守势”。这种态势从60年代起开始向相反的方向转变。1975年赫尔辛基会议特别是以后的几次续会，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便一步一步地认同西方价值

观，在外交上的意识形态色彩在现象上趋于淡化。

第三，苏联和东欧社会体系解体后，西欧北美大国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攻势更盛。在各种高层官方国际会议、报刊舆论、政治界、学术界里以不同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宣传西方制度（意识形态）的“优越性”，集中地以推进欧美的“民主制度”和“人权原则”为己任，并以之作为对非欧美国家的对外政策的准则。麦克·亨特举出的第一点就包括了这样的内容。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 1993 年 10 月 13 日在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国务院外交培训中心落成典礼上的讲话中，就把“增强美国民族价值观念”、“扩大民主价值观念的影响”作为克林顿政府对外政策的“基本目标”或“工作重点”之一。[1] 前此，美国驻太平洋军队总司令查尔斯·拉森海军上将在东西方中心发表题为《美国在太平洋面临的挑战》的讲话中也说：“新太平洋共同体要求支持民主制和更开放的社会……因为民主制最符合美国的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2] 这类言论在美国高层人士中不绝于口，他们在苏联集团业已解体的新的时代条件下反复强调这个问题，显然是有特别意义的。

外交，从其大量的日常表现看，应是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政治。当通过外交把自己的文明覆盖面推向外界时，这种“外交”就有了意识形态的成分。文明的流动，是没有地域界线的，一种新的思潮、一种文学艺术、一种学术见解可以不胫而走。濡染性，是文明（或文化）的特性，时代愈前进，发达愈多样化，观念的濡染性就愈强。先进的文明要取代过时的文明，是必然的；然而任何先进的文明都不能无条件地“嫁接”或“取代”另一种文明，因而文明又有对异质文明的排斥性本能。所以，如果说外交思想不可能避免意识形态的影响，那只能表明它们之间的内部联系，而绝不等于就此确认外交有传播意识形态的功能。

---

① 美新署华盛顿 1993 年 10 月 14 日英文电。

② 美新署檀香山 1993 年 10 月 14 日英文电。

外交与主权

这里还须谈谈与此有某些关联的两个构成悖论的命题：

一方面，所谓国际关系，从根本上说，是主权国家间的双边或多边关系。决定这种关系的基本因素是有关国家的属于主权范围内的权益，任何国家的外交都不可能完全摆脱思想的影响，外交终归是内政的延续。然而国家之间的关系，或者国际关系，说到底是在利益（主权）问题上的协调或冲突、合作或对峙。另一方面，世界已经进入了全球化的进程，许多诸如军控、经济、科技、交通、通讯、人口、移民、生态、气象、缉私、反贩毒、反集团等等问题，都不是任何国家的主权范围所能解决的；有些“热点”问题，包括殃及境外的战乱与动乱、恐怖主义、黩武主义、法西斯主义等，则需要国际的集体干预。再如，随着时代的变迁、国际间首先在经济上的日益相互依存、相互渗透，已是大势所趋，所有这些国际现象都要求对于“主权”观念给以新的诠释。

怎样看待主权与外交的关系问题，略微回顾一下历史不是没有意义的。

一国外交，属于一国的主权，这本应是不争之论。根据国际法，主权乃是一个国家独立自主地处理对内对外事务的最高权力。主权的观念，是随着欧洲近代民族国家的诞生和形成而成为普遍接受的政治观念。由于它最集中地反映了国家的属性，所以同样适用于多民族的独立国家。我们在这本书里所涉及的西方外交，就处处体现了主权的作用。根据黑格尔的观点，国家具有“个体性”和“排他性”，国际政治中的许多问题都出在这个“排他性”上。脱胎于欧洲中世纪的国家既然都成为独立的个体，那么，每个个体便都有自己的完整性，都有自己的不可侵犯的主权。这个拥有主权的个体对别的拥有主权的个体，必定具有排他性或否定

性；对自身则具有防御性。因此，独立国家间的关系从其产生之日起，就只能是“独立主体间的关系”[1]，有关国家之间在相互承认的同时也就在它们的相互关系中寓有相互区别、相互排斥，直至相互否定的一面。

黑格尔说：

> 一个国家的正统性，或更确切些说，由于国家是对外的，所以也是主权的正统性（在黑格尔的时代，主权体现在王权上——引者），一方面是一种完全内部的关系（一个国家不应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另一方面，同样是本质的，它必须通过别国的承认才成为完善的。但是这种承认要求一项保证，即别国既应承认它，它也应同时承认别国，就是说尊重别国的独立自主，因此，一国内部发生的事，对别国说来不是无所谓的。[2]

这里，黑格尔说的并非深奥的大道理，只是对国际关系特点的直平叙述。它说明，国与国之间建立和发展关系，无论是合作还是冲突，其前提都是不能不承认对方的现实性，即承认对方区别于自己的个性。黑格尔的逻辑是：由于每个国家都处于“自在自为的应然状态”，它们结成的一定关系便也是“应然”的。这里所谓“应然”，就是说，国家之间建立关系是出自需要而理所必至；有关国家并不是事先根据某种法或某种共同接受的道德规范才结成一定关系的，所以从本质上讲，相互之间并不承担任何道义上的义务。

但是，国家间一旦建立某种关系，哪怕只是“共存”的关系，就立即会在利益上发生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当问题发展成为争端，

①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中译本，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第 346 页。
② 同上书，第 347 页。

争端又发展到非使用战争手段无法解决时，直接的冲突便不可避免了。

所以，主权的原则也可以说体现了利益的原则，是各有关民族的历史经验和现实需要所决定的。当然，在相互依赖日益成为世界性现象的今天，共同关心的事情越来越多了，区域的乃至全球的合作和努力也是必然的，但那必得尊重参加这种秩序的国家的权利。主权国家、主权观念，还是十分现实的。康德式的世界主义毕竟只是哲学的构想。

确实，不同国家、不同观点的政治家和学者，对主权可以有不同的解释。但是，自从18、19世纪直到今天，国际政治一直是主权国家的国际政治，而占主导地位的一直是强权政治，只不过哪些国家成为“强权”有所增益而已。联系到对主权观念的阐释，则一般说来，今天比较强的国家不断强调主权观念已经过时。例如美国，就不像它在刚从英国殖民主义的统治下取得独立时那样突出主权的不可侵犯性，因为它的主权已不存在受到威胁的问题。而比较弱的国家，就必定要强调维护主权了。60年代的“勃列日涅夫主义”是人们都很熟悉的。那时的苏联主张在“社会主义大家庭”中实行“主权有限”，要求“大家庭”的成员把自己的主权服从于“大家庭”的政治需要。这种“主权有限论”发展到顶点便出现了举世谴责的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武装入侵。今天的某些限制主权的论调，实与20多年前的“主权有限论”惊人地相似。

即使在发展水平相差不大的国家，也不能不讲国家主权。主权的“转让”问题讨论最多的是欧洲共同体。至少有两件事值得一提。

第一件是60年代讨论欧洲的政治联合问题，戴高乐公开提出“祖国的欧洲”的观念，以之同欧洲联邦的观念相抗衡。

第二件，20年后，英国的撒切尔夫人在同欧洲共同体执委会主席德洛尔争辩时，又提出了主权国家的合作问题。

还可以再加上近几年来围绕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制定和批准的

曲折。这些都说明，欧共体诚然包涵着相当程度的主权“让渡”成份，但那终归是主权国家间的妥协，“让渡”与否，“让渡”多少，决定权握在成员国手里。

所以，在谈到世界政治时，国家主权一直是十分现实的。因为在这个世界上还存在着利益的多样性；国家分歧、矛盾和冲突，说到底是利益的分歧、矛盾和冲突。国际合作只意味着利益的结合。哪一个国家的主权受到损伤，哪一个国家就一定会作出反应。也许到了“世界大同”（World Commonwealth）的时候，国家和主权也就没有必要了。但今天还远远不行。因此，所谓“外交”就必定属于国家主权的范畴，并且是为维护主权原则服务的。

原理问题弄清楚了，则对主权的新的理解并非对主权的扬弃，也就可以解释了。例如，国际间的一些合作协定，在许多情况下，就是主权的相互妥协。但是这种“妥协”从总平均上应是相互的。欧洲共同体的所谓“主权让渡”或“辅助性”原则，就说明了这个问题。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产生的前前后后，一方面当然可以说是“欧洲一体化”的一个成就；但另一方面也恰好说明，属于国家主权的利益是不可能轻易“出让”的——哪怕是一部分的“出让”都必须得到回报，蚀本的买卖谁也不愿意干。至于有的出于无奈被迫“出让”了部分主权，那不能因而解释为“主权”观念已经过时。

对于所谓“集体干预”，同样若只从概念上来解释，也会陷入一种“二律背反”式的困境，所以不能一概而论。作为一种“权宜之计”，只有通过某种形式或某种程度的国际“集体干预”——如向索马里的人道救援遭到阻遏和破坏、向波黑、柬埔寨派遣维持和平部队等等——才能有助于保障接受这种干预的国家的根本权益时，国际“集体干预”才有其合理性。因此，“集体干预”不应是无条件的，也不能没有限度。无条件的、越过限度的“集体干预”，就必然异化于最初宣布的意图。把联合侵犯别国主权的行动合法化，那就是一种“强权政治”的表现。所以，有条件、有

限度的“集体干预”不能视为对“主权”观念的扬弃。(“集体干预”并不是新鲜事，康德在《永久和平论》中就使用过这个词；康德是把它看作权宜之计的，而且在提到这个概念时，他也同时提出不得干涉别国的内部事务。)

再有一点须加说明者，某国之外交运作特以传播某种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为目的，就必然以对方是否认同或接受这种价值观作为国家关系的基本条件，若更在行动上向对方施加种种压力以使其就范，则势必使正常的国家关系受到损害。在这种情况下，意识形态每每只是达到政治目的的手段，因而其意识形态之主张并不能一贯，甚至连它自己也常言行不一，施之于别的国家，自是依远近亲疏而实行不同的标准。结果以所谓维护某种道义上的原则而对别国横加压力，其行为必与其所宣称的原则相抵触，而成为强权政治的一种表现。

所以，对于以维护某种道义原则为旗号的外交行动，必须作具体的观察和分析，不能以其使用语言的“表面价值”为真的价值。口头上的很崇高的“信念”一旦成为实行某种政策的手段，那“信念”就异化了，甚或竟是虚伪的。

最后，还应补充几句全球化与主权问题。

世界已经进入了“全球化”时期，这已是必然的趋势。它首先是一种哲学理念，中外古圣先哲都有这类从人类社会发展总体趋向出发而提出的光辉思想。其次，自500年前“地理大发现”的伟大航行开始，不仅世界连成一片的观念已经诞生，而且生产力（特别是经济和科技）的持续发展改变了和正在改变着社会的面貌，各个民族的相互接触、沟通、了解增加了，具有普遍的世界意义的科技革命正在把世界各国都组织在一张“全球化”的大网里。

然而“全球化”又是一个痛苦的漫长进程，其间充满着难以尽述的矛盾、冲突、斗争和战乱；以全球化的趋势观察人类发展史，并不能因此就否认国家主权的现实性和根本原则。

近代西方外交史述要

西方外交，可以说是与欧洲资本主义的诞生和成长同步发展的；或者说是与欧洲民族国家的诞生和形成而同步发展的。诚然，“外交”的英文源于古希腊，但希腊罗马时期，除了内外征伐之外，实无我们今日所理解的“外交”可言。日耳曼之取罗马而代之，也谈不上什么“外交”。欧洲中世纪中期，西欧社会随着生产的发展形成了无数个实体，每个实体（村庄、镇或后来的邦）都有自己的封建领主，每个实体都有一个教堂，每个实体都有自己的农田、手工业生产，形成了一个个独立单位。日耳曼人在西欧取代了罗马统治地位的时期，“蛮族”人通过基督教化而成为西欧的主人，法兰克王国号称“西方帝国”，那些一个个的村社、市镇实体都共存在统一帝国的麾下。直至公元8、9世纪，民族的意识开始明确起来，因而在王国开始孕育民族国家的胚胎——民族经济、文化，包括语言、风俗、人际关系的特殊性，使本来就存在的民族分野进一步明朗化，法兰克王国的“一分为三”便是这种政治、经济、文化演变的反映和结果。然而所谓“神圣罗马帝国”却没有像法兰西民族和盎格鲁—撒克逊民族那样建立起日耳曼的民族国家。但是，欧洲发展到中世纪晚期，法兰克王国式的西欧已经为许多各自拥有自己主权的大小君主国所取代。它们依各自不同的教派，或结成盟友，或对立为敌人，经历此起彼伏的武装冲突，以及连续不断的宗教战争，终于衍为17世纪的更大规模的30年战争。而1648年各参战国在战后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这个欧洲第一个大的国际条约，则标志着欧洲进入了近代史期。虽然在政治上加深了德国的四分五裂局面，但表明在“和约”上签字的国家之间必须建立起战争以外的关系，可以说西方外交史从此揭开序幕。尔后一个多世纪内，尼德兰革命、英国革命、美国独立战争——脱离英国统治的民族民主革命、法国革命，接踵爆发，资本

主义与殖民开拓相伴而行，获得空前发展。至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前夕，西欧诸强虽仍均为君主制，但民族国家经过这一两个世纪已完全成形——国际关系更着重于"国家"间的关系，而不只是"君主"间的关系了，用腓特烈大帝的话来说，"不可分离的纽带使君主附着于国家"，"君主代表国家"。[1] 这到19世纪，拿破仑战争以后就更清楚了。外交在处理各国间关系问题中的作用，也就发挥到了极致。因此，我们这本书即大体上从这个时期，即法国革命前后开篇。

根据上面这些扼要的历史回顾，有一点情况是与主权国家的外交关系至关重要的，这就是民族国家的最后形成。这是西欧的一个特点，西欧的各个民族都组成自己的民族国家，从而"每一个民族，也许意大利除外，在欧洲毕竟都有一个特别的大的国家为其代表；所以，日益明显日益自觉地建立民族国家的趋向，是中世纪进步的最重要杠杆之一。"（恩格斯）[2] 国家成为民族的代表，它象征着这个民族有了自己的领土主权，自己的政治经济结构，属于自己的法规、军队、警察，等等，总之是一个独立存在的实体。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体现在国家间关系上，外交从此也带有鲜明的国家印记。此时的欧洲在形式上似乎有些像放大了的古希腊，每个国家有如彼时的城邦，集中地交错一处，有着曲折宛转的小城和山脉，虽然雅典和斯巴达时时进行血腥的搏斗，但都说自己是希腊人。统一的"西方帝国"只存在于理念和梦想之中，现实则是十分的不统一。

欧洲似乎有两个事实。一个是梦中的"事实"，一个是现世中的"事实"。

所谓"梦中的事实"，即理念中的"事实"，指的是欧洲人祖

---

① 《十七、十八世纪的欧洲大陆诸国》，《世界史资料丛刊》，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63页。

② 恩格斯：《论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国家的产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452页。

祖辈辈的认同感，所谓“欧洲”是欧洲人的欧洲。所以“欧洲统一”便成为一种千年梦想。古希腊、罗马、日耳曼先后自况为欧洲帝国的建设者，虽然谁也不曾把欧洲统一起来。这样的“统一”的理想在政治家是要借助强力来实现的，例如“罗马统治下的和平”(PAX ROMANA)。然而在欧洲的历史上却几乎没有一个强权能够做到。法兰克王国号称“西方帝国”，这仅仅是号称而已，名不符实，而且到中世纪中期便分裂了。后来有此资格的陆上强权法国，即使在路易十四亲政时期威震欧洲，所能做的也只不过是巩固和扩大法国的“天然疆界”。至于神圣罗马帝国无非是一个立不起来的破碎的帝国，而且以后欧洲中部的分崩离析状态还是它留下的遗产。以后，抱有以强力“统一”欧洲野心的，一是拿破仑，一是希特勒，结果都与愿望相反。英国曾是最强大的国家，但“统一”的观念只能来自大陆。总之，欧洲的历史决定了不可能由一个国家去建立欧洲的政治统一。

然而，从若干个国家结成联盟却是可以想象的，而且古已有之。这样的联盟设想可以分为两类。

一是与现实的需要（利益）相结合的。例如一些国家为了对付共同的敌人而结成临时性的防御性联盟；共同对敌的任务告一段落了，联盟也就解体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反法联盟”即是。或则为了维护某种秩序而结成集体干预性质的联盟，拿破仑战争后的“神圣同盟”属此。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法国政府总理白里安建议组成“欧洲联盟”也是要借集体的力量来稳定欧洲局势。这类事例不胜枚举，其共同特点之一是带有权宜之计的性质，是一种利益的简单结合，时过境迁，这种结合便归无效。其特点之二是基本上不以同源的“历史文化自性”(identity)作为支撑，因此这类联盟在精神上是貌合神离的。

第二类可以称之为理想主义的设想。虽然在开始时只是一种哲学构想，但却是有现实根据的。最有名的便是康德晚年的《永久和平论——一个哲学方案》。那是康德研究社会发展的“合目

的”性的一部很重要的著作。这本书除了从实践理性批判过渡到“道德律令”的人类学归趋这样的理论而外，还提出了制止人类最大灾害的战争的方法，其中之一就是共和体制的国家结成联盟，并且不断扩大联盟的范围，直到把全世界都包括进去，最后出现一个“世界政府”。这在 18 世纪末无疑是乌托邦。这本书问世的 1795 年，法国大革命正遇到危机，罗伯斯庇尔已于头年被处决，以拯救革命、继承法国革命原则为旗号的拿破仑作为“马背上的罗伯斯庇尔”，成为督政府的首脑，拿破仑战争就要揭幕了。康德的呼声在这种政治氛围中微不足道，然而它却成为尔后欧洲联邦主义者、主张“欧洲统一”的活动家、思想家们的理论依据。半个多世纪以后，由于形势的逼迫，以知识分子为前导的舆论界要求欧洲为和平而联合起来，接连举行了多次和平大会——1849 年 9 月在布鲁塞尔，1859 年 8 月在巴黎，1860 年在法兰克福，1867 年在日内瓦。在这些会议上，康德被视为欧洲联合的先驱；诗人雨果在巴黎会议上提出了“欧洲合众国”的概念；日内瓦会议后成立了“国际和平与自由联盟”，它的刊物遂以《欧洲合众国》命名。[①] 至此，欧洲统一问题已从理想主义的理论构想变成群众性的运动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出现的“欧洲共同体”以及今天变为“欧洲联盟”，都可以从上面的叙述找到历史根源，但是在运营上已增加了功能主义（Functionalism）的成份；历史的人文的理想和现实利益的考虑是结合在一起的。“欧洲联盟”并不等同于统一，路途还是十分遥远的。但是，“欧洲统一”作为一种欧洲人的理想，一种欧洲政治和经济的精神支柱，是根深蒂固的。欧洲，无论它在现实中何等的不统一、何等的千差万别，在人们的心目中一直是作为一种同源性的文化概念而存在；只要一提到欧洲，人们便

---

① 详参见陈乐民：《“欧洲观念”的历史哲学》，东方出版社 1988 年，第 133～136 页。

会既想到它产生了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又想到它具有的整个概念。欧洲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并存所带来的问题，是几乎任何一代领导人所规避不了的。

现在我们已经开始接触欧洲的第二个事实，现世中的“事实”了。我们当然不必重翻历史，然而把西方自 17 世纪以来的路线廓清一下，对于了解近代欧洲的外交取向关系很大，就是对于了解摆脱了欧洲控制的美国外交也有很大用处。因此对于今天的西方外交思想作总体考察，了解昨天是怎样发展到今天的，都是必要的。

要了解为什么近代欧洲的外交那样发达，必须先要了解走出中世纪的欧洲的一个最基本的特征，即地理上十分密集的民族国家，这些民族国家都各自是独立的主权国家。这种情况首先出现在欧洲的西部和中部。近代以来欧洲不再有亚历山大帝国、凯撒帝国、查理曼帝国，帝国与帝国以外的民族是后者臣属前者的关系。其他大陆如亚洲也不是这样的。亚洲的中华帝国直到 19 世纪中叶以前几乎没有真正意义的“外交”。所以在欧亚大陆的一隅出现了那么多的主权观念清晰的民族国家，相互或为友或为敌，并为此结成其成员不定的同盟，是自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来只存在于欧洲的特色。

然而，这里需要作一点重要的补充说明。说民族国家是近代欧洲的特征，是说民族国家在那时已是欧洲政治的必然趋势，并非所有的民族立刻都有了自己的国家。例如德国就在很长时期内没有像英国和法国那样组成政治上的中央集权，而是处于分裂割据状态。“皇帝的地位日益变成与诸侯相似的一个诸侯了。”（恩格斯）[①] 德国皇帝颇有点像我国先秦时期的周天子。而帝国内的大采邑领主们都变成了独立的诸侯，并且在自己管辖的采邑里实行中央集权，像一个“国家”那样有自己的内政外交。及至 19 世纪后半叶，分崩离析的德国、意大利才组成了统一的国家的时候，从

---

①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单行本，人民出版社，第 22 页。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起在整个欧洲西半部建立民族国家的任务才算告一段落。

黑格尔在论及宗教革命后的欧洲局势时，已经指出，当时政治面貌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出现了一种“相互联结的国家体系”(a connected System of States)，这些国家“卷入了各种战争，君主们既已扩大了他们自己的政治权势，也转向国外的土地，坚持提出各式各样的要求。”“这一时期进行战争的目的和实际利益一律是征服。”[①] 在这些以征服为目的的战争中，“各种不同的政治力量产生了共同的利益，其目标是维护多样性——使许多国家得以保存其独立——即‘力量均势’。”[②] 欧洲以国家为单位的体系，成为维护“力量均势”的手段；宗教革命以后，民族国家的政治权威实际上正在取代罗马教廷的地位。黑格尔进一步指出：“这种新的政治动机必然带来一种外交环境——在这种外交环境中，所有这个伟大欧洲体系的成员，不管它们相距远近，都感到凡对任何一员发生的事情，它们自己也都有干系。”[③] 黑格尔认为这种维护“力量均势”的外交思想，先在意大利达到极致，然后又传到整个欧洲。[④]

这种现象——民族国家的体系——是必然的；而既然有那么一些相互独立的政治实体，则它们之间形成一定均势或为形成某种均势而发生冲突，也就是必然的。所谓“力量均势”并不是一种常态和静态，而时常是新均势代替旧均势。因为，比较强大的国家总要打破既定的均势，建立对自己有利的新均势，即“优势”均势。“均势”是力量经过较量后的相对稳定状态。过一段时间，均势再次被打破，又开始建立新均势，欧洲历史总是这样进

① 黑格尔：《历史哲学演讲录》，英译本，多佛出版社，1956年，纽约，第430～431页。

② 同上书，第431页。

③ 同上书，第431～432页。

④ 同上书，第432页。

行的，延续了几个世纪。起先是“威斯特伐利亚式”的均势，到19世纪则是集中在几个强权国家之间的均势。参与构建均势的国家都无例外地利用均势，或建立把自己的优势强加于人的“均势”。

维也纳会议可以说是把大国均势外交发挥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恩格斯说：“英国想保持并扩大自己的商业霸权，想保留掠夺殖民地所得的最大部分，并削弱其他各国。法国想尽量减轻自己的不幸，并削弱其他各国。俄国想增强自己的实力，扩张自己的领土，并削弱其他各国。”① 而普鲁士和奥地利则显然首先要争夺德意志的主宰权。

可以说，这种从“力量均势”出发的外交思想是欧洲历史上的特色，虽然至今还有影响，但到19世纪下半叶，黑格尔所说的欧洲国家体系已经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动摇。这里有几个新因素值得注意：

一，俄国从拿破仑战争以来逐渐取代了法国作为大陆强权的地位，它地跨欧亚，取代了土耳其在历史上的地位，整个欧洲都在它的视野之内，并把巴尔干地区当作它通向欧洲的第一块跳板。克里米亚战争也没有使它失去这种地位。在它以西的欧洲大国，都把眼光投向俄国，借助它同自己的“敌人”周旋。法国、德国都在不同时期同它结成有形或无形的同盟。

二，德国结束了大分裂状态，普丹战争、普奥战争、普法战争把德国推进欧洲大国之林。在1866年（普奥战争），德国整个西北部几乎都归普鲁士管辖，而在1870年（普法战争）又把德国的西南部归并过来。恩格斯说：“现在帝国的重心已经大大地向西移动了。”② 这种形势显然是新统一的德帝国制定其“东方政策”，

---

① 恩格斯：《德国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641页。

②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第11页。

同时亦是“西方政策”的现实依据。在德国土地上进行战争的历史结束了。从俾斯麦的“小德意志”政策到威廉二世的“世界政策”，姿态不同，但却只不过咫尺之遥。

三，美国在独立战争期间所牵涉到的国际问题，曾经是欧洲斗争的反光镜，到 19 世纪下半叶，美国开始步入世界政治舞台。美西战争是一个重要信号，它已经是一个世界级强国了。日本在东方也崛起了，日俄战争是一个重要信号，日本也要走进世界级强国了。美、日之作为新兴世界强国使国际关系突破了欧洲范围。它预示，欧洲将失去世界政治中心的特权。

四，东欧、巴尔干地区的政治意义加重了。这个地区复杂的民族斗争到 19 世纪下半叶日见尖锐，数度发生战争。这种形势背后站着各大强国。于是，两股线绞在一起：一股是中、东欧各民族的民族主义，另一股是互相敌对的大国同盟体系的对峙。这两股力量对形势形成的压力都超乎正常外交途径所能排解的程度。

人们所经历过的事实是：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俄国支持塞尔维亚，德国支持奥匈，法国支持俄国，英国支持法国……1914 年 8 月 4 日，各国军队开赴战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矛盾达到这种程度，外交已毫无意义。

事实上从 19 世纪下半叶起，旧均势在一步步地被打破，通过一场世界战争，前一个世纪建立起来的脆弱的“欧洲协调”连影子也没有了。在凡尔赛条约签订以后，欧洲没有了主心骨；这次的战胜国没有做到一个世纪以前收拾拿破仑战争后的残局那样，建立起一个即使是短暂的秩序。德国和奥匈战败，一蹶不振；俄国发生了革命；美国在提出建立国联后自己却退回到美国去；法国这个受到重创的战胜国，虽有收拾欧洲局势的雄心，但眼大肚小，而且孤掌难鸣；英国似是第一次遇到一个没有自立能力的欧洲，在对德国的处置上游移于宽、严之间，即使想拼制一个新的欧洲均势，也无从下手。总之从 1919 年起的几年内，欧洲外交一直在摸索方向。

然而，有两件事却很快在西方政治家们的头脑里明朗起来：

第一，发生了苏维埃革命的俄国和被剥夺而又迅速再起的德国，成为西方关注的焦点。丘吉尔在 1919 年的一次演说中说："非常巨大的险象仍然威胁着我们。人类的两个强大的支脉，斯拉夫人和条顿人，在目前都陷于最深的灾难之中。一个曾是我们（战时）的敌人，一个曾是我们的朋友，他们两者都身处毁灭与绝望的深渊之中。如果他们走到一起，那是绝对不可取的。"① 所以，对于德国，应该解除其武装，给他们吃，让他们活下去，同他们和平相处，但并不意味认他们为朋友。对于俄国布尔什维主义，则要不留余地地打击之；绝不能允许他们结合起来。因为，"一旦产生了那种可怕的敌对均势，那就是 5 年前大战爆发的前奏"②。丘吉尔这些话是在一战结束时说的，虽然英国乔治·劳合政府不同意他的极端论点，而主张对苏的干涉适可而止，并主张承认苏维埃政府，但实质上反映了当时英国人乃至西方人的一般心态；而且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西方最警觉的便是苏德关系的动向。当然，在德意日法西斯日益得势，得寸进尺时，西方外交乃更加注意这方面的动向。在希特勒挑起对苏战争后，苏德条约不再起作用，苏联与英法等西方国家终于成了反法西斯同盟的战时盟国。

第二，美国虽然没有参加国联，然而作为后来居上的世界强国，它对欧洲的影响越来越不容忽视。它的工业力量、军事力量都已超过欧洲的任何国家。它的经济实力已成为欧洲复兴所不可缺少的依靠。由于战争负担，欧洲许多国家，包括法国和英国，都是美国的债务国。这些国家要依靠德国的战争赔款才能偿还美国的债款。如果德国付不出赔款，则其他欧洲国家也无法还债。法美两国的债务问题使两国关系处在龃龉之中达 10 年之久。最后又是美国出钱借给德国，德国以赔款方式付给法国，最后法国向美

① 《丘吉尔著名演讲集》，伦敦卡塞尔出版公司，1989 年，第 91 页。

② 同上书，第 92 页。

国还债。这类情况说明什么呢？说明美国终归有一天要卷进欧洲，说明欧洲衰落之势早已潜伏着了。

谈到这里，需要插入一个对于国际关系说来十分重要的理论转折问题，即随着国际关系突破欧洲的框架而走向全世界，限于和适用于欧洲列强之间关系的“力量均势”模式已经结束了。19世纪以前的国际政治，充其量是在欧洲这块地方上的表演。几个强国虽然力量互有消长，然而总是勉强可以维持着在它们之间的暂时“平衡”，而且它们也是把主要心思用在破坏和保持某一均势上。不是这样的均势，便是那样的均势。进入20世纪以来，“力量均势”的理论模式渐渐地失灵了。“力量均势”在某个限定的地区或问题上，或许还有策略的意义和用处，但是就国际政治的总体看，19世纪的形势已经完全过去了。欧洲各大国的外交决策者只能顾得上考虑很具体的现实利害问题，想不出如何重建欧洲秩序的方案；它们比不上一个世纪以前维也纳会议期间虽然艰难、但仍显得游刃有余地摆弄彼此力量的大体平衡。只有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十四点计划，庶几乎可以成为“力量均势”的代替物，但是并没有成为西方的共识。就在西方各国缺乏通盘考虑、都在彷徨无着的时候，希特勒现象出现了。回顾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20年，西方终于没有找出新的外交构想。迎面来的是战争，外交完全无能为力了。

打开西方外交新局面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西方世界里，美国崛起为唯一超级强国，其他西欧国家都沦为二流三流国家。西方外交的总体取向，是“东西方关系”，是基于一分为二的世界格局。维持东西方关系格局的重任落在了力量远超过其他各国总和的美国和苏联。英法等曾雄踞世界政坛的国家都只能在这个框架里考虑自己的对外政策。

所谓“东西方关系”者，主要是说明欧洲一分为二、分别属于所谓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以后，双方看待世界政局的总框架。其根据源于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的对立，而各据自己

的表征政治认同的“势力范围”。从这一点出发，“东西方”互相视为异己者。这样阵线分明的对垒，从十月革命以来即已开始，希特勒的崛起和随之而来的战争，使这种对垒暂时退居次要位置。二战结束时，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确曾有过由美、苏、英三国共同维护战后和局的共识和表明，认为19世纪赖以维持均势的那些列强大半已无能为力，只有靠三个大国重建国际秩序。这样的言论在当时留下的文献中，俯拾皆是。

问题是一落到实处，涉及战后的具体安排时，东西方的分歧便立即变得难以调合，处处都遇到利益（势力范围）的分配问题，又处处都撑起意识形态的旗号，而且形成立场的绝对对立：你以为是者，我必以为非，毫无妥协的余地。德国之终于分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属“西方阵营”）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属“东方阵营”），便是欧洲分裂的标志。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说过的关于共同维持战后和平的话，多是三巨头会面时的外交寒暄，实际上是“划地为牢”，落实下来便是从战争以后到大体上50年代后期的所谓战后“冷战”格局。同时，在西方的政治舞台上，欧洲已经不复占有中心的位置，西欧各国只能作为美国的重要盟友；从舞台边缘最终居于主位的只能是美国。

这一段时期，从西方来说，又可以1953年斯大林逝世为界。在此以前，西方基本以丘吉尔富尔顿演说为理论依据。丘吉尔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共主义是一贯的。前引他在俄国十月革命后的讲话，已奠其基；在二战正酣时，丘吉尔在给艾登的电报中便已指明，西方盟国在打败希特勒以后应该组成针对苏联的阵线。所以西方阵营虽只能以美国为首，但提出“铁幕”等思想概念的，则是英国的丘吉尔。美国凯南之“长电报”，接之而来的杜鲁门主义，等等，连接在一起构成了西方对苏“遏制”理论。

斯大林逝世给西方带来一些“希望”，以为或许可以稍微缓释一下“冷战”的坚硬冰块。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波兰和匈牙利危机，柏林危机，苏伊士战争，以及苏联人造卫星发

射成功等分别在东西方各自阵营里发生的大事，综合到一起，使西方的领导人感到，不应继续不加修改地沿用斯大林时期的对苏政策。“遏制”的一手是要保持的，但同时要增加“例行公事”以外的外交接触。除了安排四国首脑会谈之类的“顶峰”会晤之外，双方有了互访，当时颇为引人注目的是赫鲁晓夫、布尔加宁的西欧之行。共产党的第一书记到资本主义国家去作“国事访问”，大概始自赫鲁晓夫。龃龉和相互攻击照常进行，但调子已在变化，始自美苏首脑的“戴维营”会谈，翻开了“冷战”时期的另一页，始称之为“冷战”的缓释期。

60年代和70年代大体上属所谓“冷战”的缓释期。西方外交显得活跃多了。一张一弛，已成规律，但更多的是寻求对话，紧张到一定程度总要设法缓和下来。在这期间，西方出现了许多对话“专家”，美国从肯尼迪到尼克松，法国戴高乐，德国的勃兰特、施密特，英国从麦克米伦到威尔逊，等等，都有自己的“东方政策”。西方的政治家们认为，“东方”是会起变化的，他们从战后在东欧发生的政治事件中感觉出变化的内因；同东方接触当然符合自身的利益，例如商业上的利益，政治上的利益，等等，但是更可通过接触以鼓励东方的变化内因，促使其发生“和平变革”。所以对欧美来说，促使非西方国家发生“和平演变”是他们的一项公开宣布的“使命”，也就是把他们的价值观向非西方世界推行，就像昔日基督教的传教使命一样。在50年代，东西方处于隔离状态，外交只能代表国家关系间的事务来往。这种状况到60年代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及到70年代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期间，西方国家便坚持把思想文化领域的交流列入会议文件，当时的苏联本来很不愿意接受这一条，只是由于苏联特别希望通过会议重申战后的东西欧分界线（因为这意味着西方确认苏联对东欧的控制权），这才有所谓用“第三篮子”（思想文化交流）换“第一篮子”（重申战后欧洲边界不可改变）的外交交易。这在西方看来，“第三篮子”的列入大大有利于西方文化之流入东方，其长远意义

不可估量。

以上所论，都是在东西方关系的大关节上着眼的。其间发生的事件，人人皆知，这里之所以还要简要地叙述一下，是为了说明西方外交的总体框架已不同于过去任何时期。既称西方外交思想，则还需补充若干东西方关系包括不进去的西欧大国的特殊考虑。这里只扼要谈两个问题。

第一，二战以后，西欧诸国的一个主要考虑，是眼睛向内看。战争把美国、苏联推到世界前列，西欧已无能起世界作用，此时殖民帝国呈土崩瓦解之势，法国在50年代还狼狈地陷在殖民战争之中；麦克米伦在60年代初，先看到“非洲的迷雾”，后又看到“非洲的变革”。因此，西欧各国都有一个在战后重新定位以后迅速自立的问题。当时的西欧，第一靠美国的马歇尔计划，而美国也有通过马歇尔计划促进西欧联合自救之意。第二靠自己组织起来的力量，这就是让·莫内、舒曼这些欧洲经济共同体设计者的任务，像前面说的，欧洲统一这个古老观念第一次有了个具体而细微的实体。此处也有两个插曲要说。一是舒曼计划本有限制德国发展的政治意图，这也是法国对德国的一种传统心理，可谓根深蒂固，直到今天仍有影响。阿登纳也非常清楚。但是双方毕竟互有需要，所以还是毫不含糊地把煤钢共同体先搞起来，而且以后欧洲共同体之每前进一步，直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签署后产生的“欧洲联盟”，法国和德国这两个互有戒心的伙伴都起着关键作用。

另一个插曲是英国。50年代曾想以松散的自由贸易区化掉欧洲经济共同体，未果，终于在70年代初也加入了欧洲共同体。其中曲折甚多，以至英国至今被看作欧洲联盟中不同心的成员。其中涉及到的问题无暇细说，但英国毕竟终于进入了欧洲的安排，坚持撒切尔夫人之强硬立场者已为数不多了。

这两个插曲都是要说明第一个问题，即战后西欧政治“向内看”的取向，而且越接近今天，这种取向越明确。所谓“向内看”，说通俗些就是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以应付来自美、日的挑战。

当然力所能及的"国际义务"还是要履行的，在一些问题上甚至表现得相当积极而主动，以显示自己的"存在"；但不妨碍其主要政治考虑是在欧洲自身。

第二个问题是，二战后西欧已经牢牢地被镶入东西方框架中之西方，这是势之使然；而且美国是老大，也是西欧不能不接受的事实。然而，西欧国家都是独立的主权国家，因此也必定有自己的自主外交，并不全以美国政策为依准。在50年代"冷战"最激烈时，也不是铁板一块。进入60年代以后，西欧各大国在对苏外交上便表现得更为主动积极，前有戴高乐主义，后有勃兰特主义，立意都是要把自己的外交搞活，为自己的国家争得更多的活动天地。尤其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长期与东方隔绝，便无法展现其外交上的活力，不突破这一关，也难以争得在西方阵营内更多的主动权，甚至只能居于英法以后的"末座"。从俾斯麦开始，德国就深深地意识必须有一个与东方畅通的"东方政策"，这是德国特有的"地缘政治"所决定的。阿登纳晚期已意识到此问题之重要，但那时的条件还不具备，所以这个任务只能由勃兰特来完成。英国虽有与美国的"特殊关系"，但它的传统政策的特色之一，便是做任何事都要留一条后路，不把事情做得毫无转圜余地。因此，它在反对共产主义上绝不后人，然而，即使50年代也还是表现出更多的灵活姿态。丘吉尔曾经赞扬19世纪维也纳会议期间的英国代表、外相卡斯利雷子爵（Castlereagh），说他那"对大陆事务所表现出的不瘟不火的、松弛而平衡的姿态，将成为尔后近一个世纪内的英国外交政策的最好不过的特色"[①]。所以英国之同苏联来往，从来没有像戴高乐和勃兰特那样在西方引起波动。甚至到后来80年代美苏因中程导弹等问题陷入僵局，能同两边都讲上话的竟是英国的撤切尔夫人，甚至有一段时间她几乎是唯一的与

① 〔英〕亨利·斯梯尔·柯玛杰改编：《丘吉尔的〈英语人民的历史〉》，格林维奇，纽约，1965年，第327页。

戈尔巴乔夫多次长谈、建立起个人关系的西方领导人。

当80年代到来的时候，东西方关系正因为一连串的问题受到梗阻，如中程导弹问题、波兰团结工会问题、阿富汗问题，等等。但是这并不妨碍80年代是“冷战”体制受到巨大震撼的10年。这一切事件终于被东欧局势的变动超过去了。80年代中期激荡着东欧的政治波浪吸引了西方的绝大部分注意力，它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成为西方外交关注的首要问题。这些事都是人们刚刚经历过的事，现在回过头来看，这10年似乎过得匆忙，使人感到战后建立起来的“雅尔塔”体制正在经历一场足以把它摧毁的山雨。80年代的后几年，东西方除了维持着一般正常外交关系外，西方更多的精力是用来密切观察和关注着东欧变局，其他国际问题都放在了次要的地位。

历史上每过一段时间，就会出现一个分水岭，为历史划出阶段。这些分水岭对于外交思想史同样意义重大，因为它会迫使外交思路调整方向，因而显现出阶段性。

从19世纪初到20世纪末这200年，西方外交思想史上有过几次这样的分水岭：拿破仑战争是一次，这以后出现了五强相对集中的平衡，“力量均势”从理论到实践都达到很熟练的程度。普法战争和德帝国统一是第二个分水岭，原来的“力量均势”理论开始受到挑战；西方的注意焦点从维护维也纳会议式的“欧洲协调”转向德国、俄国和巴尔干。第三个分水岭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进入世界政治舞台，欧洲被大大削弱，俄国发生了革命；西方外交思想陷于彷徨状态，重点继续放在德国和革命后的俄国。第四个分水岭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东西方关系占支配地位，美国的作用和影响远远超过欧洲盟国。20世纪80年代末出现了第五个分水岭，即苏联东欧巨变和“雅尔塔”体制瓦解；西方外交从东西方关系的框架摆脱出来，力图转向组织以美欧起主导作用的全球外交方略，力图把全世界的焦点地区和问题都置于西方外交体系的关注范围之内。历史上早已存在的西方帝国理想在新的历史

条件下复活。当然这里主要讲的是思想，并不是现实的全部，而且这个新时期刚开始不久，不过征兆是清楚的。

欧美大国外交特征

以上是从近200年来西方历史的大局势、广视角看西方外交思想走过的路。下面主要讲英、法、德、俄、美几个大国的个性。

英国。英国形成民族国家最早，是海洋国家，以海洋为依托。在打败了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早期航海国家以后，英国便成了海上霸主。在历史上，大多是英国到大陆上作战，以图在大陆上分得一部分“势力范围”。除古罗马人曾一度登上岛国土地外，1066年诺曼底公国曾入侵过英国，以后再没有任何大陆上的欧洲军队踏上英国的土地，倒是英国多次到大陆干预那里的局势。英国又是工业革命最早的国家，比大陆欧洲早走一步。资本主义在西欧成为普遍现实后，英国即成为西方金融资本的中心，它的殖民地遍布世界各洲，建立起所谓不列颠的统治，故尔在历史上最可游刃有余地在欧洲列强间纵横捭阖。英国在历史上的国际政治舞台上除在北美遭到沉重打击外，一向居于比较主动的地位。在历史上漫长时期中，在英国形成了一种务实的政治文化，马克思、恩格斯说，近世唯物主义在英国最早发生。在中世纪神学领域里，唯物主义的前身——唯名论——在英国出现较早，近代政治学经验主义学派的鼻祖培根、洛克等都产生在英国，并对后来欧洲政治学产生了不可超越的影响。经验主义、务实精神，在长期历史中形成为英国的政治思想文化，甚至引导着英国国民性的形成和发展。有一种极而言之的说法，英国人讲求的是实际利益和实际效果，而不是某一条可以普遍适用的理论原则。

英国人常说，英国的风格——盎格鲁—撒克逊的民族性与大陆传统风格，形成鲜明的对照。大陆讲究先验理性，从上到下，从普遍原则到实际操作，是圣·托玛斯·阿奎那一类中世纪欧洲大

陆神学家以及大陆型学者和思想家的路数。盎格鲁一撒克逊的推理方法是从下到上的、由果到因的归纳法，也就是从经验开始，即培根和牛顿的传统。①

这种重视经验的思想传统，在外交上就是人们所常说的“实用主义”。英国在欧洲立国最早、国力最强，外交的活动天地在历史上最为宽阔，经验也最丰富。“实用主义”着重可能产生的结果，一件事一件事地去办，而不搞纯推理。照英国史学家法兰克尔的解释，“实用主义”如果运用得准确，可以帮助政策的制定者“保持最大可能性的灵活性，避免由于意识形态的承诺而超过限度，把外交努力集中在特定利益上，接受铁打的事实。”② 英国的“实用主义”外交思想有三点相互关联的在历史中形成的基本点，即：“力量均势”、“自由贸易”和超然的“地理优势”。英国倚靠这三个基本点，得以在19世纪的世界政治舞台上取得其他欧洲国家所没有的主动权。

然而，“实用主义”并不总是那样得心应手，而且不同的政治家在运用上也会有不同的表现或结果。起关键作用的是英国能不能保持它的首强地位，这个地位一旦受损或丧失，这三个基本点就相应被削弱。事实上，进入20世纪以来，英国的政治家们便时时感到不像在上个世纪——英国的“黄金时代”那样顺手了。

首先，在摆弄“力量均势”上，英国就已感到力不从心了。在19世纪，英国的份量放在哪一边，天平就会明显倾斜而调节到新的平衡状态。拿破仑战争、维也纳会议、神圣同盟、克里米亚争端等等，英国都起到了重砝码的作用。而一战以后，英国就不再能起这种作用了。

其次，“自由贸易”向来是英国对外关系的看家宝，在英国握

① 〔英〕约瑟夫·法兰克尔：《英国外交政策1945～1973》，牛津大学出版社，1975年，第112页。

② 同上书，第113页。

有海上霸权的时候，它的“自由贸易”政策几乎畅通无阻，所以它一直反对具有保护主义的经济集团政策。二战后英国同舒曼计划唱对台戏，还是这种传统延续下来的，甚至在不得不加入欧共体以后，那种无边界限制的“自由贸易”传统思想仍同欧共体的构想不能协调。直到今天，“欧洲联盟”关于究竟“深入”是第一位的，抑“扩大”是第一位的争论，英国主张先要“扩大”，也还是“自由贸易”的思想在起作用。但是英国显然已不能不作出让步，而接受组织具有一定限制性的联盟和共同市场。

第三，曾是英国历史上优势的“地理因素”，其价值也在减少。让英国人接受这个事实同样也不是容易的事。时至1952年，艾登在一次讲演中谈到英国为什么拒绝舒曼计划时曾激动地说：“有些事情是我们骨子里就不能干的……因为英国的事情和英国的利益远超出欧洲大陆的范围……这是我们的生命之所系：如果没有这些，我们就无非是生活在欧洲沿海的一个岛子上的几百万人而已，在这个岛子里，谁也休想拿到特殊的好处。”① 海洋国家于古老的英国，不单纯是地理概念，它意味着跨越欧亚非美澳五洲的英帝国。凭借这个条件，它才能纵横于欧洲列强之间，才能建立起以它为中心的世界自由贸易，使伦敦成为全世界的金融中心。没有帝国的地理条件，像艾登说的，便毫无意义。然而，政治家往往会陶醉于过去，不愿意承认新的现实。二战以后，殖民体系正在瓦解之中，英帝国已经动摇了，虽然英镑特惠制和殖民地附属国的历史依存性还在，仍能给英国由于昔日全盛时期留下的骄矜以精神上的安慰。及至60年代，形势的变化便愈加明显。今天，曾视为天堑的海峡，随着海底隧道的建成，岛国地位的现实价值也就大为削弱了。

以上这三条，都是在19世纪达到鼎盛状态，到20世纪开始遇到挑战并走下坡路的。所谓“实用主义”无非是说办事情的灵

① 〔英〕艾登：《全程——艾登回忆录》，伦敦，1961年，第36页。

活应变能力，若没有这些基本条件，灵活应变的能力自然也就会受到限制。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英国外交已不可能主动创造局面，而更着重在怎样适应现状、接受既成事实上。某届政府立场“强硬”些，某届政府“灵活”些，都不是根本的改变，而只是数量上的差别。诚然，80年代出现了所谓“撒切尔主义”，在东西方关系和与欧共体的关系上都表现得很有色彩，但要恢复19世纪的威风，是绝对不可能的。

法国。法国在西欧大陆是最早建立起民族国家的，在它已是大陆第一强权的时候，德意志人、意大利人还都处于分裂状态，更不要说处于颓势中的其他中小国家了。法兰西民族有过其他欧洲民族不能比拟的辉煌的封建文明，在路易十四亲政时期和拿破仑帝国时期，其国威国力达到了顶点，法国革命的政治影响远远超出了法兰西的国界，以致在拿破仑以后，虽然国运不及从前，但欧洲的历史却因法国给旧制度的沉重打击而翻开新的一页。法国是被打败了，但在法国发生和发展起来的政治思想却传遍了欧洲，法国人以为他们是塑造了近代欧洲史的人。拿破仑的穷兵黩武，给欧洲带来了灾难，但也把一些新兴国家推上政治舞台。如果说英国依托的是海洋，那么法国依托的是大陆，因而它的回旋余地没有英国广阔，它在处理对外关系时，常自觉或不自觉地以西欧大陆的代表自居，它不能容忍大陆以外的强权——先是英国，后是美国——涉足和“包揽”西欧事务。法兰西的民族感情从历史上便是在同盎格鲁-撒克逊的抗争、对立和争夺中得到了滋养。英法百年战争中的烈女贞德至今仍是法国人精神中的爱国主义象征。同时它又把眼睛紧紧地盯住邻国德意志民族的动向，并且把德意志国家视为它扩展“天然疆界”、威胁法国扩张利益的主要势力。诚然，今天已完全不同于过去，19世纪普法战争、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在今天已成为不可思议的事，然而法德关系仍是法国在对外关系中必须考虑的首要问题——不是“对抗”，而是相互补充、相互制约的“伙伴关系”。这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德

国统一问题、舒曼计划、欧洲一体化中所谓法德轴心问题等等都可以看出德国在法国外交构想中的地位。

法国是一个特别忠于本民族历史传统的国家，它在历史上的显赫地位一直是法国人的骄傲。就是在国运已不如往昔的今天，它也总是要在国际事务中力图发挥自己的不同于其他列强的独特作用和风格。法兰西民族的荣誉感，在法国人的心目中占有极重的份量，而外交一向是法国的政治家们——不论他们属于哪一党派——都着意借以维护和表现这种民族荣誉感的领域。在法国独自称雄西欧时是如此，在已经失去这种地位的今天，它仍要表现出一种特立独行的姿态。戴高乐维护法兰西民族独立和大国资格的独立自主思想，既是历史的总结，也为后人树立了榜样。戴高乐在60年代立意独立于美、苏、英之外独树一帜的态势，在他的继承人身上仍留下了影子，虽然形势已发生了变化。尤其是对于美国，法国常怀有警觉和戒心。法国的立足点在欧洲大陆，在法国人的观念中，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不是欧洲的民族。过去法国警惕着英国，现在则警惕着美国，它要构建一个不受美国影响的欧洲。

所以，法国与英国之带有根深蒂固的“大西洋主义”传统不同，它是“欧洲主义”加法兰西“民族主义”的民族。法国政治家们都或多或少地有这种气质。这种气质的代表人物，在19世纪是拿破仑，在20世纪是戴高乐。

然而，法国和英国也有共同的心态，都对昔日在世界上的地位有一种怀旧的情绪，而现在已经无可置疑地成为地区性的国家。如果不借助美国的力量，它们很难在世界性重要问题上发挥有意义的作用。

法国史学家阿尔弗雷德·格罗塞在叙述战后几十年的变化时说：“40年来，法国变了，世界变了，法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变了，……有三个转折点肯定是明确的：1947～1949年，东西方敌对之势从此形成；1962年，阿尔及利亚战争结束——痛苦的法国非殖民化的最后的伟大阶段；1971～1973年，进入国际货币和经济

危机。第一个和第三个变化终于临到了法国头上，而不管它的领导人是谁和具有怎样的政府。第二个变化则是与一种世界性的转变分不开的，万隆会议已从 1955 年便成为这种转变的象征。"①

德国。德国是个很特殊的国家，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史上，它是"晚熟"的国家，但一旦成熟了，便发展得很快。历史上的德国是分裂期最长，而且分割为许多相互摩擦的民族。它的边界是那样不固定，欧洲许多战争都是在它的国土上进行的，因此同其他民族的关系一直是十分错综复杂的。所以，德意志民族在还没有实现统一时一直有一种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的宿愿，有一种决心改变民族分裂命运的历史情结。在实现了统一以后，就要全力巩固它。它的地理位置——东西南北之交——决定了它必须首先巩固自己在中欧的立足点，处理好周边关系，然后才谈得上向四周发展。而在欧洲其他政治家的眼中，一个统一的、强大的德国，无疑会破坏前半个世纪所缔造的均势。迪斯累利在新帝国成立后不久就作出了反应，他在下院说："这场战争（指普法战争）意味着德国的革命，它的政治影响比上个世纪的法国大革命还要大……你们正面临一个新的世界，正在产生新的影响，有些新的、尚辨认不清的目标和危险需要应对，这样的事情目前看来还处于朦胧状态而少有人知，……但是欧洲已经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力量平衡已经彻底被破坏了。"②

德国一旦实现了统一，一种新形势就必定会出现，并且要求德国制定一项相应的政策以保持新平衡，从而使德国在其中有一个稳定的安全的地位。俾斯麦号称"铁血宰相"，但在外交上却兢兢业业地致力于减少别国的顾虑。德国需要有一项符合德国利益的"东方政策"和相应的"西方政策"——德国虽然强大到足以

① 〔法〕阿尔弗雷德·格罗塞：《法国对外政策 1944/1984》，弗拉玛里翁出版社，1984 年，第 316 页。

② 爱德华·科兰克肖：《俾斯麦》，威金出版社，纽约，1981 年，第 304 页。

影响均势，但是活动余地仍然是有限的。俾斯麦对比其他欧洲国家的处境，得出这样的看法："我们的地理位置以及根据德意志民族的内部联结与其他民族相比也许相当松散这一特点，我们比任何一个别的民族更容易遭到别人联合起来对付我们的危险。"[①] 时代在变化，今天的德国与当时的德国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德国地缘政治对外交思想的影响，却是有延续性的，即：竭力维持原状，同东方的和西方的大国开展关系，缓解和消除别人对德国的疑惧，以为自己争得尽可能宽阔的活动天地，稳步地谋求进一步发展。除了威廉二世和希特勒这两次"世界政策"使德国成为世界战争的挑拨者之外，德国在其余大部分时期的外交都或多或少沿着这个思路行事。德国之需要一项东西贯通的外交，是德国的一项传统。消极地说，不这样就摆脱不了被包围的孤立状态。从积极意义上说，没有一项东西方政策，德国的影响就无法开展，就无法与列强竞争。"冷战"时期，在德国人看来是极不正常的、是德国民族情绪受到压抑的时期，是德国作为一个民族被剥夺了公平权利的时期。因此，勃兰特在 60 年代末提出的"东方政策"，从"冷战"的逻辑看，是"讨好"东方，而从德意志民族的历史看，却正好符合德意志民族打破孤立，寻求发展的传统观念。"冷战"结束后，德国实现统一的过程，德国的政策同样体现了这种历史延续性。德国统一后，舆论界有人重提"是德国的欧洲？还是欧洲的德国？"一类耸人听闻的问题。这诚然反映了人们对希特勒时期余悸犹存，再加上新法西斯分子几度蠢动，因而对德国未来动向反复提出疑问。然而，若从历史总势着眼，希特勒式的狂人政治在欧洲重演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德国外交思想的传统，基本上是沿着俾斯麦、阿登纳、勃兰特、科尔这一路线延续下来的。希特勒的统治时期应视作德意志长期历史中的插曲。

俄国。俄罗斯在 9 世纪曾是一个柳里克王公帝国，后来为受

① 迪特尔·拉夫：《德意志史》，中译本，波恩，1987 年，第 168 页。

蒙古统治下的莫斯科公国所取代，到14世纪，伊万一世战胜其他王公，是为莫斯科大公，但使莫斯科公国摆脱了东方鞑靼人的统治的则是15世纪的伊万三世。100多年以后的彼得大帝是伊万三世以后又一个俄国历史上的权力人物，这是俄罗斯历史上的一个带有关键意义的转折点。他把俄罗斯的历史推至近代史期，他的一项新业绩，就是把僻居内陆地区的斯拉夫人世世代代要“探海”的梦想实现了。彼得大帝从内陆出发寻求海域，在阿速夫海、里海、黑海、波罗的海与土耳其、波斯、瑞典迎头相撞，把俄罗斯的地缘政治一步一步地向四周延伸出去，东抵顿河、德涅伯河、布格河、刻赤海峡，北抵涅瓦河口，并通过与瑞典的战争在波罗的海占据要津，然后从此向西扩展。马克思分析说：“对于一种地域性蚕食体制来说，陆地是足够的；对于一种世界性侵略体制来说，水域就成为不可缺少的了。”于是“彼得用出色本领把帝国的都城从内陆中心迁到滨海地区，他的特有的胆略把新都建在他征服的第一块波罗的海海岸上，距离边境几乎在步枪射程之内，就这样有意给他的领土制造一个外偏中心。”①

彼得大帝是斯拉夫扩张主义政治的奠基人，他被后来的俄罗斯人当作民族英雄和近代俄国的缔造者来称颂、讴歌，他因而也为俄罗斯树立起一个致强致富的传统——陆地蚕食加水域开拓，构成了从彼得大帝起的一贯政策。马克思所说的俄国“外偏中心”和新的“圆周”到了19世纪划到了哪里呢？马克思写道：“俄国从瑞典手里获得的领土比这个王国剩下的领土还大；它在波兰获得的领土相当于整个奥地利帝国；在欧洲土耳其获得的领土超过了普鲁士的国土面积（不包括莱茵河流域的属地）；在亚洲土耳其获得的领土有全部德国本土那样大；在波斯获得的领土面积不亚于一个英国；在鞑靼获得的领土面积等于欧洲土耳其、希腊、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总和。俄国最近60年来所获得的领土，从面积

---

① 马克思：《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80页。

和重要性来看，等于俄罗斯帝国在此以前的整个欧洲部分。”①

领土的扩大是推行政策的结果。有彼得大帝的政策确定了俄国向外大力扩展的姿态，俄国才得以借着这一强劲的推动向前奔跑起来，才会有叶卡特林娜二世等等的一步推进一步的对外侵略扩张政策。俄国终于迫使欧洲把它当作政治舞台制衡因素来对待。

彼得大帝以来形成的外交思想一直延续到十月革命发生以前的历届政府。以后70年的苏联历史是俄罗斯历史中一段特殊时期。这个阶段的苏联外交仍不时闪现出“彼得大帝”式的身影，人们不难从它对邻国的领土要求、悍然武装入侵别国的大国沙文主义行径而以“主权有限”的理论掩饰之等等，看到18世纪以来的俄国传统。

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改变了社会制度，价值观念上认同欧美。它在外交上与俄罗斯任何时期以及苏联时期都不同。在国力积弱的情况下，或许在相当长的时期不得不走靠拢西方，同时尽力不失自己大国尊严的路子。但是俄罗斯仍手握重兵，幅员辽阔，基础比较好，故在国际政治中仍不失为一支平衡的力量，像这样的民族绝非池中物，终不可能只满足于目前的状况。非不为也，是不能也。

美国。美国在国际政治中走过的道路不同。欧洲上述几个大国在历史上都曾经有过轰轰烈烈的经历，有的进入20世纪就明显走下坡路了，如英国和法国。德国曾经有过咄咄逼人的气势，两次战败，两次重建，虽然今天的潜力仍大于英法，但作为欧洲大国还可，要成为世界性大国则不易。至于俄罗斯，在苏联解体后并不能自动地取代原苏联在世界上的地位，潜力很大，发挥也难。只有美国200年来是从美洲到亚洲，又到欧洲，以至在世界各地无所不在。在19世纪中叶，托克维尔已深感美国的来势，他在比

---

① 马克思：《土耳其问题——〈泰晤士报〉——俄国的扩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131页。

较了欧洲各国的发展之后，认为欧洲各民族已经发展到了极限，以后只有守成了，只有美国和俄国从各自不同的出发点在向相同的目标迈进；当人们忙于别的事情的时候，它们已突如其来地置身于各民族的前列，世界几乎同时看到了它们的诞生和它们的重要性；其他民族却或则停步不前或则步履艰难，只有它们以轻快的步伐上升着。他说："它们的出发点不同，它们的道路各异；然而，它们中的每一个似乎都秉承天意的隐秘意旨，有朝一日它们将分别各自把半个世界的命运握在自己手里。"[①] 托克维尔写这些话时，俄国已是炙手可热的欧洲强权，美国的势力则还限于在美洲，足可见托氏的眼力。

正像托克维尔所预言的，也是后人所见到的，美国是循着自己的轨迹而发展，而向外扩张的：从巩固自己的独立起，进而扩张至整个美洲，再扩张至亚洲太平洋地区，再进而涉足欧洲政治、觊觎"世界霸权"。从华盛顿立国起，历经门罗主义、"机会均等"、"门户开放"政策、威尔逊主义，到二战后的杜鲁门主义、艾森豪威尔主义、肯尼迪"新战略"、尼克松主义等等直到今天，无论所谓"美国治下的和平"在今天是如何之不可能，其从美洲走向世界的轨迹却是非常清楚的。同时，由于立国200年的美国向以超过历史列强的新兴超强出现于世，于是以世界"领袖"自居，并以推行其价值观为"天职"，因而其针对异质文明国家的外交政策便带有一种自傲于世的意识形态色彩。这在前面如在"外交与意识形态"，"近代西方外交史述要"等节中已有涉及，此处不再重复。事实是美国从步入世界政治舞台之日起，它的外交就具有全球影响，对全世界的事它都要干预。有一种说法，认为20世纪的美国取代了19世纪英国的地位。若以此说明美国超过了英国，从英国第一变为美国第一，那是可以的，但并不完全准确。当时

---

① 详见〔法〕阿莱克西·德·托克维尔：《美国的民主》，《托克维尔文集》，罗伯尔·拉丰出版社，1986年，巴黎，第373～377页。

英国是相对于其他欧洲强国而言，表演的舞台主要在欧洲，其他地区绝大部分是殖民地；今天美国干预的范围就宽得多了。所以美国在 20 世纪，尤其是在后 50 年，美国外交基点就是要当世界的头：先当西方国家的领袖，建立以它为主的西方集体干预体制，然后去关注和插足世界其他地区的事情——从政治到经济，从全球安全到热点地区，从美洲的海地到亚洲的柬埔寨、阿富汗，从欧洲东部的前南斯拉夫到非洲索马里和卢旺达，从中东到朝鲜半岛……无论是否直接涉及美国利益，它都认为有责任亲自去管，或通过国际安排拉住欧洲国家分担责任。至于它管得了管不了，那是次要的；首要的是它要管。

*　　　*　　　*

以上这些粗线条的勾勒，只是对西方近代外交思想史和一些大国外交特点的一般性概括。各章节的撰稿人不可能随时重述这些原则性的东西，所以有必要在“绪论”里提纲挈领地说一说。外交，是一种带有较强的实用主义的政治，有很大的应变性。所想的并不一定能说出来，也不一定能做得到；表现出来的言论行为也时常不一定能反映真实的想法。如果想知道卢梭的思想，看他的书就行了；若要了解塔列朗怎样想的，却不能听他怎样说的。汤因比曾建议对于政界名人的宣言、通信、回忆录，甚至日记，都要慎重，不见得都能反映本人的思想，因为那写出来的，部分地是为了给别人，包括后人看的，因而都有想让人知道，但可能其实并不完全真实的东西。所以，外交思想应该表现在行动中，要从行动中理出思想。我们于此作了努力，但由于理论水平不高，结果仍不理想：有些章节终未脱出“国际关系史”的窠臼；有的章节较多地引用了政治家的言论；不少地方的分析为了与思想挂钩而显得牵强；有些地方限于篇幅而相互照应、连贯不够；取材方面繁简不一，文风亦有欠融通。因此，我们所做的，只能算是一种尝试。要使国际关系学科上升为理论，还有待我们持续努力。

第二章

19 世纪上半叶的欧洲

——从拿破仑的霸权外交到“力量均势”

第一节　小　　引

从 18 世纪后半叶起，西方政治社会进入了一个质变的时期。美洲大陆爆发的反对英国殖民主义的革命战争，就其实质内容而言，是一场把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结合起来的影响深远的举动。它标志着君主专制时代随着资本主义的成长将在西方最后结束——以“国家”为本位，而不是以王朝为本位的时代到来了。从北美开始的殖民地革命所显示出的战斗精神，传导到欧洲，从爱尔兰到低地国家，比利时，到欧洲中部的匈牙利、波兰，都发生了规模不等的革命性运动。几乎全部欧洲都动起来了，进而使欧洲改变面貌的革命，则是法国大革命。

这一章的重点有两个，一个是“力量均势”成为“新欧洲”的特点，“力量均势”的外交原则是这一时期欧洲的特点；再一个是美国从独立以来向美洲迈出了第一步，“门罗主义”象征着美国向外发展的第一个阶段的开始。

第一，关于“均势”问题。法国最后的三个波旁王朝（路易十四、十五、十六）是君主专制最顽强的堡垒，王朝崩溃所产生的冲击波，自然也最为广泛而猛烈。外国的武装干涉和长达近 20 年的拿破仑战争，打乱了法国革命以前已然十分脆弱的欧洲格局，

维也纳会议则开启了大国力量均势的“新欧洲”棋局。

在拿破仑战争期间，人们在欧洲看到的首先是战争，是战场上的胜胜负负。对于拿破仑，政治就是“征服”，是通过征服建立由法国控制的所谓“大陆体系”。在战争期间，法国实无真正意义的“外交”可言。本书中所叙述的拿破仑的霸权主义和黩武主义的思想，都通过“战争”表现。

“反法联盟”的目的也很明确，第一是打败拿破仑，就结束战争而言，这体现在两个巴黎条约上。第二是外交，是战后重新安排欧洲，这就是维也纳会议的任务。

这个时期外交的几乎全部活动和特点都表现在维也纳会议上，英、俄、奥、普、法五大国不仅是会议的主宰，而且是战后欧洲的主宰。所谓“欧洲音乐会”（Concert of Europe）便是这五大国“协调”矛盾的结果。每个大国的意图都受到别的大国的制衡，从而保证了战后的和平，所谓“力量均势”原则简而言之即在此。把维也纳会议比为“分赃”会议，这并没有错；但还有更重要的维护怎样的欧洲的任务。有人把维也纳会议比作威斯特伐利亚会议以来的第一次欧洲会议，是不为过的。

“力量均势”的核心是相互制衡。“维也纳会议”好像是一台戏：戏台上的主角是俄皇亚历山大一世和奥地利首相梅特涅。俄国的目的是要取代过去法国在欧洲的位置，它地处欧洲东端，有广大的亚洲为依托，在巴尔干地区有咄咄逼人的影响，触角一直伸到波罗的海。奥地利在中欧有压倒优势，它竭力要保住自己对周围民族的统治，因此在战争期间即对法俄接近十分警惕，还曾拉拢拿破仑以牵制俄国；在打败法国以后，奥地利便极其警惕俄国的动作，虽然它同时又参加了沙俄为首的“神圣同盟”，并参与对波兰的瓜分。

这出戏的路线却出自法国的塔列朗提出的所谓“正统主义”原则。它的妙用在于与会者人人都能接受，而人人又都有自己的理解。所以，有的史家说，维也纳会议就是“正统主义”加“力量均势”。

普鲁士代表哈登堡在舞台上是个"配角"。普鲁士虽然在拿破仑战争中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而且在战争中壮大了，但相比之下它还比不上其他四强，仍处于"积蓄力量"的阶段。至少，维也纳会议抬高了它的身价，"正统主义"允许它继续与俄国、奥地利分割波兰。

英国（由卡斯利雷子爵和惠灵顿公爵代表英国）起了独特作用。维也纳会议天然地有利于英国。在战败法国以后，英国为了自由贸易的利益，最希望保持欧洲的稳定和力量的相对平衡，因此它参加"欧洲音乐会"，却拒绝参加沙俄的"神圣同盟"，因为沙俄倡导"神圣同盟"显然是以基督教的名义掩盖它向外扩张的野心，有害于"均势"的保持。在英国看来，这与英国的不能允许任何一个国家单独支配欧洲的原则完全不符。维也纳会议的进程十分适合英国的口味，事实上，英国在会议上出力不多，收获却不小。

但是，"力量均势"从来不是绝对的，从一开始就已包涵着打破它的因素。所以，"力量均势"只是通过大国之间一定程度的平衡来维护相对稳定的那种理论和实践。

同时，大国权力的集中和相对均衡，使弱小民族更加处于欧洲政治的"边缘"地位。它们受着大国的统治和宰割，意大利、波兰、匈牙利等甚至形不成独立、统一的民族国家。欧洲民族主义在这一时期更加成长起来，从一般民族愿望发展为争取自身政治权力、要求民族自决的运动。

第二，关于美国的新发展。新生的美利坚合众国进一步巩固了。"联邦主义"的政治体制和建立在联邦制基础上的民主和法治，虽源于欧洲，却在后起的美国以比欧洲彻底而完备的姿态落实了。其经验通过像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的名著《美国的民主》反转来传到欧洲。然而，美国自从摆脱英国控制以来，在几十年当中主要还是保卫和巩固已取得的成果，力争在美洲站住脚，并有所扩展；因此，西方外交的主角一时还轮不上它。然而美国绝不

允许欧洲染指美洲，所以它必然十分注意欧洲的动向。

“门罗主义”很恰当地反映了此时的美国心态。“门罗主义”的起因就是欧洲列强对美洲的觊觎：俄国垂涎于美国的西北部，在阿拉斯加擅自划定100里的禁航区；法国和西班牙等国干预西班牙殖民地的革命；英国眼睛盯着俄罗斯，同时抵制法国和西班牙以保护它在拉美的市场——在欧洲土地达成均势谅解的欧洲列强把新的争斗移到了美洲。因此，门罗在1823年12月咨文中宣布了任何欧洲国家不应在拉丁美洲推行殖民主义和让美洲人管理美洲的事情这两条原则。针对美国国内关心希腊局势的舆论，门罗同时还宣布了美国不干涉欧洲事务的原则。

然而应该特别注意的是，此时的美国与立国时的美国已经有了很大发展，而且正处在进一步发展的势头上。所以此时以“门罗主义”为代表的美国外交一方面主张划出“两个半球”的界线，新旧大陆互不干涉；另一方面又为自己留出伸展余地，不束缚自己的手脚。前者重在自卫，后者重在发展和扩张。例如，当英国外交大臣坎宁以英美有抵制俄、法等欧洲强国的“共同利益”为由，建议英美发表联合声明，表示两国都不在美洲谋求更多土地时，为当时的美国国务卿约翰·亚当所拒绝。因为这样的声明显然不利于美国即将向毗邻地区扩展势力。再如关于美国不干预欧洲事务的原则，门罗的咨文特意表明不干预“与美国无关的”欧洲事务。这样的限定词，也是为自己将来可能的活动留出余地。

“门罗主义”是美国走出国界、走向整个美洲的标志；曾是欧洲殖民帝国争夺场所的拉丁美洲，即将把欧洲的影响排除出去，而为美国开辟道路。所以门罗咨文是为美国的近代外交制定了一些基本准则的重要文件。

第二节　拿破仑的霸权外交

在将近两个世纪对拿破仑的研究中，人们已经比较习惯于接

受作为军事家的拿破仑形象，他被称为“战争之神”、“四大名将”[①]之一，这是有充分根据的。因为拿破仑自登上政治舞台之日起，直到他被囚禁圣海伦岛，没有一天离开过对外战争。说他穷兵黩武，是绝不过份的。人们也愿意接受作为政治家的拿破仑形象，因为他在法国大革命动荡不安的年代里，特别是通过对外战争，为法兰西建立了至今都没有根本变化的中央集权的资产阶级体制和法制。拿破仑连年累月地从事战争，他领导的法国同别国的关系大都是在战场上表现出来。所谓拿破仑时期的外交就不可能同战争分离开来。因此单独讲拿破仑外交，就不可能讲清楚。这个时期的外交是战争中的外交。我们把拿破仑时期的外交称作“霸权外交”，也是一种十分笼统的概括。拿破仑称雄欧洲的主要手段是战争，他的外交也定然是“霸权外交”。下面分几个方面讲讲这个意思。

一　拿破仑及其所处的时代

拿破仑，1769 年 8 月 15 日生于科西嘉岛。法国文豪雨果在他的传世之作《悲惨世界》里曾描绘过拿破仑战败的滑铁卢战役。然而拿破仑不失为战败的英雄，雨果不禁赞誉道：“科西嘉，一个使法兰西变得相当伟大的小岛。”[②]科西嘉，这个面积不过 8681 平方公里的小岛，凭什么能“使法兰西变得相当伟大”？

拿破仑处在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新生的资产阶级法国与欧洲封建旧制度尖锐对峙和冲突的时代。离开这个时代特点，就无法理解拿破仑为什么能震惊全欧洲，也无法理解拿破仑的内外政策。是“英雄造时势”，还是“时势造英雄”呢？归根到底，恐怕还是“时势造英雄”。这里以拿破仑为题，是因为他是那个特定时代的产物，并非孤立地突出他的个人。

① 指亚历山大、汉尼拔、恺撒、拿破仑。

② 雨果：《悲惨世界》（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年，第 827 页。

1789年爆发的法国大革命，不仅改造了法国社会，而且深深地震撼了整个欧洲的君主专制统治。被推翻的法国封建统治阶级不甘心失败，不断进行王朝复辟活动；欧洲各封建君主国同君主立宪制的英国一起，武装干涉新生的资产阶级法国。法国处在内忧外患之中。

1789～1794年，法国革命历经君主立宪派、吉伦特派、雅各宾派三派的领导。其中，1793年以罗伯斯庇尔为首建立的雅各宾专政，把法国革命推向了高潮。雅各宾专政，用恐怖手段镇压了国内反革命势力，把外国干涉军赶出了法国国土，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群众的措施。这些民主改革的措施，不可避免地触动了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因为"这部分资产阶级还在革命过程中就迅速地发展起来了，这是因为它通过没收后加以拍卖的贵族和教会的地产进行了投机，同时又以承办军用品欺骗了国家"。[1] 1794年热月党人发动政变，推翻了雅各宾专政。代表大资产阶级右翼的督政府的成立，使法国革命出现逆转，助长了封建复辟势力卷土重来的气焰；流亡国外的保皇党人纷纷潜逃回国，在巴黎组织武装暴动，利用选举窃取立法议会议席，一度控制两院多数。1798年，欧洲干涉主义趁机筹组了第二次"反法联盟"，法军节节败退。督政府陷于瘫痪，而且由于贪污腐化，弄得财尽粮绝，人民生活困苦，军队缺粮缺饷。恩格斯指出，"正是这些骗子的统治在督政府时代使法国和革命濒于覆灭，从而使拿破仑得到举行政变的借口。"[2]

1799年11月9日（雾月18日），拿破仑发动政变，推翻了督政府，成立执政府，任第一执政，并于1804年底建立法兰西帝国，前后统治法国15年。

---

①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09页。

② 同上书，第409页。

拿破仑出身于一个经济上并不宽裕的家庭，他从青少年起就走上了职业军人的道路，16 岁时被任命为炮兵少尉。1789 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后，当拿破仑往日的军校同学大多数都汇同封建王公贵族亡命国外，伙同外国干涉军反对革命、进攻祖国的时候，拿破仑站在了革命一边。1793 年雅各宾派专政后，24 岁的拿破仑受命指挥攻克在英军支援下被保皇党人占据的土伦城。从此，法国知道了拿破仑。1795 年，历史又给了拿破仑一次机会。保皇党人利用公众对督政府的强烈不满，在巴黎发动了叛乱，拿破仑于危难之间受命，镇压了这场叛乱。1796 年，拿破仑被任命为意大利军团司令，率军击溃欧洲反法联盟军队并进军奥地利和意大利。1798 年，拿破仑又率军远征埃及和叙利亚。拿破仑因而声威大振。

拿破仑应历史的要求登上政治舞台，成为法国的最高统治者。历史要求他在内外政策两个方面采取措施，巩固革命成果。在法国，拿破仑采取了一系列的政治和经济措施，强化中央集权的资产阶级专政。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大厦""是在第一帝国时期建立起来的"，"拿破仑完成了这个国家机器"。

在外交领域，历史给拿破仑提出的又是什么要求呢？

法国大革命后，几乎所有欧洲国家都将法国看成是危及自己统治的首敌。陷入外国武装干涉重围之中的法国，能否站住脚，革命成果能否巩固和发展，不仅影响法国的历史进程，也影响到整个欧洲和世界历史的进程。在这种情况下，"给法国资产阶级社会在欧洲大陆上创造一个符合时代要求的适当环境"，就成为历史向拿破仑提出的要求。[①]

拿破仑完成这个历史要求的手段首先是战争。而拿破仑以武力征服和扩张为前提的外交胜利，也确实维护了法国大革命的成

①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 18 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1972 年，第 604 页。

果，促进了大革命的原则在整个欧洲的传播，其迅速和效应远非通常的影响和宣传所能比拟，通过重新划定边界和各种改革，拿破仑在客观上起了激励欧洲各国民族觉醒的作用。

但是，拿破仑所做的远远超出了历史需要和历史给他规定的限度。他以救世主自居，对教皇领地和德意志各国横征暴敛，对异国他族人民实行强权统治。反干涉战争衍成穷兵黩武的无止境的扩张和侵略战争。结果，拿破仑给自己和他的帝国招致了一个悲剧性的结局。

二　拿破仑的霸权外交

拿破仑的对外政策言行，与法国革命爆发后历届政府的对外政策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集中到一个点上，就是为了法国在欧洲的霸权。

（一）追求“天然疆界”与欧洲霸权

1794年7月热月政变以后，法国热月党人公开讥讽雅各宾派对外政策的“纯防御性”目的，鼓吹占领“大自然本身为法国规定的疆界”。也就是说，法国的疆界应以大自然赋予的天然屏障为界，即大西洋、比利牛斯山、地中海、阿尔卑斯山和莱茵河。

1793～1794年，法国革命在军事上已取得一系列胜利，不仅外国干涉军已被赶出国土，而且法军已进入了比利时、卢森堡、荷兰。1794年底到1795年初，法国的北方军团渡过莱茵河占领了整个荷兰，并在海上全歼荷兰舰队，与此同时，法军又多次击溃奥普联军，结果，德意志人被赶到莱茵河右岸。在东南，意大利北部皮埃蒙特人被迫退守到阿尔卑斯山那边；在西南，法军不仅把西班牙人赶过了比利牛斯山，而且直捣西班牙腹地。这种凭借军事胜利而实现的占领，法国事实上已实现了它梦寐以求的所谓“天然疆界”。当然，这种事实上的占领并不等于外交上的承认。在军事压力下，邻国不得不以和约的形式承认法国的“天然疆界”。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法国的“天然疆界”已成定局，因为反法联

军中两个最重要的国家还在同法国作战，“天然疆界”当然也就不被承认。在大陆，奥地利军队还在同法国作战，而且以哈布斯堡王朝在大陆的努力和影响，没有奥地利皇帝的认可，“天然疆界”也不能算数，而英国军舰封锁了法国西海岸，当然也就谈不上以大西洋为界的安宁。

1796 年 3 月，拿破仑被任命为意大利军团司令。意大利战役是拿破仑直接指挥的第一次大规模战争。意大利长期以来受奥地利统治，法国革命的影响已震撼了奥地利在意大利的统治，拿破仑决意从意大利攻破奥地利战线，逼进维也纳，把意大利从奥地利统治势力下变为法国的同盟国，确立阿尔卑斯山界，迫使奥地利退出战争。在整个意大利战役中，迫使奥地利皇帝承认法国的“天然疆界”，始终是拿破仑的重要外交目标。

9 月，拿破仑通过战争迫使奥地利签订《坎波福米奥和约》。第一次反法联盟已被粉碎，这是拿破仑外交活动的第一个重大成果，“在这里第一次表现了拿破仑的外交才干并不亚于军事天才”。[1]《坎波福米奥和约》连同 1795 年签订的《法普巴塞尔和约》，《法荷海牙和约》，《法西巴塞尔和约》以及《法国瑞士和约》，从外交上以条约的形式确认了法国的“天然疆界”，特别是确认莱茵河左岸为法国领土。至此，以莱茵河、阿尔卑斯山、比利牛斯山、大西洋和地中海为“天然疆界”的扩张目标暂时实现了。

法国追求扩张称霸思想早已有之。早在 17 世纪，亨利四世在对外政策中就奉行两大目标，即“天然疆界”和“政治均势”。到后来黎塞留掌权时期，以莱茵河为法国东部边界的想法比亨利四世时更加明显。当时许多御用文人都在试图论证莱茵河“这条河流一直是法国的疆界”，并鼓吹一旦法国取得莱茵河、比利牛斯山和阿尔卑斯山为界的广大地区，“欧洲的和平就会有保证”。黎塞留在他的《政治遗书》中就声称：“我秉政之目的在于：为高卢收

① 塔尔列：《拿破仑传》，商务印书馆，1976 年，第 37 页。

回大自然为它指定的疆界……”[①]法国的“天然疆界”若以大西洋、地中海、比利牛斯山和阿尔卑斯山为限来说，是容易实现的。但以莱茵河为界则非易事，因为那就需要吞并比利时、荷兰、德意志和瑞士等国的领土。

法国以天然屏障为疆界的扩张主义目标，即使在最强盛的封建君主时代也未能完全如愿以偿，但经拿破仑之手却得以实现，尽管是短暂的。拿破仑从思想和行动上，基本上继承、发展并实践了以天然屏障为疆界的扩张主义目标。

1796年，拿破仑在意大利战役中连连重创奥地利军队，在迫使撒丁王国签订停战协定之后，9月5日，拿破仑在蒂罗尔曾告示民众："我们来到这儿不是为扩大本国的领土，大自然已经让莱茵河和阿尔卑斯山限住我们的边界，正如蒂罗尔被它用来作为奥地利王室领地的边界一样。”[②] 在《坎波福米奥和约》签订之后，拿破仑以天然屏障为疆界的想法再一次被确认无疑。1797年底，拿破仑以征服意大利的英雄身份凯旋巴黎。12月10日，在督政府为他举行的欢迎大会上，拿破仑宣称："你们已经成功地建立了伟大的国家，它的领土疆界就是自然向它提供的疆界本身。……”[③] 1806年，拿破仑决定进一步巩固自己在德意志西部和中部的统治，成立了莱茵邦联。德意志各国君主根据拿破仑的指令签订了《莱茵邦联条约》，莱茵邦联公选拿破仑为保护人。莱茵邦联成立后，拿破仑就公开宣布他拥有45万无需任何军饷补给的军队，并将20万军队集中到莱茵河两岸的阿尔萨斯、洛林和莱茵邦联各国。拿破仑建立莱茵邦联的一个明显目的，就是把莱茵河这条天然疆界进一步固定起来。

拿破仑维护“天然疆界”的扩张主义思想是顽固的。1813年

---

① 转引自波将金：《外交史》第1卷（上），三联书店，1979年，第345页。

② 《拿破仑文选》（上），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35页。

③ 乔治·博尔多诺韦：《拿破仑》，巴黎，1978年，第70页。

底第七次反法联军在逼进法国时曾表示，只要法国放弃对西班牙、意大利和德意志的控制，即可维持莱茵河、阿尔卑斯山、比利牛斯山以内的“天然疆界”，但拿破仑没有答应。1814年初，反法联军已攻进法国境内，向巴黎逼进。但反法联军深知击溃拿破仑并非易事，因此，奥地利、普鲁士、英国，甚至俄国当时都仍然乐于以1792年的法国边界为基础（即法国退出荷兰、莱茵区、意大利，以及比利时、萨瓦和尼斯）与拿破仑签订和约，条件是拿破仑放弃干预这些边界之外的欧洲事务。但是，拿破仑决不从“天然疆界”退缩。2月21日，他给奥地利皇帝写信表示，法国决不放弃比利时，决不会签订一项把法国赶离莱茵河，排除于列强之外的和约。当同盟国要求停战谈判时，拿破仑拒绝参加任何谈判，除非同盟国同意以“天然疆界”为和约的基础。他在致全权代表、外交大臣科古兰的信中说道：“同盟军行事是否真诚，英国是否愿意和平，我认为是可疑的。至于我自己，我只希望有一种牢靠的和体面的和平。法国要是没有它的天然疆界，没有奥斯坦德和安特卫普，就不能同欧洲其他国家处于平等地位。英国和其他强国已经在法兰克福承认了这些天然疆界。法国在莱茵河和阿尔卑斯山范围内所获得的地方，抵不上奥地利、俄国和普鲁士在波兰、芬兰以及英国在亚洲所获得的地方。……他们是不是想使法国回到原来的边界去呢？这就是要贬损法国。……我不在乎这个皇位。我决不接受可耻的条件使国家或我自己受辱。”[①] 这就是说拿破仑始终不愿放弃以莱茵河为界。

从亨利四世到拿破仑，法国统治者不惜使用武力追求和维护天然疆界，其中，尤以拿破仑更甚。是什么原因促使他如此坚决呢？第一，拿破仑认为放弃“天然疆界”就是“贬损法国”，是“可耻”，是“受辱”。“天然疆界”已与法国和拿破仑荣辱与共。第二，占有“天然疆界”，就等于全部或部分占有了比利时、荷兰、

---

① 《关于拿破仑》，1975年，第340～341页。

德意志、瑞士、意大利。雄心勃勃的拿破仑自然不能放弃这样一个法兰西大帝国。第三，“天然疆界”不仅使法国在西部、南部和东南部无后顾之忧，而且占据莱茵河这条退可以守，进可以攻的命脉，就为深入欧洲腹地开辟了道路，为称霸欧洲创造了条件。

值得注意的是，拿破仑在追求“天然疆界”时，同他的先行者一样，都是在“追求和平”的粉饰下进行的。17世纪时法国的统治者宣称，一旦实现了法国的“天然疆界”，“欧洲的和平就会有保证”。在上边引述过的几段话中，拿破仑也说：“你们希望和平吗？法军就正是在争取和平。……我们来到这儿不是为扩大本国的领土。”拿破仑还说：“共和国希望和平，希望以莱茵河为国界。”[①] 但事实上“天然疆界”既没给法国带来和平，也没给欧洲带来和平。恰恰相反，它成了欧洲不安定的因素，特别是法德之间长期争斗的原因。

国家疆界的形成，有它不可随意更改的历史的原因。这包括民族、文化、经济、政治、地理等多种因素，自然地理条件虽是不可缺少的条件，但绝不是唯一因素。德意志人怎样看待法国的“天然疆界”呢？莱茵地区居住的大多数是德意志人，他们当然认为“莱茵河是德意志的河流，不是它的疆界。”所以，拿破仑不顾其他条件，仅以符合自身军事利益的自然条件去追求“天然疆界”，虽然在武力和强权政治下可以暂时实现，但不可能是稳固的，更不可能是和平的。“如果国界应当根据军事利益决定，那末要求就会毫无止境，因为任何一条战线都必然有缺点，可能用兼并邻近新地区的办法加以改进，并且这种国界永远也无法最终和公允地划定，因为每次总是战胜者强迫战败者接受自己的条件，从而播下新战争的种子。”[②] 用武力追求“天然疆界”本身就不是和平的，而且不可能只把守在家门口，他必然要尽可能地将势力范围

---

① 《拿破仑文选》(上)，第188页。

② 《马恩列斯论巴黎公社》，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25页。

扩展到“天然疆界”之外，向莱茵河右岸、向亚平宁半岛，向伊比利亚半岛扩张，去建立一批由拿破仑直接或间接统治的附庸国。

（二）建立附庸国与欧洲霸权

法国革命初期，资产阶级对向境外扩张革命势力还是比较慎重的。直到1792年法国君主政体被正式推翻，资产阶级才以国民公会的名义提出了以革命解放欧洲各国人民的口号，宣传在法国境外开展革命战争。11月19日，法国国民公会颁布了关于援助各国人民推翻本国暴君的法令。12月15日，宣布在法军占领的地区建立新政权，并没收敌人的财产以弥补军费。这一法令随着反干涉战争的步步胜利而逐渐扩大实施。1792～1793年底，法军占领地萨瓦、尼斯、莱茵河左岸和比利时等地，按照解放战争和放弃侵略的原则，相继郑重地通过“全民投票”并入法国。

法国此时的思想虽然还局限在“天然疆界”之内，即限于把革命的法国扩大到莱茵河和阿尔卑斯山、比利牛斯山，但这思想本身已涵有向外扩张的成分。他们希望从北海到意大利，包括意大利在内，沿法国边界建立一系列从属于法国的共和国，使法国不受其他欧洲国家的侵犯，并为法国向外扩张、争霸欧洲提供基地和跳板。从1794年起，督政府即沿共和国边界建立起一个由附庸国组成的樊篱地带。

拿破仑从1796年进军意大利开始，就继承和发展了这一政策，随着武力征服的足迹，出现了一系列依照法国的规矩建立的宣布从属或效忠于法国的新型国家。

1796年4月，意大利境内的撒丁王国成为拿破仑征服的第一个国家，拿破仑乘胜进入米兰，整个伦巴第被法国占领。随后，那不勒斯国王、罗马教皇、巴马、摩德纳大公也纷纷背离奥地利皇帝，同法国签约和好。拿破仑在伦巴第以法国资产阶级政权的革命方式组成了市政府和国民自卫军，并以伦巴第为中心建立了内阿尔卑斯共和国。它的版图北起阿尔卑斯山主脉，南至里米尼，西从提契诺河，东抵明乔河。

在这个时期，拿破仑首先考虑的是进军维也纳，打败奥地利，在法军所经过之处建立符合法国利益的国家。拿破仑很明白，当撒丁的王公们忠于法国的时候，对法国是有利的；但是他们一旦改变态度，那对法国也是最危险的。拿破仑自问："在自己的后面留下这样多怀着敌意的人是否明智呢？为了平安地前进，法军在所有被占领国家建立自己的据点，更换政府，让那些和我们观点一致，利害相同的人掌权，是不是更好些呢？"① 在坎波福米奥条约签订之后，针对成立内阿尔卑斯共和国问题，1797 年 11 月，拿破仑曾公开告示意大利公民必须任用"坚持共和国原则并直接关怀共和国繁荣昌盛的公民"。他还说道："我任命了许多人担任官职。我可能也有用人不当的情况，而让阴谋分子占了便宜。可是，让你们自己来任用人选，又很不方便，因为你们还不曾组织起来。"② 这等于准确无误地承认，内阿尔卑斯共和国是依照法兰西共和国政体并由拿破仑一手扶植建立的。

到 1801 年 2 月，拿破仑同奥地利签订吕内维耳和约，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完全被排挤出莱茵河左岸，法国还得到尼德兰和卢森堡。奥地利承认法国庇护下的黑尔维谢（瑞士）、巴达维亚（荷兰）、利古里亚（热那亚）、内阿尔卑斯（伦巴第）等一批共和国。1802 年 3 月，拿破仑在同英国签订的亚眠和约中，英国被迫表示不干涉荷兰、德意志、意大利内政，即等于承认了法国对上述地区的控制和影响。直到此时为止，拿破仑在法国周围建立一批附庸国的目的，尽管也存在向外扩张和掠夺的因素，但主要的，还是为了巩固和发展法国革命的成果，为了击溃反法联盟的主要国家奥地利，"给法国资产阶级社会在欧州大陆上创造一个符合时代要求的适当环境"。正因为这个因素占了主要方面，所以拿破仑对附庸国的控制手段一般都采取用签订和约来束缚对方，不管怎么

① 《拿破仑文选》（上），第 72 页。

② 同上书，第 340 页。

说，它还是一种间接统治的形式。当然，这都是在武力征服的前提下进行的。

随着拿破仑在战场上取得越来越大的胜利，在欧洲占有越来越广的领土，从别国掠夺到越来越多的财富，拿破仑的胃口也越来越大，霸权主义思想日益膨胀，对附庸国的控制手段也明显产生变化。

1804 年 5 月，法国元老院宣布拿破仑为法兰西人皇帝，12 月，拿破仑在巴黎圣母院加冕。但是，拿破仑不光是要当法兰西皇帝了。这时候的拿破仑已不再满足于对附庸国的间接统治了，他不仅将自己的亲属和部下封王拜相，而且还亲自执掌别国大印，试图在欧洲建立一个拿破仑帝国家园。从 1806 年成立莱茵邦联，将德意志国家实质上化为乌有，1807 年同沙皇签订《提尔西特和约》之后，拿破仑上升到欧洲大陆独裁者的地位。法兰西帝国包括了比利时、皮埃蒙特和热那亚，这是法兰西历史上罕见的疆域。拿破仑身为法兰西皇帝，还兼任意大利国王、莱茵邦联保护人，瑞士联邦仲裁者。他的兄弟约瑟夫、路易、热罗姆分别在那不勒斯、荷兰和威斯特伐利亚为王。拿破仑的军队占领了欧洲北部沿海的汉堡、不来梅、卢卑克、但泽、科尼希斯贝尔格等港口。波兰的大公是忠实于拿破仑的萨克森国王，而波兰军队也在拿破仑的元帅达武统率之下。整个欧洲大陆，弱者已在管辖之中，强者呢？普鲁士已被占领，奥地利是手下败将，沙皇俄国也委屈结盟。结果是，“欧洲到处都是压迫深重，胆战心惊的景象。拿破仑帝国的疆界不仅在战争期间和战争结束以后‘移动’，而且就在拿破仑没有进行战争的短短的间隙时期也在‘移动’，在对他适宜的时机，他只要发布一个有关的命令，就无条件地把他想要吞并的那些国家并入自己帝国的版图。”①

这时候的拿破仑，他主要想的已不是如何巩固和发展法国革

---

① 《拿破仑传》，“序言”第 3 页。

命成果，为法兰西共和国创造“适当环境”。无限的权力和强大的实力，使拿破仑自己从一个旧制度的破坏者沦为旧制度的维护者，变为一个有无限征服野心，要称霸欧洲的侵略者。

（三）进攻英国与争夺霸权

摧毁法国的世仇英国在海上的实力和殖民实力，不许它插手欧洲大陆，从而实现法国霸权的思想，一直是拿破仑对外政策中的主线。这不仅有历史的原因，更有现实的原因。

历史上的法国曾是欧洲强中之强，特别是在路易十四统治时期，整个欧洲，包括英国这个岛国在内，都不得不承认法国在欧洲的霸权。英国资产阶级在国内确立自己的统治后，在对外贸易扩张和殖民扩张政策驱使下，同法国展开了一场争夺海上和殖民地霸权的长期斗争。从18世纪初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1～1714年）开始的英法之间的争夺，最终以法国的失利而结束。1713年的《乌德勒支和约》和1714年的《拉什塔特和约》在18世纪欧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此后，法国又连续参加了波兰王位继承战争、奥地利帝位继承战争和七年战争。这3次战争，从总体上来说对封建统治者是致命的，对处于年幼阶段的资产阶级来说也是无益的。因为法国丧失了美洲的加拿大和路易斯安纳，在亚洲又丧失了印度。法国失去的这些势力范围，大部分被英国夺去。英国的威廉·庇特父子，是两位敢于作为的政治家、外交家，他们将英国的强盛和海上霸权看得高于一切，在他们的主持下，英国继16世纪战胜西班牙、17世纪战胜荷兰之后，在18世纪又战胜了当时欧洲最强大的法国，从而确立了它在海上和殖民地的霸权。法国革命爆发后，作为英国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小威廉·庇特就十分仇视法国革命，英国害怕法国革命成功，资产阶级掌权后一个强盛的法国当然会危及英国的海上和殖民地霸权。于是，从1792～1793年起，庇特的英国就成了历次反法同盟的主要倡导者、组织者和资助者。

法国资产阶级在推翻封建王朝的斗争中，曾历数帝王们丧权

辱国的罪恶。从英国手中夺回失去的殖民地和海上霸权，是法国资产阶级的强烈要求。因此，英法之间围绕革命和霸权的争斗，在革命开始时即已存在，只是到拿破仑时期变得更加尖锐激烈。战胜英国成为拿破仑外交政策中一条主线。在封建势力仍占绝对优势的欧洲，仅有的两个立足未稳的资产阶级新型国家，没有携手并肩共同对付封建君主的反革命势力，却成了你死我活的主要竞争对手。

严格地讲，在法国革命的初期，英国并没有直接参与干涉，英国是个岛国，历来喜欢采用假手他人的政策干涉欧洲大陆事务。但是法国的革命势头不减，英国认识到仅靠奥普来对付法国革命难以成功，遂决定亲自出马，试图摧毁自己的主要竞争对手并阻止革命蔓延欧洲。英国由于地理环境所致，陆上军事力量相对较弱，但它充分利用了自己的优势：高超的技术、资产阶级的金钱、强大的海军、众多的殖民地以及在全世界极广泛的商业联系。在同法国的争夺中，英国利用了大陆封建君主国家的弱点，用英国的黄金和武器来装备这些君主国的军队。“一名士兵给一枚金币，一团士兵给一袋黄金，一个国家给一吨黄金。”[①] 小威廉·庇特动用了几百万英镑来资助俄、普、奥等国，要他们去进攻法国革命和拿破仑。

因此，无论从战略上看还是具体政策上看，英国与拿破仑都是针锋相对的。新仇旧恨，拿破仑决意要战胜英国。

拿破仑认为，英国“要分裂法国，毁灭它的海军和港口，把它从欧洲地图上消除掉，或把它降为二等强国，让大陆国家分崩离析，以便垄断全部贸易，靠掠夺来富裕自己；英国正是为了谋求这种骇人听闻的成功，才挥霍黄金，滥事许愿，搞种种阴谋诡计的。”[②] 拿破仑对英国的剖析，不能说不是入木三分。他精辟地

① 福尔：《拿破仑论》，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24页。

② 《关于拿破仑》，第302页。

道出了英国的目的是摧毁法国并进而维护和进一步攫取欧洲和海上霸权。

应当说，英国站在法国的对立面，充当欧洲封建势力反对法国革命的靠山，这种局面本身就注定了拿破仑要求战胜英国政策的正义性、革命性。也就是说，在拿破仑的思想中，反对英国就是维护法国革命和法国的利益，对于这一点认识，拿破仑还是有些自觉性的。拿破仑曾说："法兰西人正在为各族人民的神圣权利而战斗；英国人只是在保卫他们所僭越的特权"，"如果我战胜他们，欧洲将为我祝福。"拿破仑还认为，"我反对英国，既不是出于感情上的偏见，也不是由于不可克服的憎恨。英国人按照一种排斥性的体制来反对我；而我之采用大陆制度，远远不像我的敌手所设想的那样，是出于野心的忌嫉，而是为了导致英国内阁同我们结束这种敌对。不管英国怎样富有和繁荣，都同我没有什么关系，只要法国及其盟国也和它一样富有和繁荣就行！因此，大陆制度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使法兰西帝国和欧洲将决定性地享有合法权益的时代提前到来。"①

拿破仑的这一段话里有三点是可以说明问题的：一是他揭露"英国人按照一种排斥性的体制来反对我"，不管这时的拿破仑是不是认识到英法两国的体制属于同一性质，起码他意识到反对我拿破仑就是在反对法兰西体制，他要求"结束这种敌对"；二是法国和英国同样要求"富有和繁荣"；三是法国和欧洲要享有被英国剥夺的"合法权益"。这几点要求应当说是符合法国革命利益的要求，符合当时历史需要的要求，是合理的，无可非议的，在拿破仑的对英政策中也充分体现了这些要求。

问题在于，事实并不止于像拿破仑自己说的那样，在反对英国的政策中没有"野心的忌嫉"。恰恰相反，野心很大，而且随着

① T. 马泰尔辑注：《拿破仑的回忆和著述》，巴黎，1926年，第355页，转引自《关于拿破仑》，第324～325页。

时间的推移，拿破仑的野心膨胀最终不能自已，导致对英政策的一败涂地，反而成了英国人监护下的阶下囚。

“如果我们理应让英国在海上占有某种优势(这是将以财富和鲜血为代价来购买，并由于它的地理位置和它在三大洲所占有的领地造成的优势)，那末至少，我们的旗帜将能在大洋上出现而不遭凌辱；我们的海外贸易将不再被破坏。阻止英国插手大陆事务，正是今天应做的工作。”①

“我的原则是：法国第一。你决不可忘记这个事实，即如果英国商业在公海上是称霸的，那是由于它拥有海上的实力，所以要想到：既然法国是陆上最强大的国家，它就应当要求大陆上的商业霸权。”②

拿破仑的意思是：英国在海上已经领先，这无法否认，但法国也要在海上占有一席之地。欧洲大陆是法国的，这个霸权毋庸置疑，至于是否允许英国在大陆也有一席之地呢？拿破仑的回答是“阻止英国插手大陆事务”，等于训告英国，你有的我也应该有，我有的你不能有。因此，在英法之争中，英国的想法是既要保持欧洲大陆的均势，又要保持海洋的“非均势”；拿破仑的想法是，既要破坏欧洲大陆的均势，又要破坏海洋的“非均势”。这是不可调和的。

自从拿破仑登上政治舞台，在后来被人们称之为拿破仑战争的所有战争行动，以及围绕这些战争行动展开的外交活动，都与力图削弱英国、战胜英国这一政策目标有关。1797年，意大利战场上的胜利使拿破仑更加坚定了他的对英政策，“让我们把我们的一切活动能力集中在海军上，从而打垮英国。此事一旦完成，我们便把整个欧洲踩在脚下了。”③ 1798年3月，拿破仑被任命为东

① 《拿破仑的回忆与著述》，第357页，转引自《关于拿破仑》，第326页。

② 《关于拿破仑》，第331页。

③ 《拿破仑一世传》(上)，商务印书馆，1977年，第186页。

方远征军总司令。督政府的密令是占领埃及，从所能到达的英国东方领地中把英国人统统赶出去。拿破仑在6月28日给远征军的通令中命令："你们就要进行一场征服战，这场征服战将对世界文明和商业带来无法估量的影响。你们要尽可能地给英国以最切实、最使之痛苦的打击，直到你们能予以最后致命的打击为止。"①1805年9月，拿破仑在莱茵河率军进攻奥地利军队，但他对士兵提出的口号是："粉碎这个由英国的仇恨和黄金交织而成的新的同盟。"1806年底，针对英国的大陆封锁政策开始，就连在西班牙的殖民战争和1812年大规模的侵俄战争，其真正目的也在于削弱和战胜英国。拿破仑说道："我即将决定干预西班牙事务，其结果将使葡萄牙人从英国人手里解脱出来，并把西班牙两个海洋的海岸置于法国的政治权力之下。""俄国在提尔西特曾发誓和法国结成永久联盟并对英国作战。今天，它违反它的誓约！"拿破仑认为"俄国是英国可以使用的最后手段"。显然这就是拿破仑侵俄战争的真正动机之一。

在拿破仑时代，这场英法之争的最终失败者是拿破仑。拿破仑所以未能如愿，有许多原因。比如过低估计了英国的实力，过高估计了法国的实力；英国得天独厚的岛国地理位置使法国难以直接染指等等。但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拿破仑始终要同英国争夺霸权的野心超过了实际可能性，同时四面树敌，终于未能将英国置于死地，反而沦为英国阶下囚。

拿破仑也曾几次分化瓦解反法联盟，也曾在同英国的争斗中谋求到欧洲大陆国家结盟或中立，甚至于调动了全欧洲的力量来对付英国。特别明显的是，在拿破仑战争期间曾有过两次法俄同盟。1801年法俄签订协定，才迫使英国签订吃亏受辱的"亚眠和约"。另一次法俄同盟是1807年在提尔西特结成的，11月7日，俄国断绝了同英国的外交关系。这本来都是拿破仑精心策划后所取

① 《关于拿破仑》，第288页。

得的有利形势。之所以策划成功，是因为拿破仑看到，英国业已形成的霸业，不光是对法国的威胁，大陆其他国家同样备受英国海上霸权之苦，因此他有可能利用这一点。但是，拿破仑的悲剧在于，他无法看到自己的霸权有着同样的利害关系。1801 年第一次法俄同盟之后，由于拿破仑一再拖延执行国际协定，在意大利和北德意志、汉诺威、荷兰、瑞士为所欲为，以致俄国不得不经常阻止拿破仑“任意修改和歪曲”欧洲地图。于是导致 1805 年俄英再次结盟反对法国。同时，拿破仑在亚平宁半岛的侵略行动将奥地利再次赶进反法联盟，拿破仑对埃及的威胁又促使英俄把土耳其拉进联盟。1807 年提尔西特和约之后的几年里，法国不仅控制了南欧、中欧和北欧，而且可以号称为波罗的海强国了，这些霸权活动直接威胁到俄国。而拿破仑 1812 年的侵俄战争使欧洲国家看清了一个真相，即英国取得的是海上霸权，那毕竟是走出家门以外的威胁，而拿破仑要的是欧洲大陆霸权；对于受到威胁的国家说来，孰轻孰重，自然分明。

欧洲国家宁可同英国这个海上霸主结盟，共同反对拿破仑这个欧洲大陆霸主。拿破仑在同英国的斗争中终于沦为一头困兽；他为渊驱鱼，英国因而得以组织广大的反法同盟军。

三　拿破仑外交的指导思想与特征

毫无疑问，拿破仑的外交思想鲜明而强烈地反映了法国资产阶级的利益、抱负和野心。拿破仑是处在新旧制度交替，资产阶级作为新兴阶级为巩固革命成果而斗争的时代，因此，他的思想和政策自然含有不同程度的历史进步因素。否认拿破仑在粉碎欧洲封建专制制度中具有积极的进步的历史意义，否认这个十分明显的不庸争辩的事实，是不正确的。但是，这部分积极意义不能掩盖拿破仑外交思想中急于为法国在欧洲确立霸权，对外扩张领土，掠夺他国财富，实行民族压迫的本质。总归起来说，拿破仑外交思想的宗旨就是要为法国争得欧洲霸权，这是与巩固和发展

法国革命成果的言行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资产阶级在上升阶段的积极意义随着地位的改变而逐渐消失，而代表资产阶级本性的、违背历史发展规律的消极因素则逐渐明显突出。这是人类历史发展中存在的客观的、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趋势。拿破仑外交思想的本质和特征正决定于此。

（一）拿破仑外交的指导思想

关于拿破仑的对外政策目标，历史学家们说法不一。有的认为拿破仑的主要目标是战胜英国；有的认为拿破仑只不过是在捍卫"天然疆界"；有的认为拿破仑不断征服，是为了称雄东方；有人认为拿破仑的雄图大略是先以加洛林帝国为模式，继以罗马帝国为模式建立统一的欧洲；也有人认为无法将拿破仑的对外政策归结为一个单一的和明确的目标，因为一旦达到这个目标，拿破仑就可能完全心满意足，然而这又无法解释他无限的权力欲和野心。法国历史学家乔治·勒费弗尔认为，"没有任何合乎理性的解释可以把拿破仑的全部对外政策统一起来，因为他同时在追求几个不同的目的，有些至少在我们现在看来是彼此矛盾的。归根结蒂，还是要回到他的'野心'上来。"① 也就是说，拿破仑的对外政策只有用拿破仑的"野心"才能归纳统一起来并解释清楚，否则是难找到答案的。但不管怎么说，一个人的行动决不会是随意性的，总有他的一定目的，并且在思想上具有为实现这一目的的行为规范。何况拿破仑，他在十几年里开创了一个"拿破仑时代"。如果他的对外政策没有一个总的目标，没有一个为实现这个总目标的指导思想，他也就决不可能在世界历史上取得那么辉煌的成功和那么悲壮的失败。

拿破仑外交中的具体政策目标，无论是夺取围绕法国的"天然疆界"，建立围绕法国的附属国，还是战胜英国，都与确立法国在欧洲的霸权这个总目标相关联。

① 《拿破仑时代》（上），第 161 页。

据拿破仑的哥哥约瑟夫·波拿巴回忆，他的父亲在弥留之际说过：他的拿破仑总有一天会推翻旧君主们并且征服欧洲。[1]如果这句话真有其事，当时是1784年，拿破仑不过才15岁，距法国革命还有5年，羽翼逐渐丰满的资产阶级已在把眼光投向未来。

在许多关于拿破仑的著作中，都特别强调拿破仑从小就具有非凡的志向与抱负。小拿破仑被描绘成爱激动、好斗、好当头，不惹人喜欢，往往是"孩子王"。这头"荒野的狮子"，从小就喜欢有自己的领地和势力范围。当拿破仑在法国革命中成长起来，并登上政治舞台之后，儿时的志向与抱负已演化升华。他的心目中只存在世界上他所佩服的那些伟大人物的形象和业绩：东方的征服者、梦想征服世界的亚历山大，罗马帝国的创建者与重建者恺撒、奥古斯都、查理大帝。这些与世界大一统思想相关联着的伟人的名字，是激发拿破仑丰富想象力的榜样，是赋予拿破仑无限权力欲和征服野心的典范。1804年，拿破仑加冕时就公开宣称，他要像查理大帝那样，成为西方的皇帝。他不是在继承过去法国国王的遗产，而是在继承查理大帝的遗产。拿破仑想成为罗马帝国的继承人，欧洲文明列国的统一者。事实上，后来在拿破仑直接统治或间接统治下的领土，远比查理大帝占领过的领地大得多。

拿破仑有过许多妄图主宰全世界的言谈话语。这种最初的萌动，始于他在意大利战场的巨大成功。1796年5月洛迪战役以后，拿破仑成为意大利的实际统治者。他是意大利的征服者、立法者，他集军事统帅、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于一身，他的思维和行动范畴，已不仅仅限于意大利，更不限于法国。1797年10月，拿破仑就任英吉利军团司令之后，就明显表示出要追求更显赫"荣誉"的决心，不愿呆在巴黎这个花花世界里，认为在巴黎一切都是过眼烟云，他已经没有什么"荣誉"可追求的了。不仅巴黎没有，连

① 《拿破仑一世传》(上)；第28页。

欧洲也是一样。他说："这个小小的欧洲是不能给我提供足够的荣誉的。我必须到东方去寻找；所有不朽的盛名都是来自东方的。"[①]于是就有了出征埃及和叙利亚。

这种日益膨胀的权欲和野心，使拿破仑无法准确地看清客观形势，无法约束自己的言论和行动。即使到1812年发动侵俄战争之前，当他的部下担忧后果劝他放弃对俄战争时，拿破仑还不屑一顾地回答说："再过3年，我就要成为世界的主人。"1814年，拿破仑曾公开承认："我曾希望法国统治全世界。"[②] 而到了1815年4月，拿破仑败局已定，他还在为当"世界的主人"做最后的挣扎，并没有因此而放弃世界帝国的迷梦。拿破仑说道："我曾向往过一个世界帝国，为了保证我能做到这一点，无限制的权力对我来说曾是必要的。仅仅统治一个法国，似乎照宪法行事要更好些。我曾向往过一个世界帝国，又有谁处在我们的地位上会不这样向往呢？世界要求我统治它，那些君主和臣民争先恐后地归附在我的王笏之下……"[③]

关于世界帝国的迷梦，对于资产阶级上升阶段的拿破仑来说，在思想上还是朦胧的，虽然有过多少次的美好的梦境，但总归因为资产阶级所处时代的局限性，它的力量还不足以使他这一思想成熟起来。建立世界帝国的真正尝试，还是留给了拿破仑的后人们，而拿破仑外交思想中真正看重并努力实践的，是欧洲霸权，是欧洲一统天下的拿破仑的法兰西帝国。

1797年签署"坎波福米奥和约"前不久，拿破仑在一封信里说过这样一段话："如若我们以准确无误的政策作为我们所有行动的基础——这项政策无非是对各种力量组合和各种机会的周密估计——我们将在长时期内是伟大的国家和欧洲的仲裁者。进一步

① 《拿破仑一世传》(上)，第183页。

② 塔尔列：《拿破仑传》，第332页。

③ 《拿破仑的回忆和著述》，第319页，转引自《关于拿破仑》，第344～345页。

说，我们对欧洲的局势举足轻重；我们可以按我们的意志来左右局势；同时，如命运是这样安排的话，我认为我们在几年之内取得那些伟大的成就，绝非不可能的。”① 到了1802年，当在拿破仑的压力下，英国签署“亚眠和约”已不可避免时，拿破仑自认为“伟大的成就”已成为现实，他说道：“西班牙是我们的，我们在意大利有个立足点。在埃及我们将取而代之。瑞士、荷兰、比利时的事情，已是不可改变的了；关于这事我们已向普鲁士、俄国以及（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声明过：如有必要，法国可以单独向一切国家作战，换句话说，绝不准荷兰有什么总督，我国一定要保有比利时和莱茵河左岸。如果荷兰有一个总督那就会像巴黎近郊圣安托万区有一个波旁王室一样的糟糕。”② 这一段话，可以明显看出拿破仑的骄横。欧洲霸权的欲望和野心，已使拿破仑目空一切。

对于欧洲，拿破仑有自己可与亨利四世的“宏伟计划”相媲美的计划。在1812年侵俄战争前夕，他曾对富歇说过：“我要把仅仅还是计划中的内容付诸实现。我们应当有一部欧洲法典，一个欧洲的最高法院，一种统一的欧洲钱币，统一的度量衡，统一的法律。应当由我把欧洲的各国人民变成一个统一的人民，巴黎要成为世界的首都。公爵先生，这就是唯一理想的结局。”③

1815年拿破仑失败后被囚困于圣海伦岛期间，他曾对自己全部政策的指导思想作过一次精辟的阐述。他说道：

> 法国，由于它的地理位置，肥沃的土地以及居民的才能和智慧，是欧洲国家的仲裁者。它像狮子居于其它动物中那样处于欧洲的国家中。……1793和1794年，全欧洲组成了一个同盟来反对它，……130万法兰西人出于爱国热忱而不是

① 《拿破仑一世传》（上），第185页。

② 同上书，第313页。

③ 乔治·博尔多诺韦：《拿破仑》，第223页。

像人们所说的出于害怕断头台，立即拿起了武器。欧洲被征服了——注定得被迫承认法兰西共和国，并且屈服于具有法兰西借以获得新生的自由平等原则的帝国。天下任何伟大的事情，法兰西人没有做不到的。危难使他们振作，……热爱荣誉在他们身上像是第六种官能……

那些被召唤出来掌握这样一个王国的人，应当了解法国所享有的这种有利地位的全部价值和意义，决不允许让天生要成为太阳的国家堕落成为一个卫星。

我在执政府和帝国时期的全部政策一贯受这种看法指导。我有雄心要做到把欧洲所有的巨大利益融合在一起，如同对法国各派所已做到的那样——成为各族人民及其君主之间的仲裁者。①

从拿破仑这近400字的自白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拿破仑的霸权野心。

拿破仑认为法兰西共和国是不可抗拒、不可征服的，无所不能的法兰西人将迫使欧洲屈服。但是他的野心驱使他的言行超出了历史的需要，他把法国喻为“万兽之王”，不是“卫星”，而是“太阳”，是其它欧洲国家的“仲裁者”。换言之，法国要主宰欧洲。而这一切的价值和意义，只有他拿破仑才能理解，也只有他拿破仑才有雄心和能力去实现这一目标。

正是在这种主宰欧洲的思想指导下，拿破仑为自己定下了与法兰西民族利益背道而驰的霸权外交目标和政策，把那根试图标志他辉煌战绩的“旺多姆圆柱”沉重地压在法兰西民族身上。

拿破仑争夺欧洲霸权的思想绝不是历史的割断，他从他历来崇拜的历史榜样中受到启发和鼓舞。在拿破仑之前，欧洲封建君主时代称霸欧洲的念头屡见不鲜，也不乏因争霸而起的连绵战争。

① 《关于拿破仑》，第352～353页。

在拿破仑的思想里，有亨利四世"宏伟计划"的蓝图，有路易十四欧洲霸权的版图，就连他多次说"法兰西像太阳"一样，也很难说不是路易十四自封"太阳王"的翻版。但是，拿破仑之前的封建君王们的争霸思想和斗争，只是围绕着帝王们的个人权益或者是封建王朝贵族的权益的争斗。而拿破仑则是在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的名义下来行事的。拿破仑宣称："我一直为民族及其利益进行统治……这是全法国都知道的，法国人民爱戴我。我说的法国人民，意思是指这个民族。"[①] 因此，作为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拿破仑的霸权思想和争霸斗争，就同封建君主们的霸权思想大不一样，其间有了质的变化；他的霸权欲望和野心要贪婪膨胀得多，要更加残忍和不择手段。当然，他的结局和后果也更加悲惨和严重。

(二) 拿破仑外交的特征

承上所说，可见拿破仑外交既是他之前历代统治者外交特征的延续，也可说是他之后资产阶级外交的预演。

1. 拿破仑外交是掠夺性的外交

拿破仑霸权外交的本性，决定了拿破仑在外交活动中要采取一切可能扩张领土，在所占领土上最大限度地攫取财富。1796 年 3 月 27 日在尼斯，拿破仑在检阅即将攀越阿尔卑斯山天险远征意大利的军队时说："士兵们，你们没有衣服穿，吃的也不好，政府欠下你们许多东西，可是它什么也不能发给你们。……我想带你们到世界上最富饶的国家里去。富饶的地区和繁华的大都市将受你们支配。你们在那儿将会得到尊敬、荣誉和财富。"[②]

拿破仑是这样鼓动的，士兵们也是这样干的。他把意大利当作自己的占领地，所到之处，征集军队需要的一切，抢夺他认为值得抢夺的一切东西。拿破仑还提出了近代史上征收占领军费这

---

① 《关于拿破仑》，第 335 页。

② 《拿破仑文选》(上)，第 60 页。

个史无前例的做法。他在帕尔马要求公爵交出包括《圣耶朗尼姆》在内的20幅名画抵偿占领军费。公爵恳求另外以200万现金代替这些艺术品，拿破仑拒绝了。他说200万很快会花光，这种艺术杰作可以在巴黎展览几百年，还会引出其它杰作来。拿破仑在米兰，在教皇领地，在瑞士，都推行一种对被征服地区敲骨吸髓以充实法国国库的作法。这一切，拿破仑都是在督政府的纵容和支持下进行的。督政府甚至催促拿破仑向富饶的地区首先进兵，以便掠夺更巨额的财富。

2. 拿破仑外交是战争外交

对拿破仑研究最多的即是他的军事才干和业绩，也就是研究拿破仑战争。在这些研究中，还可以总结出一个共同点，即所有研究拿破仑的军事权威，在肯定拿破仑既是战术家又是战略家的同时，几乎都承认他还是一个外交家，也就是承认拿破仑有把自己的顽强意志完全强加于被击溃或面临被击溃的敌人的外交艺术，不仅彻底摧毁或压倒敌人的士气及其抵抗能力，而且迫使敌人在条约中写下战胜者所需要的规定。拿破仑重视每一场战斗的胜利，但这不是结束，他务必要使每场战斗的胜利变成战争的胜利，这就是必须在“绿色谈判桌”上继续和结束对敌人的追击——通过外交谈判取得最后胜利。

拿破仑说过：“我的每一个胜利，都是走向恢复欧洲和平道路上的一个外交步骤。”[①] 再没有别的话更能够如此简明扼要地说明拿破仑外交同拿破仑战争之间的关系，它等于说出了拿破仑外交就是“战争外交”。

有的时候，拿破仑同一些国家的外交活动，是为了创造条件集中优势兵力打击主要敌人。明显的例子是在1805年著名的奥斯特里茨战役。这次战役不仅是拿破仑的军事杰作，也是拿破仑的外交杰作。拿破仑巧妙地利用了两个德意志国家——奥地利和普

---

① 《关于拿破仑》，第354页。

鲁士的矛盾和冲突，诱逼普鲁士保持中立；他封巴伐利亚和符腾堡选侯为国王，把奥地利的领地许诺给他们，使普鲁士的选侯和公爵们“咬紧牙关，使自己的日耳曼人的心暂时停止跳动”，而站到了高卢人一边。这样通往奥地利的道路畅通了，确保了战役胜利。这就是拿破仑的外交：善于把外交同战争结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有的时候，拿破仑追求战场上的胜利，是为了逼迫对手坐到谈判桌旁来。1800 年 6 月马伦哥战役之后，奥地利有意拖延谈判等待转机。拿破仑亲自指挥大败奥军，奥地利才赶紧改变姿态加速谈判进程。但此时，拿破仑却指示约瑟夫不急于签订和约。1801 年 2 月《吕内维尔和约》签订，奥地利由于战场上的失败，不得不接受拿破仑相当苛刻的和约条款，拿破仑终于从和约中得到了他要求的一切。

还有的时候，拿破仑的外交是为下一次战争作准备。1807 年法俄签订《提尔西特和约》，是拿破仑外交中一次重大胜利。但就在签约的同时，拿破仑同亚历山大一世同样都很清楚，法俄之间的战争仍不可避免。在拿破仑心目中，法俄联盟并不是平等的联盟，他视俄国为归附自己的附属国，因此俄国也决不会就此罢休。但是，拿破仑明白，他要彻底解除奥地利的武装，要战胜英国，要使欧洲归于法兰西帝国统治，需要暂时的和平，法俄联盟使这种和平有了保证。如果俄国破坏了这种和平，他既赢得了时间作好了战败俄国的准备，又找到了进攻俄国的借口。1812 年的侵俄战争正是这种外交准备的结果。

战争是拿破仑推行霸权主义的主要手段，身兼外交家和军事家的拿破仑，运用战争机器来推行外交政策，或用外交政策来推行新的战争行动，其目的都是为了实现欧洲霸权。每当拿破仑在战场上取得重大胜利，必有相应的和约产生。他依靠战争的胜利来实现外交目标。因此，脱离开拿破仑战争，就很难说有什么拿破仑外交。

3. 拿破仑外交是专权外交

同所有专制者一样，拿破仑也是一个权欲熏心的执政者，权欲使他野心膨胀，权欲使他不轻易相信任何人。拿破仑的部下曾互相提醒道："如果你要掉换房间里的天花板而去请求陛下发布命令或表示意见，你必须等待；如果米兰着了火，你去请示他要否灭火，即使是让米兰烧得一干二净，也要等候他的命令。"拿破仑自己也曾警告他的继子："即使月亮快要掉到米兰，你也不要以任何借口做你权力以外的任何事情。"[①] 这是拿破仑要求别人遵循的原则。

可是这条原则，对他自己却不适用。拿破仑对自己的原则是，没有权时我可以自己授权，有了权时别人不许越权。对于外交权，拿破仑更是如此。

1797 年 4 月，身为意大利军团司令的拿破仑，如果按照"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原则，对于军事行动完全有权自行决策，但对于外交行动，如无政府授权，应当是无权行动的。但拿破仑不理这一套。法国同奥地利在累欧本谈判停战协定与和约条款，督政府授权克拉尔克将军为谈判全权代表，但是他还在都灵。如同在其它许多场合一样，拿破仑根本不考虑政府的授权，自封全权代表进行谈判，并签署了和约。以后，同样的事情在埃及和叙利亚也发生过。

当拿破仑成了第一执政，当了皇帝，成为法国外交政策最高决策者后，他从来不与他人分享外交的决策权。

谈到外交专权，不能不提到在法国外交史上值得一书的塔列朗。塔列朗是拿破仑时代在外交界最享盛名的外交家。他在任外交大臣期间，以他聪明的才智和娴熟的外交技能，使拿破仑受益匪浅，即使后来被撤去外交大臣职务，拿破仑仍时常就重大外交问题征询他的意见。但是，正如塔尔列说的："在玩弄外交手腕方

① 《拿破仑时代》（下），第 205 页。

面，拿破仑不仅不低于塔列朗，而且比后者还要高出一筹，尽管后者也是颇有才干的外交大臣，但是一些指导思想是拿破仑自己向塔列朗提出的，一切重要和平谈判是由他自己进行的，塔列朗只是提供建议，起草外交文件，制定一些达到预定目标的策略性的办法。”[①] 而且塔列朗的去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拿破仑不能容忍塔列朗对外交决策表示异议，尽管塔列朗不少建议后来证明是有预见性的。例如，塔列朗认为法国应当同奥地利结盟，以便挑起奥俄、奥英矛盾，从而击破反法联盟。1805 年 10 月，塔列朗又擅自建议宽厚对待奥地利，他想牺牲土耳其来抚慰在意大利和德意志损失惨重的奥地利。但是拿破仑不予理睬，他更不能容忍一个如此富有独立见解的同他分享外交决策权的部属。因此，尽管塔列朗才华横溢，终不能在拿破仑时代的外交战场上纵意驰骋。塔列朗的外交杰作，只有留待拿破仑之后的维也纳会议和法国七月王朝时才突现出来。

4. 拿破仑外交是不择手段的

拿破仑对他弟弟吕西安说过这样一段话："每一个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而且要获得成功，什么恐怖的事也做得出来，什么中伤的话也说得出来，阴谋从来都是最卑劣的。"[②] 拿破仑外交正是这样，是赤裸裸的马基雅弗里主义。

拿破仑在外交中威胁与利诱并用。拿破仑在强大的武力后盾下有恃无恐，他在被占领地威胁人民的反抗，公然宣称谁不服从就以叛逆者论处，"他们的村庄将被烧毁"。几乎所有关于拿破仑的著作都叙述过这样一个故事：在法奥谈判《坎波福米奥和约》时，拿破仑被奥地利代表的态度所激怒。他站起身来，从圆桌上抓起一个放着细瓷茶具的托盘说道："好吧！那么停战就到此为止，而新战争就宣布开始！但是请你们记住：在秋末以前我一定要粉碎

① 《拿破仑传》，第 94 页。
② 《拿破仑书信文件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 18 页。

你们的帝国，就像现在粉碎这件茶具一样！”[1] 瓷片溅了一地，拿破仑向与会者点了点头就扬长而去，不知所措的奥地利代表只好接受法国的最后通牒。

拿破仑在外交中只要需要，完全可置信义和条约不顾。1803年5月，拿破仑借口英国在宣战之前劫夺了法国两艘商船，竟然视外交惯例于不顾，公然宣布所有在法国的18至60岁之间的英国人，一律作为战俘加以扣押。这一命令就连他的部下也难以接受。拿破仑在每次战胜对手之后都要签订和约，但是条约和协定在他看来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在他认为适宜的时机，只要发布一个有关的命令，就可以无条件地把他想要吞并的那些国家并入自己帝国的版图。

大国牺牲和出卖小国的例子在国际关系中并不少见，拿破仑自然也不例外。1797年拿破仑在意大利，尽管威尼斯对奥地利的统治早就不满，宁愿恪守中立并允许法军借道通过，但是拿破仑还是不肯放过威尼斯，他同奥地利签订停战协定并提出下列条件：奥地利割让莱茵河两岸和意大利被占领土给法国，而法国则以威尼斯作交换。

拿破仑在外交中不择手段，吞并葡萄牙和西班牙是最突出的例子。1807年初秋，拿破仑先是提议同西班牙瓜分葡萄牙，在西班牙军队的支援下，拿破仑取道西班牙开进葡萄牙。尔后，大军压进西班牙，要求西班牙解散具有反抗精神的西班牙民兵，每年纳贡7 200万法郎，拿破仑威胁说，如果不同意，便要揭露西班牙首相戈多伊与王后私通，马德里朝廷不得不马上屈服。于是拿破仑兵不血刃地侵占了西班牙。拿破仑自己在晚年也不得不说：“我承认，下手干西班牙这件事很不好。那样缺德，实在太明显了；那样不讲道义，实在太厚颜无耻了。”[2]

---

① 《拿破仑文选》(上)，第335页。

② 《拿破仑一世传》(下)，第152页。

（三）拿破仑外交留下了什么？

拿破仑时代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是永远不会重复的，因为在世界史上永远也不会再有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在法国和欧洲形成的那种形势了。但是，拿破仑霸权主义的外交思想，拿破仑霸权外交中显示出来的种种外交特征，却在外交思想史的篇章中留下了可画出规律线的点点痕迹。

拿破仑的霸权外交最终是失败的外交。古往今来，无一例外。特别是人类社会进入近代以来，资产阶级将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推到至高无上的境地，哪一个觉醒中的民族会心甘情愿地归附于霸权之下？当然，拿破仑的失败人们还可以找出许多具体原因，但这些具体原因都根源于同一个原因，即霸权主义导致的结果。

处在拿破仑时代的人可能还无法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所以会有成千上万的法国人狂热地追随拿破仑。甚至在拿破仑惨败之后，拿破仑神话还一直痴迷了多少人。过了几十年，终于又引出了一个小拿破仑，在别的国家，还不断出现新的“拿破仑”。

列宁曾说过拿破仑战争是“帝国主义战争”。当然，这个“帝国主义”的含义与列宁论述的资本主义最高阶段的帝国主义有区别。但是列宁为什么说拿破仑战争也是帝国主义战争呢？联想到列宁还论断过帝国主义就是称霸，这不正说明拿破仑的霸权外交与后来的帝国主义霸权有着必然的联系吗？

第三节　“力量均势”——维也纳会议

一　正统主义与梅特涅体系

随着拿破仑帝国的覆灭，欧洲国际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经过20多年持续不断的战争，一个多世纪以来大国之间围绕欧洲霸权激烈争夺所造成的紧张和冲突暂时告一段落。欧洲格局终于可以按照均势的原则基本确定下来。

为了处理盟国与法国以及盟国相互之间的关系并就战后欧洲的国际秩序作出安排，欧洲各国（除土耳其外）的代表云集维也纳，从1814年10月到1815年6月在那里进行了紧张频繁的外交谈判和磋商。会议期间达成的一系列宣言、决议，加上会前和会后达成的其他相关条约、协议，就构成了对欧洲近一个世纪内的国际关系发生重大影响的"维也纳体系"。[①] 这一体系的中心内容是在所谓正统主义和相互补偿原则的基础上消灭法国大革命的民主原则，恢复和重建被拿破仑征服所推翻与破坏了的旧王朝统治和欧洲均势。由于统治者的利益和愿望是相互冲突的，因此维也纳会议势必要做两大工作：第一，建立新的均势，换言之，就是建立几个大国势均力敌的"强权政治"。第二，有关大国在寻求新的均势过程中竭力为自己争取尽可能多的利益。因此，会议内外便成为各国外交家施展浑身解数的场所。

维也纳会议期间其实并没有开过所有外交官都参加的全体会议。作为整体的维也纳会议甚至没有举行正式的开幕式。谈判是在漫无休止的宴会、舞会和其它各种娱乐场合进行的。因此有人把这次集会叫做"跳舞会议"、"欧洲音乐会"。实际操纵会议、决定事务的是由俄皇亚历山大一世、英国外交大臣卡斯利雷、奥地利宰相梅特涅和普鲁士首相哈登堡，后来又加上法国代表塔列朗组成的"五人委员会"。他们实际上构成了掌管欧洲大事的"五头政治"。

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关于战后欧洲和平安排的意见对维也纳会议的进程具有重要影响。在摧毁拿破仑帝国的决战中，他自认是充当了盟国军队的主帅，并以欧洲大陆主宰的身份进入巴黎的。俄国从欧洲大陆头号强国法国的覆灭中大大提高了自己的地位。正

---

① 包括《肖蒙条约》（1814年3月），《第一次巴黎和约》（1814年5月），《维也纳条约》（1815年6月），《神圣同盟条约》（1815年9月），《第二次巴黎和约》（1815年11月）和《四国同盟条约》（1815年11月）。

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当时欧洲大陆政治势力的中心“从西方转移到了东方，从法国转移到了俄国”。[①]“俄国从来还没有获得过如此强大的地位。”[②] 亚历山大一世正是依靠自己空前强大的实力地位，试图在谈判桌上把自己的计划强加于各个盟国，以确保俄国在欧洲事务中的主导地位，并在脏物分配上能获取最大的份额。

亚历山大一世政策的中心，是要在欧洲确立一种有利于俄国的均势。既要削弱法国，又要把法国当作制衡德意志国家的重要力量，并视之为反英的“潜在的盟友”；同时竭力保持普、奥间的对峙态势，并采取压奥扶普的政策，以确保对德意志国家的控制。他惯常打着自由 主义的旗号与正统主义交替使用，目的是干预各国内政，追求控制它国，以维护俄国在欧洲的霸权。

英国代表卡斯利雷在拿破仑战争后欧洲的重建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是维也纳会议上的另一核心人物。这不仅是由于他本人拥有娴熟的外交技巧，是一位玩弄“力量平衡”的大师，而且是因为1815年的英国较欧洲许多其他大国拥有多方面的优势。英国在拿破仑战争中态度最坚决，是大国中唯一没有同法国结过盟的国家；英国的海上霸主地位使它拥有广泛的行动自由；它提供的金钱资助和在伊比利亚半岛战役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使它在反法盟国中间享有重要的影响。英国是一个殖民帝国和商业大国，正处在工业革命蓬勃发展的时代。英国的大陆政策宗旨一向就是在欧洲建立一种力量均势，不允许任何一个大国称霸。卡斯利雷在维也纳会议期间的外交活动十分充分地体现了这一宗旨，他在各种对立力量之间进行平衡调解。英国要建立的所谓大陆协调体制，从实质上说，就是让欧陆四大国相互牵制；而英国则居于其

---

① 马克思：《奇怪的政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343页。

② 恩格斯：《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33页。

间，力求使这种相互牵制的态势尽可能地持续下去。丘吉尔把英国的这种作用美其名为“欧洲和平的基石”。[①]

卡斯利雷在竭力使欧洲大陆各国之间保持均势的同时，积极加强英殖民帝国的力量。英国被迫从北美撤出，它绝不能再在其他殖民地上退让，哪怕是一小步。在缔结条约、瓜分战利品时，卡斯利雷集中注意的是巩固英国的工商业霸权、保住战时夺取的位于通往印度道路上的法国和荷兰的殖民地，其中最重要的有马耳他、南非以好望角为中心的开普殖民地和锡兰（即今斯里兰卡）。

讲维也纳会议，离不开奥地利首相梅特涅，他也是会议的核心人物之一。在梅特涅外交生涯中，均势外交始终贯穿其间。当奥地利在第五次反法联盟战争中失败、面临灭顶之灾时，梅特涅提出奥、法重新修好的大胆设想，劝说奥皇把女儿玛丽·路易丝公主嫁给拿破仑，从而使哈布斯堡王朝得苟安于一时。1812 年法俄战争爆发后，他极力避免使奥地利陷入这场战争。他表面佯称支持法国，暗地里却向沙皇亚历山大一世表示奥地利不向俄国发动进攻，使奥地利避免了敌对双方的进攻。而当拿破仑对俄战争失败后，他却反戈一击，与俄、英、普等国结成第六次反法联盟，并施展外交手腕，担任了反法联盟的外交指挥。

在维也纳会议期间，他以会议主席的身份展开幕前、幕后活动，他穿梭于各大国之间，游刃有余地编织着维也纳体系，被与会国誉为“蝴蝶大使”。在波兰、萨克森及德意志三个重大问题的处理上，他费尽心机、贯彻“均势”思想，并为奥地利争得了许多利益，确保了它在欧洲、德意志及意大利的优势地位。

梅特涅反对俄、普关于把萨克森并于普鲁士的方案，理由不言自明。然而，他也并不隐讳他同时要以普鲁士牵制法、俄的意图。奥地利既要削弱普鲁士，又不希望普鲁士完全从属俄国。梅

---

① 温·丘吉尔：《英语国家史略》（下），新华出版社，1985 年版，第 320 页。

特涅1814年12月10日照会普鲁士哈登堡亲王，在表明波兰与萨克森问题的立场后说："……奥地利毫无猜忌之心；相反，奥把普视为欧洲力量均衡中最有用的因素之一，……普、奥两国地处东、西各大帝国之间，它们各自的防务体系可以相互补充；两个王朝可以结成一种不容忽视的壁垒——当或许有一天法国的或俄国的王位再次为任何一位自命不凡的王子所据的时候，这种壁垒足以使其图谋不能得逞。"① 梅特涅的用意在于维护奥地利对巴尔干和中欧的领导地位，并确保对德意志邦联的领导权。拿破仑战争曾使德意志领土上的300多个政治实体合并成为30多个。维也纳会议面对这一既成事实，决定将它们联合组成一个松散的邦联。梅特涅在南德意志各邦的支持下使奥地利取得了邦联的领导权，并且担任了德意志邦联议会的主席。梅持涅的战略意图还在于通过使俄法互相牵制以维护自己的优势，为此，他支持法国提出的"正统主义"，因为这符合恢复拿破仑战争前欧洲旧制度的总目标，这就可以使奥地利维持住日趋没落的奥地利殖民帝国，维持住它对意大利人、匈牙利人和斯拉夫人的统治。梅特涅特别注意对意大利加紧控制；他认为哈布斯堡王朝能否保持其"伟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能否维持对意大利的统治。根据维也纳条约，奥地利收复了伦巴弟，取得了威尼斯。意大利各小国几乎都成了它的卫星国。显然，哈布斯堡王朝是维也纳体系的重要受益者。

维也纳会议后，欧洲格局这张蜘蛛网是由梅特涅编织的。为确保维也纳体系中欧洲大国间的势力均衡，他精心策划并组织了"神圣同盟"及"四国同盟"，自诩为"国际首相"，极力推行"均势外交"，主持一系列大国首脑会议，使各方面比较落后的奥地利一度称雄欧洲大陆。他推行的"大国均势"外交策略为后人仿效，迪斯累利、俾斯麦等欧洲著名政治家曾在欧洲国际关系中推行梅

① 转引自J.B.迪罗塞尔：《历史上的欧洲观念》，巴黎，1965年，第195页。

特涅式的外交策略。

普鲁士是当时欧洲五强中较弱的国家，在拿破仑战争中曾被法国彻底击溃。战前它曾占有相当大一部分波兰领土，战争结束后并没能全部收回。为补偿它的损失，普鲁士获得了萨克森北部，并在莱茵省获得了新的领土。这是普鲁士首相哈登堡在维也纳会议期间奋力以求的。它所得到的这两个省份当然大大加强了普鲁士的经济实力和战略地位。

法国是战败国，但却是大国力量均衡的棋局上不可缺少、也不能忽视的角色；是俄普一方和英奥另一方竞相竭力争取的对象。法国代表塔列朗是“三朝元老”式的人物，法国革命前曾当过教区主教，仕于旧朝，后跻身革命，又依附拿破仑，后期又背离拿破仑，投奔路易十八，为恢复旧秩序效命。有人说他是为“一切制度”服务又“背叛一切制度”的人。塔列朗在维也纳会议期间，以其外交手腕，周旋于各战胜国之间，为使法国获得折冲其间以保全自己利益的地位，塔列朗提出了所谓“正统主义”的原则。何谓“正统主义”呢？这里且引一段塔列朗自己的话。塔列朗于1814年12月19日给梅特涅的信里说：

> 法国并无任何个人的野心和利益；它只希望回到原来的疆界里而别无他求……然而它衷心所期许的，乃是：不单单在法国，而且也在整个欧洲完成恢复（旧制度）的事业；使革命的精神永远不复存在；使一切合法的权益成为神圣的权益；使一切野心或非正义的图谋都受到谴责，并通过明确确认和坚决保障这些不幸为（法国）大革命在长期间所遗忘的原则而使之遇到永恒的阻遏。①

“正统主义”的原则简言之，就是要恢复革命前各国王朝的统

① 转引自J.B.迪罗塞尔：《历史上的欧洲观念》，第191页。

治，不改变1792年革命战争前的疆界状态。塔列朗巧妙地应用这个原则最大限度地维护了法国的利益。1814年5月法国与反法同盟国缔结的《巴黎和约》规定：法国失去拿破仑战争时期所获得的几乎全部的征服地，但却保留了1792年疆界内的国土。可见，《巴黎和约》是他外交艺术的一个杰作，被欧洲反法同盟击败了的法国居然能不付出赔款便保全了其领土完整，不能不视为是一个奇迹。当然，列强让法国完整地保留下来，首先是为了在战后的欧洲建立起对各大国都有利的均势。为建立这种均势，最渴望瓜分法国的普鲁士梦想未能成真，因为俄国首先需要有一个强大的法国来抗衡普鲁士。为建立这种均势，塔列朗不失时机地利用了英奥与俄普之间的矛盾，通过与英奥签订秘密军事协定，共同对俄、普进行坚决的斗争，使沙皇不得不做出一定的让步，阻止普鲁士获得萨克森，并使法国成为维也纳会议中的第五个主要成员。

无论对塔列朗其人如何评价，但是他对于使战败的法国在维也纳会议上摆脱孤立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因而在相当程度上离间了其他四国的“联盟”。

维也纳会议是一台大戏，英、俄、奥、普、法是这一台戏的五个主角。这一时期的国际关系在欧洲进入近代史期以来，也是最有特色的，英、法、普、奥、俄五强最活跃、最有发言权，对欧洲国际关系的影响最大。它们合纵连横，互相制约，形成多极均势结构，谁也不允许其中任何一个强国破坏这种均势，称霸欧洲。直到今天，国际关系的研究者还不时地要提到这段历史和这段历史中的各色人物。

二　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之争

1815年后在欧洲国际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思想是谋求维持均势和现状。但是对于如何贯彻实施维也纳会议的决议，怎样理解四国联盟及维也纳条约所确立的欧洲协调体制的宗旨和作用，列强的立场是很不相同的；从根本上说是利益的冲突和维护

自己的利益的方法不同。西方史学家把以俄国为代表的外交路线称为“保守主义”路线；把以英国为代表的外交路线称为“自由主义”路线。

“保守主义”体现为俄、奥、普三国君主联盟——“神圣同盟”。“神圣同盟”是在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影响和直接倡导下产生的。1814 年 12 月 31 日，亚历山大一世提出了一份“神圣同盟”文件，向欧洲的君主国家倡议结成联盟。1815 年 9 月 26 日俄、奥、普三国君主在巴黎签署了这份文件。欧洲各国除英国、土耳其和梵蒂冈以外，后来也都在盟约上签了字。文件称，各缔约国无论在各自本国的统治中，还是在他们同其他政府的政治关系中，都应使它们的行为符合“基督教的信条”，要以所谓“正义、慈悲及和平为准则”；各国政府及人民都要像一个“基督教民族大家庭”的成员那样行动；一旦“大家庭”内的法律、秩序遭到破坏，各成员“无论何时何地应相互给予支援、帮助和救护”。

俄国之所以能够成为“神圣同盟”的盟主，并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充当“欧洲的宪兵”的角色，主要是因为拿破仑战争和维也纳会议给俄国带来了空前有利的外交战略地位。俄国当时被公认为欧洲大陆的头号军事大国，在欧洲政治舞台上居于有利地位。因为，第一，它在波兰驻有重兵，柏林和维也纳处于它的直接攻击距离之内，把整个欧洲压得几乎没有什么动弹的余地。第二，作为它主要对立面的法国的波旁王朝，是在它的支持扶植下复辟的，对亚历山大一世只能仰其鼻息。第三，中欧正处于三分天下的局面：奥地利、普鲁士和各小邦组成的“第三德意志”各据一方，互相对立，给俄国多事的西部边界提供了一大保障。第四，俄国与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关系，对它也十分有利。普鲁士直至 1870 年德国统一前，一直受制于俄国。奥地利则由于在意大利地位不稳、同普鲁士的对峙，以及对法国革命所怀有的“恐惧感”，不得不多方求助于俄国，无力在欧洲问题上抵制俄国的势力。在这种条件下，野蛮、落后、农奴制的俄国就必然成为欧洲反动势力的主要

堡垒。

欧洲“保守主义”路线的另一支重要力量是奥地利。奥地利哈布斯堡帝国横跨欧洲大陆，是欧洲平衡的中心支点。在西欧，它对意大利的控制抑制了法国的野心；在东部，它在德意志联邦内与普鲁士针锋相对，从而构成了阻止俄国对巴尔干半岛渗透的屏障。奥地利是欧洲最为古老、保守，而且是多民族混居的君主专制国家，顽固地反对民族解放运动和任何重大变革。梅特涅于是就成为由维也纳会议和四国联盟所确立的欧洲国家体系的重要代表。

在1815年到19世纪中叶的欧洲外交史上，同中东欧三个保守的君主国家所推行的“正统主义”方针相对立的，是英、法等西欧国家所遵循的“自由主义”路线。这是从总体上相对而言。对均势和稳定遭到破坏的担心，常常使西欧国家与东方国家在处理一些欧洲国家革命与民族独立等具体问题时，采取类似的政策和立场。然而英国虽然出于保持欧洲均势的考虑也对1815年后的欧洲稳定承担了义务，但它的岛国特性使它不愿过多地卷入欧洲大陆的事务。而它在政体和社会制度上与大陆东方国家所存在的差别以及出于工商实业方面的具体利益考虑，则使它同俄、奥、普三国不仅在应否干涉主权国家内部事务问题上发生严重的意见分歧和争论，而且也往往对某些国家的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采取不同的立场和态度。当然更为重要的是，无论在欧洲还是在世界范围内，俄国当时都是英国的主要对手。俄国用任何名义进行的侵略、扩张和干涉，都可能打破欧洲的均势，给英国的利益造成直接或间接的威胁。因此，俄国的某些政策主张和计划不时遭到英国的抵制和反对。英国客观上成了“自由主义”势力的代言人。

法国出于类似的原因，被认为是奉行“自由主义”路线的另一个重要国家。法国的封建专制政体事实上在1789～1794年的大革命时期就被摧毁。后来尽管波旁王朝又重新复辟，但拿破仑法

典并没有废除，代议制机构已在法国建立起来。1830年七月革命后法国废黜了波旁王朝，巩固了资产阶级对封建势力的胜利，因此法国同英国一起反对俄国的集体干涉的原则。

西欧国家与中东欧三国对民族解决运动所采取的不同态度，也是和它们本身的民族状况分不开的。俄国和奥地利都是多民族国家，包括普鲁士在内的德国各邦还处于分裂状态。国家主权和民族自决对于这些国家的统治者来说，是孕育着巨大风险的课题。然而在西欧，建立民族主权国家的问题早已解决。所以无论是法国还是英国，在对东欧民族问题上的态度自然与俄、奥、普不同。

以英国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路线和以俄国为代表的“保守主义”路线在外交事务上存在的对立和原则分歧，在亚琛会议期间首次清楚地显现出来。1818年9月根据四国同盟条约的规定，在亚琛召开了维也纳会议后欧洲协约的第一次会议。虽然大多数国家都想把讨论限制在结束对法国占领的问题上，但亚历山大一世却提出了有关整个欧洲的问题。他提议再签订一项公约，规定各国相互保证彼此的领土现状和现存的政治制度。这将使欧洲协约变成一个更为严密的组织，使干涉内政合法化。英国则不愿从四国同盟条约再前进一步。英国政府认为四国同盟条约只是防止法国重新侵略的手段，决不是建立欧洲超国家政府的基础。四国联盟和维也纳会议续会只能是讨论欧洲问题的外交论坛，而不应成为任意干涉一个国家内部事务的工具。卡斯利雷断然拒绝了亚历山大一世的主张。英国的这一立场在1820年5月5日的一份政府公文中充分反映出来。这一文件是由卡斯利雷起草、由坎宁在1823年作为议会文件部分公开发表的。文件称：一个国家以武力干涉另一个国家内部事务的原则，始终是一个道义上和政治上极为敏感的问题。把这样一条原则引伸为一项一般性原则并想把它变为一种体系，是根本行不通和要不得的。这份政策声明说同盟的目的决不是为了建立世界政府，或为了监督其他国家的内部事

务。[①] 围绕干涉原则问题的争论，英国与俄、奥、普三君主国之间的裂痕在 1820 年和 1821 年分别召开的特洛波和莱巴赫会议上更加扩大了。在特洛波会议上，俄、奥、普三国签订了重申干涉原则的协定书，在莱巴赫会议上，奥地利被授予代表各签字国在意大利恢复秩序的权利。英国拒绝在特洛波议定书上签字，法国虽然签了字，但有保留。英、法两国不同意授权奥地利派军队镇压在意大利爆发的革命。欧洲协调一致的原则事实上已经失效。

英国与东欧三个君主国在外交上的冲突和分歧，在坎宁出任英国外交大臣后更为明显。英国为了维持欧洲的均势和稳定，曾支持罗曼诺夫王朝、霍亨索仑王朝和哈布斯堡王朝在东欧、中欧和意大利的大部分地区恢复其统治，为了防止拿破仑法国的东山再起，英国还同俄、奥、普三国重订了四国同盟条约，成为维也纳体系的重要保证国之一。尽管卡斯利雷曾称神圣同盟条约为“神秘主义和胡言乱语”的大杂烩而加以否定，但在一段时间内英国事实上采取了默许的态度。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法国革命的直接威胁已经消失；俄、普、奥三国，特别是俄国在正统主义的旗号下对欧洲事务的干涉，便成为英国利益的现实威胁。同时，英国国内的情况也发生了重要变化。伴随着产业革命的迅速发展，英国工业资产阶级的实力和影响得到进一步加强。1822 年出任外交大臣的坎宁，从一切根据英国自身利益行事的原则出发，彻底放弃了附合“神圣同盟”的政策。

从维也纳会议，从五国之间的彼此牵制，从所谓“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分歧和冲突，能看出什么来呢？诚然，从表面上看，维也纳体系确乎是立了一条“协商一致”的规矩，然而，其间却是矛盾重重。四国共同对付法国，防它东山再起，为此，在第一次巴黎和约签订当天（1815 年 11 月 20 日），英国、俄

① 詹姆士·乔尔编：《英国和欧洲，从皮特到丘吉尔 1793～1940》，伦敦，1961 年版，第 69～82 页。

国、奥地利和普鲁士另行签订了四国同盟条约，重申他们决心共同维护《肖蒙条约》和《维也纳条约》作出的安排，并在必要时聚会商讨共同关心的问题。这是维也纳会议的一个方面。同时另一方面，维也纳会议所确立的体制也掩盖着欧洲几个大国讨价还价、求得妥协的国际体制。这就说明，任何国际体制的稳定性只能是相对的，它总是避免不了种种冲击的。

维也纳体系对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修改，表明形势已发生极大的变化，力量均势的制动者更明确地集中在几个大国手里。五国都在摆弄力量均势的把戏，只是由于利害关系不同，各自的“平衡术”有所不同而已。这才是维也纳体系的实质。

第四节 从华盛顿的《告别演说》到门罗主义

美国早期外交思想的形成与演变过程，同美利坚合众国的形成与发展几乎同步，在美国独立战争和建国初期，美国外交思想已见胚芽，尔后很多外交文件和政策的制定都受到这一阶段的重要影响。

美国早期外交实践为当时美国社会的生存本身之所急需，新生的合众国处在十分激烈与复杂的国际斗争中，需要在对美国的国家利益有确切认识的基础上妥为处置国际上各方关系。那时的美国虽然战胜了自己的宗主国，但并未强大到可以掌握国际斗争的主动权；欧洲列强都在利用美国的独立战争进行激烈的争斗。在这种情势下，新生的美国的每一项抉择都可能带有风险，而且今天认为理所当然的“国家利益”，在初创时期很大程度上还不能不受到各州的抵制，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一样给美国早期外交带来难以置信的困难。这就是说，新生的美国虽然富有朝气，却仍需要全力保护自己，需要善于观察和利用迅速变化中的国际形势，在同英国进行斗争的时候，不拒绝任何可以结盟的有利时机，把同

英国存在着利益冲突的国家争取到自己一边来，赢得外交上的成功，削弱英国的影响。美国早期外交思想从一开始就反映出实力决定国与国关系的本质，美国外交思想史也就是一部根据它所认定的“国家利益”观念进行长远估量和强固自身实力地位的历史记录。

1823年12月《门罗宣言》的问世，标志着美国门罗主义的产生。它是美国独立战争取得胜利以后外交政策发展的产物，是历届政府外交思想逐步成形的表现，尤其是华盛顿、杰斐逊等开国者们的外交思想的延续和发挥。《门罗宣言》的发表意味着美国早期外交活动一个阶段的结束和一个新的时期的开始。

一 美国的早期外交

自从欧洲走出中世纪、进入近代史时期以来，美洲就一直是欧洲外交角逐的目标之一；北美洲更成为英法在争夺世界力量均势的斗争中的一个重要砝码，这就决定了美国独立战争同时也是一场“外交战”，从这里可以看到美国外交思想的发轫。

1776年1月，托马斯·潘恩发表了对美国独立进程曾起过重要作用的小册子《常识》，在猛烈抨击了英国对殖民地的残暴统治，指明建立自给自足的共和国是唯一选择的同时，最早表达了应使北美洲置身欧洲之外的思想：“对大英帝国的任何屈服或从属将直接导致本大陆卷入欧洲战争或争吵之中，把我们同对我们友好的无恨无怨的国家与人民置于敌对状态，……北美的真正利益在于避开欧洲的各种纷争，如果它从属于大不列颠，被当作英国政治天平上一个小小的砝码，它就永远摆脱不了那些纷争。”[①] 潘恩认为北美大陆被一个小岛统治是一种“荒谬悖理的不自然的关系”，而且使美洲人卷入每一场与他们自身利益毫无干系的欧洲战争。如果与英国分离，不仅可以避免这些祸害，还会带来积极的好处。

---

① 《托马斯·潘恩文集》第4卷，纽约，威利图书公司，1942年，第88～89页。

潘恩一个明确的思想就是：脱离英国主权就意味着脱离欧洲的战争。潘恩同时还指出，脱离英国还会为北美的贸易打开世界市场，会享受到“和平与自由”的天赋权利。当然潘恩关于不卷入欧洲战事的提法还只是从脱离英国的角度出发的，并未扩及到整个美洲，但他这种朦胧的见解却构成了以后孤立主义产生的源头之一。

同样不容忽视的是，比潘恩的《常识》稍晚发表的《独立宣言》所提出的“自由、平等和独立”也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种思想源头。可以这样理解，美国是欧洲启蒙思想的继承者，然而在《独立宣言》中却反映出一种曲折的心态。它在语言中表述了欧洲启蒙思想的政治要求，反映了达尔文主义的改革精神和清教主义创造“纯洁”的新世界的理想，同时隐含着对欧洲旧秩序的鄙夷和批判，认为欧洲背弃了启蒙的理想而陷入道德上的颓败和无休止的战乱，于是美国的革命者们便赋予自己一种“天定命运”的使命感，不管是通过外交还是战争，千方百计避免肮脏的欧洲对美国“净土”的污染。这种思想构成美国外交的一个基本点，直到把自己看成担负着世界事务的主宰者的体现。

美国早期外交相对来说是一种弱国利用强国矛盾的外交，不可能拘泥于“对等外交”的传统规矩。在与欧洲各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尝试中，约翰·亚当斯提出把“非正规行动的策略”运用到外交上去的思想。就像美国在军事上弃绝线式队形改用散兵线小分队作战一样，亚当斯外交被称为“民兵外交”。他曾对法国外交大臣韦尔仁直言相告：“北美的尊严不在于外交仪式或任何精巧的礼节，而只在于理性、正义、自由和人权。”亚当斯建议美洲大陆不要因循只能向业已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指派大使的惯例，凡合众国愿与发生关系的国家，合众国都可以单方面派驻使节，而不必征询这些国家的政府是否同意，主动打开通道。如果坐等他国上门邀请，就必然错失良机，独立难保。

约翰·杰伊是美国早期著名的外交活动家，他对法国设法控制美国外交走向的意图有所警觉，不赞成大陆会议发出的一切听

从法国指导的训令，认为这种训令不能代表国家的真正利益。杰伊认为应该自己来思考问题，并自己决定其行动。他坚决主张与英直接谈判，并利用英内阁里的意见分歧。杰伊还转告英首相谢尔本勋爵说，等到和平条约最后签订时才承认美国独立，只会有利于法国，而不利于英国。约翰·杰伊这种在大国之间左右周旋的思想对美国外交有一定影响。

从建国初到新宪法产生期间是美国对外关系最紧张的时期。在外交方面，约翰·亚当斯曾向英国建议举行谈判缔结新约，以求解决悬而未决的争端，英国却以邦联无力执行现有条约为由而拒绝了，提出只同十三个州个别进行谈判。美国经历了从1781年到1789年邦联时期政府软弱无力的涣散阶段，几乎没有什么统辖权。汉密尔顿在《关于制造业的报告》中指出："美国在某种程度上处在一个被排除于国际贸易之外的国家的境地，各州倒是可以轻而易举地从国外进口它所缺乏的制成品。……在此情况下，美国就不能以平等条件同欧洲进行交易了。"[①] 在这种背景下，美国政治家们敏感地意识到，得到尊重的对外政策只能建立在强大的民族政府基础上，他们强烈要求建立统一的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制定共同的外交政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对来自国际海运的打击进行有效的报复，在对外关系方面才能有力地进行谈判，才能树立一个强盛、团结的和有威慑力量的国家形象。

美国政治家们认为，只有通过法律才能使外交决策权更多地集中到中央政府上层。外交事务领域对美国宪法的形成与发展的最重要影响，就在于需要有一个在外交上能代表各个新独立的殖民地的中央政府。

新的联邦宪法规定，总统经参议院同意，有权任命外交官和与外国缔结条约，是国家在外交事务方面的官方代表，被赋予广泛职责。宪法的制定者们都为此做过许多论证，他们认定最高行

---

① 《美国的历史文献》，三联书店，1989年，第73页。

政长官被授予外交权力是主权政府的主要特点和先决条件。汉密尔顿直截了当地说过，建立独立政府的决定实际上就是确立联邦在外交和国防事务方面的牢固权威。[①] 对于国会与总统的权力分配问题，联邦宪法作了这样的规定：在对外政策上总统虽享有压倒的优势，但没有最终的权威，因为国会也被授予宣战、拨款和签约的最后决定权，这样至少能以暂缓或修正等方式来影响总统处理外交和国防事务的决策。正如麦迪逊所说："1787 年的天才们早已制定了一个使国会和执政首长之间实现永久平衡的法案，这种平衡也贯彻到外交事务方面，即只有总统可以实施对外政策，但他不能长久独自判定对外政策，这反映了 1787 年宪法中许多有争议的问题。"[②]

作为联邦宪法主要辩护者之一的汉密尔顿，其职务虽是第一任财政部长，但他对政府的外交决策有相当影响，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一度超过杰斐逊。汉密尔顿崇尚腓特烈大帝和威廉·罗伯逊，持一种强权主义的国家政治观。他认为支配各国对外政策的基本因素是"对强权的热衷或对显赫与统治的欲望。国与国之间的永久和平是自相矛盾的，美国对任何国家不管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如何，都必须用强权政治的法则来对待，这构成中立政策的基础。"[③] 他不认为战争是件好事，并希望减少战争，但也未幻想战争会在任何可预计的时候从地球上消失。在对外政策上，他和约翰·杰伊都主张以美英联盟来抵制西班牙，认为美英政治关系如弄糟了，贸易就要停顿，国家收入就会锐减，借款将被"根本取消"，国家的独立进而也就处于危险境地。汉密尔顿的观点同主张履行法美盟约和限制英国货物进口的杰斐逊、麦迪逊等共和党人相对立，并作为华盛顿《告别演说》的参与者，对总统的外交政

---

① 《联邦党人文集》第 23 篇，商务印书馆，1980 年，第 114 页。

② 布鲁斯特·C. 丹尼：《从整体考察美国对外政策》，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 年，第 9 页。

③ 《联邦党人文集》，第 54 页。

策起过重要的参谋作用。

二　华盛顿的《告别演说》

乔治·华盛顿即使在独立战争中从事军事指挥时，也担任着许多半属外交性质的工作。出任美国第一任总统后，他获得了更直接的外交经验，在对外政策问题上，先后提出了许多重要观点，有的已成为美国外交长久的指导原则。

1796年9月19日华盛顿发表了著名的《告别演说》，他在《告别演说》中指出：

> 在对外国的关系上，我们行动的最高准则是：一方面要扩大我们的商业关系，同时尽可能少地和它们发生政治联系。只要我们承担了义务，就要完全忠诚地履行义务。我们可以到此为止。欧洲有着一系列极重要的利益，那些利益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或者关系很远。欧洲经常发生争执，其原因基本上与我们毫不相干。所以，如果我们卷进欧洲事务，与他们的政治兴衰人为地联系在一起，或与他们友好而结成同盟，或与他们敌对而发生冲突，都是不明智的。①

华盛顿认为与法结盟是一种危险的选择，会导致战争和无缘由的不公正的争论，从而损害美国的完全独立。华盛顿并不反对一切结盟，他强调的是：

> 当我们现在有选择的自由时，应避免同外部世界的任何一部分结成永久同盟，这是我们真正的政策。……如果通过适当的安排使我们永远处于受人尊敬的防御态势，这样，在

① 《美国的历史文献》，第94～95页。

非常紧迫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有把握地信任种种临时性的结盟。[1]

这是“根据民族的利益选择和平或者战争”这一原则的体现，换言之，只有在结盟的各方利益一致时，结盟才有价值。所以说华盛顿的外交思想不是盲目的排外主义，不是把美国变成一个与世隔绝的“隐士国”，这比潘恩对欧洲“一概摒弃”的思想又进了一步。

华盛顿的《告别演说》勾划出了美国外交路线的基本轮廓，反映的是美国当时所处的特殊地位，华盛顿的思想与其说是“孤立主义”，勿宁说是一种“国家主义”，即把美国的利益放在首位和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所拥有的“行动自由”。《告别演说》为后继者们提供了一套处理美国对外关系的规则，可以说是对门罗主义的一种先导，可以称之为美国外交的“独立宣言”。

实际上，1796 年的《告别演说》是华盛顿一贯思想的集中表述。早在 1778 年 11 月，他对友人亨利·劳伦斯就说过：“对不列颠的仇恨可能促成对法兰西的过度信任，心怀感恩之情时更易如此。有这种心情的人当然不愿设想法兰西会背信弃义，我也乐于以最友好的眼光看待新的盟国。但人类的普遍经验告诫我们：对任何国家的信任，不可超过其本身利益所能约束的范围，这也是谨慎的政治家处理政务时不敢背离的原则。就我们所处情况而言，更应百倍小心，因我们目前羽毛未丰，力量有限，如稍不经意，则失著之误，将难以挽回。”“我希望尽可能避免让外国为美国效力，使他们再立新的功勋，除非万不得已，不要争取外援。”[2]

在新的共和国里，美国人的社会态度与欧洲有着显著不同，强调个人独立，而在政治上则又向集权发展，由此便形成美国的双

---

① 《美国的历史文献》，第 94～95 页。

② 《华盛顿选集》，商务印书馆，1983 年，第 149 页。

重特性，即个人主义和群体精神。美国早期对外政策中的中立与扩张就是一个深深打下了这种思想印记的实际写照，华盛顿的外交思想当然也体现了这种“两重特性”。1795 年他给政治家帕特里克·亨利的信中这样讲：“我热切的愿望和一贯的目的是（尽可能地依靠行政部门）严格履行我们在国内外承担的一切义务，在与任何其他国家的政治交往中不受约束，能独立行事，不受任何国家的影响。总之，我需要的是体现美国的个性，使欧洲国家相信我们美国人是为自己而不是为别人行事的。我认为这是建立国际威望和国内幸福的唯一途径。千万不要成为英国党人或法国党人，而制造分歧，搅乱社会安宁，或永远毁掉联系美国各州的纽带。”① 华盛顿既反对美国卷入欧洲冲突，又未将门关死，虽然确曾出现过欧洲列强干涉美洲的险情，但他所倡导的中立原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深谋远虑的韬略，不久就证实扩张才是美国历史的主导力量，才更体现出美国人的思想特性。

三　《门罗宣言》

杰斐逊早年在《弗吉尼亚纪事》中曾集中批驳了一些欧洲作家鄙视美国的观点。出席大陆会议时，他刚写完《英属美洲权利综论》，得出“英国议会没有管辖殖民地的合法权限”的结论，最早提出建立大陆国家的概念。他反对依附英国，反对英货在美国倾销的政策，在外交取向上与联邦党人持不同见解。1801 年 3 月杰斐逊在总统就职演说中表述了同华盛顿相似的思想：美国应“与所有国家和平相处，相互通商，并保持诚挚的友谊，但不跟任何国家结盟”。为使美国不卷入英法战争的旋涡，他表示愿消除与联邦党人的分歧，采取折衷态度，他说：“我们都是共和党人，我们都是联邦党人。”② 同时他也在思考如何使总统、国务卿和国会

---

① 《华盛顿选集》，第 306 页。

② 《美国的历史文献》，第 100 页。

在对外政策上有一致的意见。他曾说，对外政策的制定者必须通观全局，从整体来考察对外政策，这才是成功的对外政策的首要因素。

1802 年 4 月杰斐逊得知西班牙有意将路易斯安那转给法国，便写信给法国美洲事务部长罗伯特·利文斯特说："法国进入美国的门户，是对我们的不尊重，因为美国 3/8 的产品都要通过新奥尔良运往市场，这只能逼使美国求助于英国。"[①] 他还声称："法国一旦占有新奥尔良，这将确定美英两个国家的结合，而美英之间的协作可以独占大西洋。从那时起，我们必须与英国的舰队和民族结为姻亲。"[②] 这些出自一贯亲法反英的杰斐逊之口，确实有其思想发展过程的，通过事实杰斐逊认识到，只要有一个外国控制的密西西比河河口，美国就会被拖入一场欧洲战争，中立并不是既成事实，而是一项目标，为达到这个目标，他主张采用华盛顿的公式，即"暂时的结盟以应付非常的事变"。杰斐逊给罗·利文斯特的信是美国外交最重要的文件之一，因为它标志着美国在建国后头十年所执行的比较消极的防御政策开始向积极的扩张政策转变，被史学家称为美国对外政策的"第二个伟大决策时刻"。

年轻的美国是作为一个"胜利的弱者"出现在世界舞台上的，虽然它主要关心的是自己的独立与主权不受干涉，但是一开始它就把目光注视到"十三州"之外了。汉密尔顿就主张建立一种"伟大的美洲体系"，杰斐逊曾概括说："美洲自身是一个半球，它必须有一套不从属于欧洲利益的单独的利益。"[③] "我们将用一切手段反对欧洲国家利用任何方式或借口干涉美洲任何国家，特别

---

① 《杰斐逊文集》，新泽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1 年，第 144 页。

② 儒尔·巴特利特：《美国外交录》，纽约，克诺普特出版公司，1964 年，第 104 页。

③ 亚瑟·惠特克：《西半球概念的兴衰》，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年，第 29 页。

是反对采用征服、割让或任何其他方式把它们转让给任何国家。”[①]

当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于1818年劝告美国加入“神圣同盟”时，约翰·亚当斯通过申明美国的立场阐述了“不介入”原则：“美国的政治制度不同于欧洲各国，在所有欧洲政治纷争中坚定地保持独立的立场是自1783年至今我们各届政府政策的基本点，因此为了美国的安宁，同时也是为了欧洲的安宁，欧洲的体系和美国的体系彼此应尽可能区别开。”“30多年来，欧洲一直处于动乱之中，几乎每个国家或者入侵别国，或者被别国所入侵，……在远离欧洲的我们这一边，我们一直在寻求安宁，所以我们公开宣布美国不介入任何的欧洲政治纷争。”[②]

1820年美国众议院议长亨利·克莱向国会提出组织“美洲体系”的建议，申明它“将是一个以我国为中心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整个南美洲都要和我们一起行动”。在支持南美独立事业上，亨利·克莱的言行引人注意，他不放过任何机会在国会中以强有力的演说主张承认拉丁美洲新独立的共和国。

1821年1月亚当斯在同英国驻美公使的谈话中阐述了“非殖民”原则，他说美国无意与英国争夺哥伦比亚河区域，“保留属于你们的地区，大陆剩下的归我们”。[③]

1823年春以俄国为首的“神圣同盟”镇压了西班牙反封建革命，又准备组织远征军干涉拉美独立运动。坚持大国均势战略的英国反对此举，同年8月16日英国外交大臣坎宁约见美国公使拉什，建议英美联合行动反对神圣同盟对拉美的干涉。坎宁—拉什会谈引起美国历史上一次外交大辩论。当门罗就此征求杰斐逊意

---

① 《美国的过去与现在》第2卷，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324页。

② 同上书，第338页。

③ 《亚当斯回忆录》第4卷，马萨诸塞，哈佛大学贝尔克拿普出版社，1961年，第252页。

见时，杰斐逊在复信中表示："这是自独立问题提出以来我所考虑的最重大的问题"，"我们首要的和基本的任务是：在任何时候都不介入欧洲的纠纷。其次，决不允许欧洲干涉大西洋这边的事情。当（欧洲）……正在竭力使自己成为专制主义的栖身之地的时候，我们当然要做出努力使我们这个半球成为自由的乐园。南北美洲有着自己与欧洲不同的、特殊的利益范围。"不过杰斐逊和麦迪逊都主张与英国联合发表声明，认为这会使整个欧洲不敢贸然对美洲发动战争，因为海上优势将在美英这边，但英国必须承认拉美国家独立，愿意在美国同欧洲事务脱离关系的情况下参与保护美国。对杰斐逊来说，联英是分化欧洲的一种手段，目的是为建立美洲体系扫清路障，他正是基于把西半球的和平保障与欧洲体系区分开来的原则来考虑与英联合声明的可能性的。

亚当斯则认为，如果与英国一道反对"神圣同盟"，就意味着卷入欧洲纷争，违背了华盛顿确立的外交准则，一方面这样会给英国干涉美洲事务提供机会，"美国将成为一只尾随英国军舰后面的小船"；另方面害怕未来美国向拉美扩张的"自由"受到约束。他反对欧洲用武力恢复西班牙在美洲大陆的殖民统治，或把君主制的原则强加给这些国家，或把西班牙殖民地的任何部分转让给任何国家。1823年12月由亚当斯起草的《门罗宣言》以国会咨文形式发表，全文贯穿着华盛顿和杰斐逊等按照各自方式所表达过的精神，重申或补充了已在不同场合有针对性地提出过的三项主要原则：

1. 非殖民原则：由于美洲大陆已具备自由与独立的一切条件并竭力维护之，所以今后任何欧洲列强不得把美洲大陆已经独立自由的国家作为将来殖民的对象。

2. 不干涉原则：欧洲的政治制度（君主制）与美洲的政治制度（共和制）不但本质上不同，而且是彼此对立的，欧洲列强把它们的政治制度扩展到西半球的任何企图都将危及美国的和平与安全；美国不干涉任何欧洲列强的现存殖民地和保护国，将来也

不干涉。

3．不转让原则：对于那些已经宣布独立、并且已经得到美国承认的美洲国家，任何欧洲列强进行的任何干预，美国只能认为是对合众国不友好态度的表现。

《门罗宣言》提出了关于欧洲与美洲两大政治范围的概念，这是对华盛顿在反对欧洲封建主义与殖民侵略的斗争中形成的两个世界思想的延续和具体运用，因为欧洲干涉美洲将对美国构成双重打击：一，在拉美恢复君主政体，对共和体制造成重大威胁；二，恢复以西班牙为中心的商业垄断，从而将切断美国与拉美的贸易联系。因此美国决心：既不让欧洲冲突转移到美洲，也不让欧洲国家在美洲相互转让领土，这对梅特涅、沙皇及其整个“神圣同盟”无疑是一种政治上的对抗。《门罗宣言》还代表了美国对拉美的政策，在外交上客观地维护了拉美新独立国家的主权，这是有进步意义的。

正是1815年拿破仑失败后欧洲的政治变化提供了《门罗宣言》出台的机会，门罗主义可以说是当时国际体系的破坏和由此而产生的新的力量对比的结果，也是美利坚民族在其发展的一个特定阶段上对所关切的问题作出的直接反应。实力不足、相对弱小的地位决定了美国迫切需要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国际环境，它通过《门罗宣言》流露出对俄国在北美太平洋沿岸进行扩张和欧洲国家对独立后的拉美采取行动的担忧，希望欧洲停止干涉美洲事务，并以承认现有势力范围作为平衡条件。《门罗宣言》作为美国外交孤立主义传统的基础纲领，保障了新旧大陆双方的分离态势，便利了美国的独立发展。

但从某种意义上讲，《门罗宣言》不仅仅是为了应付眼前的具体事件，它更是一份着眼于未来的文献，以后长时期内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一根支柱。在《门罗宣言》公布前夕，杰斐逊在给门罗的信中就已表明，美国关于“两个不同世界”的外交政策绝不是一时的想法，也不仅局限于坎宁所提出的那些问题，而是能广

泛应用于未来所发生的事件之上的准则。[1] 门罗主义包含了进攻性与防御性两个方面，在不同时期根据不同需要各有侧重。其防守性表现在反干涉和保卫共和制一面，这确实是美国的主要动机，但随着美国的逐渐拓展，当具有了达到自己外交目标的能力、也有了影响他国外交政策的实力时，其进攻性的一面就后来居上了。不管字面上还是实质上，《门罗宣言》并未如坎宁所要求的那样放弃对美洲的领土要求和在美洲的特权，其中有这样一个寓意隐讳的段落："当这些新政府（指南美独立国家——引者注）和西班牙进行战争期间，我们在承认它们时就宣告中立；对于这项原则，我们一直坚守，将来如果情势不变，也会坚守，但如情势改变，届时经由我国政府当局的判断，为了它们安全的需要，美国方面亦将作相应的改变。"[2] 美国以后之所以从一个大西洋的滨海共和国发展成为一个横贯大陆的"两洋国家"，之所以通过对墨西哥的战争获取得克萨斯等土地，都正是根据美国"安全的需要"所作出的"相应的改变"，这既是门罗主义合乎逻辑的发展，也是对《门罗宣言》中某些"暗示"和"潜台词"的诠释，许多大的外交行动也都是由这里演绎出所谓的"理论根据"。

四　从美国到美洲

在19世纪初期，美国还不具备在世界舞台上与欧洲大国一争高低的实力，但美国始终把向外延伸作为一种信念，开国元勋们已通过门罗宣言为这种"使命外交"奠定了理论根基。当时美国要想立稳脚跟并有所作为，只有先在美洲扩大自己的影响，将美洲划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从而真正达到与欧洲分庭抗礼的目标。

---

① 《美国的过去与现在》第2卷，第323页。

② 《门罗宣言》，全文参见《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上册（第一分册），第65～67页。

从安德鲁·杰克逊到威廉·霍华德·塔夫脱，这是一个认为美利坚民族扩张其领土是“天命所定”的时代。在这个有意识进取的扩张时期，美国的“民族精神”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所谓“天定命运”代表着那个时代一个相当普遍和流行的信念，即凭借共和制度的模式与力量在整个美洲大陆进行扩张。特别是对西部，国家自始至终参与了“血腥开拓”，动用各种外交手段精心策划了一个又一个“兼并计谋”，终于到波尔克任内将国境线推至太平洋。

向西部拓展，从现代角度看，似乎属于美国的内部事务，但如果进行纵向的历史把握，就应该把这一问题作为美国向美洲乃至世界幅射的整个过程的一部分。一方面，开发西部与美墨战争等重要事件有着某种联系；另一方面，打开伸展到西海岸的通道，为以后对远东和太平洋区域的扩张作了铺垫。所以说，开发西部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门罗主义的一种曲折的体现，西奥多·罗斯福就是在其四卷本《征服西部》中通过对美国西进运动的评述来系统论证他的帝国主义哲学思想的。

安德鲁·杰克逊在《论多数人统治》中虽然主要阐述的是“民主哲学”，但在对外政策方面推崇的则是“国家主义”。他认为美国同其他国家存在着“深刻利害冲突”，“协调”这些冲突正是美国的“利益所在”，美国要以“爱国精神”为后盾，使其“一切正当权利都得到尊重。”[①]杰克逊在1829年当选总统后，就一直把获取得克萨斯作为美国应得到尊重的“正当权利”，他在题为《扩大自由领域》的讲话中点明：“光凭政治不解决问题，只有得克萨斯才是我们未来安全的关键。”[②]

为了抵消英、法、西在美洲的势力影响，杰克逊还多次提出联俄的建议，认为两个大国一个在东半球，一个在西半球，都对

---

① 《美国的历史文献》，第115页。

② 弗兰克·弗雷德尔：《美国历届总统传》，新华出版社，1982年，第39页。

各自邻邦产生影响，而这些影响又必然等于它们在本大陆事务上所具有的相应优势，这样的两个大国所采纳的专约，可以给其他国家一个并非无益的范例。他还指示赴彼得堡的美国外交官伦道夫说："如果英国坚持拒绝把我们殖民地贸易的事情加以顺利解决的话，到那时俄美声明就加倍地重要和有好处了。"[①]

民主党人波尔克的主要观点是，凡是美国移民所至之处，都升起星条旗。他在第一个年度咨文中重申门罗提出的对美洲政策，着重论述了"不准干涉"和"不准殖民"原则，称美国不能默许欧洲对北美洲的任何干涉，只要出现此种干涉的苗头，美国决不退缩，立即抵制。他不但拥护合并得克萨斯，而且把解决俄勒冈问题和取得墨西哥属地加利福尼亚作为主要外交目标。本来美英在 1818 年就从太平洋到落基山脉之间介于北纬 42 度到 54 度 40 分的俄勒冈达成共管协议，但波尔克要重新占有全部俄勒冈地区，并提出一个名噪一时的口号："以北纬 54 度 40 分线为边界线，否则就开战"[②]，对英实行"战争边缘政策"。

当波尔克一经断定墨西哥不会出售加利福尼亚后，便亲自向国会提交战争咨文，称太平洋是美国天然的西部边界，是打开对东方贸易的"金门"，把整个大陆美国化描绘为"天定命运"的必然趋势。在墨西哥问题上，波尔克正是利用这种民族心理来支持这场战争，多次重申门罗主义是"既定国策"，强化了门罗主义作为美国外交政策原则的地位，为用美国的"介入"来阻止非美洲人的"介入"寻找理论依据。

富兰克林·皮尔斯力主执行"强有力的"对外政策，对英国采取强硬态度。他在 1853 年总统就职演说中强调为了国家的安全，美国可能还要获取更多的领地，而且决不会被"任何灾难预

---

① 〔苏〕谢沃斯季扬诺夫：《美国近代史纲》，三联书店，1978 年，第 308 页。

② 梅人：《美国四十任总统》，时事出版社，1988 年，第 120 页。

兆”所阻拦。[1] 皮尔斯深受当时盛行的“青年美国”思潮的影响，认为美国不能再扮演无足轻重的角色，甚至在民主党纲领上列入这样的条文：“不再恪守中立，在世界范围内同欧洲的共和主义实行积极的联合。”[2] 皮尔斯想尽快解决一切所谓悬留的外交问题，拥有更多的墨西哥领土，获得南方通向太平洋的铁路地段。

亚伯拉罕·林肯在外交方面与国务卿威廉·H·西沃德有歧见。西沃德主张美国应执行一种对欧洲列强敌对甚至战争的政策，以切断对某些州分裂势力的支持，从而避免内战。他说：“假如上帝给美国一个同英国、法国或西班牙开战的借口，那将是重新建立国内和平的最好方法。”[3] 林肯则认为不宜多方树敌，他主张把南方的叛乱问题划到纯粹国内事务的范畴以内。

内战爆发后，林肯总在避免外国介入和涉及中立权问题，但他下令封锁南部州港口又与中立权发生矛盾。根据国际法，非国与国交战是不能封锁和限制中立船只自由行驶的；如果承认封锁有效，那就是国与国的战争了。南方的交战身份实际上关联到重大外交原则问题，当时林肯政府的主要外交目标就是防止欧洲国家对南方州的承认。1861 年 5 月英国维多利娅女王宣布中立，等于对南方作为有效政府的交战资格的确认，林肯认为英国的中立声明是“不友好和不成熟的”，但竭力采取克制态度，他与西沃德决定执行一种既不屈服又不惹起战争的对策。林肯意识到，承认问题主要取决于战场上的结果，同时北方的小麦和谷物比南方的原棉对英法更重要，而且宣布废除奴隶制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英法干涉的借口。

林肯和西沃德都认为，对门罗主义原则构成最大威胁的是法

---

① 弗兰克·弗雷德尔：《美国历届总统传》，第 76 页。

② 威廉·A. 威廉斯：《美国外交的形成》第 1 卷，芝加哥，1972 年，第 247～248 页。

③ J.G. 尼科莱：《亚伯拉罕·林肯：一部历史》，纽约，都德·米德出版公司，1945 年，第 3 卷，第 445 页。

国对墨西哥的干涉，怕由此导致法国对南方联盟的承认。他们感到法美在基本原则上的根本对立，指出法国在一个美洲共和政府的废墟上建立一个外国帝制的企图将不可避免地危及法美关系。当法国从墨撤军后，西沃德认为此举在客观上提高了门罗主义的地位，其关键在于使欧洲感觉到美国开始具有强大的"威慑力量"，足以防止外强对邻国的干涉。[①]

内战虽然一度使"天定命运"的扩张狂热暂时降温，但并未打破西沃德等美国政治家所勾勒的"帝国形象"。在西沃德看来，扩张就是美国的最高利益，即使消灭奴隶制的内战，也是为了更有力地扩张。他的理想就是建立太平洋大帝国，并试图用商业观念来理解扩张，认为美国该从大陆的领土兼并转向海洋的商业扩张，从大西洋转向太平洋。西沃德在 1846 年就曾写道："我们的人口注定要不可阻挡地冲破北方的冰障，在太平洋海岸与东方文明交会。"美国"必须是支配海洋的帝国，这才是唯一真正的帝国"。[②]在 1860 年 9 月著名的明尼苏达州圣保罗演说中，西沃德就设想美国以和平方法扩张到整个世界。

西沃德在安德鲁·约翰逊总统任内继续担任国务卿，他对 1865 年新总统的年度咨文做过如下修改："假如任何欧洲国家向美洲人民保卫共和制度和抵抗外国干涉作出挑战性举动，我们将视之为对我们自己、对良好政体的事业以及对世界和平的巨大不幸。"[③] 西沃德外交上的"最大成就"要算是协助约翰逊总统赢得国会支持购买阿拉斯加，他认为购买阿拉斯加使美国主权得以延伸，共和宪制得以传播，同时也会形成对英国在美洲大陆的某种阻隔，另外阿拉斯加的木材、渔业、皮毛业等将成为美国与中、日

---

① 亚历山大·狄康德：《美国外交政策史》第 1 卷，纽约，查理斯·斯克里伯尼出版公司，1978 年，第 243 页。

② 乔治·B. 贝克编：《威廉·H. 西沃德文集》，纽约，1884 年，第 409 页。

③ 塞缪尔·比米斯：《美国外交史》，纽约，亨利·霍尔特公司，1965 年，第 196 页。

贸易的基地和向亚洲进军的跳板。他还把购买阿拉斯加作为进一步靠近加拿大的手段，设想最终从英国手中夺取加拿大，使整个北美洲成为美利坚合众国的“一统天下”。

曾出任国务卿的布莱恩是一个泛美主义者，他曾建议总统加菲尔德在改善与拉美国家关系的基础上，召开泛美国家会议，讨论在美洲大陆防止战争等问题。布莱恩认为美国经济扩张的重要性大于领土扩张，应该从“领土兼并”扩展到“贸易兼并”，而美国商业扩张的“自然和有利的机会”就在拉丁美洲。[①]布莱恩的泛美主义包括两个基本思想：(1) 美洲国家支持共和政府的原则；(2) 美洲国家在和平与贸易事务方面寻求合作。实质上泛美主义就是美国用以扩张贸易和政治干涉的“外交符号”。1889年本杰明·哈里森任内，首届泛美大会在华盛顿举行，布莱恩担任主席。这时他的泛美主义范围更加广泛，包括建立关税同盟、货币同盟、美洲国际银行和设立仲裁法庭以解决西半球各国间争议等内容，其根本意图是为美国取得在拉美贸易和财政上的统治地位。[②]

门罗主义与泛美主义相结合，使“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变为“美洲是美国的美洲”。西奥多·罗斯福在1904年就称：拉美国家“如果胡作非为，或者软弱无能，致使文明社会的联系全都松掉，那么，到头来就需要有一个文明国家对它干涉，而美国不能忽视它在西半球的责任。”[③]也就是说在西半球，美国出于门罗主义的需要，不得不“行使国际警察权利”。这被称之为“罗斯福推论”。到此时美国门罗主义可以作如下诠释：欧洲列强不得占有西半球任何领土；拉美一些小国、尤其是加勒比海地区国家，必须偿还它们的债务，美国政府为了索还这些债务很可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进行干涉；由于保护巴拿马运河和美国在西印度群岛的

① 托马斯·佩特森等：《美国外交政策》第1卷，马萨诸塞，1988年，第156页。

② 福斯特：《美洲政治史纲》，三联书店，1959年，第339页。

③ 查尔斯·A. 比尔斯：《美国政府与政治》上册，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347页。

利益，整个加勒比海区域都应纳入美国主权范围；美国资本在中美洲的巨大利润由美国政府予以保护；泛美主义受到支持，如果这种合作与美国的安全和经济利益相一致的话。"罗斯福推论"是对门罗主义的一次重要延伸，其内容不局限于阻止欧洲干涉美洲，最重要的乃是美国可以依照自己的逻辑任意干涉美洲各国的内部事务。

1911 年传闻日本公司有意从墨西哥购买下加利福尼亚一块土地，参议员亨利·洛奇宣布："门罗主义意欲阻止的'殖民化'一词也包括外国的公司或公民或臣民的行动。"[①] 这就是所谓"洛奇推论"，他把门罗主义的应用范围扩大到亚洲国家和外国公司及个人，从而迫使日本放弃了购买计划。虽然这时美国距离一个世界大国还有着很长一段路程，但美国已向世界表明它有这种愿望和能力，正是在这个时候，世界各大强国也开始不得不考虑到在采取重大外交行动时美国可能作出的反应了。

① 威廉·威德诺：《亨利·洛奇和美国外交政策》，加利福尼亚大学，1980 年，第 135 页。

第三章

从“力量均势”走向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一节　小　　引

维也纳会议所形成的欧洲均势的格局并没有稳定下来，无论什么样的国际协议也保证不了和平。因为欧洲列强的角逐一天也没有停止，无论是在谈判桌上，还是在穿梭外交上。

19世纪的下半叶，列强互为敌手，紧张而又繁忙。“维也纳会议”表现出的均势正在发生变化。

“东方问题”吸引了列强的注意。克里米亚战争把英国、俄国、法国、奥地利、土耳其不同程度、不同方式地吸引过去。俄国延续彼得大帝制定的“蚕食”和扩充海域的传统方针，向欧亚两个方面扩张实力，成为实力膨胀最为咄咄逼人的国家。事实上，沙俄很早就把扩张的方向定在土耳其，因为掌握了土耳其就扼住了巴尔干这个通向欧洲的咽喉。俄国可以说是“欧洲音乐会”中第一个突破维也纳体系而威胁那脆弱的均势的强权。

拿破仑战争无疑给普鲁士提供了机会。普鲁士从一个“次等强国”在战争中迅速羽翼丰满起来。俾斯麦抓住了有利时机，把日耳曼民族关于建立统一的日耳曼国家的世代宿愿，见诸行动。在普丹、普奥战争之后，普鲁士在对法战争中狠狠地打击了法国。俾斯麦对内实行铁腕政策，对外则推行了一种“小德意志”策略，作出准备同东、西方都搞好关系的姿态，以便为统一的德国争取一个比较有利的国际环境。当然文章不止于此，文章的下篇便是以

更大的决心和力量同其他列强一争高下。到19世纪80年代，俾斯麦的德国把争夺的触角伸向海外殖民地。应该说统一的德帝国是第二个改变维也纳体系的因素。史家评论，从那时起直到1945年，欧洲一直为一个“德国问题”所笼罩着。而俾斯麦的东、西方政策，则为今后德国的外交思想提供了最初的基础。

与俄、普（特别是统一的德国）相比，法国显得色彩黯淡得多。小拿破仑想重振老拿破仑的雄风，并曾使法国出现了“中兴”的局面。但结果却是历史的“重演”，连形似都办不到；英雄的梦想使他扮演了一个闹剧的丑角。老拿破仑的光彩没有再现，老拿破仑的结局却没能避免：法国没有能保住维也纳会议时的“体面”，一场普法战争，使法国割地赔款；困扰法国的问题一直是德意志民族，从此它将更需要把德国当作关注的焦点。

英国“均势外交”传统已久。到19世纪下半叶表现得最为完备，运用得最为娴熟。在这一时期里，出现了一批如帕麦斯顿等执行功利主义外交政策的杰出人物。“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利益是永恒的。”这一名言即出在这个时期，并成为英国外交界直言不讳的铭言。于是，从伊丽莎白到沃尔波尔，到坎宁，再到帕麦斯顿、格莱斯顿和迪斯累利英国19世纪外交“三杰”，一条所谓“光荣孤立”的欧洲政策思路，一直坚持下来。到19世纪下半叶，欧洲虽然出现了俄国、德国、意大利等新的因素，使“力量均势”发生了变化，美国和日本也正在迈进世界政治舞台，但英国仍是工业化程度最高、海外势力范围最大的世界第一大国，仍然还有力量在列强之间运用均势外交的原则。

19世纪后半叶的欧洲似乎都在关心着三件事：第一，俄国、德国、意大利的动作。俄国并不想开拓殖民地，但把手伸向它的东西两个方向。统一的德国和意大利则参加对殖民地的争夺。第二，巴尔干地区民族主义情绪激化，而在局势背后站着虎视眈眈的列强。第三，各个列强之间组成不同的同盟体系以相互抵制。总之，希法亭、列宁所指出的帝国主义重新分割世界的时期正在成为现

实。在外交场合背后，空前规模的战争威胁正在咬啮着欧洲，半个世纪前的保证正在失灵。诚如恩格斯在19世纪最后10年头上说的：

> 欧洲正好像沿着斜坡一样越来越快地滚向规模空前和力量空前的世界战争的深渊。①

当时的欧洲，一方面是所谓法、俄的“联盟”，这是普法战争以后一直时隐时显地存在着的，一方面是针对法、俄“联盟”的德、奥、意“三国同盟”；超然于几方之上的，则是海上“绝对称霸”、殖民地遍布全球的英国。这是当时的力量格局，自然也即是当时的外交格局。19世纪下半叶、特别是1871年战争以来的形势就这样摆在那里。“《法兰克福和约》对法国来说只不过是暂时的休战，正如《提尔西特和约》对普鲁士那样。于是法国和德国就开始了狂热的军备竞赛，渐渐地俄国、奥地利、意大利也卷进来了。”② 和平时期的外交除了为战争服务以外，没有任何其他超然的目标。

果然，恩格斯写这段话后20年，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世界战争便爆发了。这次战争对于西方外交来说，就是打碎了19世纪的“力量均势”及其所由产生的理论。

第二节　俾斯麦的“小德意志”与威廉二世的扩张主义

一　德意志邦联

历史上的德意志，诸侯割据、邦国林立，长期处于四分五裂

① 恩格斯：《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57页。

② 恩格斯：《欧洲能否裁军？》，同上书，第437～438页。

的状态。1618～1648 年三十年战争后，德国曾一度分裂为 1 800 个大小不一的邦国，皇权彻底衰落。

及至近代，在 297 个邦国中，只有奥地利和勃兰登堡—普鲁士两大邦稍许强大、相互掣肘。奥地利是个军事农奴制强国，由世袭神圣罗马帝国皇位的哈布斯堡家族统治；普鲁士则是个新兴的军事专制国家，由勃兰登堡侯的霍亨索伦王室掌权，18 世纪中叶开始了两雄争霸德国的历史。

1815 年维也纳会议之后，德意志成了一个松散的国际法联合体——德意志邦联。英、俄、法在德意志问题上的态度以及普、奥的争斗，决定了维也纳会议不可能在德国统一问题上给德意志民族带来福音。列强在德意志问题上妥协的结果，便是同意按奥地利首相梅特涅的方案，建立一个德意志邦联，这反映在 1815 年 6 月维也纳会议通过的最后议定书内，第 53 条规定：德意志各邦君主和自由城市……相互结成永久的联盟，称为“德意志邦联”。①

德意志邦联存在了 51 年（1815～1866 年），邦联的作用体现在：第一，起草法律法规，通过有关德意志事务的决议。如 1816 年起草了基本法，1821 年制定了战争法，但这些立法只是形式上的一纸空文。第二，维护各邦的独立与主权，捍卫德意志封建专制制度，镇压自由主义和民族统一运动。第三，邦联成了奥普两强争霸的焦点和御用工具。1848 年的德国革命曾严重冲击了各邦的封建体制，使邦联趋于瓦解。后来，奥皇弗兰茨·约瑟夫借助沙皇尼古拉一世的威慑，在 1850 年 11 月迫使普鲁士与奥地利签订了奥尔缪茨协定，使普王的小德意志联盟计划夭折，恢复了以奥地利为首的德意志邦联，使奥地利救世主的威望达到了极点。耻

---

① 见《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上册（第一分册），武汉大学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54 页。目前国内不少著述提及德意志邦联时使用“德意志联邦”的称谓，这是不准确的用语。1815 年建立的德意志邦联，其英文名是 confederation，意指邦联，而非 federation（联邦）。再者，它是一个松散的联合体，非中央集权，也不是统一的主权国家，无论从字面上还是从其结构及活动来看，称德意志邦联为宜。

辱性条约暂时压制了普鲁士的联盟举措，却使普奥矛盾趋于激化。1866 年普奥战争爆发后，邦联便寿终正寝。

所谓“德意志邦联”，其实是形联实不联。一是欧洲列强不允许有一个统一的德意志国家；再是普鲁士和奥地利都想成为德意志的主宰。而在当时，德意志在经济上还落后于其他国家，德意志的资产阶级在政治上也缺少能够把历史上十分分散的邦国状态凝结在一起的能力。与法国大革命时的资产阶级相比，德国的资产阶级缺少一种把整个民族凝聚起来的力量。但是对统一的向往是强烈的，换言之，也就是呼唤着一个德意志民族构成的“国家”。诗人歌德关于“德国在哪里?”的慨叹，就反映了这样一种德意志民族的历史情结。但是，德意志民族总是要赶上历史的脚步的；普鲁士和奥地利在维也纳会议以后都迅速发展起来。1866 年普鲁士击败奥地利，两强长期争霸局面结束，普鲁士既彻底摆脱了邦联的桎梏，也在欧洲的政治舞台上变得咄咄逼人，炙手可热，德意志统一大业便得以迅猛发展。

二　俾斯麦其人

在谈到德意志统一问题时，不可不提到俾斯麦其人，他是 19 世纪后期普鲁士王国、德意志帝国著名的政治家和杰出的外交家。在 19 世纪 40 年代就其政治态度而言，属于普鲁士的保守派，是一个“唯意志论”者，博得“头号保守派容克”的名声。在 1848 年德国革命中，他极力维护王权的威信和容克阶级利益，认为德国统一是妄想，德意志邦联和维也纳会议决议是反对德国革命的神圣堡垒，主张亲俄、奥、法，即亲那些保障德国分裂的势力。

50 年代以来俾斯麦的政治观点有明显转变，1851 年出任普鲁士驻邦联议会公使，1859 年任驻俄公使，1862 年改任驻法公使。在担任外交要职期间，有机会出入欧洲列强的宫廷，了解到列强对德国统一的态度，一改“正统原则”的立场，转而认为德国的统一不可逆转；从普鲁士霸权利益出发，力主把德意志统一于普

鲁士。

1862年9月，俾斯麦出任普鲁士宰相兼外交大臣，发表了著名的“铁血”政纲，强调以暴力求统一。时值普鲁士内政问题突出，国王与议会之间在改组军队、延长服役期及增加军费等问题上发生尖锐争执，在1862～1866年这场持久的“宪法冲突”危机中，他不择手段地捍卫王权的尊严，通过炮制“漏洞理论”，擅自增加军费，进行大规模军事改革。尔后便以实力为后盾，在60年代中后期通过王朝战争扫除德国统一道路上的国内外障碍。先于1864年联奥发动了对丹麦战争，1866年转而对奥宣战，1870年又挑起了对法战争，终于使统一的德国在1871年初崛起于中欧，“依照容克的方式完成了历史上进步的事业”。[①]

帝国建立后他当了20年的宰相，权倾朝野，建立起独断专行统治，史称“俾斯麦时代”。在外交方面，他以均势外交为原则，推行确保德国在欧洲大陆霸权地位的“大陆政策”，极尽纵横捭阖之能事，在1873年促成了俄、德、奥三皇同盟，后又执行亲奥抑俄政策；1877～1878年俄土战争期间，他表面上充当“诚实的政治掮客”，实际上却向沙皇反戈一击，在柏林国际会议上联合英、奥迫使俄国吐出战争掠获物，体现了其势力均衡的外交谋略。1879～1882年他又促成新的德、奥、意三皇同盟，矛头直指法、俄。在19世纪80年代，他还采取一系列措施防止法、俄接近。1881年恢复了旧的三皇同盟，1887年与俄密订双边《再保险条约》，支持奥、意、西与英国签订两个《地中海协定》，进一步完善其“大陆政策”。

俾斯麦外交思想可概括为如下五点内容：

（一）独立自主的思想

俾斯麦总结了近百年来普鲁士奉行的对外政策，认为1786～

① 列宁：《论大俄罗斯人的民族自豪感》，《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586页。

1806年普鲁士的对外政策从无计划开始而以悲惨告终，由此酿成《提尔西特和约》，处境每况愈下。1806年到40年代，普鲁士在1829年签订《亚德里亚诺波尔和约》、1831年镇压波兰起义时给予俄国无偿援助，结果都事与愿违，吞下了沙俄强加于它的奥尔缪茨苦果。俾斯麦说："我们方面的失算，首先由于亲戚感，由于软弱者对于较强者的习惯性依赖……从1806年到40年代这一期间，一般来说不存在独立自主的普鲁士政策；我们的政策是交替地在维也纳和彼得堡制定的。"[①]1842～1862年俾斯麦体会到，普鲁士外交地位日渐孱弱，是由于长期奉行一种怯懦的政策："由于我国的对外政策、尤其是我国的德意志政策缺乏独立性和能量，王国的权威蒙受到损害。""一个大国要别人承认自己的大国地位，首先需要深信并有勇气承认自己是大国。"[②]

奥尔缪茨等"耻辱"使他意识到削弱普鲁士外交地位的首先是自己的同盟者奥地利，普鲁士的发展受制于奥地利和德意志邦联，因此，不能在邦联中谋求与奥地利的平权地位，而应推行一种不受邦联和奥地利约束的"独立的普鲁士政策"。

俾斯麦出任首相后即本此精神行事，于1863年2月波兰起义之时与俄国签订了阿尔文斯累本军事协定，从而打乱了当时正在筹划的俄法协定，向欧洲诸强公开表明，此次普鲁士要奉行独立自主的政策，它不再仰赖奥地利鼻息，甚至不惜站在俄国一方。

（二）现实主义的务实原则

现实主义的务实原则，源于俾斯麦的国家利己主义观。他认为大国唯一健康的基础就是国家利己主义，这是其制定对外政策的准则。因此，他提倡基于现实的务实外交，他的主导思想很明确："应该有勇气放弃迄今为止所流行的'感情政策'而奉行一种

---

① 奥托·冯·俾斯麦：《思考与回忆》第1卷，东方出版社，1985年，第223～224页。

② 同上书，第219～224页。

现实政策”,[1] 即根据现实而不是假设来处理事务，只有这样做才能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的利益。

纵观其外交生涯，务实原则始终贯穿其中。19 世纪 50 年代俾斯麦与宫廷党之间曾就所谓的“利益政策”与“原则政策”展开争论，实质是哪一种政策更能拯救君主政体、谋得国家利益。俾斯麦提出：“我对外国政府的态度并不取决于凝固的仇视，而是取决于据我判断可能对普鲁士带来损害或益处的权衡。以感情为依据的政策是没有交互性的，这种政策只是普鲁士的特点；任何别国政府都把自身的利益当作它们行为的准则，不管他们是如何用合乎法律的或充满感情的推论来竭力掩饰。”[2]60 年代初俾斯麦与普鲁士新兴资产阶级自由派的“自由主义”思潮进行较量，在德国统一方式上自由派主张走“宪法统一”的“自由主义”道路，实行君主立宪，达到和平统一。他认为这纯属幻想，既不适时宜又不自量力，对此方案嗤之以鼻，执政后断然加以否决，代之以务实的“铁血政策”。在统一德国的进程中，俾斯麦奉行这种务实外交，对战败的奥地利采取灵活政策，使奥地利的复仇情绪很快平息，从而使德奥同盟在 19 世纪 70 年代末得以确立。当 70 年代后期俄土战争爆发、欧洲列强纷纷卷入这场东方危机时，他并不为狂热的“民族感情”所动，而以冷静的态度奉行现实主义的东方政策，不直接参与危机，利用德国“局外人”的地位通过外交手段从旁推波助澜、坐收渔利，利用柏林国际会议提高了德国的国际威望，平衡了英、俄、法、奥、意诸强在东方问题上的利益，使德国游刃有余地在诸强间贯彻大陆政策。

(三)“小德意志”思想

俾斯麦主张“小德意志”的思想，并把它作为统一德国的基

---

① 洛塔尔·加尔：《十九世纪欧洲大国与巴尔干》，《历史杂志》第 28 卷第 3 期，第 558 页。

② 奥托·冯·俾斯麦：《思考与回忆》第 1 卷，第 126 页。

本策略，是基于现实主义来考虑的。19世纪50年代普鲁士各种政治家都在思索寻求德国统一的途径。国王想通过“联盟”计划来统一德国，即改组德意志邦联，把奥地利排挤出邦联，实现普鲁士对德意志联盟的领导，确保君主专制体制和王权。一些议员代表则想通过“小德意志道路”政纲来实现统一，即主张以普鲁士为首建立一个把奥地利排除在外的德意志邦联，然后再与奥地利签约建立某种联盟关系。

俾斯麦的“小德意志”构想融合了以王权为代表的普鲁士容克地主与资产阶级议员的意见，其主要内容是：1. 德意志的统一只能由普鲁士领导；2. 普鲁士想取得德意志霸权，必须“对奥地利进行清算，解散德意志邦联，在普鲁士的领导下使德国获得民族统一”；[①] 3. 扩大巩固普鲁士疆域，除奥地利外的德意志各邦领土都要合并；4. 以武力为后盾并辅之以灵活的外交，逐个由易到难地克服国内外反对德国统一的势力；5. 充分利用德意志人民的民族情绪，俾斯麦坚信“民族的观念，民族的荣誉感，在比赛中是起决定作用的”；[②] 6. 最终创立一种德意志型的立宪君主政体，既确保德国君主政体的统治优势，又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资产阶级的权力欲。

“小德意志”思想的特色在于：俾斯麦把“小德意志”民族思想、资产阶级经济利益与普鲁士国家利益紧密结合起来，用民族统一运动的外壳包裹着普鲁士强权主义，用自上的改革来抵消自下的革命。之所以称为“小”者，是因为俾斯麦声称他的计划只限于解决奥地利以外的德意志民族的统一问题，无意向德意志各邦以外伸手。当时俾斯麦治下的德意志羽毛刚刚丰满起来，先把统一的局面稳定下来而不要过分刺激欧洲列强。

“小德意志”思想当然绝对不是一项“和平政策”，相反，它的基础是强权，手段是武力，是“铁血”政策，暴力政策。他在

---

① 艾伦·帕麦尔：《俾斯麦传》，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88～89页。

② 丁建弘、陆世澄主编：《德国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81页。

施政纲领中声明，“当代的重大问题不是通过演说与多数决议所能解决的……而是要用铁和血来解决。”① 他坚定地认为，“没有普鲁士的军队，并且是一支强大的普鲁士的军队，德意志民族的观念根本就不会实现”，德国的统一“只能通过同反对者进行战争的道路来实现”。② 前述三次王朝战争即是实证，舍此，无从谈起统一的外部条件，这是俾斯麦毫不含糊的。

（四）大陆政策与均势外交

俾斯麦除对外用兵之外，“大陆政策”便是“俾斯麦时代”德帝国总的对外政策，其核心内容是：建立以德国为中心的大陆联盟体系，孤立和打击法国，避免法、俄两国夹击德国，集中全力巩固和保障德国在欧洲大陆业已取得的霸权地位。

形成这一外交思想的几个现实因素是：其一，德国四周边界无屏障，易受多方攻击，这种特殊的地缘政治地位成为高悬在德国人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利剑，寻求联盟与安全是当务之急。其二，法国的“复仇”威胁。他深知普法战争已使法德由来已久的矛盾更趋激化，冲突难免，法国对外政策目标主要是削弱德国，并为此努力同其他国家结盟反德。其三，统一的德国崛起于中欧，已打破 1815 年维也纳会议后确立的欧洲均势格局，形成德国执欧洲大陆牛耳的新结构，这必然促使欧洲列强联合起来把矛头指向德国。因此只有与英、俄、奥、意等国密切关系，才能阻止法国与它们中的任何一员建立反德同盟。其四，德国刚刚获得统一，立足未稳，国内外难题不少，难以在外交上大举扩张势力。

俾斯麦的这项“大陆政策”或“保守的和平政策”，其外交战略布局是：联奥、拉俄、亲英、反法，集中精力对付法国。其中联奥是建立其均势体系的关键。德国统一后奥匈帝国对德复仇已无可能，德、奥在“叙旧”基础上极易结盟，可以阻止俄国向西

① 艾伦·帕麦尔：《俾斯麦传》，第 98 页。

② 路德维希·莱纳尔斯：《俾斯麦的崛起》，慕尼黑，1956 年，第 357、380 页。

欧和南欧扩张，铺设一条阻止法、俄联合的通道。拉俄，意在阻止法、俄结盟，使德国避免两线作战。俄国为反英抑奥、为巩固与德国农产品市场的传统关系，有可能与德国接近，奉行亲德方针，增加它在近东和巴尔干地区与英、奥争夺势力范围的筹码。因此德、俄可以彼此利用。亲英，则是利用它来牵制俄、法，并使它们相互对抗，借以维系以德国为中心的大陆均势局面。俾斯麦说，"德国的政策应当努力造成英国与俄国之间的敌对关系，而不是过分的亲密关系。"[1]英、德在外交利益中尚无冲突，为与法、俄争夺势力范围，英国宁愿联德制法、俄。反法，即通过前三个环节关系，消除法国与英、俄、奥结盟反德的可能，集中全力摧毁法国。

俾斯麦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重点放在联奥拉俄上，对奥、俄均采取亲善联合的态度，他说，"如果我们在坚定地忠于奥地利的同时，也保持使从柏林到彼得堡的道路畅通无阻的话……就能保持三大帝国之间的一致。"[2] 但是由于俄国在1875年法德危机中偏袒法国，以威胁的方式制止德国对法国实施战争打击策略，导致俾斯麦从联俄变为遏制俄国，视之为潜在敌手。在1878年解决近东问题的柏林国际会议上，德国倾向英、奥，抑制了俄国。

联奥、拉俄、亲英、反法的外交战略是通过两个外交策略来实现的：一是执行均势外交原则，二是建立一个包含有多边、双边国际条约、复杂的欧洲均势体系以维护德国的大陆霸权地位。均势外交，是俾斯麦惯用的外交原则，从奥地利著名政治家梅特涅那里借鉴过来。梅特涅时代始终奉行"大国均势"外交策略，俾斯麦时代也不例外，只不过随着时代变化，均势的内容有所不同而已。他的大陆政策和均势外交，通过下述几个同盟和国际条约

---

① 奥托·冯·俾斯麦：《思考与回忆》第3卷，第244页。

② 同上书，第2卷，第193页。

来实施：一是1873年建立的德、俄、奥三皇同盟，其目的是确立三皇协商原则，消除彼此间的冲突，对外采取共同行动。二是德、奥同盟，是1879年建立的秘密军事同盟，矛头直指俄国，“两帝国之一遭到俄国的进攻，两缔约国有义务以其帝国的全部军事力量实行互助”。[①] 三是其它反法、反俄同盟。1883年建立德、奥、罗同盟，相互承担军事义务，旨在反俄。1887年在俾斯麦的努力下奥意英、意西签订了3个《地中海协定》，矛头都是针对法、俄结盟。但同时德国又与俄国秘密签订了《再保险条约》。通过3个三国同盟、3个《地中海协定》及1个《再保险条约》，俾斯麦相当成功地实现了他的外交构想，为德国赢得了20年的和平时间，从而基本上实现了他所企盼的外交目标：“保住已获得的东西”。[②]

俾斯麦不失为19世纪后期欧洲外交界的重要人物，他的外交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可以说为日后德国的外交政策奠定了基础。

三 威廉二世的扩张主义

俾斯麦时代之后，德国经历了长达30年的威廉二世时期（1888～1918），其间，“大德意志”外交思想占据德国对外政策的核心位置，世界扩张主义构成这一时代的外交特点，而威廉二世本人也以其思想和行动异于俾斯麦而开创了另一个时代。

威廉二世（1859～1941），人称小威廉，普鲁士国王、德意志帝国皇帝。1859年1月生于波茨坦，自幼深受保守的加尔文教熏陶及宫廷封建贵族军事保守集团的影响，崇尚军国主义。10岁时按王朝习俗授少尉军衔。1874年入卡塞尔大学预科学习，后入波恩大学攻读法律和国家学。曾在波茨坦军队里服役，1885年被任命为近卫军第一团上校团长，1888年被授予陆军少将军衔。同年6月，其父弗里德里希三世突然病逝，他继承了皇位，史称威

① 《奥匈秘密条约汇编》第1卷，第25～26页。
② 艾里奇·埃克：《俾斯麦与德意志帝国》，纽约，1968年，第188页。

廉二世。

威廉二世即位时年仅29岁，却已具备军国主义和独断专行的性格。他尊崇祖父威廉一世，而对有自由主义思想的双亲却有点反感。他对帝国老臣俾斯麦既妒忌其功名才华，又憎恨其大权独揽，继位后便开始与俾斯麦较量，终于迫其下野，从而开始了他独掌帝国大权的时期。他在内政方面主要实行怀柔加大棒政策。在外交方面，1897年前基本沿袭了俾斯麦的大陆政策，立足于巩固帝国在欧洲的霸权，但策略上偏重于反俄联英，1890年拒绝延长德俄《再保险条约》。随着德国垄断资本主义的兴起，以他为首的德国容克资产阶级统治集团已不能满足于维系欧洲的霸权地位，而想从一个欧洲大陆强国扩展为一个世界强国。在此背景下，威廉二世于1897年改组政府，抛弃大陆政策，开始推行旨在争霸全球的"世界政策"，公然声称："德意志帝国要成为世界帝国。在地球遥远的地方，到处都居住着我们的同胞。德国的货物，德国的知识，德国的勤奋要漂洋过海。"[1]

为建立庞大的世界殖民帝国，他先后成立了泛德意志协会、德意志海军协会及"青年德意志同盟"等组织，实行军国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为炮舰政策呐喊，为"没有空间的民族"鸣不平。为向海外扩张，他建立了强大的帝国海军，1898年敦促国会通过了为期20年的庞大海军计划，1900年通过德国海军法令，1908年还制定了海军法令补充条例，与海上霸主英国争雄，展开殖民角逐。1897年他出兵占领了中国的胶州湾，1898年从西班牙手中取得加罗林等群岛，1899年又部分获得萨摩亚群岛，1900年伙同其他列强组成八国联军远征中国，1902年取得修筑巴格达铁路的权利。这一系列具有挑衅性的扩张活动，加深了英、法、俄与德国的矛盾。1904年英法协约，1907年英俄协约，使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欧洲两大对立的军事集团最终形成。

---

① 科佩尔·S·平森：《德国近现代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402页。

1905 年和 1911 年威廉二世两次引发德法冲突，导致摩洛哥危机。1914 年奥匈帝国皇太子遇刺后，威廉二世便煽动奥皇挑起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此为契机来实现其称霸世界的梦想。孰料在战争中他大权旁落，无力控制德军参谋本部，也无法解决德国国内空前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结果到大战结束前他皇位难保、众叛亲离，于同年 11 月亡命荷兰，从而结束了他统治德国的时代。1941 年 3 月他病死于荷兰的多恩。

威廉二世的外交思想极富侵略扩张及民族沙文主义内容，颇有煽动性和欺骗性。

“大德意志帝国”是其称霸世界的雄图构想，体现了威廉二世的强权政治思想。要点是：建立一个从北海、波罗的海到亚得里亚海，从柏林到巴格达的“大德意志帝国”；以此为基地从欧洲大陆扩向全球，在非洲、太平洋地区及南美洲夺取英、法、日等帝国的殖民地，建立幅员辽阔的世界殖民帝国。这一称霸世界的构想，正是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德国国家利己主义的强烈反映。以他为首的德国容克资产阶级在此时已不满足于德国在欧洲大陆称霸，认为德国有责任改变殖民世界现状，跃居世界强国之列，享有世界列强公认的平等权利。

为了实现其建立“大德意志帝国”的雄图，威廉二世推行一种以实力为后盾的世界扩张主义政策，大力向海外拓展殖民地，掌握制海权，进而与列强争霸世界。

威廉二世认为推行“大德意志帝国”的扩张计划需要分两步走，首先征服欧洲，进而征服世界，其野心在他撰写的《德皇雄图秘著》[1] 一书中暴露无遗，该书集德国军国主义、种族主义、民族沙文主义之大成。

---

① 此书写于战前，系威廉二世称霸欧洲和世界的“雄图”。后为一法国间谍潜入其密室盗出，最先由法人柯留尔译成法文，后由日本人樋口丽阳转译成日文，再由国人黄骥和傅式说由日文译成中文，中译名为《德皇雄图秘著》，杭州光华编译社 1916 年出版，全书分 103 章，共 250 页。

威廉二世征服欧洲的谋略和步骤是：

1. 先征服法国，使它永远不能再妨碍德国。他认为自普法战争以来法国积极恢复国力，扩军备战，一切都以对德复仇为目的，故德国走向世界强国的第一步就是征服法国。“朕之征服全欧，不可不以征服邻邦之骄儿法兰西为第一步。盖与其先征奥、匈、比等弱国，宁先侵法国。第一不可不粉碎其国而没收其全领土，此实全欧统一之顺序宜然，且亦朕之宿志也。”①

2. 建立一个在德国领导下的中欧国家联盟。威廉二世认为德国要想成为世界大国，仅凭自身领土、资源、潜力是不够的，向海外扩张又力不从心，唯一现实的做法就是将德国与欧洲中小国家奥、匈、比、荷、卢、意、瑞士、斯堪的纳维亚诸国、巴尔干国家及土耳其组成中欧联盟，以此创建大德意志帝国的基础，确保德国领导中欧联盟与英、俄、美等世界大国进行斗争。

3. 进而打败英国。威廉二世认为号称“海王”的英国是德帝国向海外扩张的劲敌，它已放弃“光荣孤立政策”，一方面同德国展开海军扩军竞赛，另一方面还联法制德，故德国征服法国后，必须渡海西征英国。“彼已悟我德帝国因争海上之霸权，早晚必不免与彼大冲突。朕已详知之，英国之态度既若此，德英之终不得不出于一战。”② 只有征服了英国，德国才能掌握制海权。

4. 继而征服俄国。威廉二世认为俄国是德国争霸欧洲的另一个劲敌，它自诩为欧洲最强的陆军大国，对德国素来傲慢无礼。在德国国力强大后，它企图以俄、英、法三国同盟的力量来抗德，这在他心目中实乃一大隐患，故德国必须全力破坏和打击俄、英、法三国协约，在征服法、英后，再与俄一决雌雄，扫清德国独霸欧洲的最后一个障碍。

---

① 《德皇雄图秘著》，第35页。

② 同上书，第148页。

5. 最后征服欧洲其他国家，达到独霸欧洲的目的。威廉二世计划再次征服波兰及奥匈帝国等中等欧洲国家，最终实现他的全欧盟主美梦。对于波兰"最后之手段惟有杀戮之一途"。[①] 对于比利时和荷兰，"朕欲置此二小国于朕统治之下入为我德帝国之一部。"[②] 对于奥匈帝国，虽是德国的亲密盟友，但仍应将它纳入德国的版图。

这五点设想，体现出威廉二世征服全欧的野心，他毫无隐讳地称："朕将以冠绝世界之陆海军征服全欧。"[③] 为保证征服全欧的计划实施顺利，他处心积虑地设想通过外交手段建立德、美攻守同盟和日德美三角同盟，意在互相保证其利益，将世界分割为三大部分，暂且让日本领有亚洲及南洋之一部，让美国领有美洲及澳洲之一部，而德国领有全欧及非洲并澳洲之一部，"然此特一时之方法手段，藉以完成朕之全欧统一大雄图耳，决非永远之策"。[④]

威廉二世随后征服世界的谋略是：

1. 东进控制奥斯曼帝国版图。威廉二世认为奥斯曼帝国疆域辽阔、资源富饶，可为德国提供粮食和原料。而且从地缘政治看，奥斯曼帝国版图极为重要，它既是横亘在英国通向印度殖民帝国道路上的战略要冲，又是阻碍俄国南下侵略扩张的前沿。为将来谋取东进的立足点，德国要不惜任何代价地向奥斯曼渗透，以达控制其版图的目的。

2. 向海外殖民扩张。威廉二世设想通过移民渗透、传播"文明"等和平方式达到兵不血刃而取胜的殖民目的。为此他鼓动受军国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影响的德国臣民向海外移民，"造成第二之故乡，以德意志固有之文明，征服彼等之文明。一听诸平和自

① 《德皇雄图秘著》，第 213 页。
② 同上书，第 154 页。
③ 同上书，第 31 页。
④ 同上书，第 77 页。

然，渐占而有之，使成德国领土之一部”。[①] 在选择殖民目标方面，他计划首先插足非洲大陆，建立中非殖民地，它既可成为德国的原料供应基地，又可威逼英法等国在非洲的殖民体系。在亚太地区，他计划先在远东取得一席之地（包括中国的胶洲湾、台湾岛等)，以此为基地同日美角逐势力范围。在拉美地区，计划先占领智利，再强夺巴拿马运河，打开通向南美洲的殖民便捷之门。他的殖民扩张计划先立足于各洲的一点，然后再扩大为面，最后连成一体，建立殖民大帝国，达到征服世界的目的。

3. 统一全欧目标既达，必讨灭日本。威廉二世对日本这个“黄祸之原菌”既鄙视又惧怕，认为日本在近代仅用了半个世纪便把欧洲民族费时达500年才创造的欧洲文明输入其国土，并融合成为它所特有的东方文明，迅速崛起于远东，颇有称霸亚洲的野心，还有欺凌欧洲列强之势。日俄战争中它击败了不可一世的俄国军队，更加飞扬跋扈，横行于远东。德国想在远东扩张领土，必受制于日本，故日、德冲突在所难免，“迨朕统一全欧之目的既达，则必讨灭日本，断不许日本存立于世界”。[②] 至于征服日本的谋略，他拟订三个方案：一是夺取台湾岛，遏制日本南下通道。二是拉拢图谋复仇的俄国，联手征服日本，“分割日本，使日本人为第二之犹太人，则朕与俄国，将不受何等之阻碍而得以进行其远东政策，且亦可根绝黄祸”。[③] 三是一旦俄国不想与日交战，则暂且放弃征服日本之念，力促日、美与德结盟，形成三分天下局面，然后促使美、日交恶，最终联美制服日本。

4. 再与美国决战，最终称霸世界。德国的南美殖民计划与美国的门罗主义格格不入，德国欲图谋占领智利，进而占领巴拿马运河，必然受到美国的妨碍，“而朕苟欲掌握巴拿马运河之支配权，

---

① 《德皇雄图秘著》，第166～167页。
② 同上书，第78页。
③ 同上书，第74页。

则德、美益不得不战矣”。[①] 德国必须全力击溃美国，才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实现征服世界的计划。

威廉二世征服欧洲、称霸世界的外交谋略，除具有有序性和逻辑性外，还试图赋予其理论性和欺骗性，使之构成一套完整的外交思想体系。其扩张主义理论依据和藉口归纳起来大体有7种：

1.“黄祸肆虐论”。威廉二世把亚洲黄种民族视为恶魔，声称“欲征服欧洲之民者，黄色之恶魔也。欲杀戮白色人者，东洋之黄色人也。欲蹂躏欧洲之国土，污辱欧洲之妇女，掠夺欧洲之一切实物者，黄色人也。吁可畏哉黄祸。”[②] 他呼吁欧洲民族“速醒速觉”，用武力杀戮黄色恶魔，使其在地球上永无立足之地。

2.“人种优劣论”。威廉二世声称“世界属于白色人种”，“德国人的气质将会再次使世界复兴”。他把德意志民族视为最优等民族，是赋有神圣使命的“全欧盟主国之大国民”，而其他民族如日本人、波兰人、犹太人等，则是劣等民族，必欲除之而后快。

3.“帝权神授论”。威廉二世声称皇帝分人造和神造两类，人造皇帝很多，如法国的拿破仑三世和俄国的尼古拉二世等均属此类，他们是人民选择的皇帝，政治上要对人民负责，并无绝对权力，仅有相对权力。神造皇帝则由神挑选，只对神负责而不对其属下臣民负责，他比人造皇帝高明得多，是全知全能的“超人”，地位仅次于神，握有绝对帝权，只依神的旨意行事。这类皇帝属凤毛麟角，他祖父威廉一世及他本人就属神造皇帝。他选择了德意志人民为他的臣民，有权要求他们绝对服从他，“对于朕之思想言论行动，无丝毫非难之权利……朕为绝对之主权者，朕之权力即为绝对之权力”。[③] 这种谬论实是百分之百的专制主义论。

---

① 《德皇雄图秘著》，第176页。
② 同上书，第28页。
③ 同上书，第113页。

4.“全欧盟主论”。威廉二世声称，“朕之当为全欧之盟主，非梦也，非妄想之类也，实乃使命也，神意之后诏也。”[①] 故“朕决不可专谋德意志一国之安全，而更须计划行动为全欧之盟主焉。”[②]

5.“军国主义论”。威廉二世在为其崇尚武力、大搞军备扩张的言行辩解时称：“欲防护我德帝国以完成神之使命而达全欧统一之目的，舍诉诸武力，无他途也。”[③] 他扩张军备的目的，一方面“将以增进我帝国之利益，保护我帝国之权利，伸张我帝国之国威也”；另一方面“为谋求全欧之统一，遵神之使命而达朕之宿志也。”[④] 军国主义实乃他为实现神的旨意而给德帝国确定的“国是”，非他本人嗜血好战的野心所为。

6.“不择手段论”。威廉二世认为惨无人道乃战争的本性，在战争中不讲正义人道，真正的英雄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苟有方法手段，于己无损，而能于敌多所杀伤，则无论何种惨虐之方法，无论何种残酷之手段，均可不问也。”[⑤]

7.“自我标榜论”。威廉二世既为“神造皇帝”，不得不自我吹嘘，使自己尽善尽美。他声称自己是“超人”，“自神而外允推朕为全知全能”。[⑥] 他英迈果敢、沉着冷静，具有大英雄的气质，“世间过去之帝王，既无一人足与朕并立于对等线之上矣。即今后帝王陆续出现，恐虽至世界人类灭绝无遗，亦无一个足与朕比肩者。朕诚空前绝后之大皇帝也。”[⑦]

与俾斯麦相比，威廉二世是一个头脑容易发热、不切实际的

---

① 《德皇雄图秘著》，第 31 页。
② 同上书，第 31 页。
③ 同上书，第 115 页。
④ 同上书，第 117 页。
⑤ 同上书，第 99～100 页。
⑥ 同上书，第 83 页。
⑦ 同上书，第 249～250 页。

空论家，他更具权力欲和称霸欧洲乃至世界的野心。其外交思想虽颇似俾斯麦外交思想那样庞大，且具有完整的体系，但缺少俾斯麦那种强烈的现实主义特色，主观臆断性很强。他的“大德意志构思”、“世界政策”和“先征服欧洲、后征服世界”的计划，依次构成了他图谋称霸世界的德帝国国策、外交战略和策略，并赋予一系列理论依据。其构思不可不谓严密，其设想不可不谓大胆，但执行起来却屡屡受挫，终究是一场“美梦”。多行不义必自毙，德帝国最终覆灭于它挑起的冒险战争。威廉二世和俾斯麦都祭起民族主义的旗帜，但威廉二世更具有扩张性和冒险性。

19 世纪末德国外交路线的变更、世界政策的出台，加深了它与法国、俄国及英国的矛盾。德国与法、俄、英矛盾的激化，是推行世界政策的结果，可以说，大国外交思想在特定历史时期会对国际格局和国际关系产生深远的影响。

从俾斯麦到威廉二世，反映德意志民族已彻底结束了政治上孱弱的局面；一个成为统一体的德意志民族对本民族建立民族国家的宿愿来说，是符合发展规律的。但另一面，它的统一和势力的膨胀，在西方列强向着帝国主义的路上迅跑的时候，又必然引起德国与其他欧洲国家的摩擦和冲突。德国在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中是后来者，其成为众矢之的更是必然的。事实上，在俾斯麦时期，势头已十分明显，但俾斯麦比较能审时度势，只集中控制手下败将法国，对其余大国则取“韬晦”策略，同时努力于内治，着力于增强国力，为尔后的扩张准备资本。威廉二世取代俾斯麦，并得以放手驰骋在欧洲大陆，进而争夺海外殖民地，使所有其他西方强国为之侧目，实得益于俾斯麦打下的基础。故从俾斯麦到威廉二世经历的道路构成一篇文章的上下篇，对德国是为昔日的“神圣罗马帝国”注入了“胶合剂”；对外则表明并预示德意志民族的发展走向必是全欧注视的焦点。密特朗曾说过：“欧洲是围绕着德国而聚散的。”这是一句深知欧洲政治历史的经验之谈。

第三节 沙皇俄国在欧亚的扩张

一 俄国与“东方问题”

19世纪以来，俄国的对外政策重点在与其利益相关的四个地区：欧洲，这里是俄国的战略重点地区，主要涉及欧洲大国之间的关系；近东，涉及对日趋解体的奥斯曼帝国的态度，特别是争夺土耳其两海峡和对巴尔干各国的控制权；中东，主要是通过高加索向中亚和波斯扩张，以期打通南下印度和印度洋的道路；远东，主要是进一步蚕食、掠夺和侵略中国的领土。1853～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改变了1815年维也纳会议以来的欧洲局势，使俄国外交陷入了空前的孤立状态。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沙俄统治集团不得不对其对外政策和具体的侵略扩张部署进行适当的调整。

首先我们来谈“东方问题”。“东方问题”也称近东问题。这里所说的“东方”是欧洲人对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近东的泛称。所谓“东方问题”是指欧洲列强争夺濒临解体的奥斯曼帝国领土所引起的复杂的国际问题。整个19世纪期间欧洲外交活动的中心和列强争夺的焦点，都与近东问题有关。

东方问题的产生，是众多因素促成的。首先，它和奥斯曼帝国的急剧衰落分不开。从17世纪末起，建立在军事征服基础上的奥斯曼帝国开始衰落。到了18世纪末，奥斯曼帝国的最后崩溃已在所难免。与此同时，欧洲各大国也进入一个资本主义飞速发展的阶段。各国对原料和市场的需求，推动它们加紧向外扩张。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和属地以及由黑海通往地中海的两海峡，就成为欧洲列强争夺的重要目标。

其实，欧洲列强、特别是沙皇俄国早已垂涎奥斯曼帝国的庞大“遗产”。早在第一个沙皇伊凡四世统治时期，俄国就对奥斯曼帝国的藩属克里木汗国组织过三次军事远征。彼得一世“早就盘

算过在土耳其的废墟上放上自己的宝座”[1]，于17世纪末18世纪初先后发动过两次对土战争。经过一个多世纪对土耳其时断时续的征战，到19世纪初沙皇俄国已经占领了大部分高加索以及顿河和多瑙河之间的整个黑海北岸地区。

19世纪在这里竞争的主要对手是英国和俄国。英国在失去北美十三州以后，全力以赴经营以印度为中心的“第二英帝国”。英国认为，俄国在近东地区的扩张有可能将英国通往印度和远东的道路拦腰截断，从而对其利益构成严重威胁。

法国和奥地利，在这一地区也有重大的利害关系。法国于1830年征服了阿尔及利亚，对穆罕默德·阿里统治下的埃及也有重要的影响。它通常与英国合作，共同反对俄国在这一地区的扩张行动。奥地利虽然在中欧事务上同俄国是盟国，但在奥斯曼帝国问题上却常常与俄国对立。首先，哈布斯堡帝国的东南部与奥斯曼帝国的巴尔干地区接壤。它不仅自己竭力要向巴尔干扩张，就是出于纯粹军事和战略上的考虑，也不能允许俄国在它的南翼扩展势力。此外，俄国在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和维护东正教徒的旗号下所进行的干预，可能会影响哈布斯堡帝国内的斯拉夫地区的稳定，所以必然会遭到奥地利的反对。

总之，俄国外交当时面临着这样一种局面，即多数欧洲大国都担心它会把奥斯曼帝国的全部遗产一口吞掉，“东方问题”有可能导致欧洲列强联合起来反对俄国的危险后果。对于俄国来说，由它单独征服并控制整个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当然是十分理想的，但这并不现实。对于濒临瓦解的奥斯曼帝国的未来命运，俄国一般主张保持现状，使它作为一个软弱的缓冲国，如果可能，则使其作为俄国的一个卫星国而继续存在；万一灭亡，则应该在与英国、奥地利等有关国家取得协调的基础上予以瓜分。

---

① 马克思：《土耳其问题——〈泰晤士报〉——俄国的扩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130页。

“奥斯曼帝国要予以保留，但应从属于俄国”——俄国对土关系的这项原则是在1828～1829年的俄土战争期间确定下来的。当时俄国军队推进到了君士坦丁堡附近，给俄国占领该城、灭亡奥斯曼帝国提供了可能性。但是俄国又不能不顾忌肢解奥斯曼帝国所可能引起的严重后果。在这种情况下，沙皇尼古拉一世指定了一个特别委员会来讨论这个重大问题。该委员会的结论是，保持奥斯曼帝国的存在比任何可能采取的方案都对俄国更为有利。作为这次俄土战争的结果，于1829年签订的《阿德里亚堡条约》，就反映了这一总的政策原则。它使俄国夺得了多瑙河和整个黑海东岸地区，并在保留土耳其完整的情况下扩大了俄国在巴尔干地区的势力和影响。在随后的埃及危机期间，俄国曾派陆军和舰队支持土耳其苏丹马赫穆德对其藩属埃及帕夏阿里的军队作战。作为回报，1833年7月土耳其同俄国签订了《温基阿尔斯凯莱西条约》。条约赋予俄国以奥斯曼帝国保证人的地位，一旦发生战争，土耳其封锁了海峡，则任何国家都不能通过海峡去攻击俄国，而俄国却能通过海峡到地中海进攻别国。俄国对奥斯曼帝国的控制，实际上通过《温基阿尔斯凯莱西条约》得到了确认。很明显，该条约是俄国用来对抗英、法的杀手锏。

因此英、法多方努力设法废除俄土之间的这一双边条约，试图以某种欧洲多边协议取而代之。发生在1839～1841年期间的埃及危机就为它们提供了一个这样的机会。

1839年4月土耳其与其藩属埃及之间的战火再起。很快，奥斯曼帝国的军队就遭惨败，奥斯曼帝国的崩溃再次逼临。欧洲几个大国都担心俄国有可能援引《温基阿尔斯凯莱西条约》单独插手土埃争端，使俄国在奥斯曼帝国的势力和影响进一步扩大。因此，英国迅速提出了列强采取联合行动进行干涉的主张。奥地利建议召开国际会议调解土埃冲突。英、法则派出联合舰队驶往达达尼尔海峡，作为对俄国可能单独采取行动的一种警告。俄国当然清楚所谓“列强联合行动”的真正目的，是要取消《温基阿尔

斯凯莱西条约》赋予它在土耳其的特权地位，所以起初它对此十分犹豫而不情愿。但是鉴于它不愿冒同列强开战的风险，而且它也无力打这样一场战争，因此只得退却。1841 年 7 月，英、俄、法、普、奥五国同奥斯曼帝国签订了关于封闭土耳其海峡的《伦敦公约》。俄国同意终止"温基阿尔斯凯莱西条约"，把土耳其置于欧洲列强的共同保护之下。

《温基阿尔斯凯莱西条约》的废除，是俄国外交被迫实行的一次退却，从此确立了英、法在君士坦丁堡的优势。

俄国在伙同欧洲各国反动势力镇压了 1848 年欧洲革命之后，感到自己空前强大。沙皇尼古拉一世宣称："俄国的君主是全欧洲的主人，没有一个国家敢于挡住俄国的道路。"[①] 尼古拉一世决心利用他自认为的有利形势，加紧实现其争夺奥斯曼帝国"遗产"的计划。俄国曾试图谋求同英国合作瓜分奥斯曼帝国。但英国不愿意事先承担义务或签订一项一般性的条约，认为肢解奥斯曼帝国对英国并没有多少好处。由于俄国在地理上毗邻土耳其，所谓共同瓜分最后还是会导致俄国一家独占，所以不如维持现状好。英国还担心同俄国达成协议会使英国陷入俄国的圈套，有可能把它卷入对法国的流血战争。

1853～1856 年的克里米亚战争使俄国处于空前的孤立状态。英、法、土作为它的主要对手和敌国自不待说，就连俄国在中欧的传统盟国奥地利和普鲁士，也在不同程度上背叛或同它拉开了距离。这就决定了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失败的结局。于是在对俄国极端不利的情况下，签订了《巴黎条约》。根据 1856 年的《巴黎条约》，东方问题被明确纳入欧洲大国的协调范围之内。

克里米亚战争是俄国在外交和军事上遭受的一次严重挫折和失败。从此以后，俄国已不能再继续发挥它自拿破仑战争结束以来在欧洲事务中所起的支配作用，也被迫放弃了在奥斯曼帝国谋

① 《沙皇俄国侵略扩张史》（上），人民出版社，1979 年，第 357 页。

求特权优势的要求。俄国不得不在一段时间内集中主要力量进行国内改革，以便积聚力量，创造条件卷土重来。新上任的外交大臣哥尔查科夫主张俄国在欧洲和近东暂时采取守势，利用欧洲大国之间的矛盾，等待时机，以争取废除《巴黎条约》中关于黑海中立化等限制性条款。他在阐述俄国外交政策原则时曾直言："俄国不生气，俄国在聚养生息。"[①]

为了重新审查巴黎条约，沙俄需要寻求欧洲大国的支持。早在制定《巴黎条约》的过程中，拿破仑三世就不愿过份削弱俄国，他想同俄国合作来加强自己在欧洲的地位。于是法、俄两国出于各自的利益和需要便走到一起来了。1857 年 9 月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同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在斯图加特会晤。1859 年 3 月两国还订立了法俄中立和合作的秘密协定。但是由于拿破仑三世在波兰问题上与俄国存在分歧，并且不愿意为同俄国接近而疏远英国，因此 19 世纪 50 年代的法俄接近并没有导致两国建立同盟关系，而在 1863 年的波兰危机中，法、俄之间的合作关系也最终垮台。

到 19 世纪 60 年代，俄国改变了其亲法方针，转而寻求同普鲁士接近。俄普的接近有王朝姻亲（亚历山大二世是普王威廉的外甥）方面的原因，但从俄国方面来说更为重要的考虑是，此时实力已大大增强了的普鲁士有可能成为俄国实现其对外政策目标的依靠力量。沙皇俄国曾在 1863 年镇压波兰起义的过程中得到过普鲁士的帮助，而普鲁士也寄希望于俄国在未来统一德意志的王朝战争中保持中立。于是沙皇政府决定拉普抗奥，争取普鲁士支持俄国废除巴黎条约中的限制性条款。普鲁士则利用俄国的默许和支持，通过普丹、普奥和普法三次战争完成了德意志的统一大业。俄国盼望已久的废除巴黎条约限制性条款的时机，终于在普法战争大大改变了欧洲大国力量对比的情况下到来了。

普鲁士对法国的胜利，使俄国处于一种非常有利的国际地位。

---

① 波将金：《外交史》第 2 卷，第 186 页。

因为反对俄国重返巴尔干的大国之一的法国被打败了；没有法国的支持，英国要在近东阻止俄国的推进则孤掌难鸣；奥匈虽竭力反对恢复俄国在黑海的地位，但顾忌普鲁士的反对也不敢采取强烈行动。而普鲁士为了回报俄国在上述三次战争中的善意中立和所提供的实际帮助，曾于1866年和1870年两次答应支持俄国旨在废除《巴黎条约》中黑海中立化条款所作的任何努力。在这种情况下，哥尔查科夫于1870年10月31日向各大国发出照会，宣布俄国单方面废除《巴黎条约》中的黑海条款。1871年3月在伦敦召开的巴黎和约参加国会议正式签订了《伦敦公约》。根据新条约，俄国恢复了在黑海拥有舰队和建筑军事要塞的权利；黑海两海峡仍对各国军舰关闭；但如土耳其政府认为有必要，则苏丹有权决定在和平时期对友好国家开放。这样就把英国从克里米亚战争胜利中所得到的主要利益勾消了。

沙皇俄国在废除了《巴黎条约》中的限制性条款后，便积极着手在黑海地区重整军备，加紧向近东扩张。1877年爆发的俄土战争签订了《圣斯特法诺和约》，引起了奥地利和英国的强烈不满。1878年6月～7月在柏林召开了修改《俄土圣斯特法诺和约》的国际会议。会议的中心问题是保加利亚问题。英、奥两国为了使俄国的势力远离君士坦丁堡和两海峡，竭力主张缩小保加利亚的疆界。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会议决定将原来的大保加利亚领土一分为三。多瑙河以南、巴尔干山脉以北的保加利亚本部，组成一个自治的公国，暂时由俄军占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仍属奥斯曼帝国，但由奥匈军队占领。英国也借机从土耳其获得了塞浦路斯岛。《柏林条约》使俄、奥、英三国实现了对奥斯曼帝国“遗产”的部分瓜分，但并没能从根本上缓和这三国的矛盾。沙皇俄国同英国争夺君士坦丁堡和两海峡的斗争也没有停止。19世纪90年代俄、英两国曾围绕亚美尼亚事件对海峡进行了激烈的争夺。19世纪末20世纪初沙皇俄国同奥匈帝国对巴尔干的激烈争夺，最终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二 俄国的“南下战略”与东进

欧洲以及政治和地理上与其相关的近东地区无疑是俄国外交的重点。但在欧洲以外，在1815到1914年期间，俄国在中亚和远东的扩张所取得的实际领土却要显赫得多。正是这些领土的扩大为俄国从一个欧洲强国变为世界强国奠定了基础。

（一）俄国的“南下”战略与英俄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俄国在亚洲的侵略和扩张大体上是沿着南下和东侵两个方向进行的。所谓南下，是指在中东地区通过占领高加索、征服中亚、争夺西亚，寻求通往印度和印度洋的道路。这一战略是由彼得一世制定的，他曾毫不隐讳地说：“当俄国可以自由进入印度洋的时候，它就能在全世界建立自己的军事和政治统治。”[①] 其后的历代沙皇承袭和实施了他的侵略计划。

俄国从18世纪开始大举向高加索地区扩张，到18世纪末，北高加索名义上已处于俄国的军事控制之下。19世纪以来俄国加紧了对南高加索的军事兼并，通过发动侵略战争，到19世纪30年代已大体上实现了把波斯和土耳其势力排挤出高加索的目标，60年代初完成了对这一地区的军事征服，使这一地区成为俄国争夺黑海控制权和向波斯与土耳其以及整个西亚地区进一步扩张的基地。

从19世纪60年代起俄国加紧了征服中亚的步伐。沙皇政府曾在40年代发动了准备以包抄方式夺取中亚的军事行动。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虽然遭到失败，但它仍决心加强在中亚的攻势，以补偿它在巴尔干和近东所遭受的挫折。1864年夏，俄国军队从东西两翼同时开始了包抄哈萨克大草原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整个地区不久就并入了俄国。60年代和70年代俄国又先后制服了布哈拉、浩罕和基发三个汗国，之后把军事行动转到了外里海地区。1881年土库曼的首都被攻克。此后征战的扩大，使俄国军队一直

① 转引自《沙皇俄国侵略扩张史》上册，第87页。

推进到与印度毗邻的波斯和阿富汗北部边界地区。总之，在不到50年的时间内，俄国在一个广阔的战线上把它的边界向南推进了1200多公里，完成了对面积达390万平方公里的中亚的血腥征服。

俄国在19世纪后半叶大举向中亚扩张，既有经济方面的需要，也有战略上的考虑。仅从战略上来看，克里米亚战争后，英俄矛盾加剧，两国在近东、中东和远东等地出现了全面对抗和激烈争夺的形势。俄国进兵中亚，固然有南下印度洋、伺机觊觎大英帝国皇冠上的明珠——印度的用意；但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为了在中亚打击和牵制英国的力量，以配合俄国在欧洲的角逐，提高它在争夺近东霸权中讨价还价的能力和地位。

俄国南下战略的实施，的确引起了英国的严重惊恐和不安。随着俄国不断向南推进，英俄两国关系变得日益紧张，双方在靠近印度的波斯和阿富汗地区展开了激烈的角逐和争夺。

俄国早在完成对高加索的军事征服过程中，就通过两次对波斯的战争占领了波斯西北部领土，在一定程度上使波斯对它处于依附的地位。英国担心沙皇政府利用和唆使波斯向东扩张，夺取赫拉特[①]，危及英国在印度的利益。赫拉特成为俄英争夺的一个重要目标。两国在这里的竞争导致了1837年的赫拉特危机和1856～1857年的英波战争。1863年赫拉特被正式并入阿富汗。这场角逐以俄国失败而告终。

俄国虽然在支持波斯与英国争夺赫拉特的问题上遭受了挫折，但它并不因此而在波斯退却。特别是后来俄国通过大力向中亚扩张，第一次同波斯东北部地区发生了直接接触；19世纪80年代又修建了与波斯新国界平行的外里海铁路，从而大大加强了它在波斯的地位。沙皇政府通过军事、、政治、经济等种种手段对德

① 赫拉特位于今阿富汗西部，曾是阿的一个藩属，是连结波斯、阿富汗、印度和中亚几个地区的交通枢纽和战略要地。

黑兰施加影响，谋求在波斯获得“绝对优势”[①]。哥尔查科夫曾成功地促使波斯国王吊销他先前授予英籍商人路透的租让权。这一态度一直持续到俄国在日俄战争中失败、被迫在中东重新采取克制政策之时。在那以后，英俄于1907年签订了在波斯划分势力范围的协定。俄国同意不在波斯东南部扩张自己的势力或反对英国的势力；作为交换，英国对俄国在波斯北部地区也作出同样的承诺。

阿富汗是英俄在中东竞争的另一个重要地区。随着俄国在中亚的迅速推进，俄国军队已逐渐逼进到足以威胁印度的门户——阿富汗边界的距离之内。为了抗衡俄国，英国积极拉拢阿富汗埃米尔舍尔·阿里，向他提供武器和金钱援助，试图策划建立一个由舍尔·阿里领导的亲英反俄的“中亚联盟”。与此同时，俄国也大力做争取阿富汗埃米尔的工作。1878年阿富汗与俄国签订了针对英国的条约。英国担心俄国有可能把阿富汗变成它的保护国，于是就抢先下手发动了1878～1879年的对阿战争。舍尔·阿里被推翻，阿富汗实际上成为英国的保护国。之后英、俄围绕划定俄阿边界问题又爆发了尖锐的矛盾和冲突。1885年3月俄国为抢占彭狄绿洲与阿富汗发生武装冲突，英俄之间的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最后两国通过谈判达成了妥协。俄国得到了争议中的大部分土地，但承认了英国在阿富汗的支配地位。1895年3月帕米尔地区的边界线也确定了下来，在俄国和印度之间保留了一条阿富汗地带作为缓冲区。1907年的英俄协定基本上肯定了上述安排。

（二）俄国在远东的侵略和扩张

俄国越过乌拉尔山脉和西伯利亚直达太平洋的大扩张，在彼得一世以前就已完成了。从19世纪中期起俄国加紧了在远东的扩张活动。沙皇政府乘英、法等西方大国以武力对中国进行胁迫、侵略的机会，诱迫清政府于1858年把黑龙江以北地区割让给它，在

① 亨利·赫坦巴哈等：《俄罗斯帝国主义》，三联书店，1978年，第419页。

1860年又攫取了乌苏里江以东地区，两次共从中国东北地区夺得约1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俄国在中国西北边疆地区也加紧了蚕食、侵略活动，把他们单方面拟定的中俄西段边界强加于中国。1871年它曾出兵占领伊犁河流域，又在征服中亚以后侵入帕米尔地区。这一时期俄国从巴尔喀什湖到葱岭，先后共霸占中国西北边境5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

19世纪末20世纪初远东成为俄国对外侵略扩张的重点目标。促使俄国外交重点转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这和世界进入帝国主义时代后列强争夺殖民地的角逐进一步激化分不开。俄国利用地理上同中国接壤、有同中国打交道的"经验"，捷足先登，积极对中国进行侵略扩张，试图把中国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其次，当时总的外交态势也有利于俄国把侵略扩张的重点转向远东，特别是中国。19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俄法财政合作的加强以及同盟关系的缔结，不仅为俄国提供了一个现代的金融市场，而且也使它在欧洲获得了某种安全保障。1897年俄、奥关于维持巴尔干现状的协议，使俄国能够腾出手来集中精力向中国扩张。而德国则竭力怂恿俄国转向东方，希望以此使它摆脱因俄、奥在巴尔干的竞争而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同时又可以使俄、英两国在远东迎头相撞，自己坐收渔人之利。第三，西伯利亚和远东省份的开发和防卫需要，也推动俄国加紧向东推进。长期以来俄国对西伯利亚的开发因交通和粮食补给的困难裹足不前。随着经济的发展，建筑一条横贯西伯利亚的大铁路提上了日程。这将不仅有益于俄国远东地区的开发和防卫，而且有助于它在远东攫取不冻港，对争夺远东和太平洋的霸权具有战略意义。沙皇政府为了缩短拟议中的铁路的长度，避免某些建筑技术上的困难，要求中国政府允许铁路通过中国东北的领土。在上述因素的推动下，一场俄国与列强争夺中国东北、朝鲜以至整个中国的角逐就展开了。

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的远东政策曾受到过财政大臣维特

的重要影响。维特在1892到1903年的任职期间，积极鼓吹以经济力量为先导，以军事力量为后盾，对中国实行一种逐步渗透和控制的政策。他主张同中国政府建立和维持亲密关系，以谋取各种特权；通过支持中国反对其他列强把中国置于自己的势力之下。维特首先关注的是修筑一条横贯西伯利亚的大铁路。他的计划是，取得中国政府的同意，使西伯利亚大铁路穿越中国东北的腹地，把它变成俄国侵入中国东北、朝鲜和中国其它地区的基础。他还支持关于修建一条通往中国西北兰州的铁路的设想，妄图把中国的西藏、新疆、蒙古和东北统统置于俄国的控制之下。他曾为沙皇亚历山大三世描绘过这样一幅图景："从太平洋沿岸到喜玛拉雅山高峰，俄国所主宰的将不仅是亚洲而且还有欧洲的事务。"①

俄国在远东的主要扩张目标是中国的东北和朝鲜，这又同日本发生了严重冲突。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日本不仅夺走了朝鲜、台湾和澎湖列岛，而且还强迫中国割让辽东半岛。这使俄国和其他欧洲列强感到自己的利益受到了损害。于是俄国就联合法、德迫使日本同意修改马关条约，将辽东半岛归还中国。"三国干涉还辽"的成功，使俄国在同中国政府的关系上占据了某种优势。这就使它有可能在给中国提供保护的幌子下，积极推行控制中国政府的方针。俄国利用它从法国那里获得的贷款，为中国提供资金，使后者得以偿还对日战争的赔款。俄国还在中国开设了华俄道胜银行，作为它对中国进行经济渗透的工具。俄中两国1896年缔结了一项针对日本的防御同盟条约。作为对俄国提供"保护"的酬报，中国政府给予俄国西伯利亚大铁路可以穿越中国东北的特许权。1898年俄国以德国占据胶州湾为口实，又进而从中国手里勒索到对辽东半岛为期25年的租借权，以及在旅顺修建海军基地、在大连开辟商埠的权利。它还被允许在中国东北境内修建南满铁路。1900年俄国又乘义和团起义之机，派兵占领了东

① 巴巴拉·杰拉维奇：《俄国外交政策的一世纪 1814～1914》，第208页。

北。沙皇俄国对中国东北的掠夺，特别是对中国东北的军事占领，激起了日本以及俄国的老对手英国强烈的不满和反对。1902年英、日两国缔结了同盟条约，联合起来准备保护它们在远东的利益。

在这期间俄国的远东政策发生了某些重要变化。1903年，10多年来对俄国远东政策拥有重要影响的维特下台，主张采取赤裸裸侵略政策的别佐布拉卓夫集团控制了俄国的远东政策。这个集团主张用直接的军事手段征服中国和朝鲜，竭力阻止从中国东北撤军，试图把发动侵略战争当作摆脱国内危机的唯一出路。这就使得俄日之间难以取得妥协，于是日本就在英国的支持下发动了对俄战争。

俄国在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遭到惨败，被迫放弃了对辽东半岛的统治权。不得不对其政策进行调整，把图谋通过同中国政府搞好关系以独自控制中国整个北方的方针，改为通过同日本合作使其势力沿边界地区稳步发展的政策。1907、1910和1912年，俄国同日本先后缔结了3个协定，就在中国瓜分势力范围的问题达成妥协。

维也纳会议确立了英、俄、法、奥、普五强并立的欧洲均势格局。在这个体系中，英国掌握了海上霸权。俄国则成了欧洲大陆的头号军事强国，它企图以“神圣同盟”盟主的资格接管奥斯曼帝国的遗产，称霸巴尔干地区，控制黑海海峡和君士坦丁堡。19世纪中叶以前，沙皇南下的姿态咄咄逼人，亚历山大一世及尼古拉一世在其对外政策中，均把在欧洲的扩张当作是争霸世界的重要举措，尤其把称霸巴尔干视为传统的扩张重点。为此，俄国在近东同欧洲其他列强屡屡迎头相撞。英、法等国都不愿听任沙俄坐大，于是多次在紧急关头把天平的砝码置于土耳其一方，支持土对俄作战，结果俄国的南下策略多次受挫。俄国最终在克里米亚战争中遭到惨败，开始走向衰落，而英、法、奥的地位则得以加强。到19世纪后半期，沙皇被迫调整俄国的外交路线，亚历山

大二世及亚历山大三世时期，在扩张重点上与前半期有所不同，对欧洲采取外交守势，目的是积聚力量、韬光养晦、卷土重来；而同时，却把扩张重点转向中亚和远东地区，加强向亚洲的军事扩张渗透，取得了上述“战果”。但不论沙皇们的扩张策略有何不同，从扩张战略上讲，其确立世界性侵略体制的既定战略及国策始终如一，这势必要使俄国在世界范围内与英、法等强国的利益发生冲突，从而产生尖锐的矛盾，不断酝酿和制造一些国际冲突和国际危机，使国际关系扑朔迷离。

三　俄法同盟与三国协约

本来，圣彼得堡和柏林之间的紧密联系，是几乎整个19世纪俄、普（德）关系的特征。在神圣同盟于50年代最终解体后，俄、普、奥三个保守朝廷于70年代初又重新结成了三皇同盟。即使在三皇同盟于1887年终止后，俄德之间订立的《再担保条约》又持续了一段时间。俄国和普鲁士以及后来的德国，在很多方面存在着共同的利益和需要。

但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外交逐渐离开了传统的俄、普（德）路线，转向与法国结盟，最后甚至同自己的主要对手英国一起，结成了同德、奥抗衡的《三国协约》。俄国外交指导思想的这种转变，是同当时整个国际形势、特别是德国统一后欧洲均势格局所发生的重要变化分不开的。德意志的统一，使普鲁士上升为欧洲的主导大国，导致大国之间的结盟关系发生错综复杂的变化。统一后的德国已不是昔日对圣彼得堡俯首贴耳的普鲁士。这时俄国已不可能继续充当德、奥或德、法之间的调解人，而是由德国来担当俄国和它的对手互相竞争的裁判官了。俾斯麦虽然赞成同俄国结盟，但把圣彼得堡明显地摆在维也纳之后。在新形势下德国为了在欧洲维持大国之间的力量均势，特别是从制约和抗衡法、俄的需要出发，十分关心维持作为其主要盟国的哈布斯堡帝国的存在，不允许让它受到严重削弱，以致被排挤出强国的行列。这

就使得德国在俄国与奥、匈帝国的竞争中往往站在后者一边，支持奥地利为限制俄国在巴尔干的扩张而采取的某些措施。这样，德国就不仅不能在近东问题上帮助俄国解除敌对国家结成反俄同盟的威胁，而且随着事态的发展，德国自己也越来越深地被奥匈拖进了反俄联盟的泥沼。事实上德国于1879年10月同奥匈帝国签订的密约，就是一项针对俄国的防御同盟条约。1882年5月德、奥、意缔结的“三国同盟”，也是一个含蓄的反对俄国的条约。俾斯麦在1887年签订的《再担保条约》中，尽管答应在保加利亚问题上支持俄国，但他随后又支持英、意、奥签订关于维持近东现状的第二个地中海协定，堵死了俄国向索非亚推进的道路，从而使俄国无法从所订的《再担保条约》中取得实际好处。

德俄关系的恶化发生在俾斯麦下台之后。俾斯麦虽然把圣彼得堡的位置摆在维也纳之下，但其政策方针的中心内容一直还是谋求同俄国结盟。他清楚地看到有关东方问题的争执是欧洲外交上的危险争端，所以他总是设法把德国的两个邻国羁縻在他所安排的联盟体系内，以防止它们在巴尔干迎头相撞。威廉二世在1888年登上德国皇位后，在一些主张德国两面作战的军方领导人影响下，开始探索推行一种新的外交方针。这一方针着眼于加强同奥匈的合作，谋求同英国结盟，从而导致同俄国伙伴关系的破裂。1890年俾斯麦同威廉二世的冲突爆发，被迫辞职下台。“新方针”的倡导者拒绝延长《再担保条约》。是年7月，英德两国签署协定。德国以放弃桑给巴尔并限制其在东非的要求，换取英国所属的赫尔果兰岛。某种英德同盟关系的确立，似乎已迫在眉睫。在这种情况下，俄国只好考虑改变方针。法、俄之间的接近和合作就成为势在必行的事了。

促使法、俄接近的客观因素，是两国有着共同的潜在敌人。1870年的普法战争使法国受到严重的屈辱和削弱；俄国在欧洲的地位和影响也因德国统一而受到损害。巴黎和圣彼得堡想称霸欧洲大陆的野心受到了德国的遏制和威胁。俄国政府不愿意看到因

法国受到进一步的削弱而使欧洲均势更加向德国一边倾斜。在这方面法、俄两国有着共同的利害。因此当1875年4月传说德国有可能对法国发动一场预防性战争的时候，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哥尔查科夫陪同下访问柏林，明确地声明俄国对此不会置之不理。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在1891年更明确地表白了俄国的信念。他说："一旦法德两国开战，我们必须立刻以全力打击德国，不让他们从容地把法国打倒然后马上转过来对付我们。"[①]

把法、俄联结在一起的另一个因素是，当时双方在外交上都是孤立的，它们的外交目标都有遭到"三国同盟"联合英国一起来加以阻挠和破坏的危险。俄国政府在别无其他选择的情况下，开始寻求与法国结盟的谈判。另一方面，就法国来说，在面对德、英两个主要对手的情况下，法国政府曾试图同英国达成妥协，但由于两国在非洲殖民地问题上的矛盾相当深，僵局一时难以打破。而英国已通过《地中海协议》同"三国同盟"挂上了钩，英意海上合作的发展更使法国疑心重重。于是法国人便被赶到俄国这边来了。法国外交官保罗·康邦说："今天我们唯一的一着棋就是希望得到俄国的支持，以及这个简单的希望会给俾斯麦造成的不安。"[②]

推动法、俄走向联合也有其经济方面的原因。俄国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不同，在向亚洲一些落后国家输出资本的同时，也是一个资本输入国。相对落后的俄国严重依赖于外国企业和资本，特别是在财政上依赖于法国的贷款。法、俄两国在财政上的合作关系远在1890年以前就已奠定了基础。1887年俾斯麦为报复俄属波罗的海省份所采取的不利于德国的行动，阻止俄国政府向柏林借款，于是俄国转向巴黎金融市场。1888年10月，第一批俄国债

---

① 巴巴拉·杰拉维奇：《俄国外交的一世纪 1814～1914》，第189页。

② 转引自泰勒：《争夺欧洲霸权的斗争，1848～1918》，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367页。

券在法国上市。从这时起接连不断的借款使法国取代德国成为俄国的主要债权人。这种由法国特意安排来为政治目的服务的经济关系，一直持续到 1917 年沙俄政权灭亡为止。它大大加强了两国政府之间的联系。接着俄国又从法国订购了一大批来福枪，以装备自己的军队。这样，两国在走向结盟的道路上就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法、俄两国关于缔结同盟条约的谈判进行得相当艰难而缓慢，因为双方各有打算。对于俄国来说，法、俄同盟的主旨实际上针对的是英、奥两国的联合，而不是德国；它希望法、俄接近导致俄德重订《再担保条约》。而法国的目标则主要是指向德国，它希望法、俄联合导致英法在非洲殖民地问题上达成妥协。所以尽管俄法于 1891 年达成了针对英国的外交上的协约，1894 年又结成了针对德国的军事同盟，但双方仍是各按自己的安排行事。在政治上，法国人拒绝被推向反英的第一线；在军事上，俄国人忽视对德作战的准备。这种情况直到 10 多年后才有了转机。那时英、法与英、俄分别就殖民地问题上的争端达成了妥协，而德国则成为对英、法、俄利益的共同威胁。只有到这时，法、俄同盟才成为一种真正具有爆炸性后果的联合。

法、俄同盟的形成，使欧洲大陆上的军事强国分成相互对立的两大军事集团。这对置身于两大集团之外的英国是十分不利的。

英、德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发展，推动英国去寻求同昔日的竞争对手法国接近和联合。于是两国 1904 年缔结了《英法协约》。德国势力在近东地区的扩张，也激化了它同俄国之间的矛盾。这就促使俄国不得不转而向英国寻求支持，以便同德奥势力抗衡。在这样的背景下，俄英两国就在 1907 年 8 月 31 日签订了关于波斯、阿富汗和西藏的协定，解决了两个缔约国在亚洲殖民地问题上迄未解决的争端。

随着 1904 年英、法协定和 1907 年英、俄协定的签订，由英、法、俄三国组成的三国协约就最后形成了。从此，两个对立的帝

国主义集团展开了更加激烈的争夺，制造了一系列的国际危机和局部战争，并最后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在以上这幅激烈而复杂的国际斗争的长卷中，人们不难看出，俄国的扩张主义，时时不免受到其他强国的阻遏，然而它一直贯串在俄国外交政策中，具有鲜明的历史延续性。

第四节　法国强权外交的破灭

拿破仑失败以后，欧洲列强在正统主义原则下通过维也纳会议暂时实现了欧洲的政治均势。法国由于波旁王朝复辟，也由于塔列朗的精明老练，终于又跻身列强。维也纳体系并未能制约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在1848年欧洲革命中政变上台的小拿破仑企图恢复拿破仑盛世，然而世事已非，19世纪下半叶法国在欧洲力量均势中居于被动地位，强权外交，计无所施，寄希望于走拿破仑的战争之路达到目的，但最终敲响了帝国的丧钟。从此，法国在德国威胁的影子下谋求维持强国之道。

一　拿破仑三世的帝国梦

拿破仑三世上台以前，整个法国可以说已无力在国外实行积极的外交政策。路易十八、查理十世、七月王朝时的路易·腓力普，虽然都有他们自己的野心，但在维也纳体系下，作为战败国的法国仍被当成疑惧对象的时候，不管是有心还是无心，除去抓住机会显示一下自己以外，总的来说，他们对欧洲列强都表示出遵守一种和平政策的愿望，以求在欧洲列强的默许下和避免引发国内革命的情况下维持自己的统治。马克思评介七月王朝的对外政策时曾说："不为荣誉花一文钱！荣誉不能带来任何利润！无论如何都要和平！战争将使三分息和四分息公债券行价降低！——这就是交易所投机者的法国写在自己旗帜上的字样。因此，它的

对外政策就是让法国人的民族感情遭到一系列的凌辱。”①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的对外政策，可以说一直延续到了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之后的临时政府时期。

1848年2月的法国革命推翻了七月王朝，共和主义者执掌政权。在此之前，他们反对1815年的维也纳条约，反对七月王朝与英、奥、俄相勾结镇压欧洲革命，主张援助波兰、意大利和德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主张加强法国的国际地位和扩大它在欧洲的疆界。这些看来与拿破仑第一帝国相近似的政策主张，曾在欧洲封建君主中引起极度恐慌。但是，这种恐慌却由制造恐慌的法国实际政策消除了。法国这时的全部外交都以一条原则为准绳，即不惜任何代价维持对外和平政策，以避免国内革命深入发展。他们害怕对维也纳条约的异议和对欧洲民族解放运动的援助，会导致同欧洲君主的战争，而战争肯定会加剧革命的发展而又导致政权的崩溃。于是，法国通知欧洲列强："法兰西共和国已经不再把1815年的条约看成法律，但这些条约中有关领土的条款却是事实，共和国认为这个事实是它与其他国家的关系的基础和出发点。”②

正是这种在仇视革命的基础上制订的内外政策，引发了巴黎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六月起义。马克思总结道："六月失败使欧洲各个专制国家识破了一个秘密，即法国为了能在国内进行内战，无论如何都必须与邻国保持和平。”③ 马克思的这一论断，在19世纪的法国，曾得到充分的验证。

1848年12月10日，法国举行共和国总统选举，拿破仑的侄子路易·波拿巴当选。1851年12月2日，路易·波拿巴采用他伯父老拿破仑的成功作法，利用军队发动政变，并于1852年12月

---

① 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97页。

② 转引自波将金：《外交史》第1卷，第723页。

③ 《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前引书第418页。

2日称帝，号拿破仑三世，开始了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

拿破仑三世同共和党人一样，痛恨1815年的维也纳条约，他想撕毁这些条约，恢复拿破仑盛世，他的野心越来越大，成为一个以“滑铁卢的雪耻者”自居的野心家。在他建立的波拿巴主义军事独裁专制下，最反动、最富有侵略性的一小撮野心勃勃的冒险家，在法国推行了一种积极进攻的战争冒险政策，不顾一切地热衷于欧洲列强的争霸战争。

（一）克里米亚战争中法国的得与失

1848年欧洲革命之后，列强争夺的焦点又到了近东，沙皇俄国同英法之间围绕土耳其问题都在准备发动战争。

拿破仑失败之后，在维也纳体系下，沙皇俄国成了欧洲实力最强大的国家，沙皇在欧洲事务上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被称为“欧洲宪兵”；对法国而言，几十年里迫使法国唯唯诺诺的大陆同盟，其支柱就是沙皇俄国。拿破仑三世想恢复拿破仑盛世，就必须设法打破大陆同盟这个精神枷锁，拿破仑三世认为，东方问题有可能在同盟中挑起不和，作为拆散同盟的“工具”，应当“紧紧抓住不放”。因此，从一开始，拿破仑三世就决心要在东方问题上大作文章，同沙皇俄国对着干。马克思说：“波拿巴进行这次战争是十分认真的。不是国内革命就是对外战争——他再没有别的出路了。他已经不可能继续像从前那样，把拿破仑第一的残酷的专制同路易·菲力浦的那种卖身的和平政策结合起来了。”[①]

应当说，俄国对拿破仑三世的野心估计不足，错误地认为法国还没有强盛到足以冒险参加对俄战争的程度，它将继续对欧洲列强奉行“和平政策”。所以，沙皇直接同英国接触，试图达成瓜分土耳其的协议，轻易地撇开了法国和奥地利，结果，不仅遭到英国的拒绝，而且被拿破仑三世所利用，成功地离间了俄国同英

① 马克思：《二月二十二日的议会辩论——西方强国的政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109页。

国和奥地利的关系。

1853年10月，土耳其在英、法两国支持下，拒绝了俄国的干涉要求并对俄宣战。1854年3月，英、法正式对俄宣战，随着，奥地利和普鲁士也站到了英法一边。1856年2月，沙皇俄国在绝对孤立下被迫媾和。在巴黎和会上，拿破仑三世的法国又成了欧洲貌似最强大的国家。

但是，即使是在矛盾最尖税、战争最激烈的时候，拿破仑三世也没有想过要彻底摧毁俄国。因为同英国一样，拿破仑三世切身需要沙皇专制制度继续存在下去，继续作为镇压欧洲革命的反革命力量，如果俄国在战争中彻底崩溃，势必引发一场革命，这将给英、法资产阶级的自身统治带来危险。所以，拿破仑三世想的只是削弱俄国的军事力量，使它难以再成为近东竞争的对手，并将自己的势力扩展到巴尔干和黑海地区。依据这个意图，拿破仑三世在整个战争期间都没有停止同俄国的接触，并竭力防止战争扩大到他们试图争夺的地区以外。1855年6月，拿破仑三世通过波拿巴派的报纸《立宪主义者报》公布了自己的军事计划，明确指出需要解决的黑海霸权问题是纯粹局部性的，因此将就地解决，扩大战争范围是不明智的。由法国提出并得到英国支持的“为了局部目的而进行局部战争”的计划，彻底暴露出拿破仑三世恐惧革命的念头如何深刻地影响了他的对外政策。

克里米亚战争对法国来说，是一场毫无必要的战争。因为法国从战争中没有得到任何实际利益。拿破仑三世只是用大量的法国人的鲜血和财富，唤醒了法国军队的“荣誉感”，报复了“滑铁卢”的耻辱，巩固了自己的皇位，满足了自己的虚荣心。沙皇俄国是这场战争中最大的失利者，而这个结局，正是拿破仑三世竭力策动下实现的。可悲的是在于，拿破仑三世以沙俄的失利填补自己的虚荣而沾沾自喜，岂不知这正是他外交战略上的最大失策——疏远了俄国，导致其在未来的普法战争中保持中立，限制了奥、匈牵制普鲁士的可能性，使法兰西第二帝国陷入了绝境。因

此，法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似乎是战胜者，实际上已铸成是个大输家。

（二）法意对奥战争

克里米亚战争之后，俨然以“欧洲最高仲裁者”自居的拿破仑三世决心“乘胜”追击，在恢复拿破仑盛世的战争道路上继续走下去，这一次他的目标是奥地利。

奥地利曾是拿破仑时代欧洲反法联军的主力，在给予俄国重创之后，再来削弱奥地利，是拿破仑三世帝国梦中顺理成章的事情。拿破仑三世利用了意大利境内反对奥地利民族压迫的革命情绪，同撒丁王国结成同盟，积极策划对奥战争，并谋求撒丁王国割让萨伏依和尼斯作交易。

拿破仑三世要发动对奥战争，当然要顾忌到欧洲列强的态度。对拿破仑三世有利的是，俄国、普鲁士和英国，都对对奥战争的企图开了绿灯。克里米亚战争之后，拿破仑三世加紧了在战争期间并未中断的法俄接触，并利用对英国的共同矛盾，发展了法俄关系。这时的俄国，也因克里米亚战争的失利要暂时“休养生息”，无力再卷入另一场战争，更何况拿破仑三世这次的对手，是克里米亚战争中对俄国背信弃义（神圣同盟）的奥地利。对普鲁士来说，尽管同奥地利源出一族，但围绕德意志统一的问题，究竟是以奥地利为中心建立一个“大德意志”，还是以普鲁士为中心建立一个“小德意志”，普、奥之间已经尖锐对立，很难想象普鲁士会助奥地利一臂之力。英国在法、俄接近的情况下，又面临殖民地人民起义的困扰，也无心干涉大陆新一轮的战争。

1859年4月，奥地利在拿破仑三世的唆使下主动宣战。开战不久，法意联军就多次重创奥地利军队。眼看奥地利军队就要被迫撤出伦巴第时，拿破仑三世却背着撒丁王国，主动向奥地利建议停战媾和。当撒丁王国和整个欧洲还在惊愕之中时，7月，法、奥两国已签署停战协定，其中规定，奥地利将继续保留威尼斯。之后不久，拿破仑三世又从撒丁王国手中接过了萨伏依和

尼斯。

拿破仑三世是在“把意大利从奥地利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和“民族原则”的口号下，鼓动意大利联合作战的。实质上他是牺牲意大利的利益以扩大法国的版图并巩固自己的皇权。“意大利解放者”只是拿破仑三世的假面具，他同奥地利一样，都是意大利独立和统一的敌人。恩格斯指出：法国“遵循的唯一原则是：**法国永远不会容许一个统一的、独立的意大利存在**。一直到路易·拿破仑，这一原则始终没有动摇”。①

（三）加紧殖民战争

拿破仑三世在欧洲不断挑起战争的同时，丝毫也没有放松通过战争来扩大殖民地。

在非洲，法国殖民者在征服阿尔及利亚后，不断向非洲内地推进。

在远东，法国同英国一道发动了侵略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1858年，法国派出远征军在印度支那登陆。占领越南之后，又建立了对柬埔寨的保护权。

在中东，1860年拿破仑三世曾派兵染指叙利亚。

在美洲，1862年拿破仑三世开始了在墨西哥的冒险战争。

到1870年普法战争以前，法国已占有90万平方公里、包括600万人口的殖民地，仅次于英国。

拿破仑三世在重建法兰西帝国时，曾说过一句安慰人心的话：“帝国就是和平。”人们完全可以依据拿破仑三世的实际行动来纠正这句话为“帝国就是战争”。

拿破仑三世在竭力效仿老拿破仑。他在自己铸造的皇座上做着老拿破仑的帝国梦。但是，拿破仑三世的第二帝国在19世纪60年代走进了外交绝境，在内外交困中迎来了土崩瓦解。

---

① 恩格斯：《波河与莱茵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297页。

1860年，法、英两国借口叙利亚内部宗教纷争，插手叙利亚。在英国之先派遣军队进驻叙利亚。法军在叙利亚盘踞近一年之后，在英国的压力下，被迫撤出，拿破仑三世占领叙利亚的企图遭到失败。

1862年，拿破仑三世开始了远征墨西哥的殖民冒险。这个试图将墨西哥沦为法兰西帝国附庸，从而在美洲立足建立一个更大范围内法兰西帝国的殖民计划，得到法国大金融资产阶级和官宦显贵们的狂热吹捧，被称之为“本朝伟大思想”，其中最得力的鼓动者，是拿破仑三世的宠臣、其异母兄弟莫尔尼公爵。

1867年，拿破仑三世被迫从墨西哥撤出远征军。这场战争法国消耗了大量物力和人力，外交上不仅加深了与美、英的矛盾，而且大量兵力的调离本土，减轻了对普鲁士这个潜在敌手的压力，法国不仅毫无收益，反而损失巨大，于是一改初衷，转而攻击拿破仑三世的冒险政策，法国国内一片怨声载道。

从19世纪60年代下半叶起，法国同欧洲列强的关系普遍恶化了。

1863年，拿破仑三世以支持波兰起义的姿态进行外交活动，对俄国落井下石，激起了沙俄对法国的强烈不满。1869年，由法国控制的苏伊士运河开通，这是法国不顾英国反对执意开凿的，致使英法关系更加紧张。1867年11月，当加里波第率领义勇军进攻罗马时，法国驻意部队执行拿破仑三世阻挠意大利革命统一的战略意图，击溃了加里波第的军队，激起了意大利人的愤恨。奥地利在1859年曾是法、意的战争对手，1866年在普、奥战争中又败于俾斯麦之手，因此，奥地利还拿不准对法国应保持什么样的适度关系，它在观望，特别是在观望俄国的态度。

可见，拿破仑三世的帝国已处在一种孤立无援的境地。而拿破仑三世帝国旁边的普鲁士，却在拿破仑三世的昏庸中迅速强大起来。

二　第二帝国的灭亡

（一）拿破仑三世与普鲁士的崛起

德意志在统一前，一直是由大大小小的国家，时而组成联邦，时而组成邦联。其中，奥地利和普鲁士是最大的两个国家。

1862 年，俾斯麦出任普鲁士宰相，竭力主张通过王朝战争实现德国统一，以强权和武力来统治德国，进而谋求欧洲霸权。俾斯麦很清楚，要实现自己的计划，在德意志内部最大的阻力是奥地利，在外部最大的阻力是俄国和法国。他知道，所有一切重要行动都应当首先在俄国的支持或中立的情况下进行，为达到这一目的，普鲁士在欧洲舞台上扮演俄国的"恭顺仆从的角色"。对拿破仑三世的法国，他早已预料到冲突不可避免，他决心争取时间，尽快扩展势力，以待同拿破仑三世这个阻挠德国统一强盛并贪图莱茵河左岸的头号敌人决一死战。

比起精明强干的俾斯麦来，拿破仑三世的战略眼光和外交手腕显得逊色多了。

拿破仑三世的帝国胃口很大。1860 年 7 月，在官方授意下巴黎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叙利亚和对俄同盟》(La Syrie et L' alliance Russe)。其中拿破仑三世的扩张野心暴露无遗，书中公然写道："我们需要扩张，舆论也早就大声疾呼地要求我们扩张。"在论证一番兼并比利时和卢森堡的必要性和合法性后，书中又写道："比利时和卢森堡归属我国以后，我们的任务还没有完成……为了改善我们的边境，我们必须合并不少于 2/3 的莱茵普鲁士、整个莱茵巴伐利亚和大约 1/3 的黑森大公国。"[1] 这样一种兼并四邻的扩张计划，当然不能与有一个强大的普鲁士邻国相容，因此，拿破仑三世阻挠德意志的统一也就不奇怪了。但是，奇怪的是，贪婪的野心更加冲昏了拿破仑三世的头脑，他不仅没有洞察普鲁士宰

---

① 马克思：《俄法同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5 卷，人民出版社，1965 年，第 124 页。

相最终要同法国决斗的战略意图，反而采取了一条有利于俾斯麦通过王朝战争统一德国的政策。

拿破仑三世曾几次透露，说他知道德意志需要统一，他自己就是可以使它实现统一的人，对普鲁士来说，用莱茵各省换取法国支持德国统一这样珍贵的东西代价不算过高。他向德意志北部各邦许愿，保证促成以普鲁士为中心的德国统一，条件是莱茵河左岸归并法国，这点损失，普鲁士可以从奥地利那里得到补偿。

拿破仑三世的意思是说：只要能满足法国的扩张野心，对普鲁士统一德意志不持异议，即使牺牲他国利益也在所不惜。但他没有意识到，对法国来说最重要的是，一个统一后强大的德意志决不会让法国实现扩张野心。

曾任过驻巴黎大使的俾斯麦对拿破仑三世可谓是了如指掌，他认准了拿破仑三世的贪欲是可以利用的机会，决心利用这个机会，先同法国拉拢关系，争取在统一德意志的王朝战争中先谋求法国中立。

1864 年，俾斯麦伙同奥地利发动对丹麦战争。这是俾斯麦通过王朝战争统一德意志的第一步，其用意是通过战争在全德意志确立普鲁士的中心地位。拿破仑三世先是拒绝了英国共同干涉丹麦战争的提议，接着又回绝了丹麦的援助请求。

1866 年，俾斯麦借口丹麦战争善后问题的纠纷，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对奥地利战争，这是俾斯麦通过王朝战争统一德意志的第二步。拿破仑三世又一次错误估计了形势。他低估了普鲁士的实力，看轻了俾斯麦和普军统帅毛奇将军的政治魄力和军事才干，满以为普奥战争将是一场旷日持久之战，法国正好隔岸观火，从中渔利，待普鲁士削弱之际可以提出更高的要求。于是，拿破仑三世默许了普鲁士的对奥战争。

普奥战争前后仅进行了 7 个星期，所以又称“七星期战争”。奥地利溃败，签订了《布拉格和约》，奥地利被迫解散德意志邦联。

1867年，以普鲁士为首的北德意志联邦成立，包括莱茵河以北22个德意志国家和3个自由市，同时，联邦之外的南方4个邦，也同联邦订了攻守同盟。

至此，一个以普鲁士为中心的统一的德意志国家已初具规模，而且可以认为，这是在拿破仑三世的变相支持下获得的成功。

（二）拿破仑三世与普法战争

法兰西第二帝国面临的外交环境已经非常严峻。在这种形势下，如果想挽回颓势，拿破仑三世的外交对策应该是，抓紧时间在俾斯麦还未最终实现德国统一之前，哪怕牺牲局部利益，缓和法国的对外关系，充分利用欧洲列强对德国统一的恐惧心态，共同对普鲁士施加压力，以便争取两种可能的结果：一是在列强的强大压力下，俾斯麦不得不放弃通过对法国的战争实现德国统一，对法国来说这是最好的结果；二是推迟普法战争的爆发，法国将赢得准备时间和可能的同盟者。无论是哪种结果，对法国都是有益无害的。

但是，拿破仑三世采取了另一种对策。他看不见自己面临强敌、孤立无援的困境，对普鲁士的实力也心中无数，虽知有危险，但没有紧迫感，待真正意识到危险时，又为时过晚。拿破仑三世错误地认为：法兰西第二帝国有必要也有能力对普鲁士发动战争。这场战争法国可以达到三个目的：通过战争打败普鲁士，以阻止德国统一；通过战争夺取莱茵河左岸；通过战争转移国内不满情绪的注意力，摆脱内外交困。于是，法国朝野上下展开了热火朝天的备战高潮。1870年春天，皇后欧仁尼指着儿子说："要想使这个孩子当皇帝，就必须进行战争。"①

野心膨胀的拿破仑三世，在波拿巴集团黩武主义的驱使下，选择了战争冒险的道路，这无疑是自己选择了一条通往灭亡的道路。

拿破仑三世的好战姿态，俾斯麦是求之不得的。他急切希望

---

① 转引自波将金：《外交史》第1卷，第936页。

法国在不利的国内外条件下走向战争道路，这样，普鲁士就可以打败法国、削弱法国，乘机夺取垂涎已久的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从而在战争中动员全德国的力量完成德国统一，实现德意志帝国的称霸。

拿破仑三世在普法战争中成了阶下囚，法兰西第二帝国垮台了。第二帝国不是在法国国内革命的炮声中下台，而是在俾斯麦推行的统一德意志的王朝战争中垮台，说明了拿破仑三世的外交战略决策错误，在决定帝国命运中起了多么重要的作用。疏远俄国的政策，导致了俄国在普法战争中的中立；俄国的中立，有力地牵制了奥地利干预战争的可能性；对意大利的背信弃义，使意大利军队不仅没有援助法国，反而乘机进军罗马，实现了意大利统一；与英国的争夺，使英国乐于看到法国的削弱。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中走战争冒险之路，是拿破仑三世自己敲响了帝国的丧钟。

（三）"国防政府"的投降政策

1870 年 9 月 19 日，普鲁士军队包围了巴黎。普法战争交战双方的地位来了个大变动，德国方面所进行的战争，已经由反抗拿破仑三世的民族自卫战争变成了侵略的不义战争。

面对侵略者兵临城下，巴黎人民群情激昂。抵抗侵略，保卫祖国，是巴黎人民的紧迫要求。当时，巴黎城内约有 10 万法国正规军和 20 万国民自卫军。如果法国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国防政府"，充分发动和武装巴黎人民群众，争取全国各地的有力支持，利用普鲁士同其他欧洲列强的矛盾，那就完全可以制止普鲁士进一步的侵略活动，在最小限度损失的基础上签订和约。但是，"国防政府"采取了一条完全相反的政策。在他们看来，武装巴黎就无异于武装革命，巴黎战胜普鲁士侵略者，就无异于法国工人阶级战胜法国资产阶级。梯也尔是投降政策的决策者。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指出："实际上，他的对外政策，从 1840 年的伦敦公约起到 1871 年的巴黎投降和目前这场内战止，始终是把法国

引到极端屈辱的地步。”①

1871年1月28日，国防政府在俾斯麦苛刻的条件下宣布巴黎投降。5月10日，两国在法兰克福签订正式和约。

丧权辱国的和约以及强行剥夺巴黎工人武装的行径，激起了1871年3月18日巴黎公社起义。从3月18日到5月28日，巴黎公社，这个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仅仅存在72天。其失败原因，有许多值得总结的经验教训，其中，资产阶级勾结入侵者，联合国际资产阶级镇压革命，使巴黎公社面临一个过于强大的敌人，是一个重要原因。

巴黎公社的失败，至少有两点是可以警喻后人的。一是在镇压国内无产阶级革命时，资产阶级政府的外交是不惜勾结入侵者的；二是在面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时，欧洲资产阶级列强同18世纪末欧洲封建君主一样联合起来了。

三　以德国为主要对手的法国外交

普法战争给欧洲近代国际关系带来的一个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在欧洲中部一个强盛的统一的德意志帝国的出现，打乱了欧洲的均势关系。从此，“德国问题”就成了百年来国际关系中难以摆脱的关键问题；而作为近邻，法国既不甘心普法战争的失败，又不得不在过于强大的对手眼前谨慎行事，寻机报复。摧毁、制约、防范德国，成了此后法国历任执政者外交思想中须臾不可忽略的问题。法德关系成了欧洲国际关系的晴雨表。

《法兰克福和约》规定的50亿法郎赔款和割让阿尔萨斯—洛林，不仅没有缓和法德两国之间的矛盾，反而成了两国加紧扩军备战，为另一次更大冲突作准备的借口。无论是在德国还是在法国，围绕阿尔萨斯—洛林问题，都成了培育沙文主义、复仇主义

①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341页。

的温床。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样："阿尔萨斯和洛林的兼并，播下了法国和德国不和的种子。"[①]

普法战争使法国元气大伤。50亿法郎的赔款，使法国无法在短期内改造在战争中弱点暴露无遗的军队和军备。法国需要时间重新武装，法国更需要时间寻求共同对付德国的盟友。因此，在19世纪70～80年代，法国还不想立即同德国开战。但是，俾斯麦在普法战争之后，仍在执行一项挑起法、德冲突，彻底制服法国的政策。俾斯麦的这项政策基于三点考虑：未来战争不可避免，只有彻底制服法国才能为未来战争创造最有利的战场；只有不断制造紧张气氛，才能不断排除干扰刺激加强军国主义；不能等待法国恢复元气找到同盟者。

于是，法国不得不在德国战争威胁的阴影下，提心吊胆地过日子。普法战争后的15年里，法国曾于1875年、1877年、1887年被迫三次拉响了法德战争警报。

但是，这三次法德战争警报，都未能直接引发再一次的法德战争。其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俄国和英国，特别是俄国，不愿意德国再次打击法国。一个保存一定实力的法国，将是俄英两国牵制德国保护自身利益的有利因素。

普法战争的发动及德国战胜法国的结局，从国际关系上来说，是俄英两国拒绝干涉的结果。在新的战争中，德国仍需俄英两国的中立，法国则需要俄、英两国的支持。俾斯麦没有想到，德国不断增长的实力和对法国的战争威胁，迫使俄英法三国逐渐靠拢到一起。

如果说在19世纪70～80年代，法国在没有寻找到固定可靠的同盟者之前，主要采取的是被动的对德防御政策的话，到90年代初，俄国同法国结成军事同盟后，它的对德政策就有了某种主

---

① 恩格斯：《欧洲政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357页。

动性和进攻性。法国利用阿尔萨斯—洛林问题在人民群众中煽动复仇情绪，利用德国挑起的战争警报加紧扩军备战，利用法俄同盟积极卷入了帝国主义军事集团瓜分世界的争夺。为了巩固这种同盟，法国充分利用高利贷资本的优势，不断地给俄国资本输血打气。为了扩大这种同盟，法国乘英国同德国矛盾加深之机，不惜在殖民地争端中让于英国，最终实现了俄、英、法同盟。

进入19世纪90年代，巩固和发展法、俄同盟，积极准备对德战争，收复阿尔萨斯—洛林，夺取萨尔，在莱茵区扩展势力，就成了法国主要外交战略目的。但是，不容否认，不管法国资产阶级煽起的复仇主义和沙文主义如何声势浩大，在面临德国这个强敌时，它已永远失去了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威风时代。法国已不可想象在没有盟国的情况下过日子，法国的强权外交已一去不复返了。警惕一个强盛的不受约束的德意志国家的威胁的危险，是普法战争留给法国外交界的重大课题。它是法国外交决策者思想中时隐时现的制约因素。

1918年11月，历时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国和奥地利同盟的失败宣告结束，法国以高昂的代价，在美、英等国的支持下报了普法战争之仇。但是，胜利者的烦恼并不亚于失败者的烦恼。当德国人正在千方百计摆脱战败国地位，减轻战争罪责的负担时，法国人首先想到的是采取何种办法才能遏制德国再起，确保法国的安全。围绕这个问题，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33年德国希特勒上台，在这一段“虚假的和平”期间，法国的对外政策一直在两种思想支配下摇摆不定，一种是力主利用德国战败的机会，联合盟国的力量，分割、占领德国，削弱和控制德国。另一种是主张法、德两国亲近合作，消除积怨，在一个“欧洲联邦”大家庭中实现和平。

持对德强硬政策的代表人物有普恩加莱和克雷蒙梭。普恩加莱在法国政界活跃40余年，作为洛林人，普恩加莱似乎比其他法国政治家对德国有更高的警惕性。1912年普恩加莱就任总理，他

坚信德国随时在想发动战争，法国的首要任务就是准备对付德国的战争，对德国绝不能姑息。当时，法国反对党反对他的口号是“普恩加莱就是战争”。从1913年到1920年，普恩加莱一直任共和国总统。克雷蒙梭也是个对德强硬分子，1917年在战争最艰苦的时候，他重新担任总理职务。克雷蒙梭以绰号“老虎”闻名政坛，在战争的最后一年里，他毫不留情地采取严厉手段，打击了法国的失败主义情绪，坚定了对德胜利的信心。

1919年1月召开的巴黎和会，是大战后大国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一次激烈争夺。为了彻底削弱德国，确保自己的安全和在欧洲的地位，以克雷蒙梭为首的法国代表团，在普恩加莱总统和福煦元帅（协约国军队总司令）的坚决支持下，要求将德国的西部边界定在莱茵河；莱茵河左岸的德国居民区，建立一个归属法国的自治政权。同时，坚持要求德国赔偿协约国的全部战争损失，并为伤亡者家属支付抚恤金。在法国人看来，如果不控制住莱茵河，不管是什么条款约束或保证，都无法阻挡德国越过莱茵河向法国进攻。而历史证明，英、美不可能作到及时援助，法国难免遭到失败。

法国的担心不无道理，但是这不符合美国威尔逊总统的“十四点计划”精神。美、英两国拒绝法国的要求，许诺以英美共同保证法国安全、设立非军事区、德国解除武装来换取法国同意德国维持原有边界不动。克雷蒙梭动摇了，他以一纸《保证条约》放弃了莱茵河，同意《凡尔赛和约》中对德国边界的规定。悲剧性的结果是，美国国会既不批准《保证条约》，也不批准《凡尔赛和约》，英国是以美国的“保证”为前提的，于是，英、美的保证成了一纸空文。赫赫有名的“老虎”总理克雷蒙梭，在法国人的愤怒声中成了牺牲品。

至于战争赔偿问题，法国在美英的压力下，作了不少让步，但是德国以无力偿还为借口，不履行和约规定的义务。1923年1月，法国总理普恩加莱命令部队进驻鲁尔，以迫使德国支付赔款。德

国的赔偿并没有如约履行，1924年的道威斯计划和1929年的杨格计划，两次削减了赔款额，并于1932年正式取消了战争赔偿。

普恩加莱、克雷蒙梭，还有福煦所推行的强硬政策未能如愿以偿，而白里安是法国对德和解政策的代表人物。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白里安还推崇对德强硬政策，但很快就改变了主张，成了对德和解政策的代表人物。特别是在1925～1932年的7年间，他连续担任11届政府的外交部长，以争取持久和平为宗旨，提出了与德国和解、加强英、法关系；以国际联盟为制约工具，实现普遍裁军、宣布战争非法、建立欧洲合众国的主张。

1926年，德国正式要求加入国际联盟，白里安对德国的要求完全支持。他在国联大会上发表了长篇演说，高呼“我们不要步枪，不要机枪，不要大炮！我们要和解，要仲裁制，要和平！”[①] 同时，为缓解国内财政困难，获得更多的德国赔偿款项，白里安许诺结束对莱茵区的占领，归还萨尔，取消军事管制。这些重大的政治让步，由于国内的反对未能实施，但已充分反映了白里安对德政策的主导思想。

在20年代，自凡尔赛和约之后，由于害怕和厌恶战争，许多人盲目迷信国际条约、裁军、仲裁，将和平希望寄托在国际间尽可能大的合作安全体系上。当白里安感觉到通过法国和德国直接合作的办法有困难时，他就竭力鼓动发展国际间的集体合作。1927年，在白里安建议下，白里安同美国国务卿凯洛格共同发起，并于1928年8月签订了《巴黎公约》（即《非战公约》）。这个被白里安称为开始“人类历史新纪元”的公约规定：签字国放弃战争为本国政策手段，只能以和平方法解决国际争端。1929年9月，白里安在国联大会上又提出一个惊人的建议，主张建立欧洲联邦。他说：“我认为像欧洲这样在地理上聚居在一起的各个民族之间应该

---

① 迪罗塞尔：《外交史》（上），上海译文社，1982年，第92页。

保持一种联邦关系；这些国家的民族随时都要进行接触，讨论他们的利益，作出共同的决议，彼此之间建立一种休戚相关的关系，一旦发生紧急的情况，就能够共同对付。我要努力建立的就是这种关系。"[①] 可见，白里安的"欧洲联邦计划"，仍然是为了应付"紧急情况"的国际间的维护安全体系。

白里安从和平的愿望出发，相信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恶果，人类已经准备放弃战争，在一个相当广泛的国际合作范围内，可以实现法、德和解，可以实现欧洲和平。但历史证明，白里安的想法是过于天真了，他与当时国际关系的实际相距太远。结果，他建议的《非战公约》由于各国保留"自卫战争"的权力而毫无意义，欧洲联邦计划也因为各国利益冲突而流产。

在 20 年代，尽管法国的对外政策重点仍然是如何处理法、德关系问题，但是两种思想指导下的对德政策都没有占据主导地位。这种摇摆，导致了 30 年代面对希特勒的崛起束手无策，终于陷进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的灭顶之灾。

第五节　英国的均势外交

一　英国的均势外交传统

英国被认为是一个长期奉行力量均势政策的典型国家。尤其是在对欧关系上，英国置身于大陆之外，与法、德、俄等欧陆国家相比，别有特色。温斯顿·丘吉尔概括说："英国 400 年来的对外政策，就是反对大陆上出现最强大、最富于侵略性和最霸道的国家，特别是防止低地国家落入这个国家的手中。从历史上来看，在这 4 个世纪中，人和事、环境和情况已发生了许多变化，而这个国家却始终如一，这是一切种族、民族、国家或人民的历史记

---

① 皮埃尔·热尔贝：《欧洲统一的历史与现实》，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年，第 32 页。

载中最突出的事情之一。”他说：英国总是“参加不那么强大的一方，同它们联合起来，打败或挫败大陆上的军事霸主，不管它所统治的是哪一个国家。”他认为，“这是英国对外政策的不自觉的优秀传统”。[①] 英国外交部高级官员、曾任外交部常务副国务大臣的艾尔·克劳1907年在一项有关外交决策的备忘录中，有一段话说得更加明确而具体："历史表明，威胁这一或那一国家独立的危险，通常或至少部分地来自于军事上强大、经济上效率高、同时又有扩展其疆界或势力的野心、暂时处于优势地位的邻国，……制止由于这样一种地位而导致的政治优越性被滥用的唯一办法，始终在于由一个同样难以对付的对手或由几个国家联合组成的防御联盟与之相抗衡。通过这样一种力量组合建立起来的平衡被赋予一个专门术语‘力量均势’。英国的长期政策就在于，通过时而把砝码加在天平的这一端、时而又加在另一端来维持平衡，不过在任何时候它总是支持同最强大的国家或国家集团的政治专政相抗衡的那一方。这在历史上几乎已成为一种不言自明的真理。”[②]

力量均势作为一种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原则自古有之。人们一般认为，英国现代均势外交发端于15世纪末、16世纪初都铎王朝早年的对欧关系。据说，亨利八世曾让人给他画了一张肖像：他右手提着一架保持平衡状态的天平，天平的一边装着法国，另一边是奥地利；左手拿着一块砝码，随时准备添加在天平的某一边。亨利八世的国务大臣红衣主教沃尔西，以国王的名义实际统治英国达14年之久。他具有折冲樽俎的外交才能，在对外活动中常常出其不意地变换结盟关系，为英国对欧外交奉行的力量均势原则奠定了基础。亨利八世曾联合西班牙和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逼迫在百年战争中获胜的法国后退，阻止它向意大利和周边地区扩

① 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1卷《风云紧急》，伦敦，开赛尔图书出版公司，1967年，第186～187页。

② 詹姆士·乔尔（编）：《英国和欧洲——从皮特到丘吉尔，1793～1940》，亚当和查尔斯·布莱克出版公司，伦敦，1961年，第205～206页。

张；后来他又反过来同法国和土耳其结盟，竭力阻止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试图建立一个支配整个欧洲大陆的哈布斯堡大帝国的图谋。伊丽莎白一世（1558～1603）的英国则试图在法国和西班牙之间保持均势。英国不仅从海上对菲利普二世的西班牙帝国进行骚扰，而且还派兵到法国和荷兰援助那些同西班牙作战的部队。英国这样做并非出于热爱荷兰的起义者或法国的新教徒，而是正如伊丽莎白一世自己所解释的："法国末日到来之时，亦正是英国行将灭亡之日"，因而保持"均势"至关重要。[①]

17 世纪 50 年代英国在克伦威尔统治下重振海军和陆军，选择时机加入法、西之间的冲突，使天平向不利于西班牙的一边倾斜，迫使西班牙在 1659 年结束了同法国的战争，这对改变欧洲的均势格局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西班牙的相对衰落，法国势力的迅速上升，英国、荷兰同德意志国家一起组成了对法作战的"大同盟"；并通过战争彻底遏制了路易十四的扩张野心，从而恢复和确保了欧洲大陆的总体均势。此后又经过 1740～1748 年的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1756～1763 年的七年战争以及拿破仑战争，终于把法国从欧洲主要大国的地位上拉了下来。英国还密切关注波罗的海地区局势的发展，它的传统做法也是在波罗的海保持力量均势，不让任何一个国家取得压倒优势和取代它的最高"仲裁者"地位。

总而言之，英国通过多年的外交（包括战争）实践形成的均势外交传统，主要表现为通过维持和左右两个实力大致相当的集团相互制约抗衡，避免使欧洲陷于任何一个大国或国家集团的支配和控制之下。在局势相对稳定或尚不明朗的情况下，英国对欧洲事务尽量采取"超脱"的态度；但在均势遭到破坏或受到严重威胁时，它通常给予同谋求霸权的国家相抗衡的那一方以重要的经济、外交和军事支持，并根据英国自身利益随时调整或变换结

---

① 转引自〔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求实出版社，1988 年，第 73 页。

盟关系。而英国外交政策的出发点乃是英国自身的利益。帕麦斯顿勋爵在阐述英国外交政策的原则时说："我们没有永久的朋友，我们也没有永久的敌人。只有我们的利益是永恒不变的，这些利益才是我们应当遵循和追求的。"[1] 这些话已成为被人们广泛引用的、描述英国外交特色的名言。由于英国外交的这种多变和实用主义特色，有人便送给英国一个讽刺性的绰号："背信弃义的英国人"。

二 从帕麦斯顿到迪斯累利

在拿破仑垮台后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国际体系中，英国占有突出的、在某些方面乃至支配性的地位。有人把 19 世纪称为"英国统治下的和平"年代，这种夸张性的说法不能说没有一定道理。

英国主要得益于这一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的总趋势及其有利的地缘政治条件。19 世纪是欧洲迅速发展并最终完成产业革命的时代。英国在这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事实上，17 世纪英国的资产阶级已经壮大成为远远超过王室加贵族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力量。英国工商业、航海、殖民等几项关键事业的大发展使这个国家在 18 世纪"先走一步"，实现了从蒸汽机、纺织业、采矿业到钢铁、交通的全面发展，从而带动整个社会的工业化。到 1860 年前后，英国达到了它发展史上相对的极盛时期。

英国的力量和影响还表现在它对世界海洋的控制以及它已建立、并且还在不断扩大的殖民帝国上。早在拿破仑战争以前的一个多世纪中，英国皇家海军就已经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部队。因此，英国的海上力量在国际政治中发挥着广泛的影响，成为欧洲政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尤其是在拿破仑战争以后，英国更凭借自己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强大的海上力量，在"自由贸易"的旗号

---

① 转引自贾斯帕·里德利：《帕麦斯顿勋爵》，潘瑟图书公司，1972 年，第452～453 页。

下向亚、非、拉和太平洋大片“无主地区”扩张，建立了一个有形与“无形”的庞大殖民帝国。

从1815年维也纳条约签订到1865年帕麦斯顿去世前后，欧洲局势相对平稳；直到德国统一完成以前，欧洲大陆主要国家之间保持着大体的均势格局，这就使英国可以集中力量进行海外商业和殖民扩张。总之，英国所拥有的这些优势以及当时的国际环境，决定了它的基本对外政策方针：在维持欧洲均势的前提下，积极谋求向海外扩张和发展。

小威廉·皮特1783年出任英国首相时，正值英国在美国独立战争中失败、在欧洲大陆又陷于极端孤立。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他起初持中立、不介入的态度。在法国入侵低地国家、英国的利益受到直接威胁、欧洲的传统均势被打破的情况下，他率领英国投入了对法战争，并先后组织领导了三次反法联盟。皮特曾明确地制定了联盟作战的目标，并为战后欧洲的安排提出了详尽的原则。他的对外政策的基本方针就是联合俄、普、奥等大国，共同反对法国，以维持欧洲大陆的力量均势，从而使英国摆脱孤立状态。因此人们把小威廉·皮特看做是对19世纪初期英国外交具有决定性影响的人物，他“为下一个世纪的英国对外政策奠定了基础”。从1812年卡斯利雷出任外交大臣到1865年帕麦斯顿逝世，在这个被称为19世纪英国均势外交“典型年代”的时期内，所有在英国对外政策领域扮演过某种角色的重要人物，几乎都称自己是皮特的门徒或政策继承人。其中比较有影响而著名的有卡斯利雷、坎宁和帕麦斯顿。

1812年出任外交大臣的卡斯利雷，运用他的外交技巧设法将脆弱的反法联盟一直维系到取得反法战争的最后胜利，并成功地在维也纳会议上达成一项既能基本符合英国利益和要求，又能在相当一段时间内确保欧洲均势与稳定的解决办法。从这时起，英国的政治家们就把维护维也纳体系所体现的欧洲均势，作为英国对外政策的基本目标。他们为英国外交确立了实用主义或功利主

义的基本原则，务实利和求实效，把英国的利益作为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而不拘泥于抽象的意识形态的准绳。

当然，坎宁和帕麦斯顿主事的年代同卡斯利雷参与制定维也纳条约的时候相比，情况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各自的经历和性格也大不相同，因此，尽管他们在基本的政策目标和指导原则上存在着广泛的一致性和继承性，但是他们执行政策的方式方法及其侧重点却有所不同。

卡斯利雷的主要工作是处理拿破仑战争后的欧洲安排。这个问题到坎宁时期已经解决了。坎宁要解决的问题，第一是对付欧洲革命的威胁，第二是警惕俄国的扩张，这在当时是影响英国利益的根本问题。坎宁说："在处理对外事务中，我工作的最高宗旨就是英国的利益。"[①] 这句话其实并没有任何坎宁本人的特色，然而它不失为对英国外交的一种概括和表述。坎宁曾猛烈抨击阿丁顿内阁抗法不力而签订的《亚眠和约》，在他出任外交大臣后，又抛弃了近10年来卡斯利雷追随欧洲大国封建君主的外交路线，拒绝支持神圣同盟，这些思想变化都是出于对英国自身利益的通盘考虑。因为他认为，自维也纳会议以来，形势发生了极大变化，不再存在革命的直接威胁，而欧洲君主国企图联合霸占欧洲则成为更现实的危险，因为这样会使资产阶级英国陷于孤立地位。坎宁意在瓦解神圣同盟，来恢复英国在欧洲事务中的领导作用。"我要把那些迄今一直写着'欧洲'的地方，今后换写上'英国'。"无论向法国靠近，还是摆出支持殖民地解放运动的姿态，都是为上述目的服务的。坎宁在外交上的自由主义观点适应了英国工业资产阶级新的海外扩张要求，是一种具有前瞻性的现实主义考虑。

帕麦斯顿出任外交大臣不久英国进入维多利亚时代，维多利

① 彼德·莱恩：《1760～1914年的英国历史大事录》，约翰·默里出版公司，1988年，第103页。

亚女王（1837～1901）临朝主政的年代，是英国力量发展达到历史顶峰的时期，也是英国均势外交表现得最为完备的时期。作为维多利亚时代英国外交政策设计师的帕麦斯顿，凭借英国“世界工厂”和海洋霸主的地位，以自由主义为名来推行扩张政策，并在欧洲防止任何大国取得明显的优势地位。帕麦斯顿崇尚均势外交，善于利用各种事件和环境去促进英国的利益，维护英国的大国地位。帕麦斯顿依然奉行“没有永久的敌人和盟友，永久不变的只是英国的利益”的信条，而且他认为国家间的利益是无法调和的，只有通过实力的较量才能一决高低。为此英国必须充实自己的力量，建立一支可以伸展到世界任何角落的海军和陆军。英国人无论在何地，都要像在本土一样，受到英国军队的铁腕保护。

比利时独立问题的解决，就是帕麦斯顿运用均势外交获得成功的一个例子。1830年的比利时起义是对维也纳条约所作领土安排的第一次严重挑战。英国既担心东欧三个保守的君主国进行干涉，又害怕法国乘机扩张自己的势力，把比利时重新置于它的影响和控制之下。帕麦斯顿为此采取了这样一些办法和措施：同法国合作，拉路易·菲力浦一起支持比利时，以便阻止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可能的干涉，从而避免了一起欧洲大国之间的战争；同时又设法阻止路易·菲力浦的儿子接受比利时王位的邀请（亲英的萨克森—科堡公国的利奥波德王子后来成为比利时国王），还以战争威胁迫使法国军队撤出比利时；最后又以“欧洲协调”方式通过了1839年的“伦敦公约”，各大国一致同意保障比利时的独立和中立地位。这样，这次事件虽然导致了对1815年维也纳体系的修正，但欧洲的均势格局基本上保持了下来，而且一个对英友好的比利时显然对保障英国的安全和商业利益是大有好处的。

东方问题在19世纪，特别是19世纪下半叶乃成为欧洲外交的焦点问题。拿破仑战败后，俄国的一举一动便是英国外交最为关注的问题。俄国1833年通过帮助土耳其苏丹抗击埃及的穆罕默

德·阿里，诱使土耳其同它签订了“温基阿尔斯凯莱西条约”，使土耳其几乎变成它的保护国，“俄国大使成了苏丹的首席内阁大臣”（帕麦斯顿语）。这就使英俄矛盾大大激化。帕麦斯顿决心采取行动消除俄国通过这一条约所取得的优势。1839 年土耳其苏丹同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的冲突再度爆发，给帕麦斯顿实现他的计划提供了机会。面对埃及军队的节节胜利和土耳其苏丹的突然去世而在奥斯曼帝国内出现的危机局势，帕麦斯顿采取的第一个步骤是设法遏制穆罕默德·阿里。1840 年 7 月他促成英、俄、奥、普四国订立集体援助土耳其反对埃及的协定。法国由于支持埃及并企图染指叙利亚而被排除在外。帕麦斯顿指示英国驻巴黎大使向法国发出战争威胁，声称“如果法国发动战争，她必将失去其舰只、殖民地，并将损害其商业利益……穆罕默德·阿里将会被赶进尼罗河中去”。[①] 之后英国舰队同奥地利和土耳其海军一起在地中海向埃及舰队发起攻击。穆罕默德·阿里在得不到法国支持的情况下，于 1840 年 11 月被迫屈服。

克里米亚战争是英法同俄国之间围绕东方问题进行的一次重大较量。19 世纪 50 年代初法、俄两国之间就巴勒斯坦圣地的权利问题发生了争执，沙皇特使缅希科夫亲王的君士坦丁堡之行不仅激怒了土耳其人，而且引起了英、法两国对俄国意图的猜忌和警惕，促使他们联合起来共同对付俄国的扩张野心，从而引发了克里米亚战争。英国阿伯丁内阁在组织领导战争过程中表现的无能，引起英国公众的愤慨和批评。在这种情况下阿伯丁于 1855 年 2 月辞职，帕麦斯顿出任首相。克里米亚战争于 1856 年 2 月以俄国的失败而告终。尽管双方在这次战争中都打得相当艰苦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是对于英国来说，却基本实现了它的参战目标：俄国在巴尔干的扩张被制止；黑海实行中立化，俄国不得在黑海沿岸建设海陆军设施和基地，从而不能再对英国在地中海的海上力

---

① 诺曼·劳：《英国现代史纲要》，麦克米伦教育图书公司，1990 年，第 141 页。

量构成威胁；土耳其作为一个抵御俄国的缓冲国被保存下来。

“东方问题”反映在英国外交上，是遏制俄国的扩张势头，帕麦斯顿在克里米亚战争爆发前就明确指出，英国要不惜一切手段，迫使俄国放弃侵占奥斯曼帝国的企图。显然，如果听任俄国扼住通向地中海的海峡通道，则英国在巴尔干地区以及马耳他附近海域的利益就将受到威胁，俄国便会长驱直入，进而威胁中欧。帕麦斯顿外交无非是反映了英国的利益和需要。对此，帕麦斯顿在给阿伯丁的信中也讲得十分清楚：“我们支持土耳其是为了我们自己，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①

帕麦斯顿外交构想是建立在英国的实力基础上的。正是英国的炮舰和“世界工厂”地位，使他能够对付和威吓几乎任何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但是，19世纪60年代以后情况开始发生变化。普鲁士宰相俾斯麦在欧洲开始执欧洲均势之牛耳，他支持俄国镇压1863年波兰起义，又利用英、法之间的矛盾使帕麦斯顿在普、奥对丹战争中陷于孤立。因此帕麦斯顿虽然曾威胁说他不能听任丹麦单独受到攻击，但是当普、奥联合入侵施勒斯维希和霍尔斯坦时，他却默认丹麦任人宰割。因为英国在缺乏大陆盟国支持的情况下是不能单独用海军力量去打一场大陆战争的。这就表明欧洲均势已开始向不利于英国的方向转化。帕麦斯顿1865年的去世标志着英国外交史上一个重要时代的结束。

19世纪7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开始向垄断阶段过渡。这时英国政府的殖民政策与英国国内对帝国的态度开始发生重要变化。在此之前，在自由贸易理论盛行的年代，英国政府曾十分注重“非正式帝国”的建设。当时一些自由贸易论的鼓吹者认为，殖民地对于母国是一种昂贵而沉重的负担，主张尽快予以摆脱。当然，这种论调实际上对政府的政策影响不大。事实上

① 朱庭光主编：《外国历史名人传》，近代部分中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255页。

英国在19世纪前半叶不仅没有去“摆脱”其殖民地，而且在1815～1865年期间，英帝国仍以每年平均约10万平方英里的速度在扩展。[①] 不过当时英国政府的确非常重视扩充其“非正式影响”，因为只要英国凭借其强大的海军和“世界工厂”优势地位所建立起来的非正式影响，能足以保卫其贸易利益时，他们宁可满足于对一些国家或地区的非正式的控制。这样做不仅比较经济方便，而且还可以免去同竞争对手的直接冲突。

但是19世纪70年代以后，英国的世界工厂优势地位开始逐步丧失，世界范围内争夺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的斗争严重危及英国在亚、非、拉三大洲广大的“非正式影响”的地区。英国统治集团的政治观念发生明显的变化，主张采取积极扩张和兼并的殖民政策方针占了上风。曾在1852年宣称“殖民地是挂在我们颈项上的一个磨盘”的迪斯累利，这时不仅主张加强殖民地同宗主国之间的联系，还批评把殖民地看成是英国的一种负担的观点，认为不应放过振兴殖民帝国的机会。[②] 约·张伯伦认为，“当今的趋势就是要把所有的权力操之于更大的帝国手中”，主张把英国同各白人自治殖民地合并组成一个全球性的权力单位，搞起了“帝国联邦”运动。英国著名的殖民主义冒险家塞西尔·罗得斯更公开宣称：“帝国就是吃饱肚子的问题。要是你不希望发生内战，你就应当成为帝国主义者。”[③]

从这时起，英国的帝国政策就由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注重“非正式影响”，转变为对殖民地的疯狂追逐和大肆兼并。它把争夺殖民地的重点放在非洲，积极参与了对非洲大陆的争夺和瓜分。1869年苏伊士运河通航，英国很快就成为主要的受益者，和法国一起成为运河公司的主人。这样，埃及就成为对英国生死攸关的

---

① 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第190页。

② 温·丘吉尔：《英语国家史略》（下），新华出版社，1985年，第544～545页。

③ 转引自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799页。

地区，英、法两国开始了对埃及控制权的激烈争夺。

英国对埃及的占领和法国的被迫退出，导致了两国之间长期的摩擦和敌对。而英、法在尼罗河上游的争夺则把这一斗争推向了高潮。英国希望建立一个自开罗至开普敦，占有东北部非洲、中部非洲和南部非洲大片土地的、纵贯非洲大陆的英属非洲殖民帝国。而法国则要建立一个西起大西洋海岸的佛得角，经乍得湖，跨尼罗河，东至“非洲之角”索马里，横贯非洲大陆的法兰西殖民地。两国的扩张路线在尼罗河上游相交。结果英法于1899年达成协议，以尼罗河与刚果河上游的中间地带划界，两河以西属法国，以东属英国。英国在这场角逐中取得了胜利。

英国在热带非洲和南部非洲的扩张，得益于19世纪奴隶贸易被禁后，英国海军在非洲沿海追捕奴隶贩子的活动。英国通过这些活动奠定了它向非洲大陆内地进一步扩张的权力基础。英国为开发非洲建立了一系列特许公司在非洲各地积极进行开发扩张，巩固英国在该地的势力和影响，直到政府能够从它们手里收买这些地区实行直接管理为止。

总之，19世纪的最后二、三十年，是英帝国空前膨胀的年代。仅在该世纪的最后25年之内，英帝国的土地就增加了400多万平方英里，居民增加了约9000万人。到1914年时，英帝国的总人口达4亿之众，无论就其面积还是人口而言，都是世界上从未见过的大帝国。[①]

英国这个“日不落帝国”，在对列强的外交中企图以凌驾于别人之上的姿态为英国争夺主动权。显然，英国政府、它的历任外交大臣在筹划外交政策时，都是以自身利益为根本原则的。这是19世纪英国外交的出发点。

---

① M. E. 张伯伦：《英国统治下的和平?》，朗曼图书公司，1988年，第125～126页。

三　“光荣孤立”的结束

1865年帕麦斯顿的逝世，特别是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标志着英国外交史上一个重要转折时期的开始。从这时起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为止的三、四十年期间，英国一方面大力加强向海外扩张；另一方面在欧洲开始调整它在结盟问题上的政策，在尽力保持欧洲均势的同时，由传统的“超脱”、“不干涉”原则，逐渐向寻求较为固定正式的盟友方向转化。

英国19世纪对欧外交基本方针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在和平时期设法使自己避免卷入任何正式固定的结盟关系，以便在两个相互抗衡的国家集团之间保持最大程度的行动自由，从而使其能够执掌欧洲均势的牛耳，扮演一个“均势维持者”的角色。英国的这种政策是建立在它对自己力量优势的意识基础上的，似乎凭藉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强大的海军、广大的殖民地，无须固定的盟友就可以实现自己的政治战略目标。因此有人把这称之为“孤立”政策。还有人在“孤立”一词前面冠以“光荣”的形容词，把索尔兹伯里时期的外交政策，特别是他在第三届（1887～1892）和第四届（1895～1900）外交大臣任期内的外交政策，称为“光荣孤立”政策。当然，用“孤立”一词来界定英国的外交政策并不确切，事实上英国从来没有强大到无需任何盟友就可以自行其是的程度，英国政府也从未有意地拒绝过同外界发生任何关系。以索尔兹伯里勋爵为例，为了同法、俄抗衡，他就同意大利和奥地利签订了两个地中海协定；在列强瓜分非洲的过程中，他曾同德国、葡萄牙和法国通过谈判达成过解决边界争端的相应协议。这里的关键是只涉及外交合作，不订立约束自己未来行动的同盟条约，更不会承担军事义务。从这个意义上讲，有人把“孤立”政策解释为一种“有限责任”的政策，一种保持行动自由的政策，看来也不无道理。1896年索尔兹伯里提出，英国应该不参加固定的同盟与集团，保持行动自由，以便于操纵“欧洲均势”。这才是所谓“光荣孤立”的本意和实质所在。

进入 19 世纪 70 年代以后，欧洲大国之间的力量对比开始发生重要变化。一个统一的德国出现在欧洲中心地带，打破了大国之间旧有的力量平衡。俾斯麦精心编织联盟网络，力图使德国成为新的力量均势体系的中心和欧洲均势的维持者。但是英国统治集团对于大陆力量均衡的改组和重建，在一段时间内有意持消极态度。英国政府当时在格莱斯顿、迪斯累利和索尔兹伯里交替主持下，正忙于国内事务以及爱尔兰和整个大英帝国的问题，无暇他顾。而且由一个统一稳固的民族国家取代原来四分五裂的众多的德意志小邦，对于英国也不见得是坏事，因为那不仅将会增强欧洲的均势，而且它将有可能充当一个抑制其两翼的俄国和法国在欧洲以外地区进行扩张的重要角色，从而减缓英国在全球范围内面临的压力和挑战。

英国人的这种看法不能说没有一定的道理。当时俾斯麦主持下的德国外交以维持欧洲均势为中心目标，这同英国设法保持欧洲稳定的基本方针是一致的。而英国同俄国和法国的关系由于东方问题以及在殖民地争夺方面的利害冲突正危机四伏、十分紧张。

东方问题一向被认为是一个直接涉及欧洲大国关系及欧洲均势的重要问题。英、俄之间长期以来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和利益冲突。俄国乘普法战争中各大国无暇东顾时，于 1871 年宣布废除《巴黎条约》中有关黑海中立化的条款。在 1875～1878 年的东方大危机中俄国又进而发动对土战争，并迫使土耳其签订了《圣斯特芬诺条约》。在这次危机期间，英国舰队曾多次前往达达尼尔海峡进行武装示威，并一度驶入马尔马拉海同俄军对峙。在这种情况下，俄国被迫放弃《圣斯特芬诺条约》，英国则乘机从土耳其那里获得塞浦路斯作为“部队的集结地”。在迪斯累利的心目中，能在地中海获取一块战略要地，是渴慕已久的事情，是实现他的庞大殖民帝国的关键一环，也是他处理“东方问题”时所掌握的“原则尺度”。最后由俾斯麦充当“诚实的掮客”，于 1878 年

召开了有关东方问题的柏林大会，确认了事先达成的各项解决办法。当然这只是一种暂时的解决办法，大国在东方问题上的矛盾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的。

19 世纪七、八十年代，世界进入了列强大规模争夺殖民地的时代。海外殖民扩张的角逐成了英国与欧洲大国关系中愈益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由于在 19 世纪最后 25 年期间英国同法国在非洲和印度支那、同俄国在中亚和远东发生了尖锐的利益冲突，所以英国当时把法国和俄国当作自己的主要对手，视法国为心腹之患，而把谋求德国的友好支持和善意中立作为对欧政策的重点。在 19 世纪 90 年代期间，它甚至试图同德国缔结某种同盟关系。

埃及问题是影响英、法、德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俾斯麦利用英国在埃及和西非问题上需要寻求中欧国家支持为契机，不仅在英、法之间挑拨离间，还乘机提出了德国对非洲和太平洋一些殖民地的主权要求。英国不仅在殖民地问题上尽量满足德国的要求，而且还通过同德国的两个伙伴意大利和奥地利签订地中海协定，同德国和“三国同盟”间接挂上了钩。而这一协定，用索尔兹伯里的话说，“是尽我们的制度的议会性质所许可的那样接近于一个同盟”。[①] 1894 年法俄协议订立后，英国处于欧陆两大集团之外，在欧洲有可能形成一个针对它的大陆联盟。英国政府中以殖民大臣约瑟夫·张伯伦为代表的一些人，希望英国放弃传统的孤立政策，主张“条顿族与盎格鲁撒克逊族的两大分支之间”结成一个新的三方同盟。英国政府在 1898～1901 年期间曾试图同德国通过发展在殖民地问题上的合作，结成某种正式的同盟关系。但由于双方都要价太高而又不愿意为对方火中取栗，所以这一尝试遭到了失败。德国的根本利益在欧洲，它不愿意在远东为英国反对俄国提供军事支持，除非作为回报英国愿意参加三国同盟，像

① 马里欧特：《现代英国》（上册），商务印书馆，1973 年，第 157 页。

在亚洲一样在欧洲也承担起一个盟国的全部责任；而英国长期习惯于把中国市场看作是自己的囊中物，它十分关心阻止俄国在中国北部的进一步扩张，但又不愿意为换取德国在远东的支持而在欧洲冒被拖进一场对法战争的风险。因此，无论是张伯伦提出的关于同德国结盟的倡议及其所进行的秘密谈判，还是1900年接替索尔兹伯里出任外交大臣的兰斯多恩为订立英德防御同盟所作的试探，都不能不劳而无功，最后以失败而告终。

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英国为探索英德结盟关系所进行的尝试，只不过是英国面对当时空前孤立的国际环境所作出的一种反应。英国的海外殖民扩张在1815至1880年之间没有遇到过需要认真对待的对手和严重的威胁。但是自从世界进入大规模的殖民扩张时代以来，它就面临着来自多方面日益严重的挑战。索尔兹伯里曾巧妙地周旋于列强之间，设法通过外交手段解决它们在殖民地角逐中发生的争端，使英国得以继续在欧洲避免卷入正式的结盟关系。但是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的“孤立”已远非作为一种政策选择意义上的、有意识“置身于联盟体系之外”的孤立状态，而是一种孤家寡人、四面受敌的危险的孤立处境。这里不仅有来自英国的传统的对手法国和俄国在非洲、远东、中亚、印支和中国的激烈竞争，而且有美国在西半球、德国在非洲和中东，以及日本在中国对英国利益所提出的严重挑战。面对如此众多的敌手遍及世界各地的竞争和挑战，英国深感战线过长难以应付。英国不得不对其全球战略中的每一个问题作出仔细的评估，妥善地处理它同各大国之间的战略关系。在委内瑞拉争端、巴拿马运河和阿拉斯加边界等问题上，英国对美国作出让步，以摆脱它在西半球战略上的不稳固状态。1902年英、日两国就联合对付俄国在中国东北的扩张签订了同盟条约，减轻了它在中国的战略负担。英、法在经过法绍达危机剑拔弩张的较量之后，终于就殖民地问题的争端达成了妥协，并在共同努力避免因日俄战争而可能被卷入一场公开冲突的动机驱使下，于1904年4月缔结了两国协约。

英、法、俄三国协约的最后确立则是和它们同德国不断激化的矛盾分不开的。19 世纪 90 年代，英、德关系急剧恶化，增加了对英国外交的压力。面对德国咄咄逼人的攻势，英国决定联合法、俄，同已成为自己主要威胁和对手的德国相抗衡。因此继 1904 年的英法协约之后，英、俄两国又于 1907 年签订了关于波斯、阿富汗和西藏问题的协议，决定共同携手抵御德国"向东方推进"。

显然，越是临近 19 世纪末，英国的均势外交越面临复杂的挑战。过去，英国一般说来在一个时期内可以侧重一个强国，如拿破仑战争时期以法国为主要对手，后来在"东方问题"上则以俄国为主要对手，同其他国家的关系都以如何有利于对付这个主要对手为准绳。从 19 世纪下半叶开始，主要是由于德国的崛起，列强矛盾犬牙交错，英国外交的主次便不能不作调整。尤其是，英国的实力已不能占有绝对优势，"光荣孤立"的本钱越来越少。曾经臣属英国的美利坚合众国正在迅速赶上来，准备取代英国的位置。素来注重实际效果的英国适时地甩掉所谓"超脱"的外衣，准备再次投入继拿破仑战争以后的更大规模的欧洲战争。

第六节　美国走出美洲

从 19 世纪初到 20 世纪初的 100 年间，是美国门罗主义由初步形成到充分扩张的时期，美国基本完成了从一个地区性的新兴国家到世界级大国的演进过程，其间虽然经历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内战，但美国对外扩张的大方向没有改变。这一时期占主导地位的外交思想大体呈现出从美国到美洲、从美洲到世界的发展轨迹，作为美国外交决策的理论基石的门罗主义，随着美国政治、经济、军事综合实力的逐渐上升，也就由防止欧洲列强对美洲的干涉发展到参与欧洲列强对世界、特别是对亚洲地区的瓜分，从而历史地暴露出门罗主义最本质的内涵。

美国之所以不惜一切手段将边界向西不断推进，一个主要目

标就是向亚洲和太平洋拓展。威廉·西沃德就曾在描绘他的"海洋帝国"蓝图中，把太平洋及东亚作为其重心。他认为，真正的扩张大目标应该是"夺取整个文明的中心——亚洲"，而西半球的大陆扩张只不过是一个插曲，大西洋利益终归会"相对地降低其重要性，而太平洋及其岛屿和海外的广大土地"将成为"这个世界更伟大未来的主要舞台"。统治亚洲市场是美国人的"使命"。只有这样，美国才能成为"最伟大的国家，比迄今为止的任何国家都更加伟大"。[①]在西沃德的扩张思想中，商业利益占突出地位，他认为美国要想成为世界性商业帝国，就必须营造横贯大陆的铁路和电报网络，发展远洋航运，建立并操纵世界统一的金融体系，并在夏威夷、中途岛、阿留申群岛等地广建贸易中继站。西沃德的确发出了"门户开放"政策的先声。

当美国最终成为一个濒临太平洋的"两洋国家"时，它就具备了实现上述目标的地理条件；当美国工业产值快速上升、铁路网密布全国、1/3 人口成为城市居民，并拥有一支越来越强大的海军时，它也具备了与欧洲大国在亚太地区角逐的物质和军事实力。这时期美国外交从大陆扩张主义转向海洋扩张主义，提出关于太平洋商业帝国的"海洋边疆"理论，鼓吹美国成为欧亚贸易的中心点。

对亚洲来说，与欧洲列强相比，美国虽然姗姗来迟，但却咄咄逼人，后来居上。在对亚太地区的扩张中，美国把盎格鲁—撒克逊的种族优越感渗透到外交政策里面，与英国血统上的认同在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形成一种不成文的联盟，这也可以算是美国外交思想中极为重要的新特征。美国社会学家、斯宾塞的信徒威廉·格拉汉姆·萨缪尔把达尔文《物种起源》中的"物竞天择"观点用于社会、经济和政治，摈弃达尔文进化论中人类与自

① 厄内斯特·N. 保利诺：《美利坚帝国的基础：威廉·西沃德及美国对外政策》，纽约，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73 年，第 5～29 页。

然环境的斗争，只片面强调人与人、国家与国家的斗争，把自然选择引入国际关系，遂成为“社会达尔文主义”，其核心即“适者生存”，国家当也如此。这种思想成为19世纪末美国扩张主义者的信条，成为扩张理论的哲学基础。历史学家约翰·费斯克1885年发表《天定命运》一书，并在全国巡回演讲，宣传社会达尔文主义。同年公理会牧师约瑟·斯特洛专著《我们的国家：它的未来与目前的危机》面世，指出美国的进步与伟大正是自然选择的结果，这样强有力的种族将会征服拉丁美洲、亚洲及其它地区；在更高级的文明发展中，落后的种族将消失。当时特纳的“边疆学说”和布·亚当斯的“文明兴衰规律论”也流传甚广。1893年美国“钢铁大王”安德鲁·卡内基公开主张确立盎格鲁—撒克逊人的霸权，说如果盎格鲁—撒克逊人“统治全世界并且成为其它各民族间的仲裁者”的话，对人类只有好处。[①]

也正是在这一个时期，美国海军军官阿尔福德·T.马汉在其所著的《1660～1783年海上强国对历史的影响》一书中说：要想组织大规模商船在世界从事商业竞争，必须拥有强大的海军保护，建立海上霸权，建立起海外军事基地。在与欧洲列强的海外竞争中，美国断然不能落后，特别是在亚洲和太平洋，美国确有组建强大海军和商业的可能性。[②] 由此马汉创立起“海上实力决定论”。

至于美国政治家的扩张思想则更直截了当。参议员洛奇声明：“为了美国人民的幸福，首先就必须扩张。”[③]他竭力主张抛弃过去适合于美国早期的孤立主义，应果断行动。他在《我们搞错了的对外政策》中写道：“如果说民主党有过一项高于一切的基本原则，那就是推进美国的边界。”“中立政策是富于远见的政治家在建国之初为美国对外关系制定的伟大原则，但是以为我国的对外政策

① 〔苏〕谢沃斯季扬诺夫：《美国近代史纲》下册，第739页。
② 阿兰·威斯克特编：《艾·塞·马汉选集》，波士顿，1918年，第102～108页。
③ 周一良：《世界通史》，近代部分下册，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88页。

就停留在那里，或者让这些基本原则以任何方式束缚美国人民的前进，将是一个致命的错误。我们在 19 世纪留下了任何民族都无法比拟的征服、殖民、领土扩张的记录，从格兰特河到北冰洋只应该有一面国旗和一个国家……现代的运动整个说来是人口和土地向大国和大片领土集中，这是一场有助于文明和种族提高的运动，作为世界上的伟大国家，合众国决不能落伍。"[①] 美、西战争爆发后，洛奇特别强调占据菲律宾的重要性。他认为贸易必然追随着国旗，美国占领菲律宾，就会使整个东方的贸易大为增加，从而也使美国成为东方强国。

西奥多·罗斯福在出任美国海军部副部长时的言论，对当时制造紧张局势和推动美国扩军备战产生了重大影响。他到处讲美国如果没有一支令人畏惧的海军，战争就会随时降临；没有以武力为后盾的外交是全然无用的；外交家是军人的仆从而不是军人的主人。[②] 他在美、西战争中声言，反对任何在"取得波多黎各、古巴和菲律宾之前"的和平。罗斯福出任总统后公开宣称："我是一个扩张主义者，我简直不明白一个人怎么能够不成为扩张主义者。"[③] 支持这种观点的一个论据是，大陆领土已成定局，美国已经"长大"，必须取得海外的商埠和扩大对外贸易，必须承担起作为一个"强国"的新责任；另一个论据是美国的工农业非有更多的国外市场不可，否则繁荣的程度就会降低，而这种市场可以靠取得海外领地而获得。参议员贝弗里奇的见解也有一定的代表性，他说："美国工厂制造的东西多于美国人民能够使用的；美国的土地生产的东西多于他们能够消费的。命运为我们拟定了我们的方

---

① 理查德·霍弗斯塔特：《美国历史上的重要论点》，纽约，温塔格图书公司，1969 年，第 188～191 页。

② 约瑟夫·B. 比绍波：《西奥多·罗斯福和他的时代》，纽约，1920 年，第 74 页。

③ 霍华德·比尔：《西奥多·罗斯福和美国上升为世界强国》，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84 年，第 172 页。

针，世界的生意必须是我们的，而且一定是我们的。我们将在全世界设立贸易站，作为美国产品的集散地。我们的商船将遍布海洋。我们将建立一支和我国的伟大程度相符合的海军。我们的贸易站四周将发展起飘扬着我们国旗的大殖民地。”[①] 他认为，哪个国家支配了太平洋，也就支配了全世界；而由于取得菲律宾，美国便成为这样一个强国。

克利夫兰和麦金莱等也都经常谈论狭窄的“国内市场”和无法销售的“过剩产品”问题，号召美国人在地球上任何有居民之地“寻找市场”，积极进行“商业扩张”。麦金莱像他的前任一样，把目光盯在夏威夷和萨摩亚上。他认为扩大美国在那里的利益已成当务之急，因为那里有太平洋最好的港口，可以作为进一步扩张的跳板。麦金莱明确指出，美国对夏威夷的需要甚于加利福尼亚，只有兼并才更能体现“天定命运”。[②] 归根结底，麦金莱志在把美国推向世界舞台：“闭关自守已不再可能，或不符合要求了……排外主义的时期已经过去。”[③] 入主白宫后，麦金莱马上提交给西班牙一份照会：如果西班牙不改变在古巴的现行政策，美国将采取必要行动。麦金莱所确定的真正战略是：抓紧战备，不断对西班牙施加压力，加剧紧张气氛，一待准备就绪，就立即兵戎相见。他要利用古巴事件把西班牙最后赶出西半球。“在我们进行战争和直到战争结束以前，我们必须保持所有我们已经得到的；当战争结束之后，我们必须保持所有我们想要的”。这就是麦金莱的基本信条。

由于美国一直存在着“光荣孤立”的大陆主义传统，麦金莱亲自在全美巡回演讲，反复宣扬美国控制菲律宾的好处，解释菲律宾在东方属于一种重要的战略位置，美国一旦控制马尼拉湾及

---

① 鲍尔斯：《贝弗里奇和进步时代》，华盛顿，1968年，第69页。

② 马格里特·里奇：《麦金莱时代》，纽约，哈波兄弟出版公司，1959年，第213页。

③ 弗雷德尔：《美国历届总统传》，第124页。

整个菲律宾群岛，就有可能跟上欧洲国家和日本在东方的步伐。麦金莱坚持认为，美国既不能把菲律宾归还西班牙，也不能送给商业上的对手，更不能留给菲律宾人自己，美国除了全盘接管别无他途。美国在菲律宾的胜利可以说改变了美国历史，标志着一种帝国主义政策的开端。当时一位共和党外交官的一段言论为此作了极好的注脚："这是上帝赋予我们种族本能的伟大命运，给我们个人也带来福祉，但这远远还未达到目标，我们的目标是赎救整个世界，使全人类基督教化。"①

美、西战争把半个世纪以来美国在太平洋岛屿的扩张进程推进到一个重大阶段，使美国具有了成为一个世界大国的某些"资历"，将其影响延伸到亚洲一边，并通过实力得到其它大国对美国在亚洲地位的承认；同时这种影响又反作用到该地区，产生一系列连锁反应。麦金莱和约翰·海的"门户开放"的思想就是在这一时期应运而生，其主要内容是互不干涉各自在华的通商活动与投资事业，在船舶货物的税收方面一视同仁，以此防止列强排斥美国在华势力，并利用美国的工业优势进一步对华进行经济渗透。约翰·海多次声明，美国在华的商品绝不允许受到其他列强的威胁和挑战。"门户开放"思想同时也带有这个年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经济实力强大而军事实力相对较弱的特点，被称为"搭乘别人便车"的帝国主义。"门户开放"的作法使欧洲和日本争夺中国的斗争复杂化，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对一些国家瓜分中国的势力起了某种制衡作用。

"门户开放"和"利益均沾"的出台与推行，反映了美国在中国和亚洲的特殊地位，也是其海外扩张的逻辑结果。但美国在华利益的份量当时还不是最为重要，所以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期间，陆续与日本达成多种妥协和让步，并视之为一种"有价值的代价"。西奥多·罗斯福在给下任总统塔夫脱的一封长信中阐述

---

① 克兰德·G. 波韦尔斯：《复仇和进步的时代》，波士顿，1932年，第76页。

了他的远东谋略，可以作为门户开放思想的有代表性的注释："在华门户开放政策是很好的事情，我希望未来仍如此，它可以通过广泛的外交协定来维持。但根据满洲在俄日影响下的历史证明，当某个强国无视它时，它在事实上马上完全失效了，因此现在还暂时不必为它打一场战争。"①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临近，"门户开放"的概念也在变化，这部分原因出于塔夫脱个人广泛的外交经验，他曾两次周游世界，访问中国3次、日本4次、巴拿马7次。因此他根据国际上的实际情况，希望外交与商业更紧密地联系，希望资本进入外交领域，特别是大量增加对中国的投资，以弥补美国在该地区势力不足的缺陷，扩大利益机会，遏制日本扩张。当1909年6月中、英、法、德签订湖广铁路贷款协定后，尽管受到欧洲排挤，塔夫脱仍要求美国银行家参与贷款。同年7月致电中国满清政府，对美国资本在中国的投资机会减少"深感不安"，抗议传闻中的针对美国的贸易歧视，并说采用"这种颇不寻常的直接同殿下联系的作法，是因为我极度重视我们目前谈判的成功"②。塔夫脱认为用美元打开中国大门，"这是直接简捷地增加美国贸易的有效途径，美国政府要给予所有合法的获益的美国海外企业以完全适当的支持"③。塔夫脱推行的这种政策被称为"金元外交"，他于1912年12月国情咨文中也正式使用"金元外交"这一提法，称"这是以金元代替枪弹的政策……这是扩展美国商务的直率愿望"④。金元外交是美国以资本输出进行对外扩张的重要手段，是满足美国金融资本利益的与"大棒政策"相辅相成的一种外交策略。

美国一位历史学家曾概括指出："我们过去不懂得，我们在1814年至1914年的一个世纪里能超然于世界事务之外的那个模

---

① 亚历山大·狄康德：《美国外交政策史》第1卷，第338页。
② 埃尔默·普利施科：《首脑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第26页。
③ 阿尔弗莱德·W.格里斯沃德：《美国的远东政策》，纽约，1938年，第134页。
④ 海姆·白莱：《美国人民外交史》，纽约，1942年，第577页。

式已被打碎而无法修复。”[1] 西奥多·罗斯福 1910 年也用心良苦地说过：“当英国能成功地在世界维持列强的均势，那很好。然而，假如她因这种或那种原因，作不到这点，美国有责任插手，至少是暂时地恢复某种均势，不管我们的努力是对准哪一个国家或集团的。”[2] 政治学家赫伯特·柯罗莱此时在代表作《美国生活的希望》中更论述道：“美国应该和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国一样武装起来，维持列强的均势和世界和平，使所有国际冲突都能获得圆满的解决。20 世纪美国应负起维持均势的责任。”[3] 的确，美国从反对欧洲干涉美洲大陆到插手亚洲及世界事务，这实在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使美国外交更带有一种强权政治的专横味道，以外交压力和军事手段推行美国的行为准则，这些都给美国未来的外交政策和外交思想打下了烙印。

---

① 迪安·艾奇逊：《辽阔的外部疆土》，纽约，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3 年，第 29 页。

② 巴特利特：《美国控制下的和平兴衰史——二十世纪美国的外交政策》，伦敦，普尔·埃勒克出版公司，1974 年，第 25 页。

③ 同上书，第 27 页。

第四章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

——西方外交的彷徨与“希特勒现象”

第一节　小　引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以后，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这样表达了他的充满和平主义的理想：

> ……在那和平的最初日子里，欧洲人表现出空前的深信不疑的心情。因为现在地球上终于有了空间去建立那个早就盼望着的正义和博爱的王国，我们梦想着当时就建立共同的欧洲，不然，就要永远失去时机了。……我们心里想：这将是我们的世界，一个我们梦想过的世界，一个更美好、更人道的世界。[①]

这是当时一般欧洲人企盼和平的梦想；然而那梦想很快就成了泡影。因为20世纪的前半个世纪，人类社会一刻也不曾出现过茨威格所幻想的曙光。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就急促地开始准备第二次世界大战了。

---

① 〔奥〕斯蒂芬·茨威格：《昨日的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中文版，三联书店，1991年，第31页。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大约有20年左右。战争期间的政治全部表演都是在战场上，这期间的外交活动都是为了战争。所以这一章只讲和平时期，或曰非战时期的外交。这一时期值得注意的西方外交问题有两个：

第一是欧洲列强的外交陷于彷徨之中。凡尔赛和约所做的只是一战结束后的大体安排，提出对战败国的处置方案、重新调整欧洲东部边界和分割战败国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但并没有能解决新的“力量均势”问题，旧的平衡被打破了，新的平衡却建立不起来。原因之一是没有任何欧洲国家有足够力量维持欧洲的稳定。诚然在战后，英国和法国都仍然分别拥有世界上最强的海军优势和欧洲最庞大的陆军力量，但是实际上已被大大削弱了，英国失去了世界金融中心地位，英国和法国都成为美国的债务国。美国已经迎头赶上了，在海军配额会议上美国的配额已与英国相等；而且事实上美国的参战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赢得战争。日本在太平洋的兴起，也是世界政治新出现的情况。俄国国内发生了十月革命，被认为是对欧洲均势的冲击，苏俄与德国也使西方陷于惶惑之中。如何对待战败的德国，在一些政治家看来是关系到如何遏制苏维埃政权的重要问题；于是在西方出现了宽与严的争论。形势使西方政治家把关注的焦点放在抵制苏联、对付德国和拆散德俄结合这三个问题上。欧洲不再有19世纪“欧洲音乐会”那样的事情；在希特勒德国崛起，并同意大利以及东方的日本法西斯结成战争同盟以后，“力量均势”的理论便完全失去了现实依据，20年代末的经济大危机也把欧洲国家的很大精力吸引过去，西方国家几无任何“协调”可言：德国忙于对付所有敌对国家，尽量使苏联中立；苏联为了自己的安全而与德国签订了很快就被撕毁的条约；剩下的只有英国、法国和一些小国家在外交上几乎处于无能为力的被动境地，只能听任战争一步步逼近。

本章拿出一些篇幅讲希特勒德国，是因为它是德意志历史中的重要片断，它的“外交”只不过是与拿破仑、威廉二世一路，无

非是征服性战争的同义语。

第二是美国的全球外交思想第一次描出轮廓。具体体现就是所谓威尔逊主义。

威尔逊主义的产生，表明美国外交史翻开了新的一页。自门罗主义问世，经 19 世纪末的美、西战争和“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对华政策，到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说明美国已经从美洲、亚洲，来到了欧洲和世界。威尔逊主义（包括十四点计划、美国的对亚洲、拉美政策）虽然没有全部实现（例如它自己提议成立国联，但却未参加），但是威尔逊主义所包含的全球外交的思想已经很完整地提出来了。事实上，美国在一战以后虽然没有更多地卷入欧洲，但是它的身影已经留在欧洲。威尔逊主义，特别是他的十四点计划，并不是对具体安排的设想，而是美国着眼于世界全局、由美国牵头、与欧洲列强共同维持世界秩序的一个总框架。威尔逊的“集体安全”思想的产生，主要原因是美国实力刚好超过了英、法等国；而它之所以不能在当时落实，也是由于美国还不到可以问鼎世界霸主地位的时机。

尔后的国际问题研究者对威尔逊主义誉毁者皆有。誉之者目之为康德以来的“理想主义”和“国际主义”的代表；而持批评意见的则认为威尔逊的主张过于理想化，没有现实可行性。

重要的是威尔逊主义先于现实提出了美国外交的走向；它的影响不在当时，甚至不在二三十年之内，而在于长远。美国史学家瓦尔特·拉菲伯（Waeter Lafeber）说：“许多后来的（美国）总统，包括林登·约翰逊、里查德·尼克松和吉米·卡特，都回过头来把威尔逊当作对民族未来具有最宽广视野和最早面对至今仍困扰着他们的挑战的首席实行家。”①

这一时期的外交舞台确实是很繁忙的，特别是英国和法国，它

① 〔美〕瓦尔特·拉菲伯：《美国时代》，W. W. 诺尔顿出版公司，1989 年纽约，第 253 页。

们随时都要忙于应付局势的变化，几乎失去了外交上的主动权，根本没有时间、特别是没有力量去主动地引导和创造局面。

第二节 威尔逊主义

历史进展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美国已大体完成了从美国到美洲、从美洲到亚洲的跳跃，终于从“大国体系”的边缘“艰难地挤进国际政治舞台”，进入争霸世界的行列。自此，美国的外交思想带有鲜明的帝国主义特征，把向全球扩展作为“在历史总法则中领导现代世界政治文明的天职”，[①] 形成以经济实力和制海权为殖民扩张的根本依据的所谓“大政策”，为全方位参与世界事务作了必要的军事、政治、经济和思想准备。尽管这时期美国国内的孤立主义情绪还很浓重，以致使威尔逊一手倡导的“国际联盟”计划受阻，但美国在争夺世界事务的支配权方面仍然保持不断上升的势头，即使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美国在国际上还不能坐大，但讲起话来的份量已经很重了。可以说就是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美国再次扩大了门罗主义的范围。

一 十四点计划

伍德罗·威尔逊 1913 年出任美国总统时，欧洲局势日趋紧张，第二年世界大战就爆发了。威尔逊于 1914 年 8 月 4 日宣布美国中立，告诫美国公民在行动上及思想上都严守中立，同时表示愿为交战双方进行调停，希望通过谈判实现和平，建议由美国召开一次和平会议，作为达成有利于协约国的和解的手段。正是通过这种中立地位，美国同时与交战双方大作生意，迅速地由债务国变为债权国。威尔逊当时就讲道：“没有人比我更关心把美国商

---

① 萨·摩理逊：《美利坚合众国的成长》第 2 卷，牛津大学出版社，1955 年，第 323 页。

人的企业带到地球上的每一个地区”，“和平而体面地征服国外市场，是美国合理的雄心壮志”。[①] 由于美国商船不断遭到德国军舰的袭击，威尔逊意识到没有武力做后盾的外交是行不通的，他说：“世界上其他地方都起火了，我们的房屋也并不是防火的。”[②] 他认为美国对战争也应有所戒备，力主通过国防法案，采取增强军事实力的政策。

威尔逊以对外坚持和平的竞选纲领蝉联总统。1916 年大选中他提出的口号就是“他使我们置身战争之外”，并于 1917 年 1 月在参议院发表演说，阐述关于世界和平的主张，要求实现“没有胜利的和平”，结束欧洲战事的胶着状态。威尔逊曾在内阁会议上表示，“我不希望看到任何一方获胜。……尽管德国在残暴地草菅人命，而英国也在攫取财富。”[③] 只是由于德国决定打一场无限制的潜艇战，威尔逊才终于下结论说，德国污辱了美国的中立权，只有摧毁德国的独裁，才能赢得和平与民主，而德国的胜利将会违背美国的利益，只有美国参战才能避免这种情况出现，况且美国对海上交通的依赖使它更直接关注协约国的战局。威尔逊当时对形势的看法是，美国卷入大战的要价就是美国坚持要有一个重新设计的欧洲，以及一个能保持和平的世界安全体系。

实际上美国在 1917 年 4 月宣战前，威尔逊对解决“一战”的基本计划和原则已有初步的设想。他在 1917 年 1 月对参议院的讲话中已涉及到以后推出的“十四点计划”的主题。在回顾美国对外政策的主要原则诸如中立权利、门罗主义、避免卷入同盟以及和平时期限制常备陆海军等以后，威尔逊建议“美国人民和政府将同世界上其他文明国家一道保障持久和平”，认为美国对这项计

---

① 阿瑟·林克：《伍德罗·威尔逊文件集》，新泽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2 年，第 38 卷，第 269 页。

② 弗兰克·弗雷德尔：《美国历届总统传》，第 148 页。

③ 查尔斯·比尔德：《美国文明的兴起》，纽约，麦克米兰公司，1954 年，第 2 卷，第 628 页。

划承担的义务是美国政策趋向的一部分："我以更大的勇气和信心说话，因为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都很清楚，这一承诺既没有违背我们国家的传统，也不违背它的政策，而只是在履行我们所声明过或为之奋斗过的一切。"① 随后他在《战时咨文》中明确讲道："当涉及世界和平以及世界各民族的自由时，中立已不再是可行的，或者不再合乎需要；对这种和平和自由的威胁是由于专制政府的存在，这些专制政府受到有组织的力量的支持，而这些有组织的力量又完全为专制政府的意志而不是人民的意志所控制。在这种情势下，我们再也不需要中立了。"②

威尔逊在准备放弃中立的同时，已形成全面插手世界事务的思想，1917年7月他对豪斯说，战后其他国家"单在财政上就要依靠我们"，"我们应当以资本供给全世界，而谁以资本供给全世界，谁就应当管理世界"③。可以说，"十四点计划"就是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形成的。1918年1月威尔逊在国会阐述美国参战目的的时候，提出"十四点"原则作为实现战后世界和平的基础，并为处理战败国提供一个起点。威尔逊首先建议，新的国际秩序的基础应该是"不搞秘密外交"，公开缔结和平条约，然后依次提出维护公海航行自由，降低关税壁垒，建立平等的贸易条件，将军备裁减至维护国内安全所需的最低限度，划分殖民地，调整欧洲国家边界和干预俄国内政等。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建立以"维护和平为目的"的"一个普遍性的各国的联合组织"，不分国家大小，用所有成员国的一致力量来集体保障每个成员国的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这一思想后来作为整个"十四点计划"的主要特色写入《国际联盟盟约》第10条。威尔逊认为，建立在集体安全上的一种联合组织还要对和平改变边界负责，实现一种以自决

① 儒尔·巴特利特：《美国外交录》，第454页。

② 同上书，第457页。

③ 库尼娜：《1917～1920年间美国争夺霸权的计划》，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第217页。

原则为主导的国际“新自由”，应在适当考虑有关各民族利益的情况下调整对殖民地的要求。

威尔逊刻意强调在国际联盟中不允许有特殊集团或条约的存在，不得运用任何方式的经济抵制或排斥，但为了纪律和控制起见，国际联盟本身得行使经济上的惩罚，使受惩罚者不得参与世界市场。威尔逊还提出，在未改变其纲领的实质的情况下，应使最后的解决办法服从民众的愿望，“不得把对民众和行省的主权进行以货易货的贸易，好像民众和行省是一局赌赛中的物品或抵押品一样”。[①] 这些意见和“十四点计划”共同构成一个广泛的和平纲领，并且形成了一个后来被称作“停战前的协定”的文件。威尔逊的“十四点计划”以“理想主义”为标榜，后来的国际关系史学界也每每以此作为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理想主义”的始作俑者。

“十四点计划”是美国登上国际政治舞台后第一次为世界和平设计的蓝图，威尔逊通过民族自治、全面裁军和公开外交等乌托邦性质的论述使其政治原则道德化，并身体力行参加《凡尔赛条约》的缔结，为推行“十四点计划”不遗余力。为达到其目的，他曾多次接受某些违反其理想的条款，他认为这些条款以后能够并且将会得到修正，因为国际联盟的组成是进行这些修改的最大保证。他认为国际联盟是世界的希望，所以在整个巴黎和会的过程中，总是反复强调国际联盟的重要性，要求把设立国联视为此次和会及缔结和约的整个程序的关键部分。威尔逊声称：“国联确实是和平的保证，它确实是保证反对侵略的誓约。”[②] 他主张国际联盟盟约与和约应当构成一个整体，且对全体成员国具有约束力。威尔逊的实际谋划却是，如果美国参加国联，“我们将是金融领袖。我们将是工业霸主。我们将掌握商业上的优势地位。世界各国正

---

① C. E. 布莱克：《二十世纪欧洲史》上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06页。

② R. M. 尼克松：《1999：不战而胜》，长征出版社，1988年，第9页。

期待我们去领导去指挥。”[1]

当威尔逊把亲自起草的国联宪章带回国内时，遭到以参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亨利·卡伯特·洛奇为首的反威尔逊集团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如果美国成为国际联盟的一员，将有损于国家主权和国会权力，巴黎和会的主要任务只是决定媾和，建立国联问题应待来日再议。在1919～1920年关于批准《凡尔赛条约》和加入国际联盟的大辩论中，洛奇主张必须附加保留条款，根据保留条款，美国不一定要去保卫国联成员，美国应有权退出国联，国联不能干涉一国内政，门罗主义必须保持不变。威尔逊拒绝接受此类保留条款，他坚持和约与盟约的不可分割性和作为完整机体的共效功能，指出要么接受包含国联盟约在内的条约，要么什么条约也得不到。他在另一次演讲中说，美国的孤立已经结束了，“不是因为我们要选择进入世界政治，而是因为我国人民的才能，我国实力的成长，我们已经成为人类历史的决定因素了。而且在你已经成为决定因素的时候，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就不能保持孤立了。”威尔逊还认为批准《凡尔赛条约》和加入国际联盟是“十四点计划”得以落实的核心，事关集体安全与世界和平，其重要性不亚于1787～1789年对联邦宪法的批准。[2]

洛奇等对国联盟约的抨击最后集中到第10项条款，第10条规定：“国联会员国承担尊重和保持所有国联会员国之领土完整与现存的政治独立，以防御外来侵略。如遇此种侵略或有此种侵略之任何威胁或危险时，行政院应建议履行此项义务之方法。”[3] 洛奇声称美国对于其他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不负保持之义务，不依照第10条规定，也不依照盟约的任何条款来使用美国陆海军干预各国争端。洛奇并不是笼统地反对一切国际组织，他

---

① 托马斯·贝莱：《威尔逊和大出卖》，纽约，麦克米兰公司，1963年，第66页。

② 林克：《外交家威尔逊》，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出版社，1956年，第145页。

③ 华尔脱斯：《国际联盟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64页。

主要担心的是该约限制美国的行动自由，他主张应建立一个将所有欧洲国家置于美国领导之下的国际性组织，至于名称则无关宏旨。

威尔逊坚持认为第 10 条是“整个盟约的脊骨”，说“如无第 10 条，则国联将不啻一个声势显赫的辩论会而已”。他特别强调第 10 条是“盟约的心脏”，“世界新秩序的基础”，他认为否定第 10 条的保留案“将改变盟约的全部意义，并使美国避免承担维持和平的一切责任。这项保留意味着美国将从建筑物的下面挖掉它的基础和支柱”。[①] 他把第 10 条看作国际联盟盟约整个体系的逻辑核心和唯一的实质内容，认为该项条款如果受到损害，美国军事实力就会消逝，结果会导致战火重燃。威尔逊预言道，假若美国不能通过它的领导和参与来建立一个“足以实施和平的联盟”，“那么美国就必须制定一项庞大的军备计划以保卫国家利益，否则世界将面临另一场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更加可怕的战争”。[②] 他要美国预先许诺帮助防御所有会员国免受攻击，以确立一种必要的集体安全体系。

实际上威尔逊在“十四点计划”中列出的有关“国际联盟”的条款，并未与门罗主义发生牴牾，而是一种特殊意义的扩大。关于这一点，他在孤立主义情绪最强烈的内布拉斯加等地区作旅行演说时讲的非常清楚，他说国际联盟试图将门罗主义的原则适用于全世界，“为世界其余地区做门罗主义在西半球所做的事情”，这是“门罗主义应用于全世界的逻辑的延伸”。[③] 威尔逊认为他在巴黎和会上只不过将这种思想形成有关条文，并纳入盟约，而且在盟约定稿中特别作出有关门罗主义的专门条款：“国际协议和仲裁条约或区域协商类似门罗主义者，皆属维持和平，不得视为与本

---

① 林克：《外交家威尔逊》，第 140 页。

② 儒尔·巴特利特：《美国外交录》，第 480 页。

③ 查尔斯·西摩：《豪斯上校秘密文件》第 4 卷，波士顿，1928 年，第 427 页。

盟约内任何规定有所抵触。"[1] 威尔逊还曾对富兰克林·罗斯福说，美国必须利用国联，以此才能"楔入世界的中心，或者开创世界中心"。[2] 威尔逊的法律顾问密勒当时也认为："从美国的观点来看，最重要的修正条款无疑是接受了门罗主义。不管怎样吹毛求疵，世界所有列强正式宣布承认门罗主义的存在及其有益，这就应该算是门罗主义地位的一大提高。"[3]

在"十四点计划"中虽然也谈到殖民地的"民族自决"问题，但威尔逊并没有断绝美国向海外扩张和重新瓜分殖民地的道路，因为他把落后国家"少数民族的权利"作为某种"干扰因素"，需要大国名正言顺地出面加以平定。1919 年 5 月他将这种观点婉转地表达出来："我们正在试图作出一种和平的解决办法，也就是说，尽可能消除那些有可能妨碍世界和平的干扰因素，而且我们正在试图根据种族对领土进行公平的分配，即根据居住在这些领土上的居民的人种的特点进行公平分配……对那些我们认为不是正确解决领土问题的办法，我们不能作出保证，同时，对那些我们认为将会扰乱世界和平的干扰因素，我们不得不同意加以消除。拿少数民族的权利来说，没有任何东西比在某些情况下给予少数民族待遇更会扰乱世界和平了。因此，如果列强要在任何意义上保证世界和平的话，那么由它们提供某种适当和必要的保证就不是不公正的。"[4] 于是威尔逊通过国际联盟确立一种"委任统治制度"，企图以委任统治为名由国联瓜分殖民地的办法，取得对叙利亚、伊拉克及土耳其等一些领地的统治。

威尔逊的"十四点计划"是理想主义和扩张主义的混合物，是"康边停战协定"所接受下来的缔造"和平"的基石，也是针对俄国十月革命和战争接近尾声时的国际形势提出的帝国主义纲领。

---

① 华尔脱斯：《国际联盟史》，第 64 页。
② 《欧美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年，第 102 页。
③ 豪斯和西摩合编：《巴黎和会实录》，纽约，1921 年，第 415～416 页。
④ C. E. 布莱克：《二十世纪欧洲史》，第 211 页。

威尔逊的“十四点计划”也成为美国外交史上要求干预全球事务的首次表态。如果说美国当时存在着“孤立派”和“国际派”之分的话，威尔逊就是“国际派”的代言人，他不但在战争期间以“为世界拯救民主”的名义促使美国参战，而且在战后不久又作了“美国孤立状态已经结束”的声明，其根本意图就是通过全球性的门户开放来树立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确保美国的经济扩张和金融优势，最终夺取世界霸权。

二　门罗主义的再次扩大

威尔逊任总统期间，美国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第一次世界大战开拓了美国关于国家利益的概念，由此需要一个更为全面的世界体系，其作用也比单方面宣布的门罗主义这面盾牌更为广泛。威尔逊看到了美国将同战后世界秩序发生重大利害关系，自认为作为行政首脑有权力和责任率领美国向全世界扩展势力：“总统再也不能像在我国如此之长的历史中那样仅仅是个国内人物了。我国在力量和资源上已上升到头等地位，从今以后，我们的总统必须永远是世界列强领袖之一，不管他行事伟大或明智与否。……我们也不能把美国总统只看成是国家的首席顾问，只在很短时期内当选任职；我们要把他看作是每时每刻都在担任陆海军总司令的人物，他可以命令我们到世界任何地方去，只要那里的战争危险也威胁到美国人民。”[①] 为此他补充道：总统的职务“就是去做他的才智和力量限度之内的一切事情。只要他凭才能可以做到的事，都可以不受限制地去做。”[②] 基于此种信念，威尔逊竭力推销他的理想主义外交，这种外交的基本目标是建立一个所谓“法治世界”，其中应以被统治者同意为基础，并取得人类有组织的舆论的支持，形成一个

---

① 布鲁斯特·C.丹尼：《从整体考察美国对外政策》，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 年，第 89 页。

② 埃尔默·普利施科：《首脑外交》，第 9 页。

将自治和民主化应用到各个国家和整个国际社会的综合体。

威尔逊的“理想主义”外交是一把双刃剑，向外扩张的一面更加锋利。大战爆发初始，威尔逊就警告德国，没有美国同意，美洲以外的国家均不准控制美洲的任何独立国家。随后他用罗斯福的大棒政策又代替了塔夫脱的金元外交，乘英、德等国忙于欧洲战事，进一步巩固它在美洲大陆和太平洋岛屿所确立的统治地位。

“理想主义”在威尔逊政府对远东问题的态度上也有重要影响。根据威尔逊的见解，用道义力量控制国际关系，用理性压倒公众舆论中的无知和狂热，才会向一个有秩序的正义的国际社会迈进。而美国在世界性事务中正是扮演着这种“传播文明”的角色，美国政府旨在促进人权，提高道德水平，培植正义的统治地位。[①] 就是这些虚幻的原则被威尔逊作为插手远东事务的原因与手段，他曾对在亚洲实行“传教士外交”寄予厚望，这种外交的目的是政治和经济的，并未表现出纯“道德”和“经济”方面的分野，而是彼此互相牵连。实际上，威尔逊关于美国同世界其他国家关系的思想总是同保持美国经济高速运转的概念紧密相关，因为他把商人和基督教传教士都视为传播美国方式的使徒。当时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也力图把美国对经济的需求同一种十字军的传教精神结合在一起，他的想法与威尔逊极其类似。[②] 而国务卿兰辛则直截了当地表明，建立和保护美国在远东的经济利益是美国远东政策的基本目标，他所重视的是一个日益扩张的美国社会在物质上的需求，而不是什么在海外的“义务”。兰辛的基本观点是，从历史上来讲，美国在远东的利益一向都是经济上的，而且今后

---

① 阿瑟·林克：《威尔逊——新自由》，新泽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56年，第278页。

② 诺埃尔·普加茨：《保罗·芮恩施的思想和经历》，威斯康星大学，1967年，第63页。

仍应保持下去。[①]

威尔逊的一个根本思想是防止远东现状发生剧变。他的远东政策大多与中国有关，总体上把中国当作国际舞台上的客体而非主角，贬低中国而把日本抬高到亚洲大国的地位。他意在摧毁美国企业在中国遇到的障碍，为此决定放弃塔夫脱在对华事务上的“国际合作政策”，拒绝对垄断中国投资市场的“六国银行团”组织的支持，对此威尔逊曾这样评价道：“假如我们同其他列强一起来参加贷款，除了在中国增加若干影响外，我们会一无所得，而且会失去我们足以夸耀的地位……这就是国务卿约翰·海所坚持的中国门户开放政策。”[②] 本来威尔逊政府采取了若干措施以加强同日本在中国的竞争，然而战争使这一局面更加复杂化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日为争夺远东的控制权发生激烈争斗，但美国为了避免两面作战，对日本不时采取纵容政策。当 1915 年初日本对袁世凯政府提出“二十一条”时，威尔逊指令芮恩施：“我觉得，直接对中国进行任何劝告，或者代表它直接干涉目前的谈判，实际上都将对它害多利少，因为这样做很可能引起日本的嫉妒和敌意。”[③] 威尔逊避免直接介入中日争端，还有以牺牲中国利益来缓和美日矛盾的意图。国务卿布莱恩 1915 年 2 月致威尔逊总统的备忘录认为，中国割让满洲以使其余领土获得自由的主张是有价值的，美国应“坦率承认领土相邻构成日本与这些地区的特殊关系”。[④]

到 20 世纪 20 年代，美利坚合众国的历史不过 100 多年，即使延续到威尔逊政府以后的年代，美国外交仍然以地域的不断扩张为基干，美国本身就是英国商业资本扩张的产物，所以扩张意

---

① 伯顿·比尔斯：《罗伯特·兰辛结束美日对抗的尝试》，北卡罗来纳，杜克大学出版社，1962 年，第 17～18 页。

② R. W. 柯里：《伍德罗·威尔逊和远东政策》，纽约，1968 年，第 24 页。

③ 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商务印书馆，1982 年，第 109 页。

④ 柯里：《伍德罗·威尔逊和远东政策》，第 116～118 页。

识就成为支配美国外交决策的一份思想遗产。自美西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麦金莱的战争咨文和威尔逊的“十四点计划”实际上都沿着一条由大陆向海外扩张的轨迹，其间不管是泛美主义、大棒政策，还是门户开放、金元外交，究其产生的背景和因由，无不是为适应海外扩张的需要而提出来的，只要达到扩张的目的，门罗主义或中立宣言都可以作机动性和随意性的解释。威尔逊标榜其外交是“理想主义”，但根底还是实用性质的，只是掺杂了更多一些的学者气质和理念成份。威尔逊的计划在国会遭到否决并不说明美国扩张政策的中断，只是威尔逊将美国全球称霸的目标不合时宜地超前提到议事日程，当时美国虽然物质上已经走在西方社会的前面，但军事准备和思想准备还未完全成熟。

总体来看，由于威尔逊在一战期间所设想的由美国领导的“国际合作”计划分别在巴黎和会和美国参议院受挫，这样分别对哈定、柯立芝、胡佛的外交都产生了一种“照顾孤立主义者情绪”的向内收缩的效应，致使美国在整个20年代基本上奉行着避免直接卷入国际政治对抗和更多地采用以经济渗透为主的对外政策。但是，从历史进程上看，所谓威尔逊主义确实是美国在行动上介入世界事务的重要标志，所谓“孤立主义”的回潮只是一条河流里的漩涡。

第三节　希特勒“第三帝国”的兴亡

一　从《我的奋斗》看希特勒

20世纪30年代初，德意志第三帝国在欧洲崛起。纳粹党党魁阿道夫·希特勒穷兵黩武，以争夺“生存空间”的名义四处征战，在欧洲大陆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征服和殖民体系，其侵略性、扩张性及残酷程度超过了威廉二世。希特勒执政的12年是德意志历史上极其黑暗、逆文明发展史而动的12年。

希特勒及其政党的行动纲领集中体现在他写的《我的奋斗》。

《我的奋斗》及其续篇是根据希特勒口述记录整理而成的，前书侧重政治纲领，后书侧重于外交思想，它们集反动思想之大成，包含泛日耳曼主义、国家主义、军国主义等庞杂内容，堪称“纳粹党的圣经”。

（一）鼓吹反动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

希特勒认为历史是民族与种族生存斗争的过程，民族与种族生来就有高低优劣之分，人类分为三类：文化的建设者，文化的维持者和文化的破坏者，只有“雅利安人种唯一可以代表第一个范畴”，[①] 它高贵文明，人类一切创造的根基和围墙均源于它。而文化低劣的民族不配生活在文明社会里，他们是文化的破坏者，终究只能为高等民族征服奴役。种族混杂、其他民族的血统渗入到日耳曼民族血统中，造成种族堕落、文明湮没和德意志帝国的崩溃。因此，雅利安种族不能与其他种族混合，必须保持它纯洁的血统。德意志人负有在中欧建立一个坚强的日耳曼种族核心的使命，应把欧洲所有德意志民族联合在一个大德意志国家内，建立一个“德意志民族的日耳曼国家”，以此来征服或消灭劣等民族和种族。

种族主义理论最突出的是希特勒的反犹太主义。他声称犹太人是一切邪恶事物的根源，攻击犹太人是寄生虫，没有固定文化，是其他民族文化的破坏者，“他之在世上繁殖他自己，是一切寄生物之本来的现象；他时常在为他的种族寻找新的食地”。[②] 强调犹太人的最终目标是确立其种族大杂烩的支配地位，降低最优等民族的种族水平，“奴役富有创造性的民族”。[③]希特勒把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矛盾的尖锐化，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都视为是犹太人宣传鼓动的结果，说犹太人企图灭亡德国，有征服世界

① 希特勒：《我的奋斗》，中译本，上海黎明书局，1935年，第159页。

② 同上书，第165页。

③ 希特勒：《第二本书》，纽约格罗夫出版公司，1983年，第212页。

的野心。因此，为保持日耳曼种族的繁殖，必须灭犹。他叫嚣马克思主义就是犹太人主义，它已成为布尔什维克革命的精神之父，犹太人现在正残酷地运用这个恐怖武器在所有欧洲国家里争夺政治权力。"要确信要使日耳曼民族的前途发展，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彻底铲除不可"，只有民族社会主义运动单独承担着与这种"邪恶"势力作斗争的任务。[①]

（二）希特勒的极端民族主义、泛日耳曼种族主义，是"第三帝国"把欧洲和世界拖进一场人间浩劫的根源

之所以造成这样空前的灾难，是因为它不是一个人和一些人的思想和情绪，而是和一个极权的、军国扩张主义政权结合起来的。纳粹党执政后所加紧实行的，足资证明这一点。因此，《我的奋斗》里特别要提倡"领袖原则"及其独裁专制。他认为资产阶级国会否认个人权威、服从多数人意见的原则，是反抗天性中的贵族政治原则的。议会制中的领袖作用仅只是维持秩序、实现别人的意见；而一般政党为捞取选票、获得议席可丧失原则和信仰，任意修改其纲领，这样的政党政治是不负责任的，不可取的。他提倡"领袖专制"，声称"多数时常是愚蠢而懦弱的政策的辩护人"，它永远不能代替一个"人"，只有独裁专制的权威领袖，才能"对所有一切的直接行动，负有完全 的责任"。[②] 强者独裁方能使国富民强。

（三）这样的政权必然极富侵略性和扩张性，希特勒的借口便是著名的争取"生存空间"论

希特勒在书中声称，德国的空间狭窄，而每年剧增 90 万人口，只靠本国土地难以生存，必须开拓领土，采取殖民贸易政策，而在欧洲采取领土扩张政策比采取殖民贸易政策更优越。德国不能再像霍亨索伦王朝那样"把希望寄托于海外殖民领地的争夺上，而

---

① 希特勒：《第二本书》，第 216 页。

② 希特勒：《我的奋斗》，第 45～46 页。

应把我们的目光转向东方”，在欧洲本土获取新的领土，为此要“首次想到俄国和与它接壤的国家”。[①] 一个国家的领土不应永久占有，而应根据强力去决定占有的权利，德国领土不靠上帝所赐，而靠武力取得。为保障日耳曼民族求生繁衍，就必须通过战争和流血牺牲来获取“生存空间”。

二　希特勒的“备战外交”

1919 年战败的德国与协约国签订了《凡尔赛和约》，它使德国领土减少 1/8，人口减少 1/10，殖民地丧失殆尽，军备遭严格限制，并承担巨额战争赔款。1920 年国联成立后为英法操纵，维护凡尔赛体系。这些均对魏玛共和国内政外交产生消极影响，形成强大压力。这一时期德国外交的宗旨便是努力利用西方列强对处置战败国的意见分歧，以求逐步摆脱孤立处境。一方面通过签订《洛迦诺条约》(1925 年 10 月)、加入国联 (1926 年 9 月) 等举措，满足法国的安全需要；另一方面又改善与苏联的关系，搞东西方均衡外交。这就初步摆脱了外交面临的困境，并且促使协约国制订了《道威斯计划》和《杨格计划》，不断减少德国的战争赔款数额，英、美外资还源源不断地流向德国，使德国经济迅速复苏，为日后重整军备打下了基础。

希特勒上台后，在 1933～1939 年间加紧推行《我的奋斗》中的备战外交。在战争爆发前希特勒按以下四个步骤实行其外交。

(一) 重整军备、实行独裁政治，为发动侵略战争打下坚实的基础

希特勒于 1933 年 2 月炮制“国会纵火案”，5 月解散所有工会，7 月解散所有政党，使纳粹党成为唯一合法政党。1934 年利用兴登堡总统病逝之机颁布法律，使总统总理合二为一，直接控制国防军，身兼党政军要职。随后，希特勒对内声称重整军备是

---

① 希特勒：《第二本书》，第 48 页。

德国要求生存空间的先决条件；对外把矛头针对《凡尔赛和约》，于1933年10月以德国军备不能“平权”为借口先后宣布德国退出裁军会议和国联。1935年3月又宣布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6月与英国签订海军协定，获得了军备平等权。1936年3月悍然出兵进占莱茵非军事区。这一系列扩军备战活动不仅撕毁了《凡尔赛和约》，也使《洛迦诺公约》毫无意义。到1936年德国的军事潜力已超过英、法。

（二）寻找盟友，最终形成柏林罗马轴心

希特勒上台后曾鼓吹英、德“友谊”与“合作”，利用英国抑制法国，并争取它支持德国扩军。但德国欲称雄欧洲，英、法、苏均是首要之敌，故与英国的“合作”关系只能是权宜之计。1935年后，他即转而修好意大利和日本，并先后结盟，最终形成了德、意、日的柏林—罗马—东京三角同盟，从而完成了德国“寻求战友”的任务，在欧亚形成了两个战争策源地。

（三）转向实施其“扩展生存空间”计划的第一个目标

柏林、罗马轴心既已形成，重整军备目标实现，希特勒便在1937～1939年开始实施第一个侵略扩张目标：“征服捷克，同时征服奥地利……以消除一旦向西方采取行动时侧翼受到的威胁。”[①]同时睨视波兰，威胁整个中欧。与此同时，英、法两国终于放弃“绥靖”政策，并签订了互助条约，初步形成反德联盟，于是西方对峙之势迅速形成。

（四）为避免两线作战，与苏联暂时缔结互不侵犯条约

反苏反共本是希特勒的起家资本，但在1937年11月他确定“先打西方”的战略决策后，转而接近苏联，力图通过与苏联缔约稳住东方，借以离间英、法与苏联关系，使苏联暂时保持所谓的战时中立。

---

① 转引自迪特尔·拉夫：《德意志史》，波恩Inter Nationes，1985年中文版，第295页。

这四个步骤的实施，也就意味着战争的政治准备已经完成。这样的“外交”无非是战争的前奏，希特勒帝国的冒险计划就要变为冒险行动了。

三　第三帝国的灭亡

尚在二战初期，希特勒便强调要通过一系列征服战争，创建一个德意志民族统治下的“大德意志联邦”，他在对其党徒的内部讲话中说：“头等任务是建立大德国，在大德国周围，我们将建立一个中、小附庸国体系……这将是一个联邦制的德意志帝国”，而臣属于帝国的其他民族和国家，则“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日耳曼种族的奴仆”。[①] 这是一整套奴役欧洲的政治构思。

（一）建立一个由日耳曼语族组成的、幅员辽阔的“强大的种族核心”，亦即“日耳曼民族共同体”

这个种族核心必须拥有“共同的血统、语言及国家观念”，能承担起支配欧洲的民族重任。为此，德国在二战中直接吞并了卢森堡、比利时一部分、法国阿尔萨斯等地区，还兼并了波兰的大部及南斯拉夫一些地区。挪威、丹麦、荷兰等日耳曼语系国家，在被占领后均纳入“德意志大帝国”的版图。由于纳粹政权认定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民族在血缘、语言方面与德意志民族很相似，是“优秀种族”的一部分，故在这些被占领国家和地区迅速推行“日耳曼化”方针，采取强行合并措施，力图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同化他们。实现这个目标后，“大德国”的版图扩展为 90 多万平方公里，人口达 1.17 亿。

（二）在欧洲大陆建立庞大的德国殖民地，开拓德意志民族的“生存空间”，掠夺其富饶的资源

为此，在被征服的东欧及苏联部分地区，纳粹德国建立起

① 格列奇科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第 2 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 年，第 725 页。

"总督辖区"、"专员辖区"及"专区"等，推行殖民化制度，发展日耳曼族的移民事业。

（三）建立"众星捧月"式的附庸国体系

这一体系包括战败国与德国的同盟国，以及被征服的拉丁人及南部斯拉夫人，他们属于非日耳曼语族，是"劣等民族"，因而只能沦为半殖民地式的附庸国被奴役民族。希特勒对这部分民族则采取种族隔离政策，让这些国家保持形式上的"自治"与"独立"。

（四）残酷迫害和屠杀犹太人

对散居或聚居于东西欧各国的犹太人，希特勒认为他们是"最劣等民族"，不配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采取血腥政策，先是驱逐犹太人，最后发展为残酷灭绝犹太种族，在大战中指使德国党卫军杀戮了600万欧洲犹太人，罪行令人发指。通过"最后解决犹太人"计划，纳粹德国从犹太民族手中聚敛了成千上万的金银财宝，从而增强了战时德国的军事实力和垄断资本实力。

通过上述努力，纳粹政权在二战期间曾建立起一个庞大的"第三帝国"，它的政治版图曾一度扩展到除瑞士、瑞典、意、匈、保、西以外的整个欧洲大陆，成为所谓"千里帝国"。然而，这样一个气势汹汹、不可一世的大德意志帝国，最终还是被同盟国击败而土崩瓦解。

四 "希特勒现象"剖析

在德国近现代历史中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希特勒现象"呢？它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中外史学界对此多有究诘，较为普遍的大致有如下解说：

关于希特勒为什么能上台。1.他宣扬的"民族社会主义"在群众中产生极大诱惑力。经济危机期间，德国民众希望奇迹能够出现，他们似乎在纳粹党的大杂烩纲领中隐约看到了奇迹的影子。[1]

① 参见张联芳主编：《世界史通俗演义》现代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

2. 魏玛共和国社会基础脆弱，支持旧帝国的一切反动势力及一般民众均对它不满。许多人对民主政治格格不入，仍在等待“一个人”的出现。[①] 3. 凡尔赛条约使德意志民族的自豪感受到极大摧残，希特勒利用了这种不满情绪来反对魏玛共和国。他煽动中产阶级、农民等社会各阶层，做出大量许诺以反对共和制。[②] 4. 他及时改变斗争策略，改组纳粹党、建立了“哈尔茨堡阵线”，壮大了纳粹党的势力，最终获得垄断资本家及国防军头目等权势集团的支持。[③] 5. 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领袖的叛卖政策，为其上台帮了忙。[④] 6. 德共长期执行“左”倾路线，当纳粹党已成为主要危险时，它仍坚持把社民党当作主要打击对象。德国工人运动的分裂削弱了工人阶级力量，在关键时刻无法阻止希特勒上台。[⑤] 7. 德国具有浓厚的封建主义、军国主义传统，缺乏民主主义传统，因而为法西斯主义的滋生提供了最适宜的土壤。[⑥] 8. 兴登堡总统的老朽无能和懦弱使他选择了希特勒，从而改变了德国政局。[⑦] 9. 希特勒敢于“大胆直言”，激发一些人的感情，并具有“宣传鼓动和组织才能”；他善于培植亲信，使其死心踏地地为他卖命；他具有永不言败的“斗士精神”。[⑧] 10. 希特勒把别人集拢在他的旗帜下，使一些人崇拜他和绝对服从他。[⑨] 11. 他厚颜无耻，千方百计地爬上德国总理的宝座以推行其一系列政策。[⑩]

在欧洲西部的历史和社会发展中，德意志是比较特殊的，因为它不曾和英国、法国等较早爆发资产阶级革命的国家同步发展。

---

① 参见塞巴斯蒂尔·哈夫纳：《希特勒的含义》，Harvad 1979 年英文版。
② 参见吴友法：《希特勒夺权备战之路》，解放军出版社，1987 年版。
③ 参见朱庭光：《法西斯新论》，重庆出版社，1991 年。
④ 参见解力夫：《希特勒上台记》，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 年。
⑤ 参见黄鸿钊主编：《百年国际风云》，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 年。
⑥ 参见朱庭光主编：《法西斯新论》。
⑦ 参见弗里德里希·梅尼克：《德国的浩劫》，三联书店，1991 年。
⑧ 参见沃尔特·C. 兰格：《希特勒之谜》，新华出版社，1990 年。
⑨ 戈登·A. 克雷格：《德国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 年，第 76 页。
⑩ 参见罗伯特·佩思：《希特勒秘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 年。

在西欧许多国家已经走上资产阶级民主道路的时候，德国还滞留在君主专制体制之下，从“神圣罗马帝国”到德意志第二帝国，漫长的德国历史一直是由皇权、王权或专制主义构成的，根本找不到共和体制的影子和成分。直到19世纪初德国还没有出现资产阶级革命的苗头。马克思在论述康德在哲学领域里进行了相当于法国大革命意义的革命时，就指出了在德国没有出现政治上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原因。因此，德国在近代史期的君主，即使是比较“开明”的弗里德里希二世，也是“专制伟人”。德国人并不是不向往在当时先进的制度，否则就出现不了康德、歌德等一批思想敏锐、同情法国革命思想的知识分子。不同时代的欧洲民众还有一种寄希望于“自上而下”改革的心态，19世纪“第二帝国”的臣民之所以崇拜俾斯麦和威廉二世，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确曾给普鲁士时代或德国历史带来变革和影响，增强了日耳曼民族的优越感和自豪感。而一战后帝国崩溃，当共和制第一次出现在德国人的政治生活中时，他们仍不能从专制主义的阴影中摆脱出来，对共和体制缺乏信心，甚至相当一部分德国人在潜意识里反对共和制，保皇主义或忠君思想仍很有市场，尤其是在政治界旧帝国的捍卫者兴登堡之流，更从未把共和国的议会民主制放在眼里。希特勒正是利用了德国人的守旧心态，狂热地鼓吹德国必须由像俾斯麦和威廉二世那样的“伟人”、“超人”来统治才能使民族兴旺国家强盛，而不少德国人出于对现实不满而不去捍卫民主共和体制，却把共和制当做是一种政权过渡形式或暂时的现象，还有意无意地期盼着“超人”统治时代的到来。可见，共和制在德国并未深入民心，这就为希特勒上台提供了独裁的社会基础。

同时也不可忽视存在于德意志民族中的根深蒂固的两点政治文化因素。其一，日耳曼民族在西欧是古老的、强悍的民族，历史上“蛮族”入侵西欧，站住脚并建立起号称“西方帝国”的法兰克王国，其主力是日耳曼人。日耳曼人素来认为取代罗马文化、

继承了希腊—罗马—基督教文明的正是日耳曼民族。因此，黑格尔在论述“历史哲学”的演讲中把“日耳曼世界”作为“绝对真理”的体现，奉为文明的顶峰。其二，德意志长期处于四分五裂的局面之中，德国人渴望有一个与日耳曼精神相称的统一的民族国家。因此，俾斯麦被奉为实现统一的“英才”。但在欧洲阻挠德国统一的力量甚盛，从拿破仑三世到克雷蒙梭，都认为德国统一非欧洲人（主要是法国人）之福。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溃败，使德国人一直感到受到歧视和排挤。这两点结合在一起，便成为希特勒现象得以形成的政治文化背景。

法西斯政权在德国的出现，有其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并非德国著名学者梅尼克所谓的“法西斯专政和德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两者毫无瓜葛，希特勒上台纯属偶然”。[①] 20年代开始，一些欧洲国家极端民族主义日渐猖獗，并与专制主义、民族主义及军国主义等等结合起来，与根基浅薄的民主共和观念反复进行较量，结果在那些缺乏民主传统、封建主义余孽尚存的国家渐占上风，导致欧洲法西斯政权在20、30年代陆续建立。[②] 所以德国出现法西斯专政兼有国内历史和国际条件的因素。希特勒个人自然有其特殊作用，他充分利用了国内外各种因素以售其奸。所谓“希特勒现象”，不应全部归之个人作用。

综上所述，德国自俾斯麦实现统一以来到希特勒溃败为止的80年当中，几乎没有建立西方民主制度的时机。“希特勒现象”的出现是当时德国国内外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这种现象在世界历史长河中只是昙花一现，希特勒欲把个人的意志强加于历史，逆流而行，终究成为遗臭万年的历史罪人。

---

① 弗里德里希·梅尼克：《德国的浩劫》第7页。

② 从1920年到1939年，欧洲出现独裁政权的国家先后有匈牙利、意大利、波兰、希腊、德国及西班牙等。

第四节 绥靖和反绥靖

一 绥靖思想探源

绥靖政策通常是指二战前英、法统治集团对德、意、日法西斯侵略扩张所采取的姑息、退让、以牺牲弱小民族利益换取大国之间的“和平”、避免武力冲突和对抗的一种外交政策。英、法、德、意之间签订的慕尼黑协定，就是这一政策最突出和最集中的表现。

以张伯伦、达拉第等人为代表的英、法统治集团对于绥靖政策的制定和推行，当然负有重要的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这一政策并非可以简单地归之于某些个人的产物，而是有其错综复杂的国内外背景和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的。

（一）英、法的衰落对安全战略所造成的限制与影响，是导致绥靖政策的根本原因

英国的衰落趋势自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开始，一次大战后变得日益明显。1929 年以后，世界范围的经济危机又严重动摇了英国本已衰弱的经济根基。英国面临的困境还在于，尽管其经济实力已大为削弱，但它的负担却有增无减。一次大战后大英帝国的版图又进一步扩大，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和发展迫使英国军队不得不在一些地区和国家采取“警察行动”，这就分散了它的力量和对欧洲事务的注意力。更重要的是，随着帝国主义国家间和不同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之间竞争与对立的加剧，英国这时不仅要同时面对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军国主义国家，还要防备社会主义的苏联。总之，陷于日渐衰落之中的大英帝国，面对着众多敌手的挑战。有限的资财和能力同战线过长的现实之间，形成尖锐的矛盾。这就促使英国统治集团在减少潜在敌手、争取更多盟国的方针指导下，试图从绥靖政策中找出路，以便集中力量对付其主要敌人。

至于法国，它早已丧失了欧洲一流大国的实力和资格。法国不仅被战争严重削弱，而且它的经济在1919年以后的几年里又经受了严重的动荡。在这同时潜伏着更深刻的社会和政治危机：各个阶级和各种意识形态之间的相互关系十分紧张；法西斯主义在欧洲的崛起，特别是西班牙内战，导致了法国舆论的分化。法国政局长期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之中。面对空前严重的经济困难和动荡分裂的社会政治局势，法国制订的安全战略只得建立在未来对德战争中全面依赖英国支持的基础上。这种"等待英国"的战略，严重束缚了法国自己的手足。

（二）和平主义思潮是绥靖主义产生并得以长期推行的社会基础

这一点在英国表现得特别明显。1933年2月，牛津大学俱乐部就"要不要为国王和国家而战"的问题组织了一次辩论会，结果以275票赞成、153票反对，通过了一项动议，表示在任何情况下决不为国王和国家而战。[①] 无独有偶，1935年11月在鲍德温公开宣称"我以自己的名誉向你们担保，将不会有大量的军备"之后，他所领导的联合政府在大选中获得了巨大胜利。这两件事生动地反映了两次大战之间英国人的情绪。战后的困苦和折磨，使人们对战争感到失望，怀疑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是否值得。因此，设法避免一场新的破坏力更大的战争，就成为绝大多数英国人的愿望。当时人们普遍反对重整军备，不喜欢听法国人关于德国军国主义复活的宣传，害怕重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覆辙。在英国普遍流行的厌战思潮中，还掺杂着一种对德国和意大利感到"负疚的变态心理"。不少英国人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责任不应单纯由德国承担。他们感到意大利在巴黎和会上被欺骗，德国在凡尔赛和约中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他们认为，应当以同情和解的态度

---

① 特尔福德·泰勒：《慕尼黑——和平的代价》，新华出版社，1984年，第314页。

对待德国和意大利，努力消除其抱怨和不满。

值得指出的是，在两次大战之间和平主义的反战思潮已广泛渗入英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并对英国政治，尤其是其安全防务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以裁军和重整军备为例，英国劳动群众和一般工党党员不希望发生战争，他们认为军备竞赛只能加剧新战争的危险。况且重整军备势必加重劳动人民的负担，也是不符合一般工党党员的意愿的。因此工党在两次大战期间，长时期不但不赞成重整军备，而且还要求进一步裁军。正是基于这样一些因素，所以到 1937 年春天，工党还在议会投票反对重整军备的建议，1939 年 5 月它还抵制关于兵役制的法案。这种思潮，为英国上层集团制订绥靖政策提供了条件。

（三）一战后欧洲均势格局的变化和不稳定的国际形势，是导致英、法绥靖外交的一个重要的外在因素

第一次世界大战显示，德国已胜过包括英国在内的所有欧洲对手，最后只有把欧洲之外的美国力量引入才得以平衡德国的力量。这也表明，单纯依靠欧洲自己的力量已难于维持欧洲的均势。然而，1920 年后美国又退回到相对的外交孤立状态。这样，欧洲就不再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德国的重新崛起。而这正是法国最担心并千方百计要予以防止的。在美国参院否决凡尔赛和约，失去美、英军事保证的情况下，法国设法与东欧新出现的一系列民族国家加强联系，缔结盟约，以便从侧翼抑制德国的扩张。在德国不支付赔款时，法国甚至联合比利时出兵占领鲁尔，以迫使其就范。

法国曾多方设法谋求英国的支持，但英国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和政策对法国是极为不利的。英国统治集团当时不是把德国，而是把法国作为自己的防范对手，视法国为欧洲和平与稳定的主要危险。因此他们不是联合法国去防止德国力量的复活，而是敦促法国对德国采取一种较为温和、调和的政策，实际上使法国为防止德国重新走上扩张主义道路而采取的种种计划、措施归于流产。

在英国积极推动下制定的洛迦诺公约，就最终把法国推上了谋求同德国和解的道路。

洛迦诺公约的基本文件是德、法、比、英、意五国共同保证法德和比德边界的条约。根据协议，德国的西部边界得到了确认，并由英、意两国的担保代替了1920年由于美国不肯履行义务而被迫放弃的保证条约，这对法国无疑是一个安慰；就德国而言，这一安排使它找到了保障其主权和面子的办法。但是这一公约含有一项重大的遗漏：德国既没有明确承认它同波兰和捷克的边界不可更改，英国也不同意对德国的东部边界予以担保，这就为德国日后向东方扩张留下了后路。当时的英国外交大臣奥斯汀·张伯伦曾明确地表示，英国政府不会冒险去让一名英国士兵为保卫波兰走廊而曝尸沙场。[①]这无异于告诉德国人，他们可以在东方放手行动。英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诺瑟治教授指出，洛迦诺公约使法国不可能在其东欧盟国遭到德国进攻时，再从西岸越过莱茵河进入德国前往支援它们。“正是洛迦诺，而不是慕尼黑，使东欧向德国敞开了大门。”[②]

英国在东欧问题上采取这种立场不是偶然的。英国的东方政策是建立在这样一些认识的基础上：中欧和东南欧虽然并非直接涉及英国重大利益的地区，但是这一地区存在着错综复杂的民族领土纠纷和不稳定的形势，随时有可能把整个欧洲拖入另一场重大冲突乃至一场新的世界大战中去。因此英国十分希望在这一“地震带”能够实现某种合作和稳定，而由德国在这一地区建立某种秩序则似乎是可取的。因为这一地区有众多的德意志少数民族，是德国扩张的传统势力范围。德国不仅地理上靠近这一地区，而且和这些国家有着密切的经济贸易联系，有可能牢固地控制这个

---

① 诺曼·劳：《英国现代史纲要》，麦克米伦教育图书出版公司，1990年，第511页。

② F. S. 诺瑟治：《英国对外政策中的自由与必然》，魏登菲尔德—尼科尔逊图书公司，1972年，第19～20页。

地区。这里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考虑：在英国看来，德国支配下的中欧，不仅较目前动荡不定的状况更为可取，而且它会成为阻止苏俄向西扩张的有效屏障。正是基于这样一些认识，所以英国不仅拒绝加入法国为防止德国扩张而与东欧国家缔结的各种盟约，而且当英、法合作不可避免时，它还多方施加影响，迫使法国放弃它对东欧“继承人国家”所承担的义务。

（四）对苏联的敌视、猜疑以及把“祸水东引”的愿望，是导致英、法绥靖政策的重要原因

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打破了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西方国家在武装干涉和封锁、孤立的图谋失败之后，不得不逐步同苏联建立起正常的贸易、外交关系，并于 1934 年 9 月接纳苏联加入国际联盟。但英、法等国对苏联的敌视、猜忌和恐惧是根深蒂固的。他们不仅不愿意同苏联发展真诚的互助合作关系，反而设法把德、意、日法西斯侵略的矛头引向东方，以便借助法西斯的力量扼杀社会主义的苏联。

对苏联的敌视和恐惧，对两次大战之间英、法两国的外交决策及其实施具有重要的影响。希特勒纳粹分子在德国夺取政权后撕毁凡尔赛条约、积极扩军备战并大肆向中欧和东欧进行扩张，得到了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方各主要国家统治集团的默许、纵容和支持。他们这样做的一个重要考虑就是：纳粹与共产主义制度相比，虽然他们对这两者都不喜欢，但纳粹不会给现存的社会秩序造成任何重大的威胁，而共产主义却会从根本上危及资本主义制度的生存；因此“两害”相权取其轻，他们宁可要纳粹主义。英、法统治集团指望法西斯统治在欧洲站稳脚跟后，反过来能放手推行希特勒公开宣布过的政策，即在中欧和波罗的海沿岸进一步扩张其势力，那么它迟早会同敌对的苏联政权迎头相撞。他们觉得，由希特勒击败斯大林并在这个过程中大大削弱德国的力量这样一种前景，是十分令人神往的。

至于法国，30 年代国内政治上的分裂和对立，加剧了法国统

治集团对苏联的敌视和猜忌。资产阶级右翼集团对群众中孕育着的愤懑、不稳和转向左倾的趋势，感到不安，把这同共产主义的影响和苏联的存在联系起来。他们希望希特勒德国成为反对赤色威胁的堡垒。1936 年法国大选中人民阵线获胜，右翼喊出了“宁要希特勒，也不要勃鲁姆”的口号。1938 年在辩论慕尼黑问题时，那些一直叫喊“宁要希特勒，也不要勃鲁姆”的份子，又喊起“宁要希特勒，也不要斯大林”来了。《慕尼黑——悲剧的序幕》一书作者约翰·惠勒一贝内特在分析法国绥靖政策代表人物达拉第的心态时这样写道：“他恨共产主义，也恨战争……他怕一场取胜的战争只会将法国断送在极左势力的手中。归根到底，法国面临一场抉择：和德国取得谅解，或是逐渐为俄国所统治。在这二者之间，他毫无困难地作出了选择。”[1]

二 绥靖政策的表现

（一）西方大国与中国“九·一八”事变

30 年代绥靖政策的第一个重大事件，是西方大国在中国东北“九·一八”事变中所采取的名为调解，实为对日本侵略者姑息、纵容和安抚的政策。1931 年 9 月 18 日，日本发动了侵占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事件发生后，英法统治下的国联竟不区分侵略者与被侵略者，无视中国东北的沦陷，通过决议要求日中双方一律停止冲突，撤退军队。避免同日本发生公开冲突，乃是他们的利益所在。

西方大国竭力避免同日本发生公开冲突，有其战略上的考虑。就英国而言，在欧洲局势紧张、面临危机的情况下，英国不愿、也难以分兵远东去对付日本。况且，一些自治领（如澳大利亚、新西兰）也不愿开罪日本。而美国直到 1939 年以前始终不愿明确表示支持英国与日本抗衡。至于其他西方大国，意大利在远东没有

---

① 约翰·惠勒一贝内特：《慕尼黑——悲剧的序幕》，纽约，1962 年，第 235 页。

多少直接利益；德国宁愿看到日本在远东的行动能为它今后在欧洲的行动提供一个有用的先例；而内外交困的法国，则担心远东的事态发展会分散和转移人们对德国在欧洲行动的注意力。这样，在英国无力、美国不愿采取行动、而其他大国又大多消极的情况下，英国对日本在中国的侵略扩张就采取了一种所谓的“中立”政策，即在牺牲中国利益、安抚日本的基础上，谋求通过国联的调解解决问题。英国统治集团希望这样能够使他们腾出手来去应付欧洲的麻烦。

西方大国之所以竭力避免同日本冲突，固然有其战略上的需要，但还有两个更为实际的考虑：一是日本可以充当西方在中国恢复“秩序”的宪兵；二是它有可能成为反苏的突击力量。20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土地革命战争的高涨，严重冲击了列强的在华利益和种种特权。因此，无论是美国总统胡佛还是英国的一些内阁大臣，对于日本诡称要在中国恢复法律和秩序都抱同情和支持态度。至于日本在反苏反共活动中所可能扮演的角色，早在它为强占中国东北而进行的外交舆论准备过程中，就已进行了大肆的鼓噪和渲染。美国总统胡佛就清楚地表明，他把日本看做是阻止布尔什维主义推进的屏障，[1] 对日本在中国恢复秩序不会提出异议。[2] 英、美统治集团认为，由于纵贯中国东北全境的中东铁路纠纷，日、苏之间必然会发生冲突，他们希望日本把中国东北变成对苏战争的桥头堡。

（二）埃塞俄比亚危机

意大利早已垂涎东北非的战略要地埃塞俄比亚。为了实施其侵略计划，它曾多方谋求英法的谅解；而英法为了拉意大利共同对付德国，也积极寻求意大利的合作和支持。这种相互需要、互

---

① 保罗·海耶斯：《现代英国对外政策：20世纪(1880～1939)》，亚当一查尔斯·布莱克图书公司，1978年，第247页。

② 见胡佛总统1934年10月的一次演讲，转引自《国际关系史》上册，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405页。

有所求的现实，就构成了英法在埃塞俄比亚问题上对意大利实行绥靖政策的基础。

30年代初以来欧洲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希特勒的上台以及随后德国撕毁凡尔赛条约、加快重整军备的步伐，使德国问题突出起来。法国对于德国的重新崛起感到紧张和忧虑。英国内阁一致认为，德国是英国最大和最终的威胁。意大利和德国之间在奥地利问题上的利益冲突也相当尖锐。在这样的背景下，英、法、意三国就走到一起来了。不过墨索里尼同意这样做，并不仅仅是为了对付德国，而且是为了使他能够放手在非洲自由行动。墨索里尼的确也在这方面得到了英法的纵容和默许。法国外长赖伐尔1935年1月访问罗马，就欧洲问题和调整两国在非洲的殖民地问题同意大利达成了一些协议和谅解。赖伐尔表示法国无意阻挠意大利实现其强占埃塞俄比亚的计划。1935年4月英、法、意三国的代表在斯特雷扎举行会晤，当会议讨论到三国宣言草案中关于“反对任何可能危害和平的单方面废弃条约的行动”一款时，墨索里尼提议把“欧洲”这个限制词加在“和平”二字的前面，意欲把埃塞俄比亚问题排除在协议之外。对此英国代表默不作声。墨索里尼认为这表明英国对埃塞俄比亚的命运并不关心，默许他自由行动。

英法在埃塞俄比亚问题上的立场和态度是十分软弱和矛盾的。意大利在非洲的扩张，对英、法在当地的殖民利益是一种损害。特别是对英国，埃塞俄比亚濒临红海，位于大英帝国的海上交通线上，意大利控制这一地区无疑对英帝国是一种威胁。但是面对德国这个更大的危险，英法在埃塞俄比亚问题上竭力避免同意大利发生正面冲突，希望在调停的旗号下通过牺牲埃塞俄比亚利益安抚意大利，以便保住本来就十分脆弱的反德联合阵线。

（三）西班牙内战

绥靖政策的反共反人民本质在西班牙内战问题上得到了充分

的暴露。1936 年 2 月，由左翼党派组成的人民阵线在西班牙大选中获胜。在群众运动的推动下，人民阵线政府实行了一些政治经济改革措施。西班牙法西斯势力在佛朗哥的领导下，于 1936 年 7 月发动了军事叛乱。纳粹德国和意大利迅速决定给西班牙叛军以大力支持，英、法等国的统治集团则不顾德、意在西班牙站稳脚跟后可能给他们带来的战略威胁，决心推行"不干涉政策"，希望借助西班牙的反动势力和德、意之手，消灭那里的民主力量。

"不干涉政策"的真正策划者是英国统治集团。他们主要关心的是把这场战争限制在西班牙境内，主张欧洲各大国签订一项不干涉西班牙事务的协定。法国在对待西班牙内战问题上陷入分裂。以勃鲁姆为首的人民阵线政府不愿也难以采取决定性的行动，所以就采纳了英国的不干涉主张。事实上正是在勃鲁姆访问英国后，法国政府宣布了中止向西班牙供应武器的决定，并于 1936 年 8 月 2 日提出了不干涉的倡议。接着英、法两国互换照会，相互承担义务，不向西班牙输出武器和军事物资。实际上不干涉政策意味着单方面对西班牙共和国政府实行禁运，剥夺其获取必要支持进行有效反抗的权力。西班牙人民的英勇斗争虽然获得世界各国人民和进步力量的广泛支持，但终因敌我力量悬殊，最后还是遭到了失败。

（四）德奥合并与捷克斯洛伐克的灭亡

到东方去夺取"生存空间"是希特勒的既定政策目标。从 1938 年起希特勒开始采取行动来实现他的扩张纲领，英、法多年来所推行的绥靖政策纵容和协助希特勒顺利实现了它的扩张纲领。特别是英国，1937 年尼维尔·张伯伦出任英国首相后，开始推行全面的绥靖计划。他和他的朋友们认为，只有根本修改凡尔赛和约中的领土条款，同德国达成谅解，才能保障欧洲和平。因此，张伯伦上台伊始就抓紧探寻同德国达成谅解的基础。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37 年 11 月，英国不管部大臣、当时的枢密院长哈里法克斯勋爵被派往伯希特斯加登去同希特勒会晤。哈里法克斯说：

"英国人是现实主义者，他们也许比其他任何人更深信，凡尔赛强制条约的错误必须加以纠正。"他表示英国不反对德国对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和但泽的领土要求，不过这种变更应以和平方式实现。他还表示，英国政府准备为全面和坦率地讨论两国共同关心的一切问题创造条件。

至于法国，由于它本身的虚弱和内部的分裂，对德国虽怀有戒心，但它无力采取任何有决定意义的行动。尤其是经过埃塞俄比亚危机"斯特雷扎阵线"瓦解后，法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英国。与此同时，法国国内右翼势力反苏反共情绪的高涨，也推动着法国统治集团自己去设法寻求同德国和解。于是，英、法两国的绥靖主义者就心照不宣地达成默契：让希特勒去东方寻找他的生存空间，让德国成为对付"东方赤色野蛮社会"的堡垒，这样"赤色威胁"也许会被遏制和消除。

其实，希特勒对英法的这种态度和立场早就了解。1937 年 11 月初希特勒在柏林召集秘密会议，决定德国未来的政策。他说："我们还需要对付英国和法国这两个仇敌，英国不会容忍在中欧出现一个强大的德国巨人。但是我个人相信，英国，也许还有法国，很可能已经悄悄地把奥地利和捷克都一笔勾销了。英帝国的内部困难及将来介入另一次长期的、毁灭性的欧洲冲突的可能性，就足以使它不会对德作战。没有英国的援助，法国的进攻简直是不可能的。"他还补充说，通过和平手段来兼并奥地利并且使捷克斯洛伐克臣服，并不是不能做到的。可以使用逼吓的手段取得欧洲政治家的默许，或者最好使他们不惜以任何代价来换取德国的友好。[①]

在奥地利危机期间，张伯伦在英国议会发表演说，暗示奥地利一旦受到德国的侵略，不能指望得到其他大国的援助。英国驻德大使韩德逊更明确地向希特勒表示，他赞成德、奥合并。一些

① 约翰·惠勒—贝内特：《慕尼黑——悲剧的序幕》，第 12～13 页。

英国政府的官员们也表示希望德国"在捷克斯洛伐克和奥地利问题上不诉诸武力而取得更大的成果。"①

希特勒在奥地利得手后，开始加紧推行其侵略捷克斯洛伐克的行动。面临日益逼近的战争危机，英国政府内部以及英、法两国之间着手就未来的对策进行频繁紧张的讨论和磋商。问题的焦点是要否为捷克斯洛伐克而战。法国对捷克承担有义务，根据法捷互助条约，一旦捷克受到德国无端侵略时，法国应当马上予以援助。但是英国历来把它在欧洲的利益范围划到莱茵河为止，对中欧和东欧事务一般持超然态度，它根本不想为捷克打仗。不过根据1936年3月伦敦条约所重申的英国对《洛迦诺公约》承担的义务，如果法国遭受德国侵犯，英国就应向法国提供援助。因此如何使法国不必为履行对捷克的义务而参战，从而也避免把英国卷入这样一场战争，就成为张伯伦政策的主要目标。他为英国选定的方针是：拉法国一起充当德国和捷克之间的调停人，敦促捷克人对苏台德日耳曼人的全部要求作出合理的让步，建议他们运用一切外交手段谋求和平；同时要求德国保持克制，提醒德国政府战争一经打响就不容易局部化了。张伯伦的这一立场当然也制约了法国的政策。没有英国进行支援的明确保证，达拉第是不敢设想对德作战的。这样，法国人就有意无意地把他们对捷克所承担的义务一笔勾销了。

英、法两国就在这样的政策方针指导下开始了联合调解活动。1938年5月，调解失败以后，英、法两国第一次开始认真考虑战争的可能性。在此期间德、意两国加紧磋商，希特勒决定邀请英、法、意三国的领导人同他一起举行一次四方会议。会议于1938年9月29日～30日在慕尼黑召开。会上由墨索里尼出面提出的一项计划（实际上是由德国外交部起草的），被四大国所一致采纳。这

①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D集第1卷，第148期第271页；转引自维戈兹基等编：《外交史》第3卷，三联书店，1979年，第970页。

项叫做《慕尼黑协定》的文件规定，立即将苏台德地区割让给德国，使希特勒不用武力就实现了他在苏台德问题上的最高纲领；同时也为英法留了面子：捷克领土的变更是用“和平方式”实现的，似乎制止了战争。

（五）慕尼黑的余波

张伯伦宣称他从德国带回了“体面的和平”。但是此后不到半年时间，希特勒就撕毁慕尼黑协定，派兵进入布拉格，接着又对但泽和波兰走廊提出领土要求。与此同时，意大利正式兼并了阿尔巴尼亚。欧洲新战争的危险急剧增长。

希特勒德国侵占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急剧地改变了欧洲的力量对比。特别是希特勒在捷克问题上玩弄的欺骗伎俩和背信弃义行为，激起了英、法两国人民的愤慨和对本国统治集团所奉行的绥靖政策的抗议。英、法两国为了应付将来可能出现的危机局势，他们积极寻求同盟者。但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前，他们并没有放弃同德国达成谅解寻求“和平”的方针，不过这时已转而强调以威慑的方式迫使希特勒就范。在德国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几周之后，英、法就先后宣布了对波兰、罗马尼亚、希腊和土耳其提供担保，还同苏联就建立集体安全体系问题着手进行谈判磋商。

对于同苏联发展合作关系，无论是张伯伦还是达拉第本能上都是不情愿的。但是，事态的发展已到了必须考虑谋求与苏联合作的地步。这不仅是由于英、法国内存在着要求与苏联合作反对纳粹德国侵略的强烈呼声，而且如果没有苏联的参与，英、法对东欧可能遭受侵略的各小国所提供的担保，显然就缺少了付诸实施的有效力量。正是基于这样一些考虑，英、法两国政府希望苏联对英、法担保中所涉及的国家做出保证，从而作为一种威慑因素迫使希特勒同英、法妥协。但是他们又担心与苏联结成正式同盟，阻碍他们同德、意“谈判和亲近”，从而使和平解决成为不可能。他们尤其担心苏联乘机在东欧和波罗的海扩张自己的势力和

影响。

1939年4月至8月，英、法同苏联就共同抗衡法西斯侵略签署一项条约问题，在三国首都时断时续地进行着谈判。苏联认为，英、法两国政府与其说是关心条约本身，倒不如说是关心条约的谈判，他们的目的是利用这一谈判作为筹码，迫使德国同英、法达成妥协和谅解。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苏联为了自身的安全，避免成为英、法挑动德国进攻苏联阴谋的牺牲品，于1939年8月23日同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苏德条约的签订，正如丘吉尔所指出的，“标志着几年以来英、法两国的外交政策和外交手段的绝顶失败”；“现在已没有什么办法能够再避免或延缓大战的爆发了”。[①]

三 反绥靖运动

在30年代的欧洲政治中，与绥靖主义相对立，也存在着一种针对希特勒扩张的反绥靖思潮。这并不是说从一开始就形成了一个固定的政治派别或联合紧密的集团，而是说当时确有某些个人和小的派系在不同时候、不同问题上，发出过一些同执政集团主导方针不同的声音。随着绥靖政策的灾难性后果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这种不同的声音就变得越来越强烈而普遍。这里既有左翼党派和进步人士对绥靖政策的反苏反共反人民性质所表示的不满和反对，也包括右翼中的某些人士要求加强军备、维护帝国利益、加强英、法联合、呼吁建立反希特勒联合阵线的主张和行动。

就英国而言，温斯顿·丘吉尔是一位反绥靖代表人物。整个30年代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前，他一直处于在野地位。这使他有可能比较直率地发表对政府政策的批评意见和不同看法。他较早地意识到希特勒政权的危险性，要求重整军备加强英国的

① 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1卷《风云紧急》，第351页。

防务，"担心有这么一天，那时威胁大英帝国心脏的手段将出自德国现在的统治者之手"。[1] 他和他的支持者同情法国的境遇，认为如果德国取得同法国平等的军事地位，就一定会带来不堪设想的灾难，因此坚持认为盟国应信守凡尔赛和约。丘吉尔为英国开出的取代绥靖政策的药方，是把维持欧洲均势作为其自身安全的保障。1936 年他在保守党外交委员会的一次秘密会议上，阐述了对英国欧洲政策中所奉行的传统均势原则的看法。他指出，希特勒政权是欧洲目前最强大、力图用暴力和危险手段来称霸欧洲的国家；为挽救国家，英国必须联合欧洲一切力量来约束、抑制、必要时挫败德国的霸权。他强调必须重视英国同法国之间的联盟，把在防务上同法国建立联盟一事看作一件带根本性的事情。[2] 他在多种场合一再表示，希望看到一个包括英、法、苏在内的维护和平的"大联盟"来制止纳粹德国的进犯。在慕尼黑危机期间，丘吉尔主张英国联合法国和苏联，一道宣布支持捷克斯洛伐克。在大战爆发的前夕，他把注意力集中在促成反希特勒联盟，特别是同苏联结盟的紧迫问题上；对英、法、苏谈判的失败感到痛惜。

如果说丘吉尔在 1936 年以前在政坛上比较孤立的话，那么随着德国重整军备的加紧进行以及德、意法西斯对外扩张步伐的加快，反对"绥靖"的呼声就日渐强烈起来。1935 年 12 月，出卖埃塞俄比亚人民利益的霍尔—赖伐尔协议在英国公众中引起强烈愤慨和抗议，协议被撤消，霍尔也被迫辞去外交大臣职务。在西班牙内战爆发之前的 1936 年，在左翼集团之间也有许多关于建立反法西斯联合阵线的倡议和议论。与此同时，丘吉尔在保守党内外积极活动寻求支持。他与一些社会名流组织了"保卫自由与和平中心"等团体。1938 年 2 月，安东尼·艾登因不满张伯伦为谋求

---

① 亨利·佩林：《丘吉尔传》，东方出版社，1988 年，第 389 页。

② 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 1 卷《风云紧急》，第 186～190 页。

与意大利妥协而疏远美国的做法辞去了外交大臣的职务。他周围的20名议员开始与丘吉尔及其追随者一起行动。艾登也是一名反绥靖的强硬派，他认识到德国随着军事实力的增长和不断扩张，对英国的威胁也就愈来愈大。他看到德国的目标不但要攫取整个欧洲大陆，而且还要鲸吞大英帝国的海外地盘。由于英、德矛盾难以调解，战争危机就不可避免。英国的出路是用“联合起来”的军事手段，来制约和对抗法西斯国家的扩张威胁。尽管艾登从意识形态上反对社会主义苏联，但从实际利害关系出发，同丘吉尔等一样，也主张联合苏联，借助其力量共同抗击法西斯。但他不认为联苏是件易事，他看到国内在这方面的巨大阻力。他觉得英国对苏联的反感之深与对德国的判断之谬呈异曲同工，而其要害在于，漠视苏、德可能达成默契及这种默契会给欧洲造成的致命威胁。

慕尼里协定的签订，特别是捷克斯洛伐克的覆灭，使英国国内反对绥靖政策的声浪变得更为普遍和强烈起来。海军大臣达夫·库珀为抗议慕尼黑协定宣布辞职。在下院的辩论中，除丘吉尔外，还有艾登、库珀和艾默里三位前内阁大臣，以及20多名保守党议员以拒绝投票的方式表示抗议。至于大部分工党人士和自由党人，也都属于“反慕尼黑派”。他们和丘吉尔等保守党内的持不同政见者一起，要求政府迅速采取果断行动，主张英、法、苏合作以积极抵抗德国进一步的侵略行为。

法国主张对希特勒德国实行强硬政策的早期代表人物是路易·巴尔图。他是长期以来活跃在法国政坛上的一位右翼民族主义政治家。巴尔图清醒地意识到法国所面临的危险，拒绝使德国重新武装合法化。他认为向德国让步屈服，只会使对方得寸进尺，到头来陷于敲诈勒索者的魔爪而不能自拔。他提出，法国只有相信和依靠自己的力量，并真诚地同苏联合作结成一个东方洛迦诺体系，才能对付德国的威胁。正是在巴尔图1934年2月～10月出任法国外交部长期间，法、苏关系达到了全盛时期。在法国的推

动下，苏联被接纳加入了国联。法、苏一起提出了订立《东方洛迦诺公约》的倡议。后来缔结的《法苏互助条约》就是在巴尔图奠定的基础上达成协议的。

进入30年代后期，随着法国国内政治格局两极分化的加剧，右翼的大多数开始由反德转而采取亲希特勒的立场。左翼进步势力，特别是共产党人，在西班牙内战和慕尼黑事件等问题上采取了鲜明的反绥靖立场，主张建立反法西斯联合阵线，支持西班牙人民的正义斗争，要求同苏联发展合作结盟关系。在统治集团中也有少数代表人物在某些问题上不同意对德、意实行绥靖政策。1936年初，法国政界元老、激进党领导人赫里欧在赖伐尔出卖埃塞俄比亚人民利益的阴谋被揭露后，宣布撤消对总理的支持，导致赖伐尔政府垮台。1938年，在位不到一个月的第二届勃鲁姆政府，曾试图加强法国的力量，摆脱英国对法国政策的控制。外交部长保罗—邦库尔坚持认为，英、法联合向德国发出警告，是保持和平的最好手段；牺牲捷克的做法只会使法国和英国军备不足的问题更加严重。就是在1938～1940年的达拉第政府中，也有3位持不同政见者——雷诺、曼德尔和尚普蒂埃·德里贝斯，坚决主张抵抗德国侵略和履行法国对东方条约的义务，对《慕尼黑协定》持保留态度。但这毕竟不占主导地位。

英、法统治集团推行的绥靖政策，给英、法两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他们是在一些过去奉行绥靖政策、而今对自己的事业又缺乏深刻信念的领袖们领导下进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法国不久就战败投降，英国进入历史上最艰难危机的时刻。只是美苏两国的介入，才使1940年5月接任英国战时内阁首脑的丘吉尔松了一口气。在苏德战争爆发的当天，丘吉尔发表广播讲话，宣布英国将给予苏联以“我们力所能及的，对苏联有益的一切经济和技术援助”。1941年7月英苏两国签订了在对德作战中联合行动的协定。丘吉尔在谈及援苏决策时明白表示：“我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消灭希特勒，这样我的处境就容易多了。”英国在法国陷落后

就开始积极谋求美国的支持和援助。1941 年 8 月丘吉尔同罗斯福签署了《大西洋宪章》。当年 12 月 7 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正式参与对德、意、日法西斯国家作战。以苏、美、英为核心的国际反法西斯大同盟正式形成。

第五章

“冷　　战”

——主导东西方关系的美苏相对均势

第一节　小　　引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把世界政治推进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即通常说的“雅尔塔体系”时期，或“冷战”时期。

这个新史期的特点，在战争临近尾声时就已经可以看出来了。说到底是战场上的形势所决定的。几次大国首脑会议讨论了许许多多关于战后的安排问题，从中拎出一条线来简而言之，就是根据东西战线推进的程度把世界划分为东西两大势力范围。这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各大国可以根据各自的处境、特殊利益，乃至历史传统考虑自己的对外政策，但是不可能脱离这个大环境。丘吉尔早在1942年给艾登的一封电报中，就明白地说，在盟军打败希特勒以后，西方势必将组成针对苏联的阵线。同样，苏联也势必将“拥有”红军实力所及的广大地区，并据以同西方对峙。时所必至，势所必然，并不是由谁来规划的。

这是一种从相反方向交汇出的一种“共识”——举凡战后的重大国际事务都将由几个大国包揽起来，而且拥有比其他国家大得多的发言权和决定权。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大国否决权制度，体现的就是这种原则。而按照罗斯福和斯大林的主张，世界上的大事就只该由美、苏两家定夺，最多再加上英国。美国和

苏联之成为战后两个实力最强的超级大国，是战后现实的必然逻辑。

东西对立的局面从而形成：政治上分为两大阵营——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军事上有两大军事集团——北约和华约；在经济上，也是两个市场。于是，东西方关系就成为西方国家和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观察形势和制定外交路线的总框架。在这个项下可以开列一张长长的问题单子，诸如德国战后安排问题、裁减军备等等，但都是属于这个总框架的问题。

这是国际政治与意识形态搅在一起的时期，或者也可以说是在意识形态的“盛装”下的国际政治斗争——争夺“势力范围”的斗争。东西双方彼此视为“非我族类”。这里有两层意思：一，双方都有各自的价值观，都认为双方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是相互敌对的，因而不可调和；而且各自都认为对方要千方百计地把它的价值观、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输出”到自己一方来。二，双方在根据自己的实际利益同对方打交道时，并不总是也不可能直接地以忠于自己的理论信仰作为处理问题的依据，意识形态的对立在这种情况下仍起着重要的，但是从属的作用。

同时，在这个时期，尽管意识形态尖锐对立，但是双方都并不想以意识形态为由向对方发动战争。诚然双方时常互相指责对方是“新战争的挑拨者”，并且各以自己的军事集团为支撑，不遗余力地增强自己的实力，特别是进行原子、核子武器的竞赛。然而，双方越是这样表现，就越是在使“分治”的局面成为无法改变的定局。于是形成了这样一种态势：双方都对对方保持着足够的政治压力，以维持一种“冷战”的“和平”局面；紧张局势不时出现，但弯弓不发；谈判断断续续，在僵持中维系着和微调着相互的关系。

此外还要看到，西方几个大国，除了美国之外，从进入 20 世纪以来就一步一步地沦为“二等强国”，如英国和法国。有的则处于战败国地位，如西德和意大利。这些国家在东西方对垒中自然

属于西方，但也都有自己的考虑，都力争在国际关系中取得尽可能多的主动权。英国丘吉尔的“三环外交”，法国的欧洲政策，德国的对美、苏、欧政策等等都属这类问题。

在这个时期，西欧还出现了联合的势头，一种古老的“欧洲观念”在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某种程度的“结构化”。联合的过程是复杂的，有其政治的和经济的基础；同时折射出有关国家（如法国和西德）利益的结合和利益的矛盾。然而，这是欧洲历史上的一个新事物，它预示着有关的国家之间将出现一种带有超国家因素的联盟，尔后还将显示出它在国际政治中的影响。因此，西欧国家在自己的对外政策中，欧洲统一的进程问题占有很大比重。

这一章所涉及的时期，主要是二战结束起到50年代后期。其最大特征是东西方关系的对立规定了外交大局的取向。就西方而言，美国是起首要作用的，西欧各国处于盟国的地位，它们关于自身的外交问题，亦绝不可能与东西方关系的总框架相背离。如果仍要沿用19世纪盛行的“力量均势”理论，那也只能用东西双方之间，更确切些说是美苏双方的相对均势。

再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到50年代后期，东西对峙的严重程度已有放松的迹象，这是从斯大林逝世开始以来几年的历程所促成的。西方各大国都在酝酿改变“冷战”的对立的局面。

第二节 丘吉尔的“三环外交”

一 “三环外交”的提出

丘吉尔“三环外交”思想在战后英国外交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事实上，几十年来，英国外交政策无论怎样调整，都脱不出这个框架。它是丘吉尔根据英国相对衰落的发展趋势和战后世界力量对比变化的新情况，为谋求继续保持英国的世界大国地位而提出的一项外交总方针。它认为英国在战后的世界上应扮

演三重角色：1. 遍及五大洲的英殖民帝国和联邦的中心；2. 与美国保有特殊关系的一个主要的大西洋国家；3. 支撑着欧洲大陆上一种大致的军事和政治均势格局的一个主要欧洲大国。

"三环"的概念是丘吉尔1948年10月9日在兰达诺保守党年会上发表演说时提出的。他说："在这个关系到人类命运的变化时刻，当展望我国未来时，我感到在自由和民主国家中存在着三个大环。……对于我们来说，第一环自然是英联邦和英帝国及其所包括的一切。其次是包括我国、加拿大及其他英联邦自治领在内，以及美国在其中起着如此重要作用的英语世界。最后是联合起来的欧洲。这三个大环同时并存，一旦它们连接在一起，就没有任何一种力量或力量的联合足以推翻它们，或敢于向它们挑战。现在假如你们想象一下，你们就会看到，我们是在这三环中的每一环里都占有重要地位的唯一国家。事实上我们正处在三环的连接点上。"[①] 显然，在丘吉尔看来，英国由于其广泛的国际联系和它在国际关系中所处的关键地位，注定要在国际政治中执其牛耳，发挥某种中心作用，使它可以充当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桥梁和代言人。

丘吉尔的这些话不只是反映了他和保守党人希望借助英国同英联邦国家、美国以及西欧的联系，谋求继续保持英国的大国地位，而且也反映了英国对外关系中客观存在的广泛联系，以及基于这种联系之上的英国对外政策需要优先考虑的目标，从而实际上为战后两党一致的对外政策奠定了基础。从战后英国的外交实践看，英国统治集团是把第一环，即英帝国和联邦作为其大国外交的资本；把第二环，即英、美特殊关系作为其政策的基石和重点；试图借助美国的力量来促使第三环的实现，即建立一个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集团与苏联相抗衡，以确保英国在欧洲和世界上

---

① 罗伯特·詹姆斯编：《丘吉尔的演说全集》第7卷，纽约，1974年，第7712页。

的切身利益及其大国地位。

二　英美的特殊关系

“英美特殊关系”一词最早见诸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英国文献，用来描述两国战时结成的亲密同盟合作关系以及规划战后英国的对外政策。一般认为丘吉尔和罗斯福是英、美特殊关系的缔造者；是丘吉尔创造了这一短语，并使之得到广泛的流传。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美国站在英国一边作战，两国首次结成了同盟。但是一战后美国又退到了外交上的孤立主义，加之两国激烈的竞争和利害冲突，使两次大战之间的英、美关系处于疏远和猜疑状态。1940 年法国的陷落成为促使两国建立紧密合作关系的催化剂。两国所面临的法西斯侵略的共同威胁，促成了它们之间战时同盟关系的确立。两国具有相似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以及血缘亲情与传统的文化联系，使在共同利害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英、美合作关系变得更为亲密和牢固。但是随着二战的结束和战时共同威胁的消逝，联结两国关系的纽带开始松弛。只是对苏联威胁的共同意识和冷战的到来，才使两国关系又在新的基础上重新确定下来。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已没有足够的力量像二战以前那样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其传统的主导作用，不得不让位于美国。事实上 1941 年 12 月美国参战后，它已取代英国成为西方的主要发言人。

借助美国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同苏联抗衡，被认为是当时西欧的唯一出路。面对这种形势，英国决定采取主动行动，推动美国迅速对欧洲提供经济援助和军事支持，并逐步走上了同苏联全面对抗的道路。

在战后冷战局面的确立过程中，丘吉尔发挥了重要的影响。正如《丘吉尔的秘密》一书作者德泽勒皮指出的，战后初期最有特点的现象是，西方这个时期的一切政治主张无不带有“英国制

造”的标记。而这些主张的最初鼓动者便是温斯顿·丘吉尔。[1]尽管这时丘吉尔已经下野，但他并没有停止以他的全部威望去影响英国和西方的政策。这里最突出的要算他1946年3月在美国发表的富尔顿演说。

1946年3月5日丘吉尔在美国总统杜鲁门陪同下到美国密苏里州富尔顿城的威斯敏斯特学院发表演说。他声称，“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的的里雅斯特，一道铁幕横贯欧洲大陆降了下来”，在“铁幕”后边一系列中欧、东欧国家落入了苏联的“势力范围”，处于苏联的影响和“莫斯科高度的控制”之下。他指责共产党在意大利、法国和世界各地组成“第五纵队”，对西方文明构成“挑战和威胁”。丘吉尔呼吁实现“英语国家兄弟般的联合”，阻止苏联“权力和主义的无限扩张”，主张在英联邦和英帝国与美国之间建立“特殊关系”。[2] 丘吉尔的演说吹响了东西方之间冷战的号角。

安东尼·艾登战时就预测到，美国迟早要成为英美关系中占支配地位的一方，英美关系的这一变化还将带来一系列反应，影响到英国的对苏政策、对法政策，乃至英联邦的前途。他认为英美关系如果协调不慎，英国将会无法控制地衰败下去，并难以恢复固有的财富和权力。艾登还指出：如果美、苏之间的政策分歧达到直接冲突的地步，而英国又不得不在美、苏之间有所选择的话，英国无疑应该肯定：英美合作是必需的、更自然的，因为比之英、俄合作，它的基础广阔得多，深远得多。[3]

如果说“三环外交”和建立英、美特殊关系的思想是丘吉尔提出来的，那么将这些政策主张付诸实施并为战后英国两党一致外交奠定基础的，则是战后第一届英国政府——艾德礼工党政府

---

① 〔比〕德泽勒皮：《丘吉尔的秘密》，河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91页。

② 《纽约时报》1946年3月6日。

③ 安东尼·艾登：《艾登回忆录》中册，商务印书馆，1976年，第555页。

及其外交大臣贝文。贝文外交在推动美国对西欧承担义务、形成联美抗苏格局的过程中发挥了突出作用。

其实关于战后联美抗苏的战略选择问题，英国战时内阁在二战临近结束就进行过充分的酝酿和讨论。根据战时内阁决定成立的战后规划委员会 1944 年 11 月提出的报告，认为战后对英国的“战略利益可能构成严重威胁的两个欧洲国家，一个是重新复兴的德国，另一个是俄国”。报告指出：“如果俄国变成敌人，德国则是唯一能以其地理位置、人力和物力资源，为我们的防卫提供可能是实质性帮助的国家。”[1] 战后规划委员会还认为，即使联盟中包括西部德国，想要阻止苏联，力量也完全不够。因此，必须使可能建立的西欧集团与美国保持密切的合作。美国是唯一具有足够人力、物力资源和后备力量使局面保持稳定，并在苏联入侵西欧后恢复正常局面的国家。[2]

把战时内阁的设想和丘吉尔的呼吁付诸实施的正是贝文。战后初期贝文曾希望就欧洲和中东问题同苏联达成一些划分势力范围的协议。工党左翼也鼓吹英国充当独立于美、苏之外的第三种力量。但是英国同苏联之间存在的一系列利害矛盾难以调和。事态的发展表明，双方达成谅解和协议十分困难，英国作为第三种力量走独立道路的设想也不现实。在这种情况下，联美抗苏、重建欧洲和世界新的力量均势，就成为贝文外交的首要目标。他决定采取具体步骤，推动美国朝英美联合抗苏的方向前进。

1947 年 2 月 21 日英国驻华盛顿使馆通知美国国务院，称英国决定从 3 月底起停止对希腊的全部援助，要求美国接管对希腊和土耳其的援助责任。贝文这样做有两个目的：即使英国摆脱在希腊的困境，又借机把美国推到与苏联对抗的前台。当时美国在

---

① 伊·巴克尔：《超级大国之间的英国 1945～1950》，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83 年版，第 8 页。

② 约·拜里斯：《英国战时关于战后欧洲安全集团的思考》，载于《国际问题评论》第 9 卷第 4 册，第 277 页。

对苏关系上正在实现由战时同盟向对苏遏制政策的转变。英国关于希腊问题的决定恰逢其时。1947 年 3 月 12 日，杜鲁门总统提出了援助希腊和土耳其的国情咨文，表示美国决心“支持自由国家，抵抗那些武装的少数派集团或外来压力奴役他们的图谋”。[①] 这就是后来人们所称的遏制苏联的“杜鲁门主义”。

贝文在组织西欧国家接受“马歇尔计划”和组建西方联盟体系的过程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特别是 1949 年 4 月以美、英为核心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建立，被认为是贝文外交的一大成就。在英国的推动下，美国终于脱离了它传统的孤立主义政策，对欧洲安全承担了义务，成为西方集团的盟主。而英国则实现了它拖住美国、借助美国力量来重建欧洲新的均势、以维护自己安全的战略目标。

从战后英、美同盟合作关系重新确立起，到 60 年代初英首相麦克米伦下台为止的这段时间，被认为是英、美特殊关系史上的一个全盛时期。在这期间，英、美特殊关系对于战后世界秩序、特别是欧洲战略格局的形成和发展，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和影响。

当然，英、美之间的密切合作关系，并不排除它们相互之间的矛盾、竞争和争吵。就连丘吉尔本人也曾表示过要执行某种“独立”的对外政策，并提出“要贸易，不要援助”等口号，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英、美之间的矛盾。当然，英、美分歧既表现在经济方面的利害冲突，又表现为战后两国在分享核机密问题上曾一度分道扬镳；至于在殖民地问题上的分歧和争夺则更是十分广泛和激烈，其中最突出的要算两国围绕 1956 年苏伊士运河战争爆发的公开争吵。不过总的说来，这种矛盾一般不会发展到危及两国在欧洲和全球范围内对苏遏制战略步调的一致。

“英美特殊关系”的概念，除可以作为一种具体的国家关系理

---

① 伊·麦克唐纳编：《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英美关系》，戴维和查尔斯出版公司，温哥华 1947 年版，第 47 页。

解外，在英国还被看作是一种外交谋略。那就是说，英国统治集团注意利用英国丰富的外交经验和两国间存在的共同文化联系，对美国的外交决策过程施加影响，以便使美国的政策尽可能适合英国的需要和利益。40 年代末到 50 年代中，东西方对峙的格局已经逐步确立下来。与此同时，杜勒斯在东西方关系上咄咄逼人的态度和美国国内麦卡锡掀起的反共歇斯底里，使英国深感不安。英国领导人坚持要美国通过谈判与苏联和中国就某些问题取得妥协。例如，在朝鲜战争问题上，艾德礼政府曾多次告诫美国不要扩大战争进行新的军事冒险；在印支战争问题上，艾登曾在日内瓦会议上成功地扮演了一个中间人和调解者的角色；麦克米伦曾在柏林问题，美、苏、英核禁试条约的谈判以及古巴导弹危机问题上，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和影响。总之，英国在美、苏对抗和东西方关系中，一方面坚决站在美国一边，执行联美抗苏的总方针；另一方面，又要极力影响美国的政策，在可能的情况下在美、苏之间充当调解人，使东西方关系不至于过分紧张。英国希望利用这种“中人”的地位，抬高自己的身价，加强自己的国际地位和影响，以其有限的能力争取在美、苏之间发挥最大的作用。

三　从英帝国到英联邦

英国将维持英帝国和英联邦的独特联系，看做是维护战后英国世界大国地位的一个重要因素。保守党人十分看重帝国的“光荣”和“伟大”，特别重视英国同老的白人自治领的亲密关系。工党和自由党的拥护者则强调不断发展演进的多种族英联邦的价值，工党左翼甚至把它看做是一种有可能成为平衡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第三种力量”。英国把实现英帝国向英联邦的平稳过渡与拉美国一起同西欧遏制苏联，看做是战后英国外交面临的两大任务。

英联邦是英帝国历史发展演变的产物。英国为了使由白人移民建立的殖民地留在帝国内而不重蹈北美 13 州脱离母国独立的

覆辙，允许他们依照母国的样式实行程度不同的内部自治和责任政府制度。从1867年英国议会通过“英属北美法案”、加拿大成为英帝国内第一个自治殖民地起，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也先后取得了自治领地位。不过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还没有一个自治领能够独立决定自己的对外政策。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些白人自治领站在英国一边参加了战争，在人力和物力方面给予宗主国以重要支持，从而为它们战后要求进一步调整帝国内部关系提供了条件和可能。1926年举行的帝国会议通过了贝尔福勋爵起草的《帝国内部关系委员会报告》，确认各自治领是英帝国内地位平等的自治实体，在内政和外交事务的任何方面彼此都无隶属关系，唯以对英国君主的共同效忠为纽带，作为英联邦国家的成员自愿联合在一起。[①]1931年英国议会通过威斯敏斯特法案，将帝国内部关系的这种变化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英联邦遂正式形成。

英联邦的兴起和发展，是与英帝国的演变和解体同时进行的。白人自治领在帝国内同英国政治上平等地位的确立，是两次大战之间帝国演变史上的重大之举。但威斯敏斯特法案并不涉及广大的英属殖民地、保护国和委任统治地。第二次世界大战严重动摇了英帝国殖民体系的基础，导致了战后英帝国的迅速解体。英国在高涨的民族解放运动面前，在美国的压力下，表现了较多的灵活性和现实主义态度。英国统治集团意识到，现在再抓住昔日的殖民地不放，是行不通了，而顺应历史潮流，作一些让步，甚至同意给予殖民地独立，使它们和英国保持尽可能良好的关系，就有可能更好、更多地保持英国在那里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影响（在有可能和必要的地方还要保持驻军和基地）。所以英国竭力争取使尽可能多的前殖民地附属国留在英联邦内，希望借助英联邦这个形式维系正在瓦解的英帝国。

---

① 转引自尼·曼塞夫：《英联邦经验》（两卷本），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82年，第2卷，第27～28页。

印度的独立及其作为一个共和国留在英联邦内，对于英联邦的发展演变具有重要的作用和影响。使印度留在英联邦内是英国政府的既定政策，这不仅是为了维护英国在印度的利益，而且是英国统治集团当时从东西方对峙和斗争的需要出发作出的抉择。艾德礼在1949年2月呈送给英国王阅示的一份文件中指出，如果印度希望作为一个共和国留在英联邦内的意愿遭到拒绝，那“它就可能成为一个反对欧洲人的亚细亚运动的领袖”；而如果使它留在英联邦内，“那就极有可能在东南亚建立一个某种类似西方联盟的组织”。[1] 英国政府为了使印度不致因政体的改变而退出英联邦，便同其他英联邦国家协商决定，不再把效忠英国君主作为英联邦成员国的一个必要条件，而只要承认英国国王作为英联邦国家联合统一的象征和英联邦的元首，即可成为英联邦的成员国。1950年印度宣布为共和国，在上述条件下继续留在英联邦之内。这就为后来一系列宣布为共和国的前英属殖民地加入英联邦提供了先例。1957年后，随着非殖民化进程的迅速发展，大批脱离了英国殖民统治的新独立国家加入了英联邦。这样，英联邦就由一个“白人俱乐部”演变为一个多种族的、具有不同文化宗教背景与不同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国家组成的联合体，成为包括大部分英国前殖民地附属国在内的一种松散的国际联系形式。英国企图在政治上充当英联邦的发言人，利用英联邦提高自己的国际地位和身价。

英国的这种期望，当然带有相当大的主观成分，不过它也并非毫无根据。英联邦和帝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英联邦虽没有正式问世，但已实际上形成）帮助英国取得了战争的胜利，对英国的实力无疑是一种补充和加强。当1945年英国和自治领从战火中胜利走出时，它们被看成是一个拥有共同信仰和统一目标，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国家集团。

---

① 尼·曼塞夫：《英联邦经验》（两卷本），第2卷，第155～156页。

从战后初期到50年代中，英联邦在经济、外交和防务方面在一定程度上配合和服务于英国的利益和战略需要。在这一时期英联邦于30年代建立起来的帝国特惠制（后改称“英联邦特惠制”）和英镑区这类经济机制，还能较为有效地服务于英国和英联邦国家的利益，促进了英国同英联邦国家间的经济联系。由海外战略要地组成的基地网（亦称“帝国生命线”）仍基本保持完整无损。这不仅对保护英国在英联邦内的利益和影响、保障联邦的战略联系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被认为对在全球范围内抗衡所谓的“共产主义扩张”和“威胁”，也具有重要的价值。

英联邦大多数国家尽管在评价苏联威胁方面存在着广泛的一致，但实际上任何人都不愿承担明确的义务，在制定或协调政策规划方面难以达成任何有效的协议。帝国实行统一防务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

随着英联邦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原自治领独立自主倾向的加强，“英联邦”一词的含义也发生了变化。二战前英联邦（THE BRITISH COMMONWEALTH OF NATIONS）是指英帝国内的独立成员国所组成的联合体；现在联邦之前的“英国的”（BRITITH）形容词被去掉，表示它与英国已不再有什么从属关系，其成员也不只包括原来的自治领，而且还包含帝国内的殖民地和附属国。这样，“英联邦”一词实际上就取代了原来意义上的“英帝国”。带有殖民主义旧有痕迹的“自治领”一词，也逐渐从英联邦关系的词汇中消失。英国政府中的“自治领事务部”于1947年改名为“联邦关系部”。

四　英国的欧洲政策

英国是一个欧洲国家，其安全与政治经济利益直接同欧洲大陆的状况相关。但是英国又自视不完全属于欧洲，不认为它仅仅是欧洲众多国家中普通的一员。因此它认为自己不宜加入一个紧密联结在一起的欧洲一体化组织。丘吉尔曾用 WITH，而不用 OF

来表示英国同欧洲的关系。他在谈到欧洲一体化时说："我们同欧洲在一起，但并不属于它。我们与之联系在一起，但不是其组成部分。我们对它感兴趣，同其联系交往，但不能被并入或同化。"①英国对战后欧洲统一运动所持的这种超脱态度，是英国欧洲政策的一个重要特点。

不过，英国人虽然不愿直接参与欧洲一体化，但他们并不反对欧洲合作的概念。他们甚至表示不反对其他西欧国家组成一个一体化的组织，只要英国置身其外，其决策和行动自由不受到限制。例如，面对欧洲力量均衡急剧变化的新形势，丘吉尔从二战临近结束时起，就一直在为组织一个同美国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西欧集团而奔走呼号。1946 年 9 月他在苏黎世发表演说，提出了建立欧洲合众国的设想。他呼吁法国和德国实现和解，在英、美帮助下重建欧洲。丘吉尔还发起了一场欧洲联合运动，强调埋葬昔日欧洲各国之间的敌对情绪，组织一个囊括欧洲大陆西半部国家的经济政治实体，以便同苏联相抗衡。安东尼·艾登也多次表示，为了吸取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教训，必须在西欧建立一个共同防御的联合体制，以此来阻止"新的希特勒"搞"各个击破"的策略。英国要想实现真正的安全，就需获得某种"纵深防御体系"，而只有妥善组织起来的西欧才能提供这种纵深防御和广大人力，从而减轻英国的负担，避免由于维持一支庞大的常备陆军而损害英国经济。艾登还看到，欧洲希望英国有自己的欧洲政策，该政策以恢复欧洲较小盟国的独立和恢复法国的大国地位为其目标。另外，英国与西欧的紧密合作还应以防止德国再度进行侵略为目的。工党对欧洲统一运动虽不那么积极，但采取实际步骤促使西欧国家组织起来同苏联抗衡的，却是艾德礼政府。1947 年 3 月英国同法国在敦克尔刻签订了同盟互助条约，作为未来西欧国家集团的核

① 引自德里克·希特：《英国和外部世界》，朗曼集团图书公司，1976 年，第 46 页。

心。接着贝文于1948年1月在下院提出了建立西欧联盟的主张。贝文以加强西欧合作作为争取美国援助西欧经济复兴和在防务上对西欧承担义务的手段。

但是，随着战后欧洲统一运动的发展，英国同一些西欧大陆国家之间有关欧洲建设的矛盾与斗争就变得尖锐起来。当欧洲统一运动在经历了以发展政府间合作为特征的最初时期而进入一体化阶段之后，这一运动内部联邦主义与邦联主义两种不同方针的分歧就公开化了。

战后欧洲统一运动中联邦主义与邦联主义的第一次较大争吵，是围绕欧洲委员会的建设问题展开的。欧洲委员会是根据1948年5月海牙欧洲大会所提出的呼吁，经法国倡议，由英、法等10个欧洲国家的政府于1949年8月建立起来的。英国工党政府对于参加由联邦主义者倡议成立的欧洲委员会非常不情愿。西欧大陆国家那些热心的联邦主义者，把欧洲委员会的建立看作是欧洲走向全面联合的一个重大步骤，希望把它（特别是委员会的“欧洲咨询议会”）建设成为具有某种超国家性质的权力机构。而英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则拒绝接受任何比松散的政府间合作组织更进一步的建议。他们坚持认为，新机构的决策权应保留在各国政府及其代表手里，在欧洲委员会内“部长委员会”应起主要作用，“欧洲咨询议会”的成员应由各国政府负责选择任命。由于英国等国的反对，西欧大陆国家联邦主义者把欧洲委员会建设成为一个政治和经济联盟的设想未能实现。

欧洲联邦主义者在欧洲委员会建设问题上所遇到的挫折，促使他们转向积极推行“职能主义一体化”的主张。关于建立“欧洲煤钢共同体”组织的舒曼计划，就是实施职能主义一体化的第一个方案。根据舒曼计划，拟议中的煤钢共同体成员国要将煤炭和钢铁工业的决策权让渡给一个超国家的“高级权力机构”。而英国人从根本上反对参与任何涉及转让国家主权的欧洲联合计划，所以工党政府就拒绝了舒曼计划。艾德礼首相在下院说：“我们这方面不准

备接受这样的原则，依据这一原则我们国家最重要的经济命脉将要交给一个根本不民主而又不对任何人负责的机构去管理。"[1] 英国对关于建立"欧洲防务共同体"的普利文计划也持冷淡态度。它以拟准备建立的防务集团带有超国家性质为由，拒绝加入欧洲防务共同体，声称它作为一个世界大国不能被超国家性质的联合捆住手脚。

1951 年 10 月保守党在大选中上台。丘吉尔在野时曾对西欧联合表示了积极态度。一些西欧大陆国家的领导人以为，保守党重新上台执政可能会给英国的欧洲政策带来转机。其实，上台后的保守党政府同工党执政时对西欧一体化的态度并没有什么大的差别。1951 年 11 月 28 日，戴维・马克斯韦尔・法伊夫爵士在欧洲委员会宣读了一项声明，声称英国将"仔细研究"有关建立一支欧洲军的建议。但几个小时之后，外交大臣艾登就在罗马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宣布，英国军队将不加入欧洲军，尽管可能会有一些其它形式的联合。[2] 1952 年 1 月艾登就西欧 6 国签订煤钢共同体条约一事发表谈话说："这是一件我们从内心深处感到不能做的事……因为英国的利益远远超出欧洲大陆。"而英国退出墨西拿会谈、拒绝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的事件，正是发生在保守党执政时期。

英国在战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对欧洲一体化进程持冷漠和超然的态度不是偶然的。首先，英国同西欧大多数国家在二战期间及战后的不同经历和地位，导致它们对战后欧洲统一运动采取不同的立场和态度。二战期间，欧洲大陆上几乎每个参战国都遭到了严重的蹂躏，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念及民族主义倾向受到冲击。在这种情况下，战后关于欧洲联合的思想在西欧大陆国家公众中得

---

① 汉瑞德和奥顿：《西德、法国和英国的对外政策》，普伦蒂斯—霍尔图书公司，1980 年，第 233 页。

② 梅德利科特：《英国现代史 1914～1964》，商务印书馆，1990 年，第 569 页。

到了迅速的传播。但是英国的处境却与西欧大陆多数国家的情况很不相同，它为欧洲重建开出的药方自然也很不一样。英国在二战期间是西欧参战国中唯一保存了自己政治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国家。它曾单独同希特勒德国作战，是与美、苏并列的世界上三个主要的战胜国之一。这一事实大大增强了英国人的民族自信心。因此当西欧大陆邻国试图寻求一条新的欧洲重建道路时，英国人完全有根据沿着自己过去的道路走下去；而没有什么明显的理由说明，他们应该把自己的命运同一个极度虚弱衰败的大陆欧洲完全拴在一起，或把自己的主权交给一个超国家的欧洲组织。

其次，大英帝国的解体过程虽然在战后初期已开始迅速发展，但从英帝国向英联邦的过渡尚属平稳顺利。英联邦难以控制的内部矛盾虽已十分明显，但从总体上说尚能艰难地维持。这个时期英帝国和英联邦，无论从感情上还是实际上对英国都还至关重要。据统计，1957 年英国同西欧大陆 6 国的贸易只占其对外贸易总额的 14%，而对英镑区的贸易则占 44%。[1] 同年，英联邦国家在英国海外投资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则高达 58%。[2] 英国担心同 6 国结成经济联盟实行统一的对外关税，将损害它同英联邦国家的经济联系。在政治上，英联邦作为维系英国同前殖民地附属国的一种手段，缓解了因帝国解体而给英国公众所带来的冲击和心理负担。总之，只要伦敦考虑到英联邦对它还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它就不愿意向欧洲一体化迈出决定性的步伐。

第三，战后国际政治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世界两极化格局的形成和发展。世界政治的决策中心已从欧洲转移到美国和苏联，对欧洲和世界事态发展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力量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英国看来，只有美国才有足够的实力与苏联抗衡。因此西

---

① 联合国：《国际贸易统计年鉴》，1960 年。

② 米勒：《英联邦事务概览：英联邦发展和衰落问题的综合研究 1953～1969》，牛津大学出版社，1974 年，第 447 页。

欧防务必须同美国挂钩，必须把大西洋联盟作为欧洲安全保障的基础。英国统治集团之所以对法国领导的西欧一体化运动持冷漠超然的态度，一个重要考虑是，它认为法国要建立的独立于美国之外的欧洲一体化组织，不仅有可能促使美国同西欧防务脱钩，从而危及欧洲的安全和均势；而且如果英国陷入那样一个联合的欧洲，它也将难以再独立地对美国的政策施加影响，从而危及它在美国对外关系中所享有的特殊地位。与西欧国家相比，美国显然是英国当时的主要伙伴，英国不愿影响英、美特殊关系。

第四，英国的历史、传统和多年形成的民族政治文化特性，对英国同欧洲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制约作用。英国作为一个岛国，一条英吉利海峡将其与欧洲大陆分割开来。英国的这种地理环境，使英国人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与大陆隔绝的岛民心理状态。英伦三岛近千年来与西欧大陆国家（特别是法国）之间的恩恩怨怨，使它同西欧大陆的关系长期处于一种若即若离的状态。特别是近两个多世纪以来，随着英国大举向海外进行殖民和经济扩张，建立了广泛的海外联系，使它的利益和影响遍及全世界。英国成为一个超然于欧洲之外的世界大国。英国对欧洲的传统政策，是维持欧洲大陆国家之间的均势。在通常的情况下，它总是要竭力使欧洲保持分裂，因为一个联合的欧洲很可能被用来对付英国（这在历史上不乏先例）；即便不是如此，那也会使它面临困难的抉择：(1) 如果成为“欧洲”的一部分，那就可能使英国失去其世界大国地位；(2) 如果留在外面，则有可能使英国丧失对欧洲事务施加影响的机会。所以，维持一个群雄并立、相互牵制的“传统的”欧洲，似乎更符合英国的利益和需要。英国政治文化方面注重传统的民族特性，对英国政府的欧洲政策也具有重要的影响。英国是西方最早实行议会民主制度的国家，他们比其他民族更难以接受“主权可以分割”的观点。工党领导人盖茨克尔曾宣称，对于英国来说，放弃它的主权，或者放弃其中的任何一部分，都意味着“英国作为一个独立的欧洲国家的终结……英国1000年历史

的终结。”[①] 英国政治文化中的实用主义传统，强调经验，注重眼前利益，不信任长远的政治允诺和目标。英国人怀疑从欧洲一体化中能获取长远的经济实惠。他们以稳健、讲求实际而自诩，认为与其谈论好听而不现实的欧洲联邦，不如集中精力解决一些政府间合作中的具体实际问题。

总之，战后英国的内外环境及其国际地位，以及地理和历史方面的种种因素，促使英国在40和50年代西欧一体化进程中采取一种冷淡、超然的态度，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置身于这一进程之外。但这并不是说，英国就完全放弃了对西欧一体化进程施加影响的努力。事实上，英国早就感到了西欧一体化建设可能给自己带来的冲击和威胁，一直在试图让这一进程按照自己所希望的方向发展。例如，针对西欧大陆六国拟议中建立的共同市场，参加以斯巴克为首的政府间委员会的英国代表，于1955年秋提议建立一个包括所有欧洲经济合作组织成员国在内的、没有共同对外关税的单纯的自由贸易区。接着1956年秋英国又向欧洲经济合作组织提出倡议，由参加该组织的所有国家组成一个工业自由贸易区，作为六国关税同盟的补充。这实际上是要把六国关税同盟消融在一个自由贸易区之中。难怪有人尖锐地指出，英国的全部政策是致力于通过使它面目全非来破坏已经达成的一切，试图“把欧洲淹没在大西洋里”。[②]关于建立欧洲自由贸易区的谈判于1958年12月最后破裂。为了继续与六国抗衡，英国同奥地利、丹麦、挪威、葡萄牙、瑞典和瑞士于1960年5月正式建立了欧洲自由贸易联盟。这样，西欧在经济上就形成了“六国”和“七国”并存的分裂局面。哈罗德·麦克米伦曾表示对上述状况的深切忧虑：“在漫长而往往令人失望的欧洲运动的历史中，笼罩着进一步分裂

---

① 盖茨克尔在1962年英国工党年会上的讲话，转引自罗伊·詹金斯编：《英国和欧共体》，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83年，第24页。

② 德里克·厄尔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西欧政治》，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5年，第243页。

的危险。已经从什切青至的里雅斯特一线遭受残酷的分割，难道欧洲现在还要由于中央集团的建立而再行分裂吗？……在防务方面，欧洲已经失去诸如瑞典、瑞士和1955年条约后的奥地利这样一些中立国家的帮助。难道现在又要在经济领域中重复这一事态吗？"[①] 麦克米伦认为无论"六国"还是"七国"，都内向大于外向，都会助长欧洲的分裂倾向，都会造成政治含义上的模糊不清。他认为如果从欧洲前景着眼，必须采取具体行动促进欧洲的真正联合，扩大欧洲的贸易交往，以弥补西欧国家两个集团间的裂痕，从而保持欧洲联合的观念。

第三节　欧洲联合与舒曼计划

一　欧洲人对"欧洲"的构想

欧洲联合思想古已有之。但对不同历史时期的欧洲联合思想，从其内涵到外延，从其内容到形式，均需从历史的角度，看到它的差异和相似之处，才可以对当代的欧洲联合思想作出较客观的分析和估价。

欧洲联合思想的真正萌发，是进入中世纪之后，随着在地理范围和政治文化范畴内，"欧洲"这个概念逐渐确定而产生的。

欧洲进入中世纪之后，一个个具有独特政治经济利益的民族国家纷纷诞生，国家之间的分裂和冲突，较之与过去的纯武力的扩张与征服更具有政治性。在中世纪，尽管欧洲长时期在精神上有着一个共同体——"基督教的欧洲"（虽然恩格斯称"这种神学上的联合不只是观念上的"[②]），在文化上继拉丁语之后又有过"法

---

① 哈罗德·麦克米伦：《指明方向》，商务印书馆，1976年，第54～55页。

② 恩格斯：《法学家的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545页。

语的欧洲"，但政治上的分裂和冲突以至战争带来的恶果，使广大人民更加渴望和平安宁的生活，向往和睦的一统天下。这种朴素的自然要求，反映到政治思想上，就出现了对未来欧洲的憧憬、设想和追求。最初的欧洲联合思想，正是这些五彩缤纷的憧憬、设想和追求中的火花。

17 世纪初期，法国大臣苏利公爵提出了据称是法王亨利四世设想的"宏伟计划"，主张把欧洲重新组织成 15 个实力均衡的国家，各国派出代表组成总理事会，在武力支持下行使仲裁权力。这是个较早、较系统且有影响的欧洲"联邦"计划，所以在 1948 年的"欧洲大会"上，丘吉尔将亨利四世和苏利称为欧洲统一运动的创始人。

1693 年，英国人威廉·佩恩提出了建立"欧洲议会"的主张。这个议会由欧洲各国根据实力大小按比例派出代表组成，采取多数通过制决定重大事宜，配备武装保证执行。他认为，这样欧洲和平就可以实现，经济和贸易就可以得到发展。此时，通过欧洲联合形式以谋求欧洲和平的主张，才真正显示出一些政治理论色彩。

"通过欧洲范围的联合以求欧洲的和平的理论家，首推法国的圣－皮埃尔（1658～1743）。"① 圣－皮埃尔 1713 年发表《争取欧洲永远和平方案》，他在方案中提出建立"欧洲邦联"的设想，主张国家之间缔结一个永远盟约，服从共同的法律，组建"欧洲参议院"作出重大决定，并以武装军队来保证贯彻执行。圣－皮埃尔的"和平方案"，是想以"欧洲邦联"的形式解决欧洲国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实现永久的欧洲和平。

此后，为欧洲革命开道呐喊的启蒙思想家们，也纷纷亮出了自己对欧洲统一的种种看法。但是，不管是卢梭的寄希望于人民的欧洲共和国，还是伏尔泰寄希望于君主们的欧洲统一，以及康

---

① 陈乐民：《"欧洲观念"的历史哲学》，第 45 页。

德式的各主权国家间邦联式的同盟，都只是思想家们在头脑里思考的结果；带有一定的空想性。就欧洲联合问题而言，还没有形成一股有影响的社会舆论思潮，只局限在少部分人的范围之内，并没有引起握有实权的政治家们的注意，更谈不上付诸政治实践。

法国大革命的成功，将欧洲历史大大地向前推进了。拿破仑试图统一欧洲，他说道："我要以我过去安排我们自己国内各方面的联合时所采用的同样方法，来对欧洲各巨大利益集团的联合作好准备。"拿破仑关于欧洲统一的注释也很坦率：在这个欧洲里，法国是"仲裁者"，他自己是欧洲人的"皇帝"。随着欧洲列强将拿破仑击溃于滑铁卢，拿破仑试图以武力统治下的法国霸权式的统一欧洲也成了泡影。随之而来的欧洲封建君主们的"神圣同盟"，则复活了大国之间相互交易和维系力量平衡的旧欧洲体系。在反对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中形成的维也纳体系，并没有给欧洲带来和平的憧憬，19 世纪大国均势之下的欧洲，仍然爆发了多次战争。

1814 年，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同奥古斯坦·蒂埃里合作，发表了"论重新组织欧洲社会"一文，主张成立一个欧洲联邦政府和一个欧洲议会，以消除欧洲国家之间的纷争，实现持久和平。从此，在 19 世纪，欧洲联合问题与普遍争取和平运动紧密结合在一起。实现欧洲统一，建立欧洲联邦或欧洲合众国，被和平运动主义者视为消灭战争、实现和平的主要途径。1849 年在巴黎召开了"和平之友大会"，大会主席维克多·雨果宣布，"和平之友运动"的主要目的就是促进欧洲联合，预言"选票将代替炮弹"。1867 年在日内瓦再度召开"和平之友大会"，在意大利革命家加里波的主持下，决定出版期刊《欧洲合众国》。

但是，19 世纪是近代欧洲列强争夺最激烈的时期，与此同时，欧洲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此起彼伏，特别是资本已经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它只有依靠战争，才能最后实现自己的目的。在这样的前提下，试图通过欧洲联合来消除战争、实现和平，只能是一种

幻想。尽管为和平实现欧洲联合始终具有吸引力，但越来越显得困难重重。所以在整个19世纪，欧洲联合问题只是一种“民众运动”，始终没有进入政治家的议事日程。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无疑是对欧洲联合主张的一个沉重打击，但从另一方面，战争的悲惨后果又更加激发了人们对欧洲联合的追求。战争结束后，欧洲联邦主义的影响日甚，他们在谈到欧洲联合问题时，已经开始接触到一些实质性问题。比如首先是经济上的联合，法、德和解与合作。1924年，奥地利贵族理查德·库登霍夫—卡勒基发表《泛欧洲》一书，倡导泛欧运动，组织泛欧联盟，主张建立不包括苏联和英国在内的欧洲合众国。1926年第一次泛欧大会在维也纳举行，像阿登纳、舒曼这些后来在欧洲联合中举足轻重的政界要人，都出席了会议。1929年，法国外交部长白里安向德国建议组织“欧洲联邦”，并于1930年5月向欧洲各国政府提交“关于组织欧洲联邦体系”的备忘录，倡议成立欧洲主权国家联盟、取消关税、建立共同市场、成立欧洲议会和常设政治委员会，以杜绝欧洲战争再起。这一举动可以说是欧洲联合历史上空前的，因为长期在民众中呼吁呐喊的欧洲联合问题，终于成了欧洲政府间的外交活动。但是，英国无意参加大陆联盟，德国首先想的是如何摆脱凡尔赛条约，即使在法国，强硬派也不愿在这个联盟中同德国平起平坐，而1929年的经济危机又使各国闭关自守。于是，这个“早熟的”计划在冷淡反映中搁浅了。紧接着，希特勒上台，战争的阴云迫人窒息，欧洲联合更是成了没有希望的幻影了。

战争期间，欧洲联合的思想并没有停止活动，有趣的是，它主要在抵抗运动中传播，这也许正是因为这些抵抗运动的参加者对战争有切肤之痛。他们认为，历史已经证明，千百年来人们赖以生存的民族国家已经无法对公民尽到责任，它反而有利于民族主义走向极端，成为罪恶战争的思想根源，纳粹主义就是例证，因此，战后一定要重建欧洲，建立欧洲联邦。

欧洲联合思想发展到这一阶段，已充分显示出，它既源于民族国家的存在和交往，又作为人们想象中民族国家的取代物而产生和发展，正因为这样，欧洲联合问题始终也无法摆脱一个争论，即人们思想中的欧洲联合同民族国家的关系，到底是一个主权国家的邦联，还是一个超国家的联邦，尽管大家都希望欧洲联合导致欧洲和平。

二　战后初期的欧洲联合思潮和运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使欧洲发生了重大变化。战争的破坏使欧洲到处是废墟。生产停顿，人民生活困苦，这种地位决定了欧洲国家既要仰美国之鼻息获取援助以渡难关，又要相互之间加强合作支持谋求复兴，更要探索一条杜绝战争的欧洲道路。此外，美、苏之间的对峙对欧洲的西方国家来说，更感到联合与合作的必要。这样，战后的欧洲联合又首先在西方国家中筹措运行。

战后关于欧洲联合最具鼓动性的举动，当属1946年9月19日，丘吉尔在苏黎士大学发表题为《欧洲的悲剧》的演说。丘吉尔说："摧毁了纳粹政权的时候，我曾自问，对这个生灵涂炭民穷财尽的欧洲大陆的兄弟公民们，我能向他们提出什么最好的建议呢？我的建议可以概括成一句话：联合起来！""我们需要建立某种欧洲合众国。为把这项急迫的任务完成好，法国与德国应当和解，英联邦、强大的美国，而且我诚恳地希望还有苏联——都应该成为新欧洲的朋友和保证人……"丘吉尔关于欧洲联合的想法有三点比较明确：一是欧洲的出路只有联合——建立欧洲合众国；二是欧洲联合首先要实现法、德和解；三是英国和苏联，当然更不包括美国，都不在这个联合的欧洲之内。

在丘吉尔演说之后，关于欧洲联合的言论、组织、活动，纷纷出台，为欧洲联合掀起了一阵颇有声势的高潮。其中，最为活跃的还是欧洲联邦主义者。他们竭力主张建立欧洲联邦，拥有一个有权力的欧洲政府，其中以法国和比利时人居多。1946年12

月，50多个联邦主义组织的代表在巴黎组成了欧洲联邦主义联盟。1947年6月成立了欧洲社会主义合众国运动，这个以社会主义者和工会活动家为代表人物的运动，主张首先建成欧洲联邦，然后促使它成为社会主义合众国。20年代以“泛欧运动”闻名的库登霍夫·卡勒基战后回到欧洲，1947年他在欧洲各国议员中组织了欧洲议会联盟，试图由各国议员推动成立一个由各国议会选举产生的欧洲议会。另一方面，主张以主权国家之间的合作为联合道路的邦联主义者也在积极活动，这主要以英国人为先。

1947年11月，欧洲运动各组织之间为了加强联系，决定成立一个国际协调委员会，以便进一步推动欧洲联合。

1948年5月7日，欧洲统一运动国际协调委员会在海牙组织了“欧洲大会”。这次大会云集了西欧各国积极倡导联合运动的显赫人物800多人，其中有200多名议员，12名前总理，60名左右部长参加，丘吉尔被推选为大会名誉主席，康拉德·阿登纳率德国代表团出席了会议。丘吉尔在大会演说中重申他在苏黎士演说的主要精神，声称：“我们要想把自己从逼近的危险中拯救出来，就只有忘掉过去的仇恨，丢开民族的怨恨心和复仇心，逐步消除那些使我们分裂加深和凝固起来的边界与关卡。”[①] 丘吉尔热烈欢迎阿登纳率团作为代表参加大会，强调“战胜国的光荣使命，就是拉着德国人的手，把他们带回欧洲大家庭”。[②]

海牙大会通过了政治决议、经济决议和文化决议。海牙大会的功绩在于显示了欧洲联合运动的力量，代表的组成结构为欧洲联合转向各国政府间的外交活动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大会虽然总的目标比较明确，但具体办法和建议没有实质性的进展。到1949年8月，成立了欧洲11国组成的欧洲委员会，这是一个属官方性质的政府间合作机构，包括部长理事会和咨询议会。欧洲联

① 丘吉尔：《欧洲联合起来》，商务印书馆，1977年，第146页。
② 同上书，第147页。

合问题成为政府政策，成为对外政策目的，至此已经很明显了。

随着欧洲联合运动的声势扩大，涉及的问题越来越具体，分歧也就愈加明显和尖锐，其中根本性的分歧就是联邦和邦联之争。与此相应，还有个欧洲联合究竟是先从政治入手还是先从经济入手的问题，特别是欧洲联合问题日益从理念和想象中走向现实和具体，逐步列为政府政策议程时，这种争论和分歧就日益表露出不同民族国家的利益冲突。

战后初期欧洲联合之所以能形成一股颇有声势的运动，是战争的后果以及战后特定的国际环境，使欧洲有识之士更加迫切地感到欧洲国家之间还是有着共同利益的基础，有可能更有必要联合起来。这种基础，就当时来说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战争的结果，使欧洲国家统统降为二等或三等的国家，多年以来在欧洲以自身均衡政治来约束欧洲局势的可能已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逐渐明朗化的以美、苏两大国为主的雅尔塔体系。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面临着恢复经济、恢复往昔地位的任务，可任何一个国家又都不可能仅依靠自己的力量改变处境，只有通过合作协调，共同努力，创造一个适合的国际环境并在美国的援助下，复兴才有可能。因此，当马歇尔计划提出并要求受援国之间首先要合作提出一份相应计划时，欧洲联合的某些举措已经开始了。其次，战后苏联已成欧洲强国，在战争中坚持抗战的各国共产党，不仅赢得了民心，而且力量空前壮大，随着东欧国家人民政权的建立，东西方对峙在欧洲已成定局。丘吉尔的富尔敦演说将“来自东方的威胁”更明确地摆在西欧国家面前，成了战后欧洲联合运动的催化剂，于是又有了后来的布鲁塞尔条约。最后，起主要作用的仍然是多少年以来欧洲联合的主导思想，即通过欧洲联合来保障欧洲安全。两次世界大战的元凶德国虽然已战败并被占领，但复仇主义的威胁仍然存在，德国问题没有最终解决。通过联合将德国控制在联合体当中，成为防止军国主义复活的最佳设想。正是这些共同利益基础，促进了战后欧洲联合运动逐步走向实质性阶段。

但是，共同利益基础并不抵消不同利益冲突。顾名思义，联合本身就是因为存在“分”，才有“合”的要求。联合是因为存在分歧，存在矛盾，试图通过联合来解决旧的矛盾，消化新的矛盾。因此，欧洲联合从一开始，就在这种对立统一规律之中演进发展。

战后欧洲联合的倡导者依据共同利益基础倡导联合，但不同国家及其代表人物因为国家利益的差异，他们的联合目的、联合的政策都有着不同的打算。

大陆上的西欧国家基本上都是战争的受害者。作为战争的最后失败者，像意大利，特别是德国，对于欧洲联合抱有很大的期望，认为德国如能参加到一个联合的欧洲中，有助于提前结束被占领状态，摆脱孤立，尽快获得平等地位。因此，有关欧洲联合的动议在德国都是受到欢迎的。比利时、荷兰、卢森堡和其它一些小国，从原则上来讲都支持欧洲联合，因为它们作为个体来讲都势单力薄，寄希望于联合能够共同发展，而且有效地将德国制约于联合体之内。但正因它们势单力薄，又从另一方面害怕在联合中受大国控制，一直对英国的不积极参与政策心存疑虑。至于法国，与其说是关心欧洲联合问题，不如说是关心德国问题。在法国人看来，战后最迫切的国际问题、欧洲问题，就是如何处置德国，如何迫使德国军国主义不能复活、复仇主义不能再起。因此，法国人的欧洲联合政策是与对德政策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在战后最初几年里，肢解、分裂德国的政策，使法国在欧洲联合问题上颇费了一番精力。

英国对于欧洲大陆来说，是个海外欧洲国家。作为欧洲唯一没有被战败过的国家，本可以作为战后欧洲联合的主要策动者，但是，丘吉尔给英国定下的“三环外交”政策，实际上已将英国同英联邦以及和美国的关系置于同欧洲其它国家关系之前；尽管丘吉尔激昂陈词鼓动建立欧洲合众国，但那是大陆国家的合众国，并不包括英国。1945 年工党政府的欧洲政策更加明确，根本就不赞成一个超国家的一体化欧洲，坚持只在政府间进行磋商和合作，认

为解决德国问题离不开美国，让美国人参与控制德国人要比欧洲联合更有效。

美国由于战后在欧洲国家中的特殊地位，对战后欧洲联合运动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1947 年初，乔治·凯南和迪安·艾奇逊协助马歇尔制定了“遏制”理论，随后，以遏制共产主义为目的的杜鲁门主义出笼。在这个理论基础上，美国人认为，欧洲只有联合起来，才能阻止苏联向西方推进，才能有效地复兴德国并永远结束相互间的战争。当时任美国驻联合国代表、两党对外政策发言人的杜勒斯公开认为，欧洲统一对美国是有利的。1947 年初他在纽约演说时主张，欧洲不应再建立独立的互不关联的主权国家，德国问题应在欧洲统一范围内加以解决。1947 年 3 月，在参议员富布赖特提议下，美国参众两院通过决议“支持成立一个在联合国范围内的欧洲合众国”。马歇尔也公开承认，欧洲统一运动是促使他作出援欧计划决定的一个思想环节。[①]

总的来说，尽管各国都有自己的打算，但西欧国家需要联合起来，已成了各国政府间的基本共识。而且另一个共识是：欧洲联合的关键是德国问题，是法、德关系问题。这不仅是因为法、德两国都是西欧大国，而且因为法、德两国是欧洲历史上的战争世仇，积怨太深；更因为战后美国遏制理论的需要，决心复兴和武装德国。在英国支持下的这一政策，与法国力图肢解削弱德国的政策针锋相对。1949 年 10 月，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曾向驻欧各国大使发出通报，称西欧联合和德国与西欧国家的关系取决于法国。美、英联手向法国施加压力，要求法、德和解，同意复兴和重新武装西德。

这样一种局势，就把法国推到了欧洲联合的焦点上，欧洲联合是否能够走出实质性的一步，则取决于法国的对德政策。因此，战后欧洲联合的实质性设想来自法国的设计大师们也就是很自然

---

① 丘吉尔：《欧洲联合起来》，第 111 页。

的了。

三　舒曼计划——战后欧洲联合的起步

战争刚刚结束，戴高乐领导下的法国就表示出肢解削弱德国的强烈要求。主张鲁尔和莱茵兰地区国际化，萨尔与德国分离，经济上向德国索取高额赔偿。1946年戴高乐下台后，从1947年开始，法国的对德政策开始了变化。因为冷战的需要，法国被迫调整了在美、苏之间适度平衡的政策，改为向美、英的欧洲政策靠拢。德国没有被肢解，鲁尔也没有国际化。只是作为一种让步，美、英同意萨尔在经济上同法国联在一起。法国已经认识到，德国的复兴已势在必行，当前重要的是，如何使欧洲既能容纳德国又能有效地限制它，当然，还要有利于法国巩固独立地位和恢复大国地位，确立欧洲领导权。当时曾任外交部长的皮杜尔表示："法国首先是个欧洲国家。我们目前的使命就是要使法国成为欧洲联合的先锋。"他并不是个欧洲联邦主义者，但这时他想到的是法国在欧洲的地位和利益，在一个采取某种形式联合的欧洲中，法国有可能占据主导地位。这种从法国切身利益出发的欧洲联合思想，在法国政界赞同者大有人在。1948年底，丘吉尔曾对法国的政策说过这样一段话："在与德国和解的整个过程中，给法国在欧洲恢复自己的领导地位带来了机会。千年的争吵已使欧洲陷于衰败，并且几乎使世界文明遭到毁灭，现在该是结束这种争吵的时候了。旧帐是永远算不清的。报复是代价最高、耗费最大的劳民伤财之举……，让利害关系最大的法国带头把日耳曼民族带回到欧洲大家庭里来吧。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挽回自己的失败和恢复他们在世界上的地位。我觉得我们有权对法国人民提出这一忠告……大约两年半以前，我在苏黎士发表这个看法时，法国人还不能完全接受，……可是现在我发现他们的情绪变了，我为此感到高兴。"[1]

---

[1] 丘吉尔：《欧洲联合起来》，第319页。

这就是说，法国人已在考虑，如何在新形势下制定一项能够妥善处理德国问题的欧洲政策。1949年9月，联邦德国政府正式成立，阿登纳出任政府总理，为了尽快摆脱被占领的从属地位，西德政府接二连三地提出各种建议，这些建议包括同法国建立边境地区关税同盟，建立法德同盟或法德经济联盟。当然，阿登纳很清楚，德国人的任何建议都是舆论行动，只有法国政府才具备提出欧洲联合实施方案的主动权。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法国人采取了行动，1950年5月9日，导致欧洲煤钢共同体成立的舒曼计划出台了。战后欧洲联合这一重大而实质性的一步能够迈出，归功于欧洲联合的积极倡导者，法国的让·莫内和罗贝尔·舒曼。此两人在今日的欧洲联合运动中被誉为“欧洲之父”，足可见他们在欧洲联合中的地位和作用。

让·莫内1888年11月9日出生于法国科涅克，是法国著名经济学家、政治活动家。他的聪明才智和业务专长，以及他对欧洲联合孜孜不倦的追求和推动，使他的经历丰富多采、涉足世界，所以，他又是一位知名的国际政治家。莫内出任过国联副秘书长，他先后在美国、波兰、罗马尼亚、中国担任过经济顾问或财政顾问。二战期间，莫内使命重大，穿梭来往于盟国之间，为筹措抗击德国法西斯的军事装备和物资作出了贡献。法国解放后，他负责最紧迫而又最困难的物资供应工作。为了振兴法国，1946年莫内提出了法国现代化计划，为法国重建定下了大政方针。

但是，作为一个积极的欧洲联邦主义者，一直悬在莫内心头的问题是：采取什么办法处理德国问题，从而导致欧洲实现统一，防止各种民族主义势力重新抬头。

1944年7月，战争还没有结束，莫内在伦敦就对麦克米伦说过，整个欧洲的前途决定于德国问题的解决，虽然成立欧洲合众国是一个长远之计，但是欧洲国家可以先以某种形式结盟，以便从中制约德国。1945年夏，莫内明确指出，“欧洲各国如果只在民

族独立的基础上重建各自的政府，强权政治和经济保护主义就会重新抬头，欧洲便无和平可言”。于是，他呼吁为了欧洲的繁荣和社会发展，欧洲各国应该组成一个联邦，或者是先搞成某种经济实体。[①] 仅隔一年，莫内在美国《幸福》杂志上指出，“德国问题是个中心问题”，提出建立某种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权力机构，让各国共同参与管理鲁尔的煤钢资源。莫内说道：“此举将导致欧洲实现统一。这种统一不仅是通过合作来实现，而且是通过把各国同意出让的那部分主权，合并转移到某种中央联盟的机构中去实现统一。这个联盟机构能够打破各国的关税壁垒，建立一个巨大的欧洲市场，防止各种民族主义势力重新抬头。”莫内认为，这就是他的主要想法。[②]

但这并不是莫内的全部想法。应该指出的是，即使是莫内这样的公认的联邦主义者、积极主张建立放弃国家主权的超国家机构的“欧洲之父”，他的欧洲联合思想，也是首先立足于维护法国国家利益之上的。这一点，从莫内选择的欧洲联合的突破口就可以看出来。

莫内的想法因为忙于实施法国现代化计划和等待适合的机会，拖到1950年初才开始付诸行动。

1950年4月16日，莫内在他的计划总署助理艾蒂安·伊尔什，国际法教授、外交部法律顾问保罗·勒泰的协助下，草拟了后来称为“舒曼计划”的欧洲煤钢共同体计划。

在莫内的计划里，选择了煤和钢铁这两个经济部门作为通向欧洲联合的突破口。战后初期的煤炭，是工业的“食粮”，主要能源。鲁尔的煤炭，不仅支撑发展了整个德国工业，也是法国洛林钢铁基地的主要依靠。因此，为了防止德国利用煤炭资源重新崛起，也为了保证法国工业能源的正常供应，煤炭被选择为欧洲共

---

① 让·莫内：《回忆录》，〔法〕法亚尔出版社，1976年，第263页。

② 同上书，第264页。

管。至于钢铁，它是军备生产的基本材料，实行共管，无疑是被看成限制德国军备生产的最有效措施。因此，莫内的计划应该是最适合当时广大法国人的要求的，它既满足了法国经济振兴发展的需要，又从政治中满足了人们限制德国的心理要求。当然，莫内毕竟是个地道的欧洲联邦主义者，尽管他立足于法国利益，但他设想的是一个拥有实权的独立机构来实行共管，这就与以往那些建立在政府间的协调合作机构大大不同，即人们称谓的“超国家机构”。莫内计划的独特性就在这里。

莫内在计划里写道：“欧洲应在联邦的基础上组织起来。法、德联合是欧洲联邦的基本因素。……从现在起，即应建立发展经济的共同基础，这是法、德联合的第一阶段。法国政府建议将法、德两国的煤和钢的全部生产置于同一国际组织领导之下，这个组织面向其它欧洲国家开放，他们可以参加。这个组织机构的任务是，将各成员国的煤钢生产合并管理，而且要将这种以和平为最终目的的有效合作逐步扩展到其他领域。”[①]

文中提到“法国政府建议”，而莫内虽然影响巨大，毕竟不是政府成员。这个建议应该由谁代表政府提出呢？莫内认为最适合的人选当然是罗贝尔·舒曼，因为舒曼当时任法国外交部长，可以从政治上承担政府责任，而且舒曼又是一位积极的欧洲联邦主义者，他完全可能接受这个文件并设法使它付诸实施。

罗贝尔·舒曼出生在法国洛林。阿尔萨斯—洛林地区历来是法、德兵家必争之地。这一地区的归属随着战争的结局不同多次变更，所以阿尔萨斯—洛林人既希望尽早永远结束两国之间的争战，又期望着历史造成的与德国人民之间的千丝万缕联系能够顺其自然。舒曼在这一地区长期就学、从政。他渴望法、德两国修好。战争期间，舒曼就在设想如何在一个统一的欧洲内实现法、德和解。他不同意那种置德国于“死地”的对德政策，应该设法让

① 让·莫内：《回忆录》，第350页。

战败的德国重新有活力但又不可能重新对欧洲邻国成为威胁。1946年舒曼任法国财政部长，1947年任总理，1948年改任外交部长。在整个法国开始转变对德政策的时候，舒曼意识到应该是采取实际行动了。舒曼不能采纳阿登纳的建议，一方面因为这是德国人提出的，更重要的是他认为阿登纳为了德国有点操之过急，显然两国经济还有差别，不可能像阿登纳想的那样完全合并，步伐不能过快，快了反而可能不成功，只能通过不同阶段逐步实现。正在这时，莫内起草的计划送到了舒曼手中。

由此可见，欧洲联合的设计大师们对于第一步是多么慎重，它不仅说明尽管欧洲联合当时已可称为一种时髦运动，但真正实施起来有多么艰难，而且还预示着欧洲联合今后的进程也绝非一帆风顺。

舒曼计划导致了法、德、意、荷、比、卢六国参加的欧洲煤钢共同体的成立。英国当然置身于外，美国表示了积极的赞成态度，苏联则认为是美国支持下的西方国家针对苏联的一个行动。

舒曼计划的意义是巨大而深远的，有些在当时并不明显，尔后随着欧洲联合的发展扩大而日益显著。

舒曼计划的意义首先在政治上。舒曼计划解决了欧洲联合的先决条件——法、德和解问题。这种和解当然是从政治上着眼，即如何消除法、德之间的世仇宿恨，如何解除法国对德国有可能在恢复元气后再向法国进攻的疑虑。法国要在共同机构中充分利用自己战胜国地位，主张制约德国，并借此提高自己的地位；德国也希望尽快得到法国的谅解重返欧洲大家庭，进而恢复国际地位。因此，双方的目的都是政治性的。至于通过共同体从经济上获取多大利益，当时并不是第一位的。对于这一点，欧洲煤钢共同体的几位主要缔造者都有过明确的表态。阿登纳曾经转述过舒曼的话："他的建议所要达到的目的，并不是经济性的，而是具有重大的政治性质。在法国，人们担忧的是，德国一旦恢复了元气，就

会进攻法国。反过来说，他可以设想，在德国，人们也有安全的要求。重整军备首先总是煤、钢的增产过程中显其端倪。如果建立起舒曼所建议的那种机构，那么两国中的任何一国都能够觉察到重整军备的初步迹象，这对法国将起着极大的安定人心的效果。"[①] 阿登纳自己也强调："煤钢基础工业的联营为今后消除法、德之间的一切争端创造了一个真正的前提。我认为这就是法国政府的决定所具有的极其重大的意义。"[②] 他又说："如果说，舒曼计划的意义首先在于政治而不在于经济，我是同法国政府的见解完全吻合的。"阿登纳确信无疑，无论是研究计划后得出的结论，还是同法国人接触的感觉，"法国认为政治观点应占主要的份量"。[③] 莫内在解释舒曼计划谈到建立新型法德关系时也指出："法国的建议，从主观愿望来看，主要是政治性的。就其某些方面来看，甚至可以称之为道义性的。因此从本质上说，建议的着眼点是想在第一阶段首先实现法国政府的这一政治目标，并不过多地去考虑某些技术性的困难。"[④]

尽管舒曼、莫内，还有阿登纳都将舒曼计划的政治意义放在第一位，但当时无论谁也无法理解舒曼计划实施后政治意义的全部含义。在此后的欧洲联合进程中，往往是任何一个政治举动都比经济进展困难得多，于是欧洲联合体中逐渐形成了分别以法、德为代表的政治支柱和经济支柱，这两者之间的平衡关系，体现了新时期下的法、德关系。另外，随着欧洲联合的逐步发展扩大，欧洲联合力量的逐步强大，自然使欧美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尽管当时阿登纳等人也谈过"第三种势力"，但总不能说欧洲对美国闹独立、同美国展开激烈竞争，也是舒曼计划的初衷。经济政治的发展规律导致如此，也是美国所始料不及的。

---

① 《阿纳回忆录》第4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373～374页。

② 同上书，第378页。

③ 同上书，第385页。

④ 让・莫内：《回忆录》，第365～366页。

舒曼计划的意义还在于，欧洲煤钢共同体的成立标志着欧洲联合迈出了第一步，它向世界表明，欧洲联合是可行的。经过了多少代人的呼吁呐喊,欧洲联合终于从观念和舆论中的虚的东西，走上了实践和具体阶段成为实的东西,因此,对于后来的 6 国、乃至 12 国的欧洲共同体来说，虽然还只是局限在“西欧联合”范围之内，这一步确实是开创性的。

舒曼计划的意义还在于为欧洲联合确立了机构模式，建立了超国家机构的欧洲煤钢共同体组织,这就为欧洲联合确定了方针。尽管围绕国家主权问题的争论仍然不断地延续下去,但在当时,的确为在其他部门进行同样的联合尝试掀起了一股热潮。1950 年 8 月，法国人向欧洲委员会提出了在运输行业建立同样权力机构的方案，1950 年 11 月荷兰人向欧洲委员会提出了建立一个农业高级机构的草案，1951 年法国农业部长弗林姆兰起草了农业共同市场的草案，1952 年 9 月，法国公共卫生部长还提出过欧洲卫生共同体的建议。所有这些方案和建议，都未能获得成功，其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各国的利益难以互补，这从另一方面说明，欧洲煤钢共同体的成功，正是因为法、德两个主要国家通过共同体使利益得到了互补。

到于说莫内等人在迈出第一步后，由于初步成功又急于迈出第二步，试图在政治领域打开新的缺口，又由莫内起草了欧洲防务共同体计划——即普利文计划，结果在持续了数年搅乱了法国朝野上下的大辩论后，还是被法国人自己否决了。这个惨重的失败,使欧洲联合进程变得艰难和曲折了,直到 1955 年墨西拿会议，才有了新的转机。

第四节　阿登纳与德国复兴

一　阿登纳外交政策的目标

1949 年 9 月 20 日，联邦德国（西德）第一届政府成立，康拉

德·阿登纳出任政府总理，作为一个特殊形态的国家，西德一开始不得设立外交部，而由联邦总理阿登纳管理外交事务。直到1951年3月，西德方设立外交部，其部长之职由阿登纳兼任。1955年，阿登纳卸去外交部长之职，由海因里希·封·勃伦塔诺出任外长。但此后直至1963年，阿登纳虽然只担任联邦总理，却始终对西德的外交政策起着决定方针大计的主导作用。因此，可以说，阿登纳不仅是西德对外政策的奠基人，从根本上规定了西德外交的走向，而且使西德长达14年的外交政策，深深打上了阿登纳外交思想的烙印。这种烙印对阿登纳以后的联邦德国外交思想和外交政策，也时隐时现地发生影响。

阿登纳于1876年1月5日出生于莱茵河畔的科隆市，他的父亲是一名职业军人，后来当上科隆市的法官。阿登纳从1894年到1897年先后在弗赖堡、慕尼黑和波恩攻读法律和国民经济学。1906年被选为科隆市议会议员，踏进政界。1917年至1933年，阿登纳任科隆市市长。希特勒当政期间，他曾两次涉嫌反希特勒被抓进集中营，但后来都侥幸获释。阿登纳的这段经历对他以后的政治生涯极其重要。战后美国人正是看中阿登纳当过科隆市长和被希特勒抓过的“历史”，从德国的政治废墟中把阿登纳请出山，让他再当科隆市长。正是这块垫脚石日后使阿登纳在西德战后衰败的政坛上逐渐显赫起来，终于当上西德总理。

但担任联邦总理的阿登纳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是严峻、艰巨的。新生的西德实际上是一个畸形儿。在它的上方，罩着一个美、英、法三国之间达成的《占领法规》，此法规在西德成立的第二天即生效。按此占领法规，美、英、法三国政府保留管制西德外交、国防和对外贸易的权力。

所有这些，对一国总理的阿登纳来说，无疑是不顺畅的。因此，阿登纳一个最重要的目标就是复兴西德。这个目标的对内方面主要是复兴经济，阿登纳把这个任务交给他的经济部长路德维希·艾哈德，此后便几乎完全放手让艾哈德去干了；而这个目标

的对外方面就是提高西德地位，使之逐步摆脱被占领状态，最终以独立主权国家的平等地位参加到国际组织中去。阿登纳早在1946年的一次讲演中，就明确指出，西德外交政策的目的“必须是以平等的地位参加国际组织中各国人民之间的和平合作”。在当了联邦总理后，阿登纳始终把使西德复兴，取得国家主权作为孜孜以求的目标。

就一般国家而言，振兴国家主要属于内政，但对西德来说，却更多地与外交政策有着关联。正如阿登纳1949年9月20日在其第一篇声明中所说：“我们处在一种互相矛盾的境地，这就是：虽然德国的外交事务由盟国高级专员公署掌管，但联邦政府或联邦议院的任何活动即使在德国的内部事务方面，都包含着某种对外关系的成分。由于被占领、鲁尔法规、马歇尔计划等等，德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紧密地与外国接合在一起。”[①]

在阿登纳的种种外交努力之下，西德逐渐被松开绑结。1951年3月7日，美、英、法三国对占领法规作了修改，放弃对联邦德国的联邦一级和州一级的立法进行监督，同时放松对西德的经济管制，给予其部分外汇自主权，并扩大西德政府的对外事务职权，使西德政府得以在1951年3月13日正式设立了外交部。同年5月2日，西德又作为正式成员国加入英、法等国于1949年成立的欧洲委员会。1955年5月又通过使西德加入北约而获得了主权国家的地位。此时，阿登纳的使西德作为独立主权国家平等参与国际组织的目标可以说已基本达到。但他还有着一个更高的目标，即重新统一德国。

阿登纳从1948年作为西部三个占领区的议会委员会主席筹建西德之日起，就想到有朝一日要统一德国。因此，当阿登纳负责为未来的西德制订宪法时，甘冒西方三占领国虎颜而只制订了

① 阿登纳1949年9月20日在联邦议会上发表的第一篇政府声明。引自联邦德国外交部编：《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外交政策》，1972年，第148页。

一部基本法，其意即在于为将来德国统一后制订正式宪法留下余地。在这部基本法的前言中，开宗明义地规定：这个基本法是德国西部占领区各州的人民“怀着维护自己的民族和国家统一的意愿”而制订的，以便“在一段过渡时期内为国家生活赋予一种新的秩序”，“全体德国人民仍然要通过自由的自决去完成德国的统一和自由。”①

1949 年 10 月 7 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在苏联占领区成立，这当然是对阿登纳统一德国的目标的打击。阿登纳立即对此发表声明，称东德是一个“非法机构”，是“在苏俄命令之下，并在一小撮投靠苏俄的德国人胁从下出现的”。阿登纳同时声称，西德“在德国获得完全统一之前是德国人民唯一合法的国家组织”，“对生活在苏占区的 1800 万德国人也负有责任”。②

值得一提的是，阿登纳心目中的德国统一，是指在 1937 年 12 月 31 日以前，即希特勒正式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两年的德意志帝国疆域内的统一。这就意味着，阿登纳不承认战后在波茨坦会议上划定的疆界，即波兰与东德交界的奥得—尼斯河边界。阿登纳在其 1949 年 9 月 20 日的声明中以强硬的口吻声称：“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甘心苏联和波兰单方面地把这些地区分离出去”，“我们将不断地通过正当的法律程序继续提出对这些地区的要求。”③

为了坚持统一德国这个目标，阿登纳政府在官方的正式称谓中，始终只用“苏占区”或“所谓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指称东德。1955 年，西德在同苏联建交后，随即提出“哈尔斯坦主义”，宣布不与除苏联以外的任何其他同东德有外交关系的国家建交，以此明确地表示了阿登纳要实现德国统一的意志和决心。

---

①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第 21 页。

②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外交政策》，第 156 页。

③ 同上书，第 151 页。

可以说，复兴西德是阿登纳的近期目标，统一德国则是其外交政策的长远目标。阿登纳任联邦德国总理14年，其外交思想和外交活动的根本出发点便是这两大目标。

二 阿登纳的外交思想

（一）向西方一边倒

冷战是阿登纳执政期间的大背景。阿登纳上台之初，冷战刚刚在两年前由美国的杜鲁门总统一篇国情咨文拉开序幕，至阿登纳1963年下台之时，冷战刚在一年前以美、苏两国间的古巴事件危机达到登峰造极、几乎演为热战的地步。冷战期间，分别以苏联和美国为首的两大集团壁垒分明，互相对峙。阿登纳不外三种选择：倒向以苏联为首的东方或倒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或实行中立。倒向东方几无可能。这是因为，西德是在美、英、法三个占领区内建立起来的，西方三大国扶植西德的主要意图便是同苏联对抗，何况西德立国初期的国家权力仍控制在西方三大国之手。而中立化的呼声在西德成立之前和之后的一段时期内曾相当高。不唯当时影响很大的、以舒马赫为主席的德国社会民主党，而且在与阿登纳同属一个党派的基督教联盟内，也有以凯泽为首的一批人主张中立。他们或要求西德走第三条道路，或要求西德成为沟通东西方的“桥梁”，其实质都是要西德实行中立化。

但阿登纳坚决主张向西方一边倒。阿登纳首先从思想本源上就敌视苏联以及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在他看来1917年苏联建立的世界上第一个苏维埃政权与德国的纳粹政权同样危险。作为一个笃信基督教的基督徒，阿登纳对无神论的社会主义抱着根深蒂固的敌视态度。他曾这样写道：“我们受到来自东方的固执共产主义无神论独裁统治的威胁。苏联的例子告诉我们，左的独裁统治至少是和右的独裁统治具有同样的危险。”阿登纳由此得出结论：“必须有一个以西方基督教世界观和基督教伦理原则为基础的大党，才能担当必要的教育德国人民的工作，引导他们去完成复

兴大业，并建立一道防御无神论的共产主义独裁的堤坝。”[①]

促使阿登纳向西方一边倒的另一个重大原因是为了复兴德国，即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之力使西德逐步壮大起来并成为西方阵营中的平等一员，最终依恃西方联盟的强大实力把东德统一过来。

阿登纳对自己的这种倒向西方的思想在回忆录中有多处表述，例如他写道：“如果单单靠自己，我们将一事无成；如果同西方团结一致，我们就能——这是我的信念——维护我们的自由，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使德国在和平与自由中重新获得统一。”他又写道：“无论过去和现在，我都相信，只有执行一种和西方紧密而坚定的结盟政策，才能有一天使德国在和平与自由中重新获得统一。”

阿登纳向西方一边倒的思想有三个主要内容。

第一即反对中立化。既然要倒向西方，便顺理成章地要反对中立化，只是由于如前所述，在西德建立前后一段时期内，主张中立化的一派人有着很大的势力和影响，因此，阿登纳反中立化的思想也就具有了特别明显的色彩。在阿登纳眼里，中立化实质上与倒向以苏联为首的东方、“落入共产主义之手”并无差别。阿登纳是从地缘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的：战争结束后，在欧洲只有美国有实力可以同苏联对抗乃至把“铁幕”推回去，但美国远在大西洋彼岸，如西德实行中立化，便意味着美国的力量退出欧洲，这样，欧洲大陆便只剩下虎踞于欧洲东部、且已将其势力范围扩大西移至西德大门口的苏联，它将可以随心所欲地控制西德，所谓中立化于是也就成了一句空话。1952年，苏联曾经以德国统一为诱饵要求德国中立化。面对国内强大的主张中立化的压力，阿登纳毫不妥协，他说道：“难道有人相信，我们转向苏联就能被赠予自由的重新统一？我以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必然是否定的。对

① 《阿登纳回忆录》第1卷，第44页。

我们来说，存在的可能性只是：寻求——全力以赴地寻求——西方盟国的帮助来实现德国自由的统一。其它可能性在我看来是没有的。"①

第二，重新武装。阿登纳的外交政策被人称为"实力政策"。在阿登纳的外交思想中，实力是外交的最重要的基础。只有具备了实力，才能使西德成为国际组织中的平等伙伴，也只有具备了实力，才能谈得上统一德国，而这种实力，不仅来自西德自身的经济复兴，也来自作为一个主权国家不可或缺的武装力量。当然，阿登纳是在向西方一边倒的大框架内来构思西德的重新武装的。

然而，鉴于德国曾经两次发动世界大战的劣迹，不仅世界上除了美国以外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反对德国重新武装，西德国内饱受战争苦难的广大人民也反对西德重整军备。当美国重新武装西德的意图公诸于世时，德国社会民主党立即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反重新武装的"无我"运动。但阿登纳坚决把建立武装部队看作是西德加入西方阵营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而当美国正式提出重新武装西德的计划时，阿登纳一拍即合，马上不遗余力地排除各种困难与干扰，与美、英、法三国于1952年5月26日签订了《一般性条约》，又于次日同法、意、荷、比、卢五国签订《欧洲防务集团条约》，使西德建立武装部队并加入"欧洲防务集团"。阿登纳后来在谈到签订这两个条约时，很明白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他说，这两个条约是否签订，意味着西德"是否同西方联系在一起；它是否能保证得到大西洋防务体系的保护；它是否想实现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一体化；它是否愿意在一个自由的欧洲以自由的方式重新统一德国，还是愿意接受德国分裂，或以不自由的方式重新统一德国"。② 在欧洲防务集团流产后，阿登纳又

---

① 联邦德国联邦议院编：《联邦议会讨论文件集》，德文版，1952年，第11卷，第8761页。

② 彼得·爱森曼：《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对外政策》，西努斯出版社，1982年，第56页。

不惜对法国作出巨大妥协，终于使西德于1955年成为北约的正式成员国，完成了西德的重新武装。

阿登纳向西方一边倒的思想的另一重要内容是依靠美国。阿登纳在战后被美国人请出山当科隆市长之前，无论从个人思想意识方面或在政治方面均与美国没有联系。魏玛时期，他思考的问题集中在欧洲大陆方面。然而当他出任西德总理时，已十分清楚地看出美国是西德最主要的依靠对象。这是因为，其一，只有美国具有强大的经济力量能使西德的经济得以复苏。美国1947年推行的马歇尔计划对西德后来的经济起飞是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的。当时实际上也只有美国有实力推行这样的计划；其二，只有美国具有强大的军事力量能使西德免遭苏联的侵犯，也因而只有依靠美国的力量才能最终从苏联手中把东德统一过来。阿登纳的实力政策首先是以美国的军事力量为后盾的；其三，只有美国具有强大的政治力量能对英法两国施加影响，并牵制它们，使它们服从美国的需要而作出有利于联邦德国的妥协，美国在重新武装联邦德国的问题上便充分显示了这种作用。

但阿登纳没有把宝全部押在美国身上。阿登纳在其回忆录中明白无误地阐述了这样的思想：西欧国家如果仅仅依靠美国的保护来取得自己的幸福和安全的话，它们自己便不能充分发挥作用，长此以往，它们的力量就会衰竭而沦为超级大国的附庸。从阿登纳的外交实践看，阿登纳在1956年以前同美国的关系相对而言是和谐的，但此后他对美国的不满和不信任感便与日俱增。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使阿登纳清楚地意识到，美国同欧洲国家的利益并不总是一致，今后势必出现分歧和矛盾。作为一个欧洲国家，阿登纳认为，欧洲必须走联合自强的道路。1958年9月，阿登纳同法国总统戴高乐在科隆贝双教堂会晤时所说的一段话最直接地表现了他对美国的不信任心态。他说："我们的形势是由我们直接与苏联接邻所决定的。判断这种形势的出发点是：我们不能永远指望美国。美国人曾经给予欧洲许多慷慨的援助，但是，他

们一作出反应，或好或坏，都嫌快了些。美国还是一个很年轻的民族，所以从长远的观点来看，人们还不能确切知道美国将抱怎样的态度。”①

作为对不完全信赖美国的补充，即欧洲联合，便构成阿登纳外交思想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欧洲联合

阿登纳的欧洲联合思想确切地说是一种西欧联合思想。早在1945年10月31日，阿登纳在写给前杜伊斯堡市长魏茨的一封信中就指出："东欧——俄国的范围——和西欧截然分开"乃是当时世界局势的基本事实。阿登纳认定，俄国泛斯拉夫主义的扩张传统与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相结合，促使它有强烈的扩张欲望，俄国一项恒定不变的政策便是先占领东欧，然后占领整个德国，最后占领全欧洲。阿登纳一再告诫西方国家，要防止"来自东方的经常不断的威胁"。而要成功地抵御这种"威胁"，阿登纳认为，西欧国家必须联合起来，建立欧洲合众国，只有如此，方能提供"对德国西部邻国最可靠、最保险和最持久的安全保证"。②

可见，阿登纳思想中的欧洲联合是不把苏联及在他眼里已被纳入苏联势力范围的东欧国家包括在内的。阿登纳曾用了许多名称来表述欧洲的联合，如"欧洲一体化"、"欧洲联邦"、"统一的欧洲"、"西欧国家的联合"，实际上都是指西欧的联合。

以上所述，已经清楚地说明了阿登纳欧洲联合思想的出发点，即对苏联的敌视和对美国的不完全信任，后一种因素在50年代中期后表现得更为明显一些。除此之外，实现德国统一，也是阿登纳这一思想的重要着眼点。在阿登纳的思想中，欧洲联合即西欧联合可以从两方面推动德国统一的进程。一方面，由西欧联合所形成的实力，可以迫使苏联在德国统一问题上作出让步。1956年

---

① 《阿登纳回忆录》第3卷，第503～504页。

② 《阿登纳回忆录》第1卷，第31页。

1 月 19 日，阿登纳在给联邦政府部长们下达的指示中要求他们对欧洲一体化采取明确而积极的态度。他对此解释说："如果一体化成功了，那么无论在关于安全问题或重新统一问题的谈判中，我们都能把一个统一的欧洲的砝码作为一种新的重要因素投到天平盘上去。"① 另一方面，阿登纳清醒地意识到，要实现德国统一，还必须化解西欧各国对德国的不安全感和恐惧心理。他深知，如若一味要求统一德国，而置欧洲其他国家这种要求安全的心理于不顾，势必会使西德走向孤立，更遑论统一德国了。阿登纳在其出任总理后的长期外交活动中，如果谈及德国统一，总是把它与"欧洲的统一"相提并论，一再强调"德国的道路必须通向欧洲"，便是阿登纳这种思想的表露。

构成阿登纳西欧联合思想的核心是同法国的和解与联合。对西德来说，欧洲两个有分量的盟国就是法国和英国。这两国不仅从综合国力上说是欧洲的泱泱大国，而且都是战胜国。但在阿登纳眼里英、法两国的分量是不一样的。对于英国，阿登纳认为："在欧洲事务中，尤其是对欧洲安全方面的考虑，由于对威胁的感受不同"，英国的想法从来就不和大陆欧洲一样，"此乃英国人的天性"，即使到了极其危急的时候，英国人来共同参加战斗，"英国的想法和作出的反应也不会和大陆欧洲人一个样，这是我们必须胸中有数的。"②

阿登纳对法国人的看法就大不一样了。阿登纳自称从 20 年代起就致力于德国同法国的和解。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曾用了十分坚定的语气来谈德国与法国的和解，以及这种和解对欧洲联合的重要意义。他如此写道："我一直把始终不渝地争取和法国建成友好睦邻关系看成是德国外交政策最重要的目标之一。必须不顾一切困难、挫折和失望坚持这个目标。必须作出不断的努力甚至牺

---

① 《阿登纳回忆录》第 3 卷，第 291 页。

② 《阿登纳回忆录》第 4 卷，第 226 页。

性。因为法德之间如不建立友好关系，欧洲的联合是难以想象的。因为不这样西方就不能达到与东方进行谈判所迫切需要的那种团结一致，跟法国取得谅解乃是西方团结的基本前提。”①

阿登纳由此进一步得出德、法合作是欧洲联合的核心的结论。他指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决心为创建一个统一的欧洲作出一切可能的贡献。我们认为，法、德两国之间的良好关系就是任何一种欧洲联合的核心内容。”②

阿登纳对德、法关系重要性的关注直到他1963年辞去总理职务后仍然不减。1964年7月15日，他在同联邦德国驻苏联大使馆一等政务参赞阿罗斯·梅特斯（此人先前曾在驻法使馆工作过5年）谈话中说，他对自己的继承人艾哈德总理能否正确地认识到法国对联邦德国利益的重要性表示忧虑。阿登纳指出，法国虽然是一位特别难打交道的伙伴，但许多事情都要取决于这个邻邦。联邦德国必须像他阿登纳以前所做的那样去对待法国。③

然而，同法国和解乃至联合谈何容易。正如阿登纳所意识到的那样，由于历史的（两国100多年来曾三次大规模兵戎相见）和地缘政治的（两个同处欧洲大陆的强国）原因，法国对联邦德国的戒心是根深蒂固的。但阿登纳同法国和解的决心坚定不移，为此他甚至不惜对法国作出重大的妥协与让步。这一点集中地表现在阿登纳处理德、法间最棘手的问题之一，即萨尔问题的时候。1950年，当西德欲加入欧洲委员会时，法国率先把萨尔拉进欧洲委员会作为该委员会的准成员国，并且同萨尔签订了一个使萨尔处于法国控制之下的协议，造成一种具有法律意义的萨尔同德国分离的既成事实。此时，如果西德加入欧洲委员会，便意味着西

---

① 《阿登纳回忆录》第2卷，第424页。

② 《阿登纳回忆录》第3卷，第3页。

③ 阿罗斯·梅特斯：《1964年夏与康拉德·阿登纳的一次谈话：俄国与西方之间的德国》，载迪特尔·勃鲁门维茨等主编：《康拉德·阿登纳及其时代》，德意志出版社，1976年，第674页。

德承认萨尔的自治的地位。阿登纳对法国的这种做法尽管十分不满，但还是顶住来自国内的各方压力，使西德加入了欧洲委员会。他后来在谈及自己对此的想法时说道："虽然萨尔问题的处理并不是在互相谅解的基础上通过自由坦率地交换意见的途径，而是以另一种方式予以解决的，但我们不应该因此而拒绝更为重要得多的欧洲合作，这个道理是很清楚的。……我提醒注意，不要因欧洲谈判的失败而使德国陷入仇恨的情绪。"①

后来，在1954年，签署巴黎协定前夕，阿登纳再次向法国作出重大让步，同意法国提出的要求：萨尔地区在政治上实行自治，在萨尔法规生效后3个月由萨尔公民投票表决来决定萨尔的归属。阿登纳在签约后说："由于我同意了目前这样措辞的萨尔协定，我就背上了一个沉重的政治包袱。在这个协定中包含着一个巨大的危险，即萨尔完全脱离的危险。"②

阿登纳之所以甘愿背上这个沉重的政治包袱，当然是有其深层次的谋略的，这就是实现欧洲联合，而要实现欧洲联合，首先必须同法国和解并携手合作。也正是出于同样的考虑，当1950年5月，阿登纳得到法国"舒曼计划"的草案时，立即以巨大的热情作出响应，于当晚举行记者招待会。会上，他从德、法关系和欧洲联合的角度对该计划作了高度评价。此后，在一系列关于成立欧洲共同体的谈判中，阿登纳常常在关键的时刻亲自介入，积极促成了欧洲共同体在1958年的成立。

但就像任何一个精明的政治家一样，阿登纳在竭力同法国实现和解与进行合作的同时，也没有把西德完全绑在法国的车上由法国随意导引。在阿登纳的考虑中，美国固然不绝对可靠，英国人的想法也"总不像欧洲人，而像美国人"。③ 但西欧的联合以及

---

① 《阿登纳回忆录》第1卷，第372页。
② 《阿登纳回忆录》第2卷，第438～439页。
③ 《阿登纳回忆录》第4卷，第227页。

德国的统一仍缺少不了美国强大的实力作为依托，而把英国纳入到一体化的欧洲中来，则会有助于遏制法国在西欧称霸一方的野心，并有助于西德在外交舞台上获得较大的回旋余地。有鉴于此，阿登纳在1963年同法国签订显示"法德轴心"的德法友好合作条约中，成功地使该条约加上了一段序言，指明该条约同时也促进西德与其他盟国的团结，"特别是欧洲同美利坚合众国之间的紧密伙伴关系；……实现在由欧洲共同体开创的道路上的欧洲联合，把大不列颠吸引进来。"[①] 当然，这一段序言使法国甚为不满。戴高乐后来谈及这个序言时说，这是个单方面的序言，它完全改变了条约的意义。

（三）以中国牵制苏联

向西方一边倒构成阿登纳外交思想主体，从这个含义上说，中国在阿登纳的外交思想中占的地位无足轻重。中国与西德相距遥远，中国虽然在1945年的波茨坦会议上被确定作为五大战胜国之一参与对德国问题的处理，但此后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实际上被排除在对德国问题的决策之外，因此中国与西德之间没有像美、苏、英、法四国同它那样的直接的利害关系，又加上中国在1949年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嗣后又同东德建立了外交关系，使西德从立国之日起便同中国处在敌对状态。凡此种种，导致西德长年与中国没有正式外交关系，即使在经济贸易上有少量来往，也大多属民间性质。

然而，无论是阿登纳的向西方一边倒或西欧联合的思想，均基于一种敌视和防范苏联的心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幅员辽阔的中国便成了阿登纳外交思考中的一个重要对象。因为阿登纳认定，中国将是在东部牵制苏联，从而可以迫使苏联不得不在西部向西方国家作出妥协的重要力量。因此，阿登纳很早就对中国表

---

① 阿尔弗雷德·格罗塞尔：《法国及其对外政策，1945年至今》，哈恩泽出版社，1986年，第229页。

现出很大的兴趣。他经常让外交部的人员（有时是他自己先把问题列出清单）向他汇报中国的政局、经济、军事力量，特别是中、苏关系等情况。

阿登纳是西方极少数几个很早就预料到中、苏会发生对抗的政治家之一。50年代上半叶，约在1954年夏和1955年春之间，正是中、苏两国“牢不可破的兄弟般的友谊”在国际上得到最充分的宣传和表现的时候，阿登纳已经认定，中、苏间将发生严重对抗。1955年春，阿登纳发表了下述看法：“自由世界应该充分利用俄国人当前的弱点，并使俄国人放弃向西方施加压力，而使其转向真正威胁他们的危险，即红色中国。……因此，可以不太乐观地认为，在不久的将来，红色中国将成为苏联的主要忧虑。”[①]

在阿登纳说这段话的前一年，1954年7月6日，阿登纳在外交委员会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分析时局时说：没有人能够断言，红色中国是否会长期留在苏联集团内，它今天是否全心全意地属于这个集团。[②]

阿登纳在分析中、苏关系会恶化时提出的一个理由是，中国每年增长1100万至1200万的人口会对苏联造成严重的人口压力。这显然是荒谬的。但阿登纳很早就预见到，一个强大起来的中国不会屈从于某个大国或大国集团的指挥棒，就这一点而言，阿登纳无疑是正确的。

据西德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波恩—北京》一书的作者恩斯特·马约尼卡说，阿登纳的关于中、苏必然发生对抗的思想，深受一个名叫维尔海姆·施塔林格的教授及其撰写的《苏联权力的极限》一书的影响。这个施塔林格曾长年作为医生在苏联的监狱和集中营呆过。他在与一些早年曾当过中级领导人的苏联囚犯接

---

① 恩斯特·马约尼卡：《阿登纳和中国》，转引自《康拉德·阿登纳及其时代》，第682页。

② 恩斯特·马约尼卡：《波恩—北京》，科尔哈默出版社，1971年，第54页。

触中了解到，俄国人对中国怀有深刻的不信任感。

1955年9月，阿登纳去苏联谈判，当时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会下同阿登纳毫不隐讳地谈及所谓的中国威胁，并要阿登纳帮苏联一把，共同对付中国。这使阿登纳对中、苏关系的想法得到了证实。阿登纳后来在多种场合，不仅在同诸如尼赫鲁、肯尼迪、戴高乐这样的国家领导人会谈中，而且在同记者和社会名流的谈话中，也一再表述自己关于中、苏冲突不可避免的想法。

对阿登纳来说，中、苏冲突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西德可以从中渔利，即苏联为对付中国而减轻其对西边，特别是对西德的压力。阿登纳认为，中国的崛起会改变俄国人在欧洲问题上的想法，莫斯科有朝一日终会与美国和欧洲达成谅解，以便转过身来对付中国。阿登纳甚至以为，解决德国统一的钥匙也在于中、苏冲突之中。因为，苏联要同欧洲达成谅解，就非解决德国统一问题不可。有一位名叫路易斯·费舍尔的人在同阿登纳交谈后发表感想说，阿登纳从中、苏冲突中“产生了极其乐观的信心：德国统一终究会实现”。[①]

阿登纳由此发现了中国对平衡欧洲两大军事集团力量的重要作用。所以，他一方面出于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上同中国的对立和敌视（特别由于中国同东德建立了外交关系）而坚持不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但另一方面，又始终不愿也不敢过分得罪中国，在中国最敏感的台湾问题上，阿登纳就顶住美国的压力，坚决不承认台湾，并且执意不介入到中国大陆与台湾的冲突中去。这一点，在1961年3月西德外交部就不同台湾建交作出的一项决定中得到了充分的说明。该决定称：西德要是确定了同台湾的关系（意即承认台湾——作者注），西德通往北京的道路便会被堵死，鉴于苏联与中国的关系今后发展情况尚捉摸不定，留下这条路是有

---

① 路易斯·费舍尔：《重见莫斯科》，转引自《康拉德·阿登纳及其时代》，第688页。

好处的。①

明乎此，就不难理解，当1955年中美大使级会谈行将开始之时，阿登纳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他于1955年7月27日从其休养地穆伦写信给他的外交部长勃伦塔诺，信中说：中美间的接近是与我们利益攸关的头等大事，因为这一接近可以减轻俄国对我们的压力。②阿登纳在信中还指示勃伦塔诺，详细收集一切与此有关的情报并归纳后给他寄去。阿登纳认为，中美接近意味着中国背离苏联，从而会产生有利于西德的效果。

总的说来，阿登纳的"以中国牵制苏联"之计还只是停留在思想活动中，而少有具体行动，这是因为，阿登纳十分明了西德的战败国的孱弱地位，没有能力介入到中、苏的是非中去。所以，当1955年赫鲁晓夫明目张胆地要阿登纳帮忙一起反对中国时，阿登纳拒绝了这个请求，而只是在内心对中、苏行将出现的对立幸灾乐祸。

阿登纳这种对中、苏关系静观待变的态度直至他下台也没有改变。1962年9月，他同戴高乐会晤时，戴高乐问他，是否对同中国建立联系有兴趣，阿登纳只是给了一个含糊其词的回答："不要作官方接触，但可以设法了解苏联准备怎样对付中国。"在这次谈话中，阿登纳还表示了这样的希望："我的希望基于下述一点：由于赤色中国的发展，俄国被迫从西方撤回武装力量，用来反对赤色中国；对我们来说要不是这样，就无法达到跟俄国过得去的关系。"③

三　阿登纳晚期外交思想的转变

阿登纳以古稀之年（73岁）出任联邦总理，到1967年引退时，

---

① 《波恩—北京》，第49～50页。

② 恩斯特·马约尼卡：《阿登纳和中国》，转引自《康拉德·阿登纳及其时代》，第682页。

③ 《阿登纳回忆录》第4卷，第209、208页。

已届耄耋。以如此高龄当政，且又在其政策上表现出极其强硬的手段，因此阿登纳常给人以思想僵化的老顽固印象，但如细心研究一下他的外交思想活动轨迹，便可发现他有时是很灵活变通的。

西德在1955年同苏联建交便是一明显的例证。当1955年6月苏联邀请阿登纳访问苏联并谈判两国建交事宜时，西德政府内部反对者甚众，他们出于对苏联的敌视，认为阿登纳既不应去莫斯科访问，更不能同苏联建交。但视苏联为头号仇敌的阿登纳却作出了接受苏联邀请去莫斯科的决定，并且在莫斯科会谈期间同苏联建立了外交关系。阿登纳如此决断的动因有二：1.苏联乃四大战胜国之一，将来实现德国统一非苏联参与和首肯不行；2.更为重要的是，阿登纳很不喜欢西方三大国越过西德同苏联谈判德国问题。同苏联建交则可使西德有了同苏联进行直接谈判的渠道。

阿登纳同苏联建交的决定还只能说是一种策略上的考虑。他的外交思想的变化主要反映在他晚期对哈尔斯坦主义也即对德国统一问题的思考的转变。

哈尔斯坦主义是在西德同苏联建交之后提出来的，旨在阻止其他国家承认东德，维护阿登纳统一德国的长远目标。然而，随着50年代中期以后形势的变化，阿登纳越来越清醒地看到，他所一边倒向的西方三大国，特别是美国，并无帮西德实现统一德国的热情。1957年，他不得不屈从西方三国压力，放弃了坚持多年的把统一德国作为解决欧洲裁军问题的先决条件的立场。1958年，阿登纳向苏联试探，能否让东德像奥地利那样实行中立化，这表明，阿登纳关于德国统一的思想已经开始发生变化。此后，阿登纳又有一系列行动充分表明他在德国问题上正进行新的思考，这种思考，先是以对原有政策表示怀疑的方式表现出来的。

1959年2月26日，阿登纳给国务秘书汉斯·格洛勃克写了一张字条，请他“认真考虑一下与柏林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有关的全部法律问题”。阿登纳在字条中列了一些问题，其中以下三个问题集中反映了阿登纳对自己推行的政策产生疑问：“如果因无条

件投降而产生的对（德国）支配权的限制将无限期地，也许是100年地持续下去，那么‘德意志帝国’这个国家法概念能否站得住脚？”

“我们是否认为，尽管苏俄反对，我们，由原西部三个占领区组成的联邦共和国，由于被西方三个占领国通过德国条约授予了（除少数保留外）所有权利，就是一个主权地区了？”

“这样的话，苏联不也能理直气壮地声称，同样情况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符合国际法的吗？”

1960年夏，阿登纳在一封拍给外交部长勃伦塔诺的电报中，又一次对西德的外交政策提出疑问。该电报云：“我请您审核一下，在柏林问题和德国问题上所牵涉到的，特别是与西方三大战胜国有关的问题上，我们迄今为止的态度是否能继续保持下去。”[1]

阿登纳的这些思想活动，都是在1958年苏联以柏林问题作为突破口向西方发动攻势，而西方三大国在苏联攻势面前表现畏缩，漠视西德切身利益的背景下进行的。到1960年底，阿登纳对德国问题的新思考结晶于一份“格洛勃克计划”，这份在阿登纳授意下由格洛勃克起草的计划放弃了阿登纳一贯歧视东德的立场，提出两国实行为期10年的城堡和平，尔后两国在平等条件下举行自由选举以决定德国是否统一的建议。

由于苏联的反对，这份格洛勃克计划没有公开出台便夭折了。在此期间，东德在苏联的支持下于1961年8月在东西柏林交界筑起了柏林墙，而西方三大国在柏林墙面前无所作为。这一事件，对阿登纳更是一大刺激，使他对西德在德国问题上视为金科玉律的“哈尔斯坦主义”也发生了动摇。1963年，他同当时的西柏林市长勃兰特作了一次谈话，阿登纳在谈话中出其不意地问勃兰特如何评价哈尔斯坦主义，在勃兰特尚未对这一提问的含义完全领悟过

① 汉斯·希赫海姆：《德国政策，1949～1972年》，德意志出版社，1984年，第90页。

来之前，阿登纳自己意味深长地说道："有些东西只要还可以捞回些什么，就应该脱手。"[①] 这一席话明白昭示了阿登纳已有将哈尔斯坦主义"脱手"之意。

然而阿登纳此时已走到了他权力的终点。他已没有能力和时间去用行动来实现自己转变了的外交思想了。

阿登纳担任联邦总理达14年之久，他在联邦德国历史上占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如前所说，阿登纳是西德对外政策的奠基人，为西德的外交政策规定了航道。他坚决推行向西方一边倒的政策并获得了成功。西德迅速从战争的废墟中站起来并在经济上奇迹般地起飞，不能不说与他的外交思想和外交实践也是密切相关的。但50年代中期以后，世界形势发生了变化，阿登纳的与向西方一边倒相对应的、以"哈尔斯坦主义"为标志的东方政策就显示出了其冥顽僵化的一面，越来越严重地束缚了西德对外政策的活动能力。尽管阿登纳在执政后期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并在切实考虑使自己的东方政策灵活一些，但历史和世界观注定的他个人的局限性使他作出的灵活的程度极其有限。他在给西德留下了一份丰厚的外交遗产后终于在1963年退出了历史舞台。

第五节　从罗斯福到艾森豪威尔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美国外交在威尔逊以后的又一次历史性转折点，它把美国推上了资本主义世界的霸主地位。还在战争进行期间，美国领导人就已开始根据美利坚合众国的实力与利益，勾勒出了夺取战后世界的目标和计划，特别是富兰克林·罗斯福关于美苏合作主宰世界格局的构想深刻影响了战后的历史进程。由于两大阵营的形成和对垒，终于使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在1835年关于形成两极世界的预言成为现实。战后美国外交，从罗

① 维利·勃兰特：《会见与思考》，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58页。

斯福到艾森豪威尔，经历了三个特点鲜明的历史阶段，即从美苏“合作”到“冷战”，再到50年代末出现“解冻”迹象，曲折地反映出国际形势的主要变局。

一 罗斯福的构想

在探讨富兰克林·罗斯福关于战后安排的构想之前，有必要了解一下他的整个外交思想的发展脉络。早在1920年被民主党提名为副总统的候选人时，罗斯福就与共和党孤立派唱反调，积极宣传“国际联盟”。他在1933年初第一次就职演说中，提出“睦邻政策”，废除《普拉特修正案》，亲自在泛美会议上提出《美洲和平纲领》，要把门罗主义从美国单方面的宣言变成一项与南美诸共和国采取一致行动的相互协议。不久罗斯福又改变了美国一直无视苏联存在的态度，承认了苏联政府。二战爆发后他力主修改“中立法案”，提出“现购自运”和“租借法案”，实行援英援苏政策，在“炉边谈话”中要求美国努力完成“民主国家的伟大兵工厂”的任务。在美国参战后由罗斯福签署的文件中，都透露出一种含义，即美国在奉行一项与其他国家合作来维持某种形式的集体安全制度的政策。

1941年1月，罗斯福针对法西斯威胁宣布了四项“人类的基本自由”纲领：言论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①]并把四大自由包含到《大西洋宪章》的八点纲领内，不但为美国参战奠定基础，而且影响到战后的历史发展。《大西洋宪章》可以说是以“美国世纪”作为筹划战后和平的指导思想文件，在该宪章中，罗斯福以审慎的措辞作出诺言，要“在纳粹德国的暴政最终毁灭之后”，致力于建立一个各国间政治和经济一律平等的世界；不希望看到未经有美国同意的领土变更；各国有权选择自己愿意在其统治下生活的政体；所有的国家在战后都

① 《美国的历史文献》，三联书店，1989年，第297～304页。

有更多的机会进行贸易和取得原料，并在经济领域内进行国际合作；所有国家在战后都能得到安全和公海上的航行自由，并制定一个与“持久的普遍安全体系”相结合的裁军纲领。[①]

罗斯福关于战后安排的构想是对战前国际格局和西欧诸大国的传统国际地位的一种挑战和否定。美国试图利用自己的竞争对手在战争中相互削弱的机会，通过最后参战来夺得美国在全世界的霸主地位。在大战期间的一次演说中，罗斯福就明确表示过，美国本可以与德、日妥协，所以未采取这一政策，是由于美国既不愿“在希特勒极权世界中居于次要地位”，又不甘心“在日本控制之下的亚洲谋求一席之地”。他说美国的目标在于负起“领导国际社会的责任”，争当“球赛进入高潮时最后得分的跑手”。关于战后安排问题，罗斯福主张增加“凡是被剥夺了自治政府的民族应恢复它们的这种权利”的条款，并主张民族自决原则“不但适用于大西洋两岸那些地区，也适用于全世界”。[②] 在这方面，罗斯福与丘吉尔时有矛盾，罗斯福打算为日后进一步削弱和瓦解旧殖民体系、建立和扩大美国在殖民地区的势力和影响，奠定舆论基础。罗斯福还要通过《大西洋宪章》及《租借协定》来废除英国的“帝国贸易特惠制”，用世界性“自由贸易”来为美国战后经济扩张提供便利。

作为战时总指挥，罗斯福把大后方战争物资生产方面的许多责任委托给别人，自己则集中精力研究世界范围的战略和外交问题，研究战后世界秩序所需要的新的政治均势，研究战后大国所起的稳定作用和世界政治制度化问题，包括创建一个新的维持和平的机构。罗斯福打算通过《大西洋宪章》改变以往支持国际联盟的立场，转而另建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组织来取代作为英

① C. E. 布莱克：《二十世纪欧洲史》上卷，第753～754页。

② 罗伯特·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下册，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85～86页。

法工具的国联。1942年罗斯福最初提出美苏英中“四警察”设想时，主要想采取地方“警察”各管一片的方式，在此基础上再组成大的国际联合，但随着美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势力日益增强，罗斯福就把“四警察”的设计与建立一个由美国承担“领导责任”的国际安全组织结合在一起了。建立联合国组织是罗斯福的战后世界蓝图的基石之一，当丘吉尔反对建立一个新国际组织时，罗斯福意味深长地讲道：“时间将得出现实主义的结果。”[①]言外之意是，美国强大的实力日后会自动满足其要求和利益的，英国面对现实不能不给予确认。关于联合国组织，罗斯福的基本思想是，在美国领导下实现“大国合作”控制世界，建立广泛持久的普遍安全制度。为了把联合国作为“大国合作”的组织，罗斯福又提出“大国一致”原则，在经过与苏联的讨价还价后，改为在“实质性问题”上大国享有否决权。否决权条款的确立，是战争结束前夕东西方既矛盾又合作的产物。

早在战争还在激烈进行期间，美国白宫一份政策性文件就写明：

> 反对我们目前敌人的战争胜利结束后，我们将发现世界各国军事力量的消长要发生意义极为深远的变化；其意义之深远，在罗马陷落后的1500年中，只有罗马陷落可与之比拟。击败日本后，只有美国和苏联堪称第一军事强国；其原因均归结于它们的地理位置、辽阔的幅员和巨大的军火生产潜力。[②]

对于战后力量的结构，罗斯福这样评价道：只有美、苏、英少数大国才能维持战后的世界秩序，只有大国才应保持强大的军备，承担“世界警察”的任务。同时罗斯福还对英国外交大臣艾

---

① 韦尔斯：《我们向何处去》，伦敦，哈波兄弟出版公司，1946年，第15页。
② 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第437页。

登讲，战后欧洲的军备应当集中在美、苏、英手中，由三大国对欧洲实行“纠察制度”。[①] 实际上最令罗斯福担心的是，苏联战后能否继续与美国保持合作关系。在战后合作的决策中，罗斯福只是把其他大国作为抵消苏联的平衡力量来考虑的，而只有美苏两大国的合作才是关键的所在。

随着战争的深入发展，罗斯福有意不断地加强对苏合作，倡导召开美、苏、英三国高级会晤，提议美、苏、英三国在战后和平建设方面共同合作，并认可苏英就波兰边界问题达成的交易，想用满足苏联有关权益的办法来消除它进一步扩展势力的欲望。在罗斯福脑子里，战后安排问题排在首位。

战争进行期间同盟国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许多都关系到战后安排问题，即使各个战区的建立，都影响到某种势力范围的形成。罗斯福几经思虑，同意承认苏联在东欧和中国东北占有优势，并与英国在南斯拉夫平分势力，同时承认英国在希腊的特殊地位。实际上罗斯福的主要考虑是，在巴尔干地区形成某种东西方均势，从而最终将巴尔干地区从苏联的势力中解脱出来，但暂时避免在“东欧问题”上摊牌。

罗斯福这时还看到，远东国际关系面临重大变化，这种变化主要在于苏联将成为这一地区的另一个超级大国，苏联此后将以巨大的规模介入远东。从地理位置、军事力量和政治影响来看，苏联在远东的势力必将是很强大的，而日本的战败和英法的衰落更使它能具备一种过去沙俄所无法企及的有力地位。罗斯福认为，限制苏联扩张将成为美国今后的头号任务，但限制的办法不是对抗，因为对抗会带来致命的负面效应，美国应当以它对待欧洲问题的基本方针来对待远东问题，谋求美苏合作，使苏联成为“守法国家”，服从和维护美国所拟定的国际秩序。

在罗斯福看来，在中国问题上的美苏合作尤其必要。中国和

---

① 何春超主编：《国际关系史》下册，武汉大学出版社，1984 年，第 39 页。

苏联之间有着漫长的共同边界，苏军又将由于对日作战而占领广阔的中国领土，况且中国国内还存在着国共两党的斗争，这些都是使苏联在中国进行领土和政治扩张的因素。同时罗斯福还认为，如果不协调美苏对中国的关系，两国间就会出现严重冲突，从而使它们在远东乃至世界中的关系遭到破坏。由于形势的变化，罗斯福的在华目标已不是把中国扶持为大国，而是使中国不提供苏联扩张的诱因和便利条件，不危害美苏的合作。罗斯福还打算把美苏合作当成解决中国及远东问题的一种重要手段，共同努力防止中国内战，否则美、苏出于意识形态和传统利益必然站在各自支持的一方，从而不可避免地损害美苏合作的前景，甚至可能引起两国间的军事冲突。罗斯福还忧虑中国内战一旦爆发，苏联出兵东北后将援助中国共产党的军队，使之控制华北，形成中国的分裂局面。他注意到每当其他国家共产党人的利益妨碍苏联的国家利益，斯大林就会牺牲前者以维护后者的历史经验；他还注意到1944年下半年英国利用苏联的合作，成功地使希腊共产党同意交出军队和解放区政权。所以他也想通过与苏联的合作促使苏联与中国国民党政府的接近，中止对中共的支持，同时迫使中国共产党接受美国的对华政策。当然这只有在苏联获得具体利益的时候才肯这样做，为此罗斯福准备设法恢复昔日俄国在中国东北的特权，运用“丢卒保车”的策略，使美国在亚洲得到一个亲西方的中国，以此成为美苏之间的一个“缓冲地带”。

以后的雅尔塔协定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罗斯福的外交思想，它是彼此竞争的国家利益之间的一次重大妥协，是传统均势与集体安全的混合产物，它所确定的“雅尔塔体制”成为战后国际政治的基本格局。尽管当时美国政府私下指出“势力范围事实上存在，并将在未来一些时期内，继续存在下去”[1]，但罗斯福仍认为：

---

① 加布里埃尔·柯尔柯：《战争政治：世界与美国外交政策》，纽约，1968年，第482页。

"克里米亚会议是三个主要国家为寻求共同和平的基础而进行的一次成功努力"，"将出现一个在政治上较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稳定的欧洲"，美国清楚了"在未来必须面对什么"。[①]

当罗斯福殚心竭虑规划统治世界的蓝图时，同盟国和轴心国还在兵戎相见，所以在打败德、日法西斯方面美苏还是盟友，美国仍有求于苏联。虽然美苏两国社会制度和参战目的都不相同，但为了战胜共同的敌人，还是建立了比较紧密的盟友关系，加上罗斯福的个人努力，尚能不让内部矛盾干扰对法西斯作战的基本目标。况且罗斯福还认为，苏联在战争中损失惨重，即使想把经济恢复到战前水平，也离不开美国的各种援助，这就提供了美苏战后合作的客观基础，因此美苏在许多方面也能够继续妥协。所以罗斯福设计了美苏合作而以美国为主宰的体制，他的世界新秩序思想与威尔逊的理想主义有某种渊源关系，具体通过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来构筑战后世界格局，实现美国称霸全球的和平渐进战略。

二　凯南的"X"论文和杜鲁门主义

杜鲁门继任美国总统后，起初还是遵循着罗斯福所导引的美苏合作安排战后世界格局的既定政策，因为当时太平洋战争的代价太大，美国仍需要苏联参与对日作战。但1945年下半年，随着国际环境发生变化，德、日相继投降，美国在全世界建立了几百个军事基地，又把独占原子弹作为一种外交力量，出任国务卿的史汀生就说过，美苏关系"也许会因为我们同俄国解决原子弹问题的方式而无可挽回地使怨恨加深"[②]。这时期美苏同盟的政治基础发生动摇，两国在一系列问题上的裂痕逐渐扩大，双边关系日

---

① 埃尔默·普利施科：《首脑外交》，第479页。

② 阿瑟·施莱辛格：《世界权力的动力》第2卷，纽约，切尔西出版社，1973年，第167页。

益恶化，形成两强对峙的新局面。杜鲁门从而转向对苏采取强硬政策，他认为罗斯福设计的以大国合作来维护战后秩序，以便美国称霸的世界蓝图已不合时宜，应该改弦更张，把苏联看作妨碍美国称霸世界的最大敌手。加上美国外交官员对苏战略的系统推论，终于导致遏制苏联的冷战政策出台，这一历史性的转变，成为影响战后世界政治的重大因素。

实际上杜鲁门对苏联的看法有很深的思想渊源，早在德国入侵苏联后的第二天，当时还是参议员的杜鲁门就公开表示："如果德国战胜，我们应当帮助苏联；如果苏联战胜，我们就应当帮助德国，就那样让他们去互相厮杀，杀得愈厉害越好。"[①] 在1945年4月，杜鲁门就已开始酝酿新的对苏政策，这时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汇报说，苏联正在奉行两种相互对立的政策，一种是与美国合作的政策，另一种则是扩大对东欧地区控制的政策，而苏联确实需要美国帮助进行战后的重建工作，至今还愿与美国保持合作关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歇尔和史汀生也认为，对苏联要采取慎重态度，不能吵翻。而杜鲁门坚持认为，苏联需要美国甚于美国需要苏联，所以应在东欧问题上现在就跟苏联"摊牌"，要求东欧国家实行"自由选举"，并且改变雅尔塔协议那种"单行道"的局面。杜鲁门当时看到，苏联帮助东欧国家从法西斯奴役中解脱出来走向社会主义道路，构成了美国称霸世界的严重障碍，东欧问题成为美苏关系的要害。不久杜鲁门在会见苏联外长莫洛托夫时讲道："由于苏联在波兰新政府的性质上未能贯彻执行在雅尔塔达成的协议，美国对此是不愉快的。"[②]

杜鲁门在美国向日本投掷原子弹不久，马上宣布东欧国家"不应是任何大国的势力范围"，指责苏联操纵保加利亚选举，决定在伦敦外长会议上对苏联实行"强硬外交"，发誓要对分裂世界

---

① 美国《纽约时报》，1941年6月24日。

② 何春超主编：《国际关系史》下册，第44页。

的另一个阵营进行一场“圣战”，想在“东欧大门口取得政治和经济的立足点”，[1] 并声言“除非俄国碰到铁拳和强硬抗议，另一次大战就可能发生。他们所了解的只有一种语言——你究竟有多少个师？”[2] 美苏很快在伊朗和土耳其问题上发生激烈争执，种种事态表明，当世界由战争转向和平的时候，一种使国际局势日趋紧张的不使用武器的战争出现了，罗斯福时期所刻意培植的美苏联盟已不复存在。

美国40年代著名的“遏制政策”倡导者之一的乔治·凯南1946年2月在任美驻苏代办时给美国国务院拍了一份8000字的电报，对战后苏联的“意图、政策和作法”提出了比较全面的分析，渲染了一些苏联向世界“扩张”的迹象，为美国执意恶化同苏联的关系辩护，提供了这种政策改变所必要的精神根据。凯南认为，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问题是苏联对资本主义世界采取敌视态度的根本原因，对付苏联已是美国外交空前的巨大任务，应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基于此“西方世界”要“团结、坚定和有力”。[3] 同年冬凯南又向持反苏立场的海军部长詹姆士·福莱斯托提交了一个《美国和俄国》的文件，涉及对苏关系的10条“准则”，其中包括疏远对苏关系，必要时不惜用重型武器采取报复行动，公开美苏分歧，使美国各派集中全力面对苏联等等。[4]

1947年7月凯南在美国《外交季刊》上发表了一篇署名“X”的文章《苏联行为的根源》，进一步发挥了上述那份8000字电报的内容，从意识形态和社会性质入手，分析苏联受到一种顽固思想的支配，总感到自己生存在资本主义包围之中，使它崇尚黩武，“在世界强国地盘里到处钻营”，它将在“一切认为合乎时机和会

---

① 约翰·C. 坎贝尔：《世界事务中的美国》，纽约，1947年，第66页。

② 《杜鲁门回忆录》第1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64年，第471页。

③ 乔治·凯南：《回忆录1925～1950》，波士顿、利特尔·布朗公司，1972年，第547～559页。

④ 同上书，第560～565页。

有好结果的地方，作出努力来推进苏联政权的正式疆界。”凯南的结论是苏联听不进理智的逻辑，根本不能指望在预见的将来同它建立政治上的亲善关系，也不能同它通过谈判解决问题，苏联是“一种狂热地相信决不能与美国永久妥协的政治力量”，只有遇到某种无法对付的障碍时才会在优势力量面前停下来。[①] 为此凯南主张美国必须拥有足够的武装力量，并准备使用这种武力，才能避免“摊牌”，迫使苏联退却。还可以用“消除非共产主义世界中所存在的大片软弱和脆弱的地区的方法，来遏制苏联”。[②] 美国必须把苏联看成是政治上的“敌手”，而非“伙伴”。凯南反复强调“美国对苏政策的关键要素必须是一种长期的、耐心而坚定的对苏扩张倾向保持警惕的遏制政策”，具体来讲，对其经常变动的政治目标要“灵活运用对抗力量加以遏制”，对其政策施加压力，“驱使克里姆林宫采取比现在远为克制和谨慎的态度，最终促成苏维埃政权瓦解或逐步趋于软化”。[③]

凯南还补充道，如果只向苏联表明世界上哪些地区“美国不允许落入敌手”，这是一种不足取的消极作法。长远来看最积极的遏制策略应该是大规模执行经济援助计划，帮助西欧和日本重建工业，这才可以真正有效地削弱共产主义对西欧和日本的影响，有助于世界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美国的方向发展。因为只有使西欧和日本离不开西方阵营，并使其实力得到增强，才会确立起使苏联永远处于劣势的综合力量对比。总之，凯南认为苏联在推行一项以共产主义统治世界的总体计划，必须加以“遏制”，这种对苏遏制战略就成为杜鲁门主义的理论基础。杜鲁门随后在利用丘吉尔的富尔敦“铁幕演说”大造舆论的同时，加紧研究对付苏联的

① B·伯恩斯坦德：《杜鲁门政府文献史》，纽约，哈珀与罗出版社，1968年，第209页。

② 乔治·凯南：《美国对外政策的现实》，商务印书馆，1958年，第57～58页。

③ 乔治·凯南：《1900到1950年的美国外交》，伊利诺伊，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51年，第114～127页。

长远方针。

美国白宫助理克拉克·克利福特于1946年9月提出由杜鲁门领导起草、马歇尔和艾奇逊等参与商讨的《美国与苏联关系》的报告，在长达50页的篇幅内全面剖析了美苏关系以及苏联的所谓"动机和方法"，指出苏联的势力范围是个截然不同的实体，美苏之间发生冲突在所难免。为此美国必须加强与西方盟国的关系，既然不能同苏联合作解决世界问题，那么美国就应同西方国家强化联盟关系，形成一个有共同目标的联合世界。该报告又从地缘政治学的角度讲道，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将被一个庞大的军事强国所控制，海洋强国若想保持全球力量均势，就需抗击该国向大陆边缘地带的进一步扩张。为此美国必须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强大到足以抑制苏联，使苏联的势力范围限于目前它所控制的地区，对苏联扩张危及美国安全的一切活动应作好准备，以便进行有力和有效的抵御。同时要对那些反抗苏联的国家给予必要的政治支持和经济援助，使"遏制战略"扩展到"中间地带"及全世界。[①] 这些观点的落脚点在于使美国制定称霸全球的计划师出有名，也为杜鲁门主义提供了依据。

1947年2月美国副国务卿艾奇逊在国会两党领袖会议上总结了二战后美国"遏制"苏联的经历，认为"共产党人的压力"正集中到希腊，"一旦希腊和东地中海被苏联所控制"，必将对其他国家产生"破坏性的、或许还是决定性的"影响。他把西欧和中欧的共产党力量的扩展作为苏联"渗透和颠覆的结果"，主张美国必须采取措施来"加强那些受到苏联侵略或共产党颠覆威胁的国家"。[②] 同年3月杜鲁门在国会通过一篇咨文，应允英国希望美国增加对希腊和土耳其军事经济援助的要求，利用英国力不可支的机会来攫取巴尔干半岛和东地中海地区的战略要地，将美国的势

---

① 阿瑟·施莱辛格：《世界强权的动力》第2卷，第304页。

② 约瑟夫·M. 琼斯：《十五个星期》，纽约，1955年，第141页。

力范围推进到苏联和东欧国家边缘，以此作为“美国对共产主义暴君扩张浪潮的回答”。杜鲁门插手希腊和土耳其事务的理由是那里受到共产党领导的“恐怖主义活动的威胁”，那种“混乱和无政府状态很可能危及土耳其和整个中东地区”，甚至会给欧洲和全世界带来灾难。这篇咨文所涉及的内容远不止于希腊和土耳其，它宣称美国有领导“自由世界”和“援助”某些国家“复兴”的使命，以“防止共产主义的渗入”。该咨文还提到，美国的支持和帮助应该首先通过经济和财政援助的途径，这对稳定经济和有秩序的政治进展关系重大。美国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之一就是创造种种条件，以便美国和其他国家能促进一种“不受强制行径支配的生活方式”，其根本用意是“不论什么地方，不论直接或间接侵略威胁了和平，都与美国的安全有关”，也就是说美国要在全世界反对共产主义。这种思想和政策被称为“杜鲁门主义”，并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转折点：

1947 年 5 月艾奇逊通过演讲对杜鲁门主义的内容作了归类分析，分别包括大量增加美国出口商品和增加对国外贷款，使那些抵抗“强权政治”的国家足以应付自己的需要，物质援助优先给予那些反对“极权主义”的国家，单独进行复兴德、日工作，延长战时权力，使政府仍可以控制国内货物的销售、运输和出口工作等。杜鲁门主义标志着美国向全球扩张所实行的根本性转变，是美国系统推出“遏制”苏联的冷战政策的重大步骤，是一种新的世界范围的门罗主义。杜鲁门主义正式将酝酿已久的“遏制”苏联、控制中间地带和称霸世界的战略原则作为美国的基本国策，它也意味着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全面对抗，是反苏反共的理论纲领，并导致全球性的政治分化，对二战后美国的外交政策和整个国际关系的演变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形成美国走向称霸世界的重要时期。

杜鲁门主义是杜鲁门、乔治·凯南等外交思想的逻辑发展。杜鲁门早就认为存在着一个分裂为“自由制度”和“极权政体”两

个阵营的世界，他拒绝同苏联在联合国范围以外进行谈判，认为"当有一个国家无视联合国全体成员国共同签署的国际行为准则时"，或者"当一个国家习惯于在国际事务中使用威逼和公开侵略的手段时"，举行会议是无益的。[①] 这表明杜鲁门对苏联越来越采取一种毫不妥协的态度，希土危机不过是为这种"全球性反共政策"提供了某种出台机会。杜鲁门还试图通过建立各种政治军事集团来抵制苏联的"蚕食"，实施"以拉美为后院、以太平洋为内湖、以大西洋为内海、以欧洲为重点"的部署，进而达到称霸全球的进攻型扩张战略，以后陆续产生的马歇尔计划、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朝鲜战争和签署《太平洋安全保障条约》等都是这种意图的具体化。杜鲁门称，"美国的政策是必须援助那些正在反抗少数派独裁者或外部颠覆势力的自由民族"。[②]艾奇逊曾补充道：美国援欧不仅是保持国内经济繁荣的需要，而且是遏制苏联和保持美国在世界上领导地位的需要，美国不能通过与世隔绝来保持安全，而应实行一种行动主义的外交政策。艾奇逊还进一步论述说："当杜鲁门政府在外交事务方面立稳脚跟以后，它的政策显示出一种气势，显示出概念的广泛和行动的果敢，这两点在美国历史上都是新的，并且显然是由中央计划和指导的。……1947 年在东地中海承担的责任，1948 年辉煌的马歇尔计划，对封锁柏林的回答，1949 年北约组织建立欧洲的防务，以及 1950 年对朝鲜的干预——所有这一切都构成了以真正英勇的姿态所进行的扩张性行动。"[③] 艾奇逊认为杜鲁门政府的上述外交行动可以增加对苏联的讨价还价的份量，他特别推崇实力政策，说要打算同苏联就共同关心的一系列问题达成协议，并且建立一个同国联和联合国创始

---

① 埃尔默·普利施科：《首脑外交》，第 283 页。

② H. 德拉克斯：《从杜鲁门到约翰逊的文献史》第 1 卷，纽约，罗伯特·斯佩勒出版社，1971 年，第 141 页。

③ 艾奇逊：《参与创造世界：我在国务院度过的岁月》，纽约，诺顿公司，1969 年，第 731 页。

人的设想较为吻合的国际关系结构，都有待于建立起西方的“实力地位”，只有从这种地位出发，才更有希望举行谈判。

三 “解冻”之前——“戴维营精神”

1953年是美苏关系的重要一年，在这一年里，斯大林逝世，美国总统换届。艾森豪威尔刚刚就任总统，就发表题为《和平的机会》的演说，表示欢迎苏联新领导“为和平而采取的每一个真诚行动”，要求苏联领导人用诸如在奥地利和约上签字的实际行动证实其和平诚意，并呼吁美苏进行裁军谈判。[①] 艾森豪威尔基本上继续推行了杜鲁门政府的“冷战”政策，但也有一些重要变化，例如他认为遏制是防御性的和徒劳的，应以积极、大胆的政策取而代之。[②] 于是在中东、近东他提出“艾森豪威尔主义”，并根据50年代初以来社会主义阵营力量日益强大、欧洲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以及美国霸主地位有所下降的新形势，确立了一种带有时代特征的“新面貌”的外交战略。他批评杜鲁门的“遏制”政策使美国力量过于分散，负担超重，主张削减地面和海上的常规武装，把军事力量集中在美国周边地区，把主要打击力量放在核武器上，当美国“遭到打击”时，能对“侵略者进行大规模报复”，即实行一种以核武器为威慑力量、对别国进行核威胁和核讹诈的“大规模战略报复政策”，把战略核武器作为实现美国外交目标的重要工具。

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是50年代美国外交界的重要代表人物，出任国务卿前就当过共和党外交政策顾问。他在早期著作《战争、和平和变革》中，提出了一些对国际问题的基本看法，反对孤立主义思想，也反对建立世界政府和所谓“民主国家联盟”，认为其结果会招致出现一个反联盟。1950年出版的第二本专著

---

① 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白宫岁月：受命变革》，三联书店，1978年，第173～176页。

② 沃尔特·拉菲伯：《美国、俄国和冷战，1945～1984》，纽约，约翰·威利出版社，1985年，第136页。

《战争还是和平》,就明确了以一切手段同共产主义作斗争的信念，并指出:“认为苏联的意向能够通过说服而有所转变，那不过是一种危险的大幻想罢了。……实力是同苏联领导人打交道取得成功的关键。”[①] 1952 年 5 月杜勒斯公开指责“遏制政策”，称共和党决不就此止步，而将“促进被奴役民族获得解放”。[②] 1953 年 1 月杜勒斯为准备出任国务卿在国会作证时说，“遏制”政策是消极被动的“单纯防御”政策，鼓吹要实行“更为有力、更为主动”的“解放”政策。他进一步解释道:“解放并不就是解放战争。解放，可以用战争以外的方法达到。”杜勒斯在出任国务卿头两天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表示:“只要苏联共产主义还统治着世界 1/3 的地方，并且至少还企图将自己的政权不断强加给许多其他国家的人民，我们就永远不可能有可靠或幸福的和平。只有支持争取解放的愿望，只有在每一个出现这种可能的地方利用这种愿望，我们才能消除这个可怕的危险。”[③] 1954 年 1 月他又引伸说，“解放”只有“在更多地强调先发制人的威力，以及较少地依赖当地防御力量的情况下”才能获得。局部力量对付不了“共产主义世界”，“地区性的防御措施应用更强大的能进行大规模报复的威慑力量加以充实，根据自己的抉择决定行动的地点和方式”。[④] 这被称为所谓“解放理论”。

实际上杜勒斯的“解放”思想流行甚短，艾森豪威尔很快就回到原路。到 1954 年杜勒斯自己也有所变化，是年 4 月他在《外交季刊》上撰文时转而大谈“灵活”与“谨慎”，指出在不损害基

① 约翰·鲁滨逊·比尔等:《约翰·福·杜勒斯》,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 年,第 39 页。

② 约翰·杜勒斯:《当即报复的政策》,载《美国编年历史文选》第 17 卷,第126～127 页。

③ 约翰·杜勒斯:《遏制还是解放》,载《美国编年历史文选》第 17 卷,第204～205 页。

④ 理查德·吉尔德—亚当斯:《强权时代:重新评价杜勒斯》,伦敦韦登菲尔德和尼科尔森公司,1962 年,第 116～118 页。

本立场的条件下可采取具有弹性的作法，不必硬性地拘泥于一时一地的固定成规。杜勒斯认为，如果苏联确信再没有其他什么办法能够保持同西方大国的和平关系，则它会同意停止“国际共产党人的颠覆活动”，这就使“铁幕后的卫星国家”有机会得到“部分主权和民族自决”。[①] 同时杜勒斯又在纽约外交学会发表演说称：“目前的基本决定，主要依靠一支庞大的报复力量，它能够使我们选择的武器与在我们选择的地方马上进行报复。”[②] 即实行一种敢冒战争风险、但又避免战争爆发的“战争边缘”政策。

在新的形势下，艾森豪威尔主张欧洲联合和强大起来共同对付苏联，为此应加强美国与欧洲盟国的合作和北约的力量；在亚洲虽然停止了朝鲜战争，但艾森豪威尔却提出“多米诺骨牌”理论，声称“一个国家倒下去，其他国家将会一个跟着一个倒下去”。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印度支那失掉，就会产生一系列的反应，不仅会失去重要的矿物资源，还会失去千千万万的人民，共产主义势力也就会转向日本、台湾与菲律宾结成的岛屿防御锁链，并将成为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的威胁。[③] 杜勒斯当时也宣称，存在美国“被迫”在印度支那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并主张动用军事力量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甚至考虑通过修改《共同安全条约》来实现日本向东亚派兵，抨击中立主义是“不道德和近视的概念”。[④] 为此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推行一种拼凑军事集团的政策，签订一系列带有某种约束性的区域化集体防卫条约，以在相对减少海外驻军和开支的条件下强化对该地区的控制。他们还有意强调中东位置的极端重要性，要求国会授予在中东使用武力的特权，抢在苏联前面，填补由于英法势力撤出而出现的“力量

---

① H. B. 西瓦切夫：《美国现代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206页。

② 吴成平：《世界现代史大事记》，知识出版社，1984年，第159页。

③ 斯蒂芬·安布罗斯：《艾森豪威尔：总统》，纽约，斯蒙和丝朱思特公司，1984年，第180页。

④ 吴成平：《世界现代史大事记》，第162页。

真空”。

艾森豪威尔主张从军事实力出发进行谈判，试图以此缓和冷战局面，重新探讨和解与合作的可能性。到50年代中期，艾森豪威尔逐渐形成了某种“和平取胜”的新的外交思路。当时美国发生了较为严重的经济危机，国力有所衰落，艾森豪威尔开始切实把苏联放到了与美国同等的地位，承认苏联是两个超级大国中的一个，并主张改变以往军事对抗的形式，多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用心理战和宣传等手段向苏联、东欧进行渗透，促其“和平演变”，以和平方法“战胜共产主义”。

曾为遏制政策提供过理论根据的乔治·凯南这时期又提出一种“脱离接触”的观点，即美苏共同撤出德国和中欧、东欧地区，以实现这些地区的和平与中立化。[①] 但凯南的观点受到艾奇逊等的诘难，后者主张应继续实行战后传统政策。1959年艾森豪威尔邀请赫鲁晓夫访美，举行了戴维营会谈，开始了美苏又争夺又想搞缓和的新局面。戴维营会议在西柏林问题、冻结核武器问题、裁军问题以及对华关系等问题上互有争执，双方都持一种“我的就是我的，你的则可以协商”的态度。但不管会议的内容如何，仅就这次会议的召开本身而言，美苏两国关系业已发生变化，这对以后的美苏关系和整个国际社会产生重要的影响，成为美苏由“对抗”走向“解冻”的一个先兆。所谓“戴维营精神”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国际局势的紧张，但还带有明显的“过渡性质”，离真正意义上的“缓和”还相距甚远，因为艾森豪威尔本人就曾否认过“戴维营精神”，而且在戴维营会议之后，美苏关系也由于U－2飞机事件、柏林墙事件和加勒比海危机等一度又趋于紧张。

---

① 乔治·凯南：《俄国、原子和西方》，纽约，1958年，第37～42页。

第六章

以“缓和”促变

第一节　小　　引

这一章重点要讲的是不同于50年代的新的西方外交思想的准备和发展。

60年代的特点表现为打破僵持局面所作的种种努力，是化解坚冰的起步阶段。其重要性在于“起步”，在于相互试探接触的契机和方式。东西方框架丝毫没有改变；美国也好，苏联也好，它们所想的，仍是两家共管世界，不过不要像过去那样绝对的对立，这表现在赫鲁晓夫的一系列言论中，也明确表现在肯尼迪的国情咨文里。其实就美苏两家而言，从“戴维营会议”已经开始了。从肯尼迪和赫鲁晓夫的会晤到莫斯科三国禁试条约，美国和苏联都要通过接触以维持东西方关系的思想是显而易见的。这种局面之通向尼克松主义也是十分必然的。而且，60年代所发生的使东西方关系骤然紧张起来、直至达到直接冲突边缘的事件，都在千钧一发的最后时刻“化险为夷”，这表明双方都有改善关系的意图。古巴导弹危机、“柏林墙”事件的结局都透露出一个信息：在东西分立中求缓和，是对立双方的“共识”。

尼克松主义在美国外交史中是有划时代意义的。如果说肯尼迪时期开启了美苏对话的局面，尼克松时期则在东西方的大范围里开创了新局面。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在莫斯科发表了关于两国关系准则的联合声明，甚至写进了“和平相处”的原则。同时中

美首次会晤也在此时举行，因此，有的西方史学家认为，尼克松结束了一代人的历史。

60年代，也是西欧大国纷纷面向东方的年代。戴高乐主义、勃兰特的“新东方政策”等都极大地推动了美国，又翻转来受到美国政策的推动。英国比较特殊，它没有像法、德两国以很突出的方式开展同东方的关系，因为根据英国的传统特色，又由于它是美国最密切的盟友，战争期间同苏联有着共同作战和一起进行“大国磋商”的经历，所以即使是在“冷战”最严酷的年月，也同苏联悄悄地保持着联系。英国随时都在调整着自己的政策。

在60年代，西方国家是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地各自向东方开门或敲东方的门。到70年代就形成了欧洲北美范围的大对流，从改善国与国的关系转向缓和欧洲局势的全欧安排，这就是长达数年的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以及中欧裁军谈判）和1975年8月举行的各国首脑会议。这是二战以来第一次全欧加北美的国际会议。它通过的《最后文件》标志着东西方关系从对立到对话的历史性转折；它对于东西欧形势的影响，特别是对东欧的影响，到80年代便比较明显地表现出来。这次会议无论取得了多大成果，也不论这其间穿插进多少曲折复杂的斗争，但这件事本身足以说明，西方经过60年代的准备已经形成了针对东方的外交新思路。概括起来就是以下两点：第一，承认并维持东西分治的战后以来的现状；第二，是通过多边或双边的接触和交流，把西方的价值观传播到东方，促进东方的内部发生变化。事实上从60年代起，意识形态的主动一方已开始从东方转移到西方。

当然，逆转性的事件在同一时期，也是层出不穷的。例如60年代有古巴导弹危机、柏林危机，特别是旷日持久的越南战争，苏联武装侵捷等；70年代后半期有中程导弹、阿富汗战争、非洲紧张局势、波兰团结工会等问题，有的问题一直延续到80年代中期。但是欧美形成的上述两点思路一直持续到80年代末苏联的解体和东欧巨变，导致“冷战”体制最终崩溃。

从 60 年代到 80 年代这 30 年，西方外交思想经历了从脱出“冷战”硬壳到试探性接触，到东西方关系的整体新安排的 3 个连续的阶段。其间东西方关系中时有紧张和缓和的交替，西方国家的态度、政策和见解也时有参差甚至龃龉，这都是自然的事。例如，西欧国家每有所谓“欧洲派”与所谓“大西洋派”之争，欧洲联盟问题的讨论也是欧洲的大事，法、德、英三角关系时有摩擦，在诸如对阿富汗战争、波兰实行“军事管制”、中程导弹和“星球大战”等等问题的对策上，在西方内部，也存在着美欧之间、西欧国家之间的意见歧异，各自的政策都不能不受传统和现实的双重影响；但是究根寻底都无足改变那两条大思路。

80 年代的后半期，东欧的变化加速了，变化立即在政治领域里掀起：波兰模式和匈牙利模式很快传导到东欧各国，集中在建立多党制“民主政治”和私有化经济这两点上，到 80 年代末，几乎所有的东欧国家的共产党都不再执政，社会主义制度随即在这些国家被推翻，当时的苏联也处在剧烈的动荡之中，整个东欧的政权性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西方国家毫不隐瞒它们对这种质变进程的鼓励，都把东欧的动向当作头等大事加以关注，所有几十年当中时时讨论的问题，如裁军之类，都置于次要地位。

本章恰恰结尾于“冷战”结束之时；彻底告别了二战后东西分治的时期。从外交思想的角度看，也将有适应新时期的重新建构，实际上，在 80 年代最后几年，西方已开始在准备迎接“后冷战”时期的新局面了。

第二节　从肯尼迪的“和平战略”到里根主义

进入 60 年代，由于国际战略态势的变化，美国的外交基调由同苏联的对峙与抗衡转向调整与缓和，不再拘泥于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相互争斗上，而是强调新形势下的国家利益、经济发展

和安全保障。美国社会出现越来越强烈的厌战情绪，紧张与缓和之所以交替出现，就在于寻求规避战争之路。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肯尼迪提出了所谓“和平战略”。从肯尼迪的“和平战略”到“尼克松主义”，是从“冷战”转向“解冻”的关键时期，对以后世界格局的分化与改组产生相当深远的影响。肯尼迪和尼克松在外交方面的思维、见解和所采取的有关行动，对这种变化的形成起了带头的作用。

一 肯尼迪的外交思路

美国的总统换届历来是调整国内外政策的契机。肯尼迪在大选时就声言，美国要在外交方面实行“有力的、富于想象力的和有实效的领导”，来为美国寻找到一条“新途径”，争取打开被各种危机缠绕和威胁的被动局面。这诚然有同对手竞争的宣传目的，然而面对新的局势，美国确实需要在外交上有一个新的思路。重要的是，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时代制定的“大规模报复战略”需要修改。用肯尼迪自己的说法，就是美国必须“重新估价外交政策的基础”。他提出，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要“把共产党世界带进我们所寻求的多样化的自由世界中来”，最好的武器就是美国同苏联实行和平共处、和平竞赛。[①]

总的思路有了变化，一些比较具体的思路也得跟着变。然而，总思路也好，具体的思路也好，都离不开一个前提，那就是世界上的问题只能由美、苏两家来决定，不过，要采取比较灵活的办法，例如不要总是强调意识形态的两极观念，强调同苏联谈判的必要性等等。肯尼迪说：“对于那些与我们为敌的国家，我们所要提供的不是保证，而是要求：双方重新着手寻求和平，不要等到科学所释出的危险破坏力量在有意或无意中使全人类沦于自我毁

① R. 莫里斯编：《伟大的总统决策：改变历史的国务文件》，纽约，1967年，第466～467页。

灭，”“这种和平不是依靠人的天性的突然改变，而是依靠人的制度的逐步演变。”①

肯尼迪着意于改变美国的“好战”形象，认为有必要重新检查和调整美国在“军事、经济和政治方面所掌握的全部工具”。②他认为杜勒斯的“战争边缘”政策不利于美国在全世界发挥“领导作用”；在战后新时代应通过接触而非隔绝来确立美国式的“民主、自由、和平与民族主义”，以此来“涣散、颠覆和瓦解共产主义”。③他的“新边疆”计划的要点之一，就是要对东欧准备一套更现实的作法，即通过援助、贸易、旅行、新闻、文化交流等渠道，在东欧各国“燃起自由之灯”。

为了分化社会主义阵营，肯尼迪还提出一种“多元化”策略，即在不打破美苏平衡的前提下各国自由地寻求各自的“解救”之道。他说：“我们必须面对现实，那就是，美国既不是无所不能，也不是无所不知的”。把世界分为两个集团的政策已经过时了，多样化世界“不但同美国关于世界秩序的观念毫不违背”，而且正好表达了“我们对未来看法的实质”，而朝着这样一个世界前进，则是“我们各项政策的统一精神”。④ 当然，“多元化”是针对着苏联和东欧说的，是说那里应该实行“多元化”。

在肯尼迪的“和平战略”中，第三世界居于相当重要的位置。他认为“保卫和扩大自由”的大战场是在地球的整个南部，为此他提出了“粮食用于和平”、“攀亲戚”运动和为期10年的“争取进步同盟”计划等，同苏联争夺“中间地带”，并避免出现“卡斯特罗式的革命”。肯尼迪将此看作“是在意志和目的方面的竞争，也是在武力和暴力方面的竞争；这是争取人心和灵魂的斗争，也

---

① 《美国的历史文献》，第311页。

② 约翰·肯尼迪：《扭转颓势》，三联书店，1976年，第23页。

③ 弗兰克·弗雷德尔：《美国历届总统传》，第188页。

④ 阿瑟·施莱辛格：《一千天：约翰·肯尼迪在白宫》，三联书店，1981年，第494～495页。

是保卫生命和领土的斗争”。“对于那些我们欢迎参与自由国家行列的新国家，我们要提出保证，绝不让一种形式的殖民统治消失后，却代之以另一种远为残酷的暴政”。[①] 二战后，一切以美苏划线，于是第三世界国家也被划为倾向于美国或倾向于苏联两类。肯尼迪要打破这个界线，要把苏联影响较多的地区争取到美国一边来。

肯尼迪的第三个着眼点是美欧关系，主张加强同欧洲盟国的相互合作，他说："我们同那些与我们有共同希望和利益的国家的密切联系，是美国最强有力的资产之一。”“拥有人力和物力的西欧是解决其他一切问题的关键。”[②] 他提出一项北美与西欧共同推动经济发展和军事防御的“宏伟计划”，强调加强北约内部的团结，美国和西欧在平等的伙伴关系基础上建立多边核力量，共享核技术的成果。但是美国仍应保持使用核武器的最后决定权，同时西欧国家也不能单独建立核力量，主要承担发展常规武器的任务。因此在整个防务分工上，美国负有“全球责任”，西欧则负“地区责任”。

应该说，肯尼迪政府对苏战略的调整是带有根本性的调整，其外交新思路的基础即在此。这就是人们所熟知的以“灵活反应”的军事战略代替过去那种“大规模报复战略”。其实 1960 年美国政治家泰勒就曾提出过一种新的战略构想，他说："我建议用来代替大规模报复的战略理论，叫作‘灵活反应’战略，这个名字表明，我们应有能力对任何可能的挑战作出反应，并能在任何情况下顺利地采取行动。”[③] 肯尼迪进一步分析“大规模报复战略”由于过于倚重核威慑力量，不能适应变化了的复杂的国际形势，而“灵活反应战略”既包含了“大规模报复战略”的主要思想，又能适

---

① 《美国的历史文献》，第 309～310 页。

② 约翰·肯尼迪：《和平战略》，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 年，第 16 页。

③ 马克斯韦尔·泰勒：《音律不定的号角》，纽约，1960 年，第 37 页。

应小规模的“有限”战争，即准备打四种战争的新战略：（1）使用常规武器打常规战争；（2）使用常规武器打特种战争；（3）使用战术核武器打有限战争；（4）使用战略核武器打核大战。肯尼迪认为这种“新战略”将加强美国的常规力量和部队的机动性，提高空运能力，加速推行核导弹规划，扩大北极星潜艇计划，使美国具有同时应付“两个半战争”的多样化军事能力。

肯尼迪政府时期制定的这些“新战略”绝不是权宜之计，它对尔后的对苏政策和世界政治的发展变化都有很大影响。站在今天的位置向回看，就会理出一个渊源，许多美国外交的举措，都可以在肯尼迪的“和平战略”里找到“源头”。这就是肯尼迪的“和平战略”在美国对外政策演变中的作用。当然，口上说的、纸上写的与现实存在的和人所做的，都不可能、甚至很不可能一致。

肯尼迪未到执政期满即遇刺身亡，把解决侵越战争问题留给了他的继任者。总之，尽管肯尼迪的缓和思想没来得及付诸实施，但他在任不长的几年里，对于美国尔后的外交影响之大，是不能低估的，特别是对约翰逊的“架桥政策”颇有影响。应该说，美国对苏政策的新思路始于肯尼迪，是他善于适应变化中的形势。

著名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对国际事务的见解直接或间接影响了美国历史上许多重要事件，肯尼迪和约翰逊在执政时极为重视他的观点。李普曼在早期著作《外交赌注》中就初步分析了国际关系中的实力角逐。二战爆发前后，他明确阐明：美国的命运就是要在调整世界的实力平衡方面成为英国的继承人。[①] 二战中的著作《美国的对外政策》批判了威尔逊的理想主义，认为外交政策只能建立在主权国家的国家利益基础之上，提出“国家安全”等重要概念，并预见到战后美苏关系不可避免地要经受严峻考验。冷战时期李普曼又提出“以实力对抗实力”，在“微妙和不稳定的均势”中把握机会。实际上李普曼最先倡议欧洲复兴的援

① 〔美〕罗纳德·斯蒂尔：《李普曼传》，新华出版社，1982年，第548页。

助计划，并鼓励成立欧洲联盟。在对苏评价上，李普曼与乔治·凯南的分歧是，后者多从意识形态着眼，而前者侧重地理和历史因素。李普曼认为，以西方入侵为特征的俄国历史有其传统性的不安全感，力图控制东欧并非始于斯大林，只有减轻苏联对周边安全的恐惧，而不是进行所谓遏制，才是使东欧中立化的上策。在美苏之间，存在通过谈判实现有限和解的可能。同时李普曼原则上并不反对使用美国军事力量，而只是强调使用这种力量的分寸和限度，反对在国际上平均使用力量，并确立进行干涉的政治准则。他把"势力范围"作为国际社会中最基本的东西，认为接受势力范围就成为东西方缓和的外交基础和实行共处的一种方式。

二、尼克松主义

如果说，肯尼迪提出了调整外交的思路，那么把这种思路进一步明确、系统化，加以实施、并在东西方关系中打开局面的则是共和党人理查德·尼克松，他的外交思想和政策被称之为"尼克松主义"。"尼克松主义"也和肯尼迪的"和平战略"一样，是"应运而生"，尼克松是有丰富外交经历的，出任总统后对局势提出系统看法，并形成美国政府的政策。

1968年底大选后不久，尼克松与基辛格就国际形势和美国对外政策问题发表了一篇文章，明确提出"超级大国的时代行将结束"，"多极化将要成为未来的潮流"，"政治上的多极化会使得美国无法把它的想法强加于人"。因此美国"为了在国外采取与承诺一致的行动，我们必须能够组成为共同目标分摊责任的联盟。美国支持下的区域性组织应为它们本地区承担主要责任，美国则更多地关心维护全面的秩序格局。"[①] 这些话反映了尼克松等美国外交决策层对当时局势的看法，尼克松政府的一系列外交举措都由此产生。

---

① 何春超主编：《国际关系史》下册，第320～321页。

(一)“新亚洲政策”

1969年7月尼克松在关岛对记者说，美国作为太平洋国家，不会不管西太平洋和亚洲各国，并透露他正在拟订一项使美国能在太平洋地区继续成为一个强国而又不搞“家长关系”的政策。尼克松比较详细地解释了美国关于亚洲政策的指导思想，他说，“在我们同所有亚洲友邦的关系方面，现在是着重强调下列两点的时候了：第一，我们将恪守我们的条约义务，在亚洲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如果某个核国家对其盟国的自由与生存构成威胁时，美国视之为对自己安全的重大威胁，并对该盟国提供保护；如果涉及其他类型的侵略，在接到求助的要求时，将根据条约义务提供军事经济援助。“第二，在国内安全和军事防卫问题上，除非存在某个核大国的威胁，美国将鼓励并有权期望逐渐由亚洲国家本身来处理，逐渐由亚洲国家本身来负责。”[①] 面临威胁的盟国最好为自己的防务负担提供人力的主要责任，美国最好必须避免采取那些会使亚洲国家倚重依赖，以致把美国拖入像在越南那类冲突中去的政策，美国现阶段在亚洲不得不摆出“低姿态”和“低形象”，要提倡“亚洲的自主”和“亚洲的首创精神”。[②]

从印度支那后撤，是尼克松新战略首先要达到的目标，试图通过谈判来“体面地结束越战”，即采取一种“越南化”计划与巴黎和谈同时并进的“双轨”政策：一方面争取通过谈判，实现美国和北越从南越“共同撤军”，促使对方接受南越的政治现状；另一方面扩充南越军事力量，建立一支能逐渐代替美军作战的当地部队，由“打败敌人”改为向南越提供“最大限度的援助”，实现“战争越南化”。尼克松还解释说：“越南化不是谈判的代替办法，而是对谈判起一种促进作用，加强南越政府和人民保卫自己的能

① 理查德·斯特宾斯：《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68～1969》，纽约，对外关系委员会，1972年，第332～333页。

② 欧内斯特·梅等：《美中关系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388页。

力，我们就对河内起到真正的促进作用，促使它认真进行谈判。”[①]尼克松力主从越战脱身的根本立意，就在于卸掉包袱，由被动转变为主动，使美国迅速恢复元气。

（二）新的均势外交

尼克松重申继续参加各盟国防务及发展活动的同时，又强调美国不能制订全部方案，也不会执行全部决定和负起保卫世界自由国家的全部责任。只有在美国的帮助真正起到作用、而且被认为是符合美国利益的时候，美国才会给予帮助。[②]尼克松把他在关岛所阐述的“新亚洲政策”扩展为一种新的全球战略，并提出“伙伴关系”、“实力”和“谈判”三原则。所谓“伙伴关系”，就是要美国的盟国承担更多的责任。实力仍是基础和后盾，即建立一支“现实威慑力量”。同时，以谈判为重要手段。概括地说就是从实力地位出发进行谈判，在五大力量和三角关系中搞均势外交，从而使美国处于有利地位。

这些想法就如尼克松自己所称道的那样，是“适应国际关系新时代的对外政策新方针的声明”。60年代末苏联的军事实力直追美国，日益接近均衡状态，导致美苏战略态势发生重大变更，西欧各国越来越表现出自行其事的倾向，第三世界的崛起也越来越不可忽视。虽然国际关系形成新格局是尼克松主义出笼的一个重要原因，但美国侵越战争的失败和经济衰退也是关键因素，尼克松在越战结束前就承认：“我得出结论，没法打赢这场战争。当然，我们不能那样说。实际上，看来我们只能说些相反的话，这完全是为了保持一定的讨价还价的本钱。”[③] 尼克松认为，当今世界存在五支经济力量——西欧、日本、中国以及苏联和美国。“这五支

---

① 何春超主编：《国际关系史》下册，第324页。

② 《美国对外关系：二百年美国对外政策文选》，南京大学，1976年，第199～201页。

③ 理查德·惠伦：《别让旗帜倒下》，转引自《国际问题研究》，1983年第3期，第9页。

经济力量将决定世界经济的前途和本世纪最后 1/3 时间世界其他方面的未来，因为经济力量是决定其他各种力量的关键。"[①] 他说，"由于我们的视线被越南问题挡住了，我们看不到世界上发生的非常重大的变化，……同我们在二战结束以后不久所处的地位相比，美国遇到了甚至作梦也想象不到的那种挑战。"战后美国唯我独尊的时期"已告结束"，美国面临古希腊和古罗马衰落时期所遇到的那种挑战。[②] 但尼克松的本意在于，为使美国从国家安全、经济和法律秩序的重重危机中摆脱出来，必须改变到处干涉的方针。同时美国也要巧妙地利用苏、中、日和西欧几大力量之间的相互对立和斗争，通过维持全球均势来保持美国的"领导地位"。

基辛格既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外交家，又是一位深谙国际政治均势理论的专家，他的均势外交思想对尼克松主义的形成无疑起了重要作用。他很早就批评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的外交战略在不同水平的攻击面前要么全力以赴，要么毫无作为，失去灵活反应能力。他对国际关系的新变化从理论上作了系统说明，提出了美苏、亚太、中东和欧洲几个均势框架，主张在这几个方面搞纵横捭阖，认为这就适应了美国战略调整的需要，增加美国的全球灵活性，使美国外交的回旋余地大为扩展。基辛格崇拜梅特涅和俾斯麦，把"我们没有永久的敌人"作为至理名言。他在处理世界事务时强调从更大范围进行观察，主张直接与世界的真正权力中心打交道，将目标同实现目标的各种行动方案作通盘考虑，把所有事务联系起来进行审视。看待国际问题不能绝对化，在世界上只能建立一种在合理的力量对比基础上的相对安全，完全和谐一致乃是乌托邦的幻想，反而会有不安全感。知道何时适可而止是处理国际事务的关键，特别是跟大国交往时应根据其所作所为，而不是根据其意识形态。他认为由于美国力量受到种种制约，只有

---

① 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第 505 页。

② 《战后国际关系史纲》，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 年，第 235 页。

与中苏都保持比它们之间更密切的关系，中苏之间的敌对才最有利于美国。正是在此基础上，基辛格才把均势政策看作尼克松主义外交战略的主要特征，而把“实力”和“谈判”作为维持其均势的主要手段。

（三）美苏关系

尼克松主义仍把处理美苏关系作为“战后美国对外政策中必须长期全神贯注的当务之急”,认为苏联是一个强大有力和咄咄逼人的竞争对手,应付苏联挑战的根本前提是必须拥有足够的实力。在苏联问题上，尼克松的基本战略是实行一种“连环套原则”，即“不是要对方赶快摊牌，而是要在桌上积累大笔赌注，就一连串看来是相互关联而规模广泛的问题同俄国人谈判。”[1] 根据“连环套原则”，美国还主张把核谈判同欧洲问题、中东问题及越南问题等串联起来形成网络，来轮番压苏联让步。由于苏联战略力量的增长和各类核武器试制的增加，尼克松和基辛格一方面强调美国必须大力发展核进攻和防御力量，防止发生核袭击或核讹诈并导致战略核战争的升级行动；另一方面又反对一味对抗，把东西方的接近同谋求和平和减缓美苏紧张关系结合起来。

（四）美欧关系

尼克松把肯尼迪时代的“两个半战争”改为“一个半战争”，不再把中国作为“最大威胁”，将苏联作为“一个半战争”的对手，把重点放在欧洲，西欧成为尼克松调整后的外交战略的重心。尼克松提出，由于美欧已开始出现某种“竞争关系”，因此必须改变美国支配一切的状况，从过去的“依附关系”过渡到一种新型的“伙伴关系”。实行“分担负担”的总兵力方针，防务上以共同安全为原则，使西欧盟国组建更多的常规部队，推动盟友分担防务责任，确立一种“自由世界防务”的分级责任制。同时美国也需借重西欧盟国来加强它同苏联的争霸，共同协调有关对苏政策，把

---

① 亨利·布兰登：《美国力量的收缩》，三联书店，1974年，第352页。

勃兰特的“新东方政策”纳入尼克松主义轨道。尼克松曾多次申明，美国对北约承担的义务是美国整个安全政策的基石，在制定有关对外政策时不会损害西欧利益和“美欧大家庭”的整体关系，强调“共同命运感”和多边防务的“不可分割性”。

基辛格的观点是，随着国际关系的逐渐缓和，欧洲应承担更多一些的义务和责任，为此美国和西欧应共同制定新的“大西洋宪章”。基辛格的“新宪章”就是要把大西洋联盟从军事联盟扩大为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各个领域的全面“共同体”，并把美国和西欧之间存在的各种问题联系在一起解决，用加强军事合作迫使欧共体在经济和政治方面向美国作出让步，并以一定形式吸收日本参加，确定对苏和对第三世界的共同战略。但基辛格也看到美欧经济关系中的隐患："我们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政府解决了这样的问题：如何执行自主的国家经济政策，同时又不致于同既是政治盟友又是贸易敌手的国家搞得关系日益紧张。"[①] 由于西欧各国已不复是战后初期的西欧，到70年代初，欧洲共同体已从6个成员国扩大为10个，实力以及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都已大为改观。因此美欧关系在大的方面保持相同立场的同时，涉及到自身利益时并不容易调节得恰到好处。尤其是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经济矛盾有增无减。

（五）对华政策

尼克松早在60年代就说，美国对亚洲采取的任何政策，都必须刻不容缓地抓住中国的现实。他在竞选总统时提出“与中国对话”的主张，1970年他又在对外政策报告中说，从长远看，如果没有中国这个拥有7亿多人民的国家出力，要建立稳定和持久的国际秩序是不可设想的。尼克松现实地看出美国多年来所执行的“遏制和孤立”中国的政策已经失败，而苏联正气势汹汹地加强与

---

① 亨利·基辛格：《白宫岁月——基辛格回忆录》第1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第453页。

美国的争夺，中国作为世界五大力量之一，是牵制苏联的重要筹码，美国如果不与中国改善关系，其“均势外交”就难以推行。为了遏制苏联的“亚洲集体安全体系”，尼克松提出了所谓“三角外交”的概念，努力打开同中国的关系，以结束中美的对抗局面。基辛格后来在一份给总统的备忘录中论证了改善美中关系的目的，他写道：美国“对中国采取主动的最大好处，也许就是对苏联的影响……我们要使我们的对华政策向莫斯科显示一下，同我们达成协议对他们是有利的，他们必须考虑美国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作的可能性”。“三角战略的真正意义就在于使中苏竞相与我们搞好关系”，美国“对双方都有大量选择的余地，而它们彼此之间的回旋余地则比较小”。[①] 基辛格进一步引伸说，根据地缘政治战略的判断，倘若任凭中国在战争中被苏联击垮，这不但要危及美国的利益，还会使苏联集中军事力量转向西方，到那时就连日本和西欧也会向苏联屈服。[②]

总之，尼克松主义是美国势力相对衰落和实力地位下降的产物，是美国适应国际关系结构深刻变更和世界趋向多极化的结果，是美国政府出于维持美国霸权地位的需要，以一种新的比较现实的态度所采取的相关对策。它不仅规定了美国的海外义务及其与盟国的关系，而且还规定了对苏对华政策的指导原则，它不但成为尼克松届内对外政策的指南，也对以后历届政府的对外政策产生重大影响。尼克松本人曾解释说，“我们决定继续在世界上发挥我们积极的领导作用”，“70年代的新情况要求创造性地对美国的领导重下定义，而不是要悲哀地放弃美国的领导”。[③] 尼克松的本意是：在本身力量的基础上以尽可能小的代价来维护美国在世界各地的利益，或尽可能借助代理人的力量来维护美国在世界上的

① 何春超主编：《国际关系史》下册，第321～322页。

② 王春良等主编：《世界现代史》下册，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27～528页。

③ 班宁·加瑞特等：《从尼克松到里根》，时事出版社，1988年，第79页。

“安全利益”。这就改变了从杜鲁门主义开始形成的那种全方位强力扩张的进攻性战略。从肯尼迪到尼克松，东西方关系逐渐进入70年代的“缓和时期”。出现此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特别是苏联也有调整关系的要求，采取了许多重大外交举措。

詹姆斯·威廉·富布赖特1959～1974年间曾出任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关于国际问题的著述颇丰，对美国外交有一定影响，其代表作有《自恃过高》、《跛足巨人》、《炫耀武力》和《帝国的代价》等。他看到从杜鲁门到尼克松的外交战略中意识形态与现实利益关系的变化，看到新的缓和战略与旧的冷战习惯之间的矛盾。他认为美国真正的战略利益在欧洲，但为了推行杜鲁门主义，却在亚洲打了两场不适宜的战争。他批评尼克松的“战争越南化”和“示范性战争”的概念，认为美国应用地理政治论原则代替旧的冷战观点。富布赖特指出，在国际关系中国家的“重大利益”是一种现实主义的实在事物，是以战略语言对某种决策的明确辩解，根本上来讲，是一种物质性的价值取向。“我们应当关心的，不是我们能使世界变成何物，而是必须在这个世界上创造一些条件，使我们可以自由地去做我们本身所需要的事情。”[①]基于此，他认为越战后的美国外交应减少对外承担义务，在一段时间内恢复元气，这并不是一种“新孤立主义”，而是一种古老的力量平衡制度的体现。美国正在完成着一个循环，即从联合国宪章的理想主义开始，经历了杜鲁门主义和尼克松主义，再次走向一种新的理想主义。

三　卡特的“人权外交”

从70年代后半期到80年代末，美国外交继续在西方外交中居于“领导地位”。论者每每把卡特的“人权”外交披上理想主义的外衣，而里根则更带有现实主义色彩。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使

① 威廉·富布赖特：《跛足巨人》，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151页。

无论哪一届总统的外交形象都是全球性的。

在美国的政治文化中，社会价值观和道德优越感是根深蒂固的一根主线，囊括了民主信念、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和反极权主义等诸多内容。这些思潮对历史上的美国外交决策者们都产生了程度不同的影响，卡特的“人权外交”不过表现得更为突出而已。影响卡特的另一个思想因素，就是越战时期滋生起来的那种对美国军事力量评估不一的矛盾心理，使卡特政府一方面要迅速稳定受到震撼的美国实力地位，另一方面赋予美国外交以某种“人格力量”和“道义责任”。

卡特的一个基本思想是，美国要在人权和自由方面给国际社会树立榜样。他称美国是第一个明确致力于基本道德和哲学原则的国家，曾经带来一个引起人类遐想的革命发展，而现今正是美国再次引起世界遐想的时候。他把“人性自由”和“道义责任”作为对外关系的“理性原则”；“我们已经从对共产主义的过度恐怖之中解放出来了，我们不应以火抗火，而应以水抗火。”[①] 卡特想凭借“人权外交”来恢复美国外交中的所谓理想主义精神，扫除因霸权衰落而带来的悲观主义情绪，增强美国在全球意识形态中的地位。

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人权外交”强调“道义感”，卡特有时称为“道义战”。卡特对苏联军事力量增长的政治意义感到忧虑，渴望改善美国的战略地位，主张从大国均势外交向对外部世界施加政治影响方面倾斜。“我们将保持足够的力量，以致不需通过作战加以证明——不仅基于巨大的武器库，而且基于高尚理想的无言的力量，……当我做你们总统的时期结束时，我希望世界各国人民可以说，我们已缔造了持久和平，其基础不是战争工具，而是反映我们自己最宝贵的价值标准的国际政策。”[②] 卡特坚持把对

---

① 〔日〕教育社编：《里根政权》，新华出版社，1981 年，第 145 页。

② 吉米·卡特：《保持信心》，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 年，第 22～23 页。

人权所负的义务作为美国对外政策中的基本信条。

卡特在批评战后历届总统忽视人权在外交中的作用时指出：“很长时间，我们未能显示出美国所特有的杰斐逊或威尔逊的理想主义。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缺少对付来自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威胁和激发我国人民精神的最有效的办法。由于我们过于强调美苏竞争，所以我们在国际交往中，一个主要因素就是看这些国家是否拥护反共路线，……我熟悉那些被人们广为接受的论点，说我们必须在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或者在伦理与行使武力之间作出抉择；然而这些说法我都是不赞成的。在我看来，树立美国理想主义的榜样，是处理外交事务的一种切实可行的和现实的态度，道德原则是行使美国武力和扩大美国影响的最好基础。”[①] 由此看出，卡特的“人权外交”，还与美国在国际社会中确立什么样的形象和美苏争霸有关。卡特曾直截了当地说过，促进人权将直接影响美苏关系。他上台后，就很快展开了对苏的“人权攻势”。

卡特的“人权外交”范围广泛，其中还包括美国对第三世界的“政治吸引力”。他把“减轻发展中国家的痛苦和缩小世界性贫富差距”，也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基本前提，[②] 在维护人权的口号下，采取一些有别于支持亲美独裁政权的传统作法，以图改善美国在第三世界的形象，目的在于增强抗衡苏联的政治力量。

这里还需要说明，卡特上台正是世界局势顺着赫尔辛基会议后出现的“缓和”势头发展的时候，美国参与了“缓和”的进程，同时反过来也受到当时局势的影响。及至发现苏联利用“缓和”进程在安哥拉、埃塞俄比亚、阿富汗等地得手，特别是苏联已悄悄地研制和部署起SS20海基弹道中程导弹时，卡特政府才感觉到只侧重“人权外交”是无济于事了。在朝野的批评中，卡特经历了一段重新审查自身政策的过程。

---

① 吉米·卡特：《保持信心》，第128～129页。

② 刘绪贻、杨生茂主编：《战后美国史》，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61页。

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曾出任肯尼迪政府对外政策顾问，在卡特届内成为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他是学者出身，对国际问题有一套自己的看法，系统阐述过关于美国对外政策总结构的观点。他擅长从历史的思想角度，来挖掘外交策略的理论基础。他认为尽管历史是不断变化的，但国际事务还是能区分阶段，由各种关系的某种模式所支配。国际关系实际上是由合作因素与角逐因素构成的混合物，具有实用性质和地区性质。外交的目的应使角逐关系趋于稳定，减少冲突的成分。

布热津斯基认为，当代美国外交存在“力量现实主义”和“现世人道主义”两种思想流派，以不同的哲学和政治内容来阐释“世界相互依存”这一共同概念，前者的价值准则强调战略、武装力量的关系和均势等，后者则注意社会正义、和平、发展的限度乃至生态环境等。但它们又与传统的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不同，新的力量现实主义更关注稳定和相互依存，而新的现世人道主义更倾向于世界的社会变动。他认为尼克松的外交框架基本是力量现实主义的，突出一种俾斯麦式的动态均势，而非梅特涅式的静态均势。卡特政府应把缓和作为双向的全面运作的过程，而非单行道，应以美国军事威慑作为先决条件，否则这种缓和就不会稳定。

四　里根主义

罗纳德·里根在好莱坞演艺界当工会主席时，就具有强烈的“反共意识”，长期以来坚持认为，共产党有一个以美国为最终目标的征服世界的计划。这种看法根深蒂固，一直影响到他出任总统后的外交决策。里根典型的右翼保守特征既表现在经济政策上的供应学派方面，也表现在他的外交思想中，并逐步形成较系统的“里根主义”。

里根呼吁要恢复所谓“美国精神”，他多次援引清教徒约翰·温思罗普的比喻，把美国视为“山巅之城市”，即世界的光辉榜样。他认为美国从建国初期起就是一个“决定事物进程的国家”，应该

复兴美国一度在世界上所拥有的无可匹敌的支配地位，建设“强大的美国”，实现“充满活力的美国”。他否认世界多极化的提法，但又认为美国不应仅是一个被动的样板，应信心十足地把自由的神灵传布四方。只要美国领导人态度果断，美国的力量、技术及其社会准则就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巨大影响。为此，里根强调说：“我们必须成为民主制度的兵工厂。”“我们并不谋求对自由世界的领导地位，但是没有任何别的国家能提供这种领导，如果没有我们的领导，世界就不会太平。”[①]

里根观察世界的基本哲学观点，就是把它看成是冷战早期那种非此即彼的两极世界。美苏在全球的权力竞争不但影响着他对外交问题的想法，而且也成为他观察和判断国际局势的尺度，同时也驱使他产生一种“使命感”。他说：“我们必须重建我们的梦想，重建我们对自己和对我们国家的自豪感，恢复那种使美国始终不同于世界其他国家的独特使命感和乐观主义。……竭尽全力恢复美国的精神活力。”[②] 里根想方设法调动各种因素，扭转美国权力走下坡路的颓势，以中兴美国实力为己任，力主美国在全世界作出更强劲的反应。

鉴此，里根要求迅速增加防务开支，批评卡特忽视国防和削弱国防力量。他认为只有一场扩军高潮才能恢复美国的“安全状态”，现在美国的任务就是重整军备，在政治上再次发动攻势。[③]乔治·舒尔茨曾说过，在里根的思想里没有比加强美国国防能力更重要的事了。[④]里根的一个经常性议题就是吸取这样一种“历史教训”，即在大国间只有实力雄厚足以保护自己利益的国家才能生

---

① 赫德里克·史密斯等：《里根和里根总统》，商务印书馆，1982 年，第 98～99 页。

② 罗纳德·里根：《里根自传》，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 年，第 196 页。

③ 米歇尔·曼德尔伯姆等：《里根与戈尔巴乔夫》，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 年，第 21 页。

④ 《里根和里根总统》，第 57 页。

存，他一再声称，美国的军事力量不能亚于任何国家，如果美国成为“第二位国家”，那就等于成为末位国家，就会招致战争。他认为和平不会从软弱或退却中取得，和平将从“恢复”美国的军事优势中取得。他认为在美苏军事竞争中，美国是失利的一方，而且差距正拉大，苏联的核力量无论在当量上还是种类上，都已处于危险的领先地位，美国已由于力量减弱而难以有所作为，这是一种“耻辱”。[1]当务之急是加强常规军事力量和战略军事力量，不能仅局限于拥有与苏联相匹敌的军事力量，而要拥有优于苏联的综合军事力量，后者才是和平的先决条件。美国必须为此目的而支出所需要的一切费用，即使联邦预算因此出现不平衡也在所不惜。他相信美苏军备竞赛的结果，将使苏联经济无法承受，因而被迫与美国谈判和妥协，这样和平就有保障，美国也将恢复“受到尊敬”的霸主地位。

里根反对尼克松确立并被卡特所承袭的“一个半战争”的战略，按照这一战略，美国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中必须有足够的部队在欧洲同苏联打一场大规模战争，另外还能余下一些部队在某个地方打一场小规模的“灌木林火式”战争。里根认为，美国今后可能会同时在若干地区投入战争，包括欧洲、波斯湾、东亚及加勒比、中美洲。美国应采取同时在几个战区进行长期全面战争的方针，其军事经济潜力要对一场全球规模的“持久”军事冲突作好准备，即实行一种“实战”战略，也是一种攻防兼备的“新灵活反应战略”。

里根主张加强北约组织，吸收更多的成员参加，扩大西方联盟体系，尤其是西班牙，以强化南翼力量，再把远东、澳洲和其他一些地区都囊括其中，从而使美国与盟国有能力在全球范围内对付所谓“军事威胁”。里根上台后不久就重申：“我们珍视同盟

---

①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1980 年 10 月。

关系，并希望维持这种关系。"[①] 同时他又要求各盟国"公平分担防务"。里根把美日关系作为美国对亚洲政策的支柱，要在"密切磋商和合作"的基础上继续发展美日关系，并要求日本承担更多的防卫义务。在中东，里根把以色列视为"最可靠的盟友"，认为以色列战略地位重要，必须使之保持强大，免受苏联控制。里根虽然多次表示对盟国的支持态度，但考虑这种关系时是从美国居于盟主地位的角度出发的，并不看重盟国独立自主的一面。他总觉得西方联盟内部的矛盾和错位只是由于美国的领导失误，致使苏联插手其间。根据他的逻辑，只要美国适时纠偏，形成有利的战略对比，明确对全球事务的坚定立场，并不间断地向盟国指明政策方向，就能够解决大多数相关问题，欧洲国家也就会重新心甘情愿地接受美国的领导。

里根是对苏强硬派的著名人物，他在英国议会演讲时总反复提到"铁幕"一词，并把自己同丘吉尔相提并论，不承认似乎已被西方作为既成事实接受下来的苏联的"势力范围"，要把苏联"推回"到它自己的边界线处，甚至到其本土以内。加强国防、恢复军事优势的目的就是要与苏联抗衡，这是里根对外政策的主题。里根视苏联为"世界一切动乱的根源"。他说，如果苏联人不去搞多米诺骨牌游戏，世界上根本不会有什么危险的地区。他毫不含糊地认为苏联要控制世界的每一角落，不论苏联在哪里采取行动，必然是针对美国的，苏联加强军事力量主要是为了在政治上取得好处，借以逐渐包围西方，削弱西方在战略方面和经济方面的影响，最终使苏联的政治制度在全球获胜。为此里根要美国在与本国利益相关的区域同苏联进行直接对抗。他认为只有苏联看到美国决心加强其军事防御力量时，他们才会坐下来谈判，因此美国不能同苏联仅仅讨论限制战略武器问题，而应把这个问题同世界

---

① 《时代》周刊，1980年6月。

其他问题联系起来讨论。他说："我相信连环套"。[1] 里根的"连环套"策略就是不管与苏联谈判什么问题，都应同苏联的全球战略联系起来考虑。

里根的结论是，苏联已决意获取优势地位，而美国则不能再犹豫，如果一个敌对国家对任何地区的控制或影响威胁着美国的安全，那么，世界上没有任何地区是在美国利益的范围之外。对于苏联在阿富汗和东欧等地的作为，不能视为长久性的历史事实来接受，虽然美国往往必须依靠盟国的军事能力来遏制苏联，但盟国的支持不应抑制美国在保卫其自身利益方面所采取的行动。

对反苏组织的援助在里根届内形成高潮，同时在理论上也得到比较完整的阐述。里根认为苏联决不可以拥有美国建立附属国的那种特权，承认苏联的这种特权是极其危险和愚蠢的。基于此，如果在左派极权政府和右派独裁政府之间作出选择，宁取后者，也不要前者。里根的一个明白无误的观念是："支持为自由而奋斗的战士就是自卫。民主国家也应采取共产党国家那样的扩张主义政策，成为自由、个人解放和代议制政府等在全世界的传播者，支持民主是促进反苏反共的最好办法。"[2] 里根进一步明确表示："作为我的对外政策的基础，我决定我们必须给俄国人送去一个尽可能强有力的信息，让他们知道，当他们为恐怖分子提供军事和财政支持以颠覆民主政府的时候，我们决不再袖手旁观。我们的政策应建立在实力和现实主义的基础上。"[3]"我还试图发出信号：美国打算支持一切为反对共产主义和争取自由而战的人民，不论是在什么地方——这一政策后来被一些作家称为'里根主义'。"[4] 1986 年 3 月 14 日里根发表《自由、地区安全和全球和平》的对外政策咨文，再次宣称："一系列政府落入共产党控制下的局面，行

---

① 任益：《从好莱坞到白宫》，时事出版社，1981 年，第 59 页。

②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86 年 3 月 17 日。

③ 《里根自传》，第 234 页。

④ 同上书，第 497 页。

将到此为止。”①

这也就是说，美国必须谋取单方面优势，除掉苏联至少在70年代抓到手的东西，改变现状以利于自己。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里根蝉联总统后尽管与苏联举行了最高级会晤，但第三世界政策更趋强硬的原因。究其根本，仍然是谁压倒谁的问题，只不过较量的方式和地点有所变动而已，里根不再像其前任总统那样“训导”苏联，而是干脆从外围把它驱逐出去，或动摇它的外部结构，使之付出更大的代价，造成多向抵消，以达到“拖垮”苏联的目的，最终形成一个使苏联不能“任性胡来”的世界格局。

尽管里根给人留下鹰派印象，但他又自称不是“动辄喜欢扣扳机的家伙”，他也在某些场合表示过，和解比对抗更为可取，只是事情总有一定限度，如果超过其限度，就不能任其摆布。里根所期望的，是用军备竞赛可能加剧的警告来迫使苏联重新考虑他们自己的核战略，最后按照对美国较为有利的条件进行谈判。

上述表明，里根政府从理论实质上是向“冷战”最盛时期的“两极体制”的回归，甚至可以说是从肯尼迪以来没有过的。里根观察世界、观察东西方关系、观察第三世界，无一不是从东西方对立的立场出发的。从里根前期言论看，丝毫没有妥协的影子，在诸如中程导弹、阿富汗问题、波兰危机等方面重新出现了尖锐对峙的局面。但是时代已经不同了，局势不可能退回到50年代，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里根也不能不在对外关系的举措上适应现实。美国的实力毕竟不能使领导人为所欲为，同时各盟国显然已不愿看到局势的根本逆转。欧日领导人都曾以不同方式充当东西方之间的中介，撒切尔夫人周旋于里根和戈尔巴乔夫之间，表现得最为活跃与主动。各种因素推动里根政府一方面继续致力营造夺人的气势，另一方面又进行审慎的权衡。虽然并不情愿，但是总得通融，里根这样表示自己的分寸：“有些人认为，你如果不能得到

① 《纽约时报》，1986年3月15日。

你所希望得到的一切，就应当凭着自己的原则信念，举着飘扬的旗帜跳崖自尽。假如我发现我的要求不能百分之百地得到满足，我就同意满足我百分之八十。”[①]

1984年初，里根又撰文写道：“无论我们还是苏联，都不能希望消弭我们之间在两种制度和两种哲学上的分歧”，“但是我们应时刻牢记，我们确实存有共同利益，……没有比一条我称之为可信的威慑与和平的竞争更加理智的选择道路了。”[②] 里根意在展开一场更为主动的“和平攻势”，使对抗与有限缓和并存。但这并不是说里根放弃了以实力为后盾的争霸战略，而是主张东西方之间在“合法的竞争领域”共处。里根的“合法竞争”论仍是一种对苏联的地缘政治攻势，是一种介乎于以前用词辛辣的直面攻讦和从尼克松到卡特的“缓和战略”之间的外交谋略，也是“推回”战略的一个修改版，通过“合法行动”迫使苏联退出东方集团以外的区域，龟缩到自己圈内。这种“新遏制战略”也是里根主义的一个重要部分。

总体说来，里根主义是逐渐演化而来。在里根的外交思想中，一个关键性的命题是，对东西方关系的现状，改变它要胜于维持它，应充分利用苏联及其一切它所影响到的左翼政权的各种不稳定因素，通过多条渠道促使“内部危机”爆发，把支持第三世界反苏势力作为阻止苏联扩张的一种手段。里根主义的现实基础就是美苏各自代表的两种制度的根本对立与长期竞争，而实力和威慑则是推行里根主义的两个重要的支撑点。

里根的“战略防御计划”，既是一项安全战略，也是一项外交战略。里根要用它来改变核时代的基本前提和战略领域的手段，用“确保生存”的观念来取代“相互摧毁”的观念。里根这一思想并不是突然产生的，早在1976年与福特竞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

① 《里根和里根总统》，第160页。
② 《里根与戈尔巴乔夫》，第31页。

时，里根就曾形容传统的威慑政策是互将枪口瞄准对方的两个人。他认为美国未来的安全系数不能完全依赖于苏联的克制，这是一桩没有把握的悬事，一旦苏联失去自制，美国除了报复便别无它途，结局只能是同归于尽。里根的战略目标是：或使苏联接受绝对裁军，或使美国的防御态势加强到"再次消除苏联发动先发制人袭击的可能性"的程度。1982年3月在里根授意下，几十名专家学者联合提出《高边疆——国家的新战略》报告，其中指出："当前美国必须当机立断，抛弃以往恐怖平衡的理论，利用科技优势，确立以空间战略为主体的新国家战略。"[①] 该报告还从历史角度论述了空间战略对争霸世界的意义。1983年3月里根在被称之为"标准的威慑演说"中宣布实行"战略防御计划"，利用空间为国家安全服务，打破核均衡，而这种核均衡正是苏联多年来所追寻的目标。

关于核武器，里根是美国第一个已经就职仍强调劣势依然存在的总统，在他的头脑里有一个简明的公式，即要求苏联削减，同时使美国扩充。技术上极其复杂的战略防御计划，实质上就是这简明公式的曲折体现。虽然战略防御计划有里根政治本能的作用，但也有他对如何从一直支配美国防务和外交政策的思维定势中走出一条新路的考虑。可以说，在外交和国家安全领域，战略防御计划则更多地展示出里根的个人意志和处事风格，正如他一贯认为的，如果一位领袖敢于对基本的问题提出疑问，那么，最棘手的问题也会迎刃而解。极端复杂的核武器问题，在里根那里就浓缩为一个简捷的问句：如果国家受到苏联导弹的威胁，为什么不发明一个系统在它们造成破坏前将其击落？他说："我从来没有把战略防御计划看成是一块刺不穿的盾牌——没有任何防御可以指望成为百分之百的有效防御。但是这种思想的令人鼓舞之处在于：如果它运行起来，我们将进入一个时代，那时世界上的国家都同

---

① 李瑞晨等：《星球大战与美苏太空争夺》，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第10页。

意消灭核武器，它可能成为反对讹诈——或抵制那些掌握核导弹的疯子发动进攻的安全阀。"[1]

尽管有人把战略防御计划喻为"皇帝的新衣"，但它提出的本身，已使里根无论在舆论上还是声势上都处于某种有利位置。对可能长期停留在实验阶段的战略防御计划的宣传，就是一种具有威慑效应的报复能力，至少使对手处于一种更为不安的戒备状态。尽管里根声称战略防御计划不是讨价还价的筹码，但他还是认为，苏联为限制这个计划，最终会提出大规模削减进攻性武器作为交换条件，或削弱扩充进攻性武器的势头。因为苏联担心万一美国的防御技术有所突破，他们的攻击力量从长远看将失去作用。里根强调战略防御计划并不意味着放弃或代替威慑和现有的条件，他认为无论从历史上还是理论上讲，防御系统和威慑政策都是一致的，战略防御计划正是为加强威慑而提供的一个较稳定的基础，把这种未来的研究成果与全面威慑态势溶为一体。里根正是以这样的设想企图使对手就范，难怪里根的一位顾问称战略防御计划为"历史上最伟大的敲竹杠"，这也是里根试图摆脱传统核威慑困境的一种谋划。

里根的战略防御计划是一项具有多种追求目标的发展战略，一方面，在里根的战略防御思想中，它只是进攻性战略核武器的补充，是美国整个威慑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的绝不在于消极防御，而在于重新确立对苏联的军事战略优势；另一方面，开发和利用宇宙空间将是美国二次革命的主要内容之一，而这场"里根革命"是"一场把世界和平和人类自由的美好希望带到我们国界之外的革命"。[2] 这也是美国未来通过高技术全面谋求世界霸主地位的基本战略。从这种意义上来讲，不管国际情势发生怎样

① 《里根自传》，第548页。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政治研究所：《星球大战——对美苏太空争夺的剖析》，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第12页。

变化，像“实力威慑”、“战略防御”等这样一些重要概念，仍不失为了解美国外交思想与实际运作的一把钥匙。

第三节　法兰西民族主义与戴高乐的独立外交

如果在西方外交思想史中谈到戴高乐，浮现在人们心目中的，自然是一副处处维护法兰西民族利益，竭力恢复法国大国地位，并为此不惜与世界上最强大的盟友分庭抗礼的戴高乐形象。这样的戴高乐形象，也正是戴高乐外交思想中所遵循的主要原则的具体体现。

一　戴高乐其人

戴高乐，生于1870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反法西斯抵抗运动的主要领导人，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创始人、首任总统。

戴高乐是一位具有鲜明特性的西方当代政治家、外交家。他之所以引人注目、受到法国人的崇敬，不仅在于他率先发动了抵抗德国法西斯的民族解放战争，比较成功地治理了法国，而更在于他在西方政治家中，是一位具有鲜明独特思想的外交家。在他的外交思想主导下，法国制定并实践了一项具有明确战略目标的对外政策，这一政策及其思想依据，在西方外交思想史和战后国际关系中是非常值得研究的。

那末，戴高乐的外交思想中遵循的主要原则是什么呢？简而言之，就是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

法国在历史上曾称霸欧洲，也曾跃居世界强国，但又几次三番沦陷敌手；她在历史上曾涌现了众多的民族英雄和振国扬威的历史人物，像“圣女”贞德、路易十四、拿破仑，但也有使法兰西蒙受耻辱的拿破仑第三、贝当和赖伐尔。在法国，法兰西民族又具有绚丽多姿的文明史，启蒙运动造就了许多载入史册的思想

家、文学家、科学家；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改变了欧洲大陆的面貌。然而，一个多世纪以来，法国却相对衰落了。由于对往日称雄欧洲的怀念和对 70 年中三次战争（普法战争和两次世界大战）丧权辱国的余悸，法国对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问题特别敏感。在欧洲诸多的民族主义中，这是法兰西民族主义的一个特点。戴高乐正是在这样的历史熏陶中，孕育了自己的外交思想。

法兰西至上是戴高乐的一个突出思想。戴高乐的爱国热情、民族情感和对往昔的回忆往往交织在一起。

戴高乐自己怎样总结他的外交原则呢？

他曾回忆 1958 年重新执政时所面临的所有重大国际问题，指出：首先是德国问题（德国变成了两个集团争夺的主要赌注）；其次是欧洲问题（欧洲被两个集团分裂了）；北约组织问题（体现了西欧对美国的从属关系）；援助第三世界发展问题（这是美苏争夺的场所）；近东和亚非拉的危机问题（两个大国的对抗干涉使这些危机长期存在）；关于国际组织问题（两个大国主宰）。戴高乐认为，在所有这些问题中，他都要使法国发挥积极的作用。他总结道：

> 就我来说，我时常进攻，但从来不伤害一个民族的自尊心，或领导人的尊严。但是，主要的是我们所说的和所做的必须保持独立性。我重新执政以来，这就是我们的规则！我们国家的态度这样彻底的变化，使世界的政治角逐也突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①]

所以，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是戴高乐外交思想的主要原则，是戴高乐从政以来处理外交事务和国际问题的主要原则。它包含有三层意思，也可以说在戴高乐的外交生涯中，从三个方面

① 戴高乐：《希望回忆录》，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3 年，第 174 页。

体现出来，即反对美苏称霸，欧洲观，非殖民化。而这三点归结到最后，就是围绕戴高乐的最终目标——恢复法国的大国地位——服务的。因此，戴高乐外交思想的宗旨也可看成是：维护法兰西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争取恢复法国的大国地位。

二 反对美苏两霸主宰世界，在东西方关系中独立自主

戴高乐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原则主张是一贯的。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兰西国土沦陷，戴高乐不仅要率众从德国法西斯铁蹄下夺得民族独立，恢复法兰西国家主权，而且还要在诸事依赖盟国的情况下，在盟友手里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在争取解放时是如此，在法国解放后也是如此。如果说在战争期间，因为地位和力量的原因执行起来还有所顾忌的话，那末到法兰西恢复成一个完整统一的主权国家，特别是在戴高乐执政期间，那就很难看到有什么让步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结束时，法国是被排除在大国协商之外的，罗斯福和斯大林都不把法国放在眼里，是由于丘吉尔的坚持，戴高乐的法国才得到美国和苏联的承认。戴高乐的心情是复杂的。在他看来，美国和苏联这两个庞大的国家，具备了能够毁灭世界的核武器，它们相互以此作为讨价还价、争夺霸权和向其他国家发号施令的资本。戴高乐认为，这种对峙下的平衡，是危险的平衡，“如果不向着普遍的缓和方向发展，终有一天平衡会被打破因而变成一场规模巨大的战争！”

戴高乐决计要打破美苏垄断国际事务的局面。他在谈到前面已经提到过的问题时是这样说的：

> 到底是些什么问题呢？首先是关于德国的问题。它被分为三部分：西部存在着一个议会制共和国，东部存在着一个共产党专政国家，还有柏林的特殊地位。由于这种状态在内部引起的动荡，德国变成了两个集团争夺的主要赌注。其次，

关于欧洲的问题。在它遭受的可怕的分裂以后，理智和感情都要求它重新团结起来，但是中欧和巴尔干受到苏联霸权主义的奴役以及两个集团制度和铁幕把欧洲根本分裂了。关于北大西洋联盟的组织问题，这个组织仅仅体现了西欧对美国在军事和政治上的从属关系。关于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需要援助的问题，华盛顿和莫斯科把这些国家作为它们争夺的场所。关于近东、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危机问题，这两个大国互相对抗的干涉使这些危机成了慢性病和不治之症。关于国际组织问题，在这里，这两个敌手对一切问题的判断各走极端，而大公无私却遭到遏制。①

戴高乐不能容忍这种由美苏主宰世界的状况继续下去，他要使法国发挥“积极的作用”，他要实现这个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强烈要求但没有如愿的抱负。最重要的就是要为法国争得一个与美国、苏联、英国“平分秋色”的地位。那首先就需要从美国的“影响”下摆脱出来。

为此，戴高乐构起了他的行动计划，他说道：

“我的计划在于把法国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美国指挥下所奉行的欧洲一体化中摆脱出来，但不是脱离我认为应该保持的可以作为最后预防手段的大西洋联盟；在于同每个东方集团的国家——首先同俄国——建立缓和国际局势的关系，然后建立谅解和合作的关系，一旦时机到来，对中国也是如此；最后在于建立这样一支核力量，使任何国家要是攻击我们的话，它自己就会受到可怕的打击。”②

这就是后来戴高乐遵循独立自主原则，针对霸权主义作成的举世皆惊的三件大事。

---

① 《希望回忆录》，第174页。

② 同上书，第212页。

戴高乐首先冲击的目标，是以美国为盟主的北大西洋公约联盟。

戴高乐认为，二战结束后，欧洲由于担心俄国在控制中欧和巴尔干之后，继续向西扩展。“因此，恐怕没有比美国的帮助是更需要和有益的了。”于是，马歇尔计划帮助欧洲恢复经济和社会安定，核武器保障安全，结果出现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这个安全体系。因此多年来，欧洲不得不依附美国的领导。但是1958年的世界局势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立时大不相同了：苏联已不大可能真正进行征服西方国家的行动。因为美苏都有了可以毁灭对方的武器，美苏直接交战的可能性是不大的，但是谁也制止不了他们在自己的领土之外投弹，因此对于西欧的欧洲人来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已经不能保障他们的生存了。既然保护作用令人怀疑，为什么还要把自己的命运委托给“保护者”呢？

从1958年7月份起，戴高乐便接二连三地采取断然措施，退出了北约一体化军事委员会，逼迫北约理事会从巴黎迁往布鲁塞尔，真正显示了法国独立自主的立场。

戴高乐的第二个目标是打开同东方集团对话的另一扇门。

以美苏关系为代表的东西方关系，战后以来经历了合作、冷战，到50年代末期，已从戴维营会谈开始出现了某些解冻的迹象。戴高乐认为，随着形势的发展，东方集团将会越来越希望缓和国际局势，这是戴高乐关于世界形势与战争结束时“大不相同了”的主要内容。在1958年7月和1959年9月，戴高乐同杜勒斯和艾森豪威尔的会谈中，都强调了自己对苏联和整个东方集团的看法，主张在不忽视防御手段的同时，朝着同克里姆林宫进行接触的方向前进，“从既成事实出发，使西欧国家和东欧国家互相接近，开始时只从经济、文化、技术、游览方面着手，一点一点地打开铁幕。”

但是关键在于，同苏联的接触不应当由美国来垄断，法国也应有权独立与东方，首先是与苏联打交道，“法国应当而且能够为

世界各国作出榜样。”因此，他提出了一条同东方国家“缓和、谅解和合作”的道路，在美苏之间搞平衡，争取充当调解人。他当着艾森豪威尔的面宣布，法国也打算邀请赫鲁晓夫来法访问，并准备签订法苏合作条约。

1960年3月，在戴高乐邀请下赫鲁晓夫访问了法国，受到隆重接待。两国领导人就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特别是德国和欧洲问题、核裁军问题交换了意见。戴高乐对这次访问很有些自得，觉得“世界和平有了希望，欧洲也有了前途”。到1966年前后，通过正式访问东欧和苏联，戴高乐将法苏关系推向了“新阶段”。它的意义不仅在于戴高乐外交中独立自主精神的体现，而且为后来西德的“新东方政策”开辟了道路。勃兰特曾说过，他最终提出“新东方政策”，是与多次同戴高乐的谈话得到的启发分不开的。

戴高乐的第三个目标，是要拥有法国自己的独立核力量。这是法国是否真正独立自主的主要保证。

法国研制核武器，在戴高乐重新执政之前的第四共和国时期就早已开始了。但用核武器来作为反对美苏霸权的筹码，则是在戴高乐执政后明确起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苏争霸、美苏对峙、美苏妥协，无不是与各自拥有的核力量有关。因此，能否维持核垄断，是美苏能否维持霸权地位的关键。在60年代，大国外交的指导思想中维护霸权和反对霸权的斗争，就相对集中在维护核垄断和打破核垄断的斗争上。

戴高乐从1958年重新执政到1961年之间，先后会晤过杜勒斯、艾森豪威尔、赫鲁晓夫、肯尼迪等美苏要人，每次谈话都离不开核武器问题。美国人规劝戴高乐，美国已拥有强大的核力量，足以保护欧洲和法国对付任何侵犯，法国不必再耗费巨额资金单独去研制，何况从技术和规模上也很难超过美国。戴高乐不为所动。他说，问题不在核武器本身，问题在于谁有权使用核武器。1959年9月，艾森豪威尔对戴高乐旧调重弹，戴高乐仍然明确反对，艾森豪威尔不无感叹地问道：“为什么您怀疑美国不和欧洲共命运

呢?”戴高乐反唇相讥，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法国在“受了3年漫长的痛苦考验几乎濒于灭亡之后美国才来帮助”,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在美国干预之前法国已经崩溃了。言外之意是：美国可以指望么?1961年夏，肯尼迪又同戴高乐谈起核武器，提议提供北极星导弹潜艇给北约使用，以换取法国放弃进一步研制核武器。戴高乐将这一建议看成“不过是从一个美国司令转给另一个美国司令，而决定发射导弹的权利仍然在同一位美国总统手里。”

1960年2月13日，法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戴高乐认为，它证明法国“确实又重新独立自主了”。对于美国提出的“多边核力量计划”,戴高乐拒绝参加。美国同苏联和英国提出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戴高乐同样拒绝签字。总之凡是可能妨碍法国放手发展独立核力量的事，戴高乐一概予以抵制。

戴高乐不肯让步的顽强态度，使美国异常恼火。美国总统肯尼迪公开在记者招待会上谴责这种作法“违背大西洋联盟集体利益”;西方舆论中甚至称戴高乐为“西方联盟的叛逆”。戴高乐说：“法国这种作法使美国的某些方面感到不很满意。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政治方面、战略方面，如同在经济方面一样，垄断的办法，对垄断者来说，总显得是最好的制度。”[①] 他觉得如果同意这种核垄断存在，世界上就会产生新的霸权，而法国是决不会同意的。

从戴高乐自己选定的，反对美苏霸权的这三个突破口来看，可以明确得出一个结论：戴高乐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斗争，主要是针对美国，戴高乐反对美苏霸权的侧重点在反对美国霸权。

当然，戴高乐在东西方关系中以反对美国称霸为重点的态度，并不表明他改变了对西方联盟和东方联盟的基本立场。他虽然对

---

① 1963年1月14日戴高乐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载〔法〕《世界报》，1963年1月16日。

美国的地位多次公开提出挑战，斥责美国伙同苏联称霸世界，但从未表示过要脱离西方联盟。因为戴高乐的一个基本看法是，尽管东方集团的领导人具有了现实主义的态度。也希望缓和国际局势，但苏联仍然是“极权国家”，不论从意识形态、社会制度、价值观念各方面来看，法国还是西方联盟的一员。在柏林危机问题，U2飞机事件，古巴导弹危机等东西方关系的重大事件上，戴高乐的西方立场是很明确的。

三　戴高乐的“欧洲观”

欧洲联合问题，是欧洲历史上历代著名思想家、政治家们长期探讨、争论和呼吁的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国际环境，欧洲联合问题再次成为欧洲的重大政治问题，并逐步成为各国政府间的外交内容走向实践阶段。作为法国这样一个欧洲大国的政界要人，戴高乐当然也有自己的“欧洲观”。但是，长此以往，在许多人看来，戴高乐是欧洲联合的反对派。其实，戴高乐的欧洲观，是他整个外交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就是说，他的欧洲观仍然是以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争取大国地位为原则的。之所以一些人将他看成是欧洲联合的反对派，是因为欧洲联合中传统的联邦主义者的主张，在一些关键问题上与戴高乐的外交原则有抵触，因此后者从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这一原则出发，对欧洲联合问题的具体内容和形式时有异议，矛盾经常公开和激化，甚而陷入僵局。

应当说戴高乐还是主张欧洲联合的。只不过他设想的欧洲联合只是各个欧洲主权民族国家的联合，而不是牺牲国家主权的一体化的联合。

戴高乐的欧洲观的主要内容是：

（一）邦联式的“祖国的欧洲”

戴高乐反对建立一体化和超国家的欧洲联邦，主张建立一个保持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邦联式的“祖国的欧洲”。

50年代初期，他曾斥责煤钢共同体是“一堆碎煤烂钢”，认为欧洲煤钢共同体和欧洲防务共同体等计划都是在“歪曲欧洲联合的思想”，是一种“假象”和“借口”，是在欺骗人民。戴高乐认为它的要害是要法国放弃自己的主权，并溶化在一个更大的集体中；要法国接受“超国家”的理论，就等于是要法国屈服于一种不属于法国的法律。他这样描绘超国家的欧洲：

> 它是这样一种机构，技术专家在这里构成“行政部”，国会议员享有立法权，前者和后者的大多数都是由外国人组成的，他们有资格决定法国民族的命运。因此，要对大西洋组织表示热情，虽然这个组织使我国的安全和我们的政策受另一个国家支配。因此，迫不及待地要使我们国家权力机关的行动服从国际机构的决定，在这个机构里，表面上采取集体讨论的形式，而在一切问题上，不论是政治、军事、经济、技术、货币等方面，却行使保护人的最高权力。在这里，我们的代表从来不敢说“我们要什么”，他们最多只能“为法国辩护”。[1]

在这样的欧洲里，法兰西民族的特性不见了，法国的主权被掠夺了，当然就更不可能有戴高乐梦寐以求的法兰西的光荣和伟大，法国的大国地位。戴高乐公开表示：“如果西欧的联盟……是我们在外部行动的主要目的的话，我们不希望在它的里面被溶化。任何制度，如果包含着要把我们的主权交给超国家的议会的话，那都是同法兰西共和国的权利和义务不相容的。”[2] 1962年5月15日，戴高乐在记者招待会上态度强硬地坚持了自己的观点，他把

① 《希望回忆录》，第177页。

② 转引自埃德蒙·若佛：《戴高乐将军和欧洲建设》第2卷，法国法律和法学出版社1967年版，第290页。

那些坚持超国家主张的人讽刺为“无国籍者”，是在用“这种或那种世界语”进行思维和写作，断定他们不会对欧洲有多大贡献。

那末戴高乐的欧洲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是个什么样的欧洲呢？

戴高乐主张邦联式的各国的欧洲（祖国的欧洲），这个欧洲应该是为各个民族国家服务的欧洲。这种欧洲观与主张超国家的传统联邦主义的构想是格格不入的。戴高乐将那种试图取消民族国家的没有祖国的欧洲，斥之为只能是一个神话当中的欧洲。戴高乐在《希望回忆录》中谈到对欧洲共同体委员会主席瓦尔特·哈尔斯坦的看法时，曾说道，“他热烈拥护超国家的观点”，“我觉得瓦尔特·哈尔斯坦虽然就他的态度来说是一个真诚的欧洲人，但他首先是一个对自己的祖国抱有野心的德国人”。戴高乐认为，在瓦尔特·哈尔斯坦竭力设计的欧洲里，他的国家可以毫不费力地恢复失去的威望和权利，可以获得经济上的优势地位，进而可以解决边界问题和统一问题。既然像瓦尔特·哈尔斯坦这样不折不扣的“欧洲人”，也“首先是一个对自己祖国抱有野心的德国人”，人们所寄希望的欧洲只能是由各个国家联合起来的欧洲，“我们以事实证明，要达到欧洲团结，各个国家是唯一有效的因素。同时也证明，如果民族利益发生问题的话，任何事物、任何人都不可能去强制它们做什么，除了合作的道路以外，其他道路都是走不通的。”[①] 因此，戴高乐在对欧洲联合的看法中还融有对德国的传统芥蒂。

如果从戴高乐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争取法国大国地位的立场出发，他反对超国家欧洲的主张就不难理解了。因为戴高乐几十年来倾心关注的事，“就是要使法国不会消失”，“使法国不退出舞台”。他所关心的是保持民族和国家的特性和地位，他不甘

---

① 《希望回忆录》，第198页。

心法国被封闭在一个“超国家的欧洲联邦”中，除非这个联邦是由法国控制，否则只能是成立一个由各国组成的邦联。他害怕在这个联邦中德国势力日益强大，法国日益相形见拙，失去对德国的政治优势；他害怕这个联邦在美苏对峙中不可避免地会成为美国的附庸；他也确信这个联邦式的欧洲不可能解决任何实际问题，而只有国家才有这样的权力和能力，所以他坚持现实主义的态度：欧洲联合只能是先走欧洲国家之间合作的道路。

戴高乐在思想上从来不是一个自我掩饰的人，任何分析和推断，都不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坦诚可信，还是摘录一段他自己的话吧：

> 我历来——特别是今天——感觉到居住在欧洲的各个民族有很多共同点。他们都是白种人，信仰同是来源于基督教，有相同的生活方式，长期以来，思想、艺术、科学、政治、贸易等无数关系把它们联系在一起。这些民族由于他们的本性终于形成为一个整体，在世界之中具有它的特点和组织。为了实现欧洲一体化这个目的，罗马皇帝曾经在这里统治，查理大帝、查理五世、拿破仑试图把它合并，希特勒妄想把他的沉重的统治强加于它。可是在这些合并论者中间，没有一个人能够使被征服的国家放弃自己的独立，这个事实，难道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吗？相反，专制的中央集权总是由于反作用，引出有害的民族主义。因此，我相信现在和过去任何时代一样，统一的欧洲不可能是各民族的合为一体，但是它能够而且应当是出自各民族有组织的互相接近的结果。在我们的时代，大量的贸易、国际共同的事业、没有国界之分的科学技术、迅速的交通、频繁的旅行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推动欧洲各民族向着这个方向迈进。因此我的政策的目的就是要建立欧洲国家的协调，以便发展各民族之间的各种联系，来扩大它们的团结。我们可以设想，以此作为出发点，尤其是

如果有一天它们受到同样的威胁时，那么，这种演变的结果就有可能使它们联合起来。[①]

（二）欧洲人的欧洲

在前面第五章第三节“欧洲联合与舒曼计划”中已经谈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欧洲兴起欧洲联合运动的高潮时，美国是持支持态度的。当然，美国的这种支持态度，是从它与苏联对抗的全球战略出发，以欧洲联合运动应该纳入美国领导下的“大西洋联盟体系”为条件的。随着欧洲联合的深入发展，随着欧洲国家政治经济地位的逐渐变化，是继续维持原来意义上的大西洋联盟体系，还是建立一个在政治、经济、军事上有尽可能多的“自主权”的欧洲，就成了欧洲联合中一个长期争执的问题。

从战争刚刚结束，戴高乐就比较关注美国的对欧政策，他多次强调欧洲的事务应该由欧洲自己来解决：“美国并不是欧洲的一部分。”进入60年代后，随着以欧洲共同体为核心的欧洲联合趋势的发展，戴高乐又明确提出了“欧洲人的欧洲”的主张。这一口号明显是针对美国而提出的。

建设一个“欧洲人的欧洲”的潜台词，就是要将美国势力排出欧洲，这与戴高乐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争取大国地位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针对有人提到欧洲联合应模仿美利坚合众国、成为一个“欧洲合众国”，戴高乐说：“美国是在一片崭新的土地上，由一群群涌到这里来的无家可归的移民白手起家建立起来的，可是却有一些天真的人时常拿欧洲应该做的和美国已经做的事作比较，这些人的眼光不是很肤浅吗？”[②] 这就是说，欧洲与美国有着不同的历史背景和历史条件，不仅美国插手欧洲联合是不能容许的，连学它的样子也没有现实的可能性。

---

① 《希望回忆录》，第179页。

② 同上书，第199页。

(三）法德合作是欧洲联合的基础

戴高乐对待德国的心态，是有所师承的；在历史上法国向来就对统一的日耳曼民族国家心存芥蒂。然而德国是邻国，如何处理好两国关系是历届法国政府所关注的。戴高乐的对德政策可以概括为“肢解—和解—合作”三个阶段。

战争结束前后，戴高乐思想中对德国是强硬的。他认为战后德国问题的唯一解决办法就是将它永远肢解，也就是说，战后的德国只能是德意志统一以前的，由保持独立的各邦组成的松散的联邦，而不能再出现中央集权制下的统一的帝国。因此，他曾采用一切手段和措施，竭力削弱德国。这种情况尽人皆知，连阿登纳也说：“对于德国重新崛起的一种担心，显然是已经完全支配了法国国内的政治思想”。[①] 事实上，“肢解”德国的想法，最初也不仅仅是戴高乐或法国的主张。从1941年底丘吉尔第一次访问美国，直到1945年初雅尔塔会议，美英苏三大国曾多次商讨战后处置德国问题，有个共同的看法就是：战后德国应当肢解成几个国家。

但是，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历史却走了一条与戴高乐最初设想不完全相同的路。首先是美英苏三大国的态度变化。由于美苏矛盾日益演化成东西方对立的趋势，双方都想将德国变成自己与对方抗衡的势力范围，于是，最初肢解德国的想法变成了波茨坦协议中规定的占领和管制德国。随着两个德国相继成为独立的国家，戴高乐关于肢解德国的主张只能是放置一边了。尽管戴高乐仍然对德国问题时有异议，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肢解”德国显然已极不现实。

1949年秋，在“舒曼计划”公布之前几个月，戴高乐表示，“欧洲的统一，假如可能，而且无论如何都非包括德国人不可”，“将来会不会有个欧洲，就要看在日耳曼人和高卢人之间会不会直

① 《阿登纳回忆录》第1卷，第95页。

接达成一个协议。"戴高乐已接受了战后欧洲联合问题中的一个共识：法德和解才能有欧洲联合，法德和解是形势的需要。

1958年9月，重新执政的戴高乐很快就与阿登纳会晤，他对阿登纳说："由于欧洲统一的重要性——这种统一首先要求巴黎和波恩合作，我认为必须尝试把历史的进程颠倒过来，使我们两个民族言归于好，并使它们的力量和才能联合起来。"① 1963年1月22日，两国政府在巴黎签订了法德合作条约，这是法德关系进入一个新的时期的重要标志。戴高乐认为，这一行动构成了他计划中欧洲邦联的基石。他相信，只要法国和德国团结起来，一个新的欧洲就会开始实现。反之，西欧的联合就没有任何可能性，更谈不上整个旧大陆的联合了。这样，舆论界所说的"巴黎—波恩轴心"就开始逐渐形成了，为欧洲联合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戴高乐积极推动法德合作，是想通过条约的形式，凭借法国在政治和军事上的优势拉住或控制西德。这一方面，是因为害怕西德重新崛起压制法国，另一方面是想拉住德国和充分利用它的经济优势来与美国抗争。戴高乐关于在西方联盟中由美英法三国领导人共同组成一个"指导机构"，来代替美英两国决策的建议遭到拒绝后，更加着重同西德的关系，以求增强自己同美国和苏联抗衡的资本。

（四）建设六国欧洲

1958年戴高乐重新执政时，正是罗马条约实施前夕，根据罗马条约而成立的欧洲共同体，是欧洲联合深入发展的重要标志。戴高乐的法国对罗马条约会是什么态度，曾使许多推动欧洲联合的人深感不安。

但是，戴高乐并没有像一些人担心的那样，拒绝执行罗马条约。1958年10月29日，当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实现了收支平衡

---

① 《希望回忆录》，第184页。

和稳定法郎之后，法国政府发表公报，正式表示接受罗马条约，如期实施罗马条约规定的第一阶段措施，表达了戴高乐建设六国欧洲的愿望。

戴高乐是个现实主义者。他知道，法国要实现自己的目标，决不能置身于欧洲之外，更何况，参加共同体对法国来说还是“利大于弊”。这种利，不仅在经济上，更重要的是在政治上，而对于那些可能与法国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主张相抵触的“弊”，戴高乐则要加以抵制。例如，戴高乐为争取共同农业政策多次以最后通牒的方式要挟成员国，迫使妥协；一再坚持共同体实行一致通过制，使法国保有否决权；竭力主张限制共同体委员会的权力，充分发挥部长理事会的作用等。总之加入欧洲联合进程的前提，是维护法国的主权和利益。

戴高乐参加欧洲联合进程，最根本的用意是在里面起领导作用。依靠欧洲共同体，法国就有可能利用它以欧洲的名义来说话，可以充当欧洲的领导。他曾经当面对阿登纳说：“许多世纪以来，法国民族已经习惯于做欧洲的巨人。”① 在六国欧洲共同体中，比荷卢三国都是小国，意大利实力不足，都不可能与法国争高下，西德虽然经济实力雄厚，但是战败国地位使它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多处受制，在一段时期内很难争当六国之首。因此，“正如在太平洋上领导权应该在美国手里，在中东应该由英国领导一样”，法国自然就该是西欧的代表。戴高乐设想的是，凭借六国欧洲共同体，建立一个由法国居领导地位的独立的政治欧洲，他提出欧洲政治联盟的方案，但此案遭其他国家反对未获通过。

综合戴高乐关于欧洲联合问题的几点主张，可以看出，戴高乐确立了一条原则——反对超国家一体化的欧洲联邦，坚持建立邦联式的“祖国的欧洲”；奠定了一个基础——法德和解与合作关系；利用一个工具——欧洲共同体；扫除一个障碍——美国在西

---

① 《希望回忆录》，第187页。

欧的霸权。这是戴高乐欧洲联合思想的基本要点，虽然表现在几个不同的方面，但最后都是归结到戴高乐要千方百计确立自己在欧洲的领导地位。因此，它是法国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争取大国地位这个总战略思想的一部分。

四 戴高乐与第三世界

戴高乐维护旧殖民利益的立场一贯是很鲜明的，在一般人印象里，他一直是个“帝国派”。战后初期，他还念念不忘重建法兰西帝国的迷梦。可是，到50年代末期，当他自己重新登上政治舞台之后，面对全世界汹涌澎湃的民族解放运动大潮，戴高乐审时度势，不固守他自青少年时期深受熏陶的过时政见，放弃“法兰西帝国”的思想，开始构想和实施非殖民化政策。他说：“在重新担负起领导法国的工作时，我就曾决定，从今以后，不惜代价把法国从过去作为帝国所加之于它的义务中摆脱出来。”[①] 当然他的主张并非一日形成，更不是“一步到位”。

1958年，在戴高乐主持制定的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宪法中，提出法国同法属殖民地一起组成“法兰西共同体”。法属殖民地是否参加法兰西共同体，根据宪法规定，由各地公民投票决定。8月份，戴高乐在公民投票前夕遍访法属黑非洲，为各殖民地参加共同体而游说。9月，投票结果是马达加斯加、达荷美、尼日尔、上沃尔特、象牙海岸、乍得、中非、刚果、加蓬、塞内加尔、苏丹、毛里塔尼亚等12个法属非洲国家参加法兰西共同体，几内亚拒绝参加，宣布独立。

这样，除去几内亚以外，法属非洲各国和马达加斯加都成了法兰西共同体中的自治共和国，“制订了宪法，各自选出了总统和议会，执行行政管理的职能”。戴高乐对此似乎是比较满意了，但是，殖民地人民的独立自主要求并没有得到满足。戴高乐也看到，

---

① 《希望回忆录》，第37页。

“随着这些国家在法律上和事实上的确立，它们日益明显地保持了各自的个性”，到1959年底，这些成员国一个接一个地向法国提出新的要求。

1960年1月和4月，根据联合国通过的决议，喀麦隆和多哥这两个法国托管区分别独立。1959年12月，由塞内加尔和法属苏丹组成的马里联邦提出“在法兰西共同体内独立”的要求，戴高乐亲自出马，经过协商后，1960年6月，法国承认马里联邦为法兰西共同体内独立国家，后来，塞内加尔退出马里联邦，法属苏丹更名马里共和国，成为两个完全独立的国家。这一先例，使法属非洲国家纷纷效仿，戴高乐只好同意这些国家的独立要求。这就是戴高乐的“非殖民化”。但是，非殖民化进程，直到1962年阿尔及利亚宣布独立时才基本结束。

阿尔及利亚问题是戴高乐推行非殖民化政策中最棘手的问题。1959年，戴高乐逐渐明朗了自己关于政治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的态度。公开宣称“父辈的阿尔及利亚”已经死了，谁不懂得这一点照样也活不下去。他告诫军队，仅有军事上的胜利是不行的，因为欧洲人直接统治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没有阿尔及利亚人的同意，有关阿尔及利亚的任何事情也办不成。建议给予阿尔及利亚自决权，要求同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代表谈判。

戴高乐要“放弃”阿尔及利亚的政策，在法国引发了一场政治危机和动乱。但是，戴高乐并没有退缩。他以坚定的意志和铁的手腕，排除了来自内阁的干扰和来自军方的暴乱，以公民投票的方式通过了给予阿尔及利亚自决的权力，终于签订了“埃维昂协议”，阿尔及利亚获得独立。法国长达几个世纪的海外殖民统治基本结束了，戴高乐的“非殖民化”政策也基本完成了。

一贯坚持旧殖民主义立场的戴高乐，转变为实行“非殖民化”，对他来说，将过去的“臣属关系变为伙伴关系”，“这确实是残酷的”。他在充满怀旧之情地对历代殖民功勋作了一番激动人心的评功摆好之后，感叹地说：“就我来说，要在那些地方移交我们

的权力，卷起我们的旗帜，合上这部伟大的历史，是一种多么痛苦的精神上的考验啊！”[①] 不过，戴高乐还是经受住了这一痛苦的考验，顺应了历史发展的选择。这种选择虽有不得已而为之的一面，但他能认准形势不失时机地提出新政策，则应说他不愧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

当然，戴高乐实行“非殖民化”政策，并不等于放弃法国在殖民地的传统利益和影响，而是在新的形势和新的条件下，采用新形式维持传统利益和影响。戴高乐说：“这是不是说，从今以后，让他们当家作主，我们把他们放弃掉，‘廉价拍卖’掉，不再放在我们的心目中呢？显然不是。”[②] 由于原法属国家长期受剥削和压迫，在政治、经济、文化，甚至国防上，与法国都还存在难以割断的联系，法国就充分利用这一点，通过各类协定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且逐渐形成了一个以法国为中心的“法语区”、“法郎区”，这是法国对其旧殖民地政策的主要特点。

戴高乐在实行“非殖民化”后，努力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发展关系。1963 年，法国开始恢复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1964 年，戴高乐访问墨西哥、访问拉美十国，把脚伸进了美国“后院”。不仅如此，更有趣的是，戴高乐公开反对美国操纵联合国干涉刚果，拒绝对古巴实行禁运，谴责美国在越南的干涉政策。他对肯尼迪说，美国在越南“走的是一条不应该走的路”。他还以法国人在印度支那的切身体验给肯尼迪上课。他在 1961 年 5 月对肯尼迪说：

> 您在这个地区插手干预是永远也脱不了身的。民族觉醒以后，任何外国势力，不管手段多么高明，都是站不住的，您以后就会看到。因为，即使您在当地找到几个政府领导人由于自己利益关系愿意服从您，可是人民不同意，他们要反对

---

① 《希望回忆录》，第 37 页。
② 同上书，第 38 页。

你们。您所宣扬的理想也没有用。还有，群众会把你们的强权和您的愿望混淆起来。因此，您越在那里做反共工作，共产党人就越能以民族独立的捍卫者身份出现，越能得到人们的协助，首先，得到绝望的人的协助。我们法国人是有经验教训的。你们美国人昨天要在印度支那取代我们的地位，现在你们要在那里接替我们的位子，重新点燃我们已经熄灭了的战火。我告诉您，您将一步一步地陷进一个军事和政治的无底泥坑，不管你们能在那里浪费多少开支，作出多少牺牲。你们、我们和别人应该对这个不幸的亚洲做的，不是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代替他们的国家，而是供给他们摆脱贫困和屈辱的东西，而贫困和屈辱恰恰是这些极权主义制度产生的原因。我对您说这些话，是以我们西方国家的名义说的。[①]

这番话是在 1961 年 5 月说给肯尼迪听的，它既是过去痛苦经验的总结，又有未来结局的预见，同时也显示戴高乐已有资格去教训美国人了。

戴高乐自创建法兰西第五共和国之后，为法国确立了以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争取大国地位为主要原则的对外政策总方针。这一独立自主的外交原则思想，自戴高乐之后，尽管经历了蓬皮杜、吉斯卡尔·德斯坦和密特朗几位不同党派的总统，他们有各自的行事规则和不同的思想风格，也曾在政策某一方面有过“世界主义”、“大西洋主义”或“第三世界主义”的称谓，而且密特朗还曾经是戴高乐的长期政敌，但都基本没有脱离戴高乐所制定的外交总方针。多年来，法国经常在国际关系中起到一种独特的作用。这种独特作用，显然与戴高乐“必须保持独立性”的信条有密切关系。

---

① 《希望回忆录》，第 267 页。

五　密特朗的“法国式社会主义”外交

弗朗索瓦·密特朗是法国社会党领袖，是法兰西第五共和国迄今任期最长的总统。密特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参加了法国地下抵抗运动，战后进入政界，在第四共和国时期曾多次担任内阁部长。从1958年至1981年，密特朗当了23年戴高乐、蓬皮杜和吉斯卡尔·德斯坦的政治反对派。也正是在这期间，密特朗以反对戴高乐的“个人专制”、争取“社会民主”开始，真正从思想上、组织上逐渐成为法国社会党人的领袖。

60年代，密特朗提出了“法国式社会主义”，即“可能的社会主义”，以此作为法国社会党的建党宗旨并成为他1981年任总统后的治国指导思想。所谓“法国式社会主义”，是属于欧洲社会民主主义范畴内的一种社会改良主义。它之所以能在法国成为一种政治气候，是因为在美苏激烈对抗的大环境下，在法国国内社会经济政治矛盾长期痼疾化的困境下，以既要同资本主义私有制“决裂”，又要与共产主义的集权制“对立”的激进面目，宣扬“社会民主”，提倡“实现人的价值”，从而迎合了法国广大选民的政治心理需求。

密特朗虽有不少著作，但没有论述他的政治思想和主张的专著，基本上都是演讲、采访、文章等的汇编。其中有代表性的是：《可能的社会主义》（1970）、《手中的玫瑰》（1973）、《稻草和谷粒》（1975）、《政治》（1977）、《蜜蜂与建筑师》（1978）、《此时此地》（1980）、《法国对外政策之我见》（1986），等等。在这些汇编成册的书中，特别是在最初几年的执政实践中，密特朗外交给人的印象是：仍然是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谋求大国地位的戴高乐式外交。西方舆论界有的甚至把密特朗说成是“戴高乐主义者”。密特朗对此严词否认，问题是戴高乐的一套原则是法国历史地位的综合，任何法国政治家都难以摆脱，不管他是不是“戴高乐主义者”。当然，密特朗的民族主义不同于戴高乐体现的赤裸裸式的民族主义，而是涂上了一层“法国式社会主义”的道义原则

色彩。再有一点需要谈及的是，密特朗时期的法国在东西方关系中的作用实已式微，因此密氏较其前任的政策带有更大的被动性。这里只就其在几个重大问题上的主张作些综合性的阐述。

（一）在东西方均势中实现独立

戴高乐的独立外交主张：法国应该“成为世界三大势力之一”的带头人，“在必要时，使它成为苏联和盎格鲁—撒克逊两大阵营之间的仲裁者”。[①] 从戴高乐到密特朗，这个基本思想是一致的。

密特朗的“法国式社会主义”反映到对外政策上，认为只有保持东西方的均势才能维持世界和平与安全。法国作为西方联盟的成员，主张欧洲独立于美苏之外成为“第三种国际力量”；主张实行普遍裁军，以平等对话解决国际冲突；支持争取人权和民族自决的斗争。密特朗指出：“法国的对外政策遵循几条简明的原则：国家的独立、世界各军事集团之间的平衡、欧洲建设、各国人民的自主权、穷国的发展。”[②]

应该指出，密特朗执政前期与戴高乐时期的国际局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戴高乐时期，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核力量的均势下，直接对抗已不大可能，在“缓和”的气氛中，美国通过北大西洋联盟国家政治和军事一体化对西欧、特别是对法国的霸权显得突出起来。戴高乐选择了一条与美国疏远并越过分歧同苏联接近的政策，试图在东西方均势和业已开始的缓和中使法国起到一种独到的积极作用。密特朗执政前期，由于柬埔寨事件、阿富汗事件、波兰事件，以及苏联在埃塞俄比亚、莫桑比克、安哥拉扩充势力，似乎说明美国的国际地位和作用正在削弱，而苏联却是一副进攻态势。1979～1985 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关系明显恶化，西方有“新冷战”之称。正是在这种国际局势下，为继续在均势中使法国

---

① 戴高乐：《战争回忆录》第 3 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1981 年，第 194 页。
② 密特朗：《法国对外政策之我见》序，法亚尔出版社，1986 年，第 7 页。

起到独特的积极作用，密特朗调整了法国的对外政策。

调整最明显的，是法国同东西方的关系。

密特朗首先改善了法美关系，在许多问题上采取了与美国接近或一致的立场，如欧洲导弹问题，同北约关系问题，加上法美两国首脑频繁的会晤，一段时间内，舆论界纷纷认为："法国在某种程度上重返西方阵营"，"密特朗奉行大西洋主义"。所有这些，在美国人看来，"这标志着从戴高乐将军开始的那种保持缄默的情况的终结"。[①]

与此同时，法国全面调整了它同东方国家的关系。中断了自戴高乐以来一年一度的法苏最高级政治协商，并同意重新推动巴统的活动，以限制东西方贸易和技术交流。

当然，这种调整并不表明密特朗放弃了戴高乐制订的外交战略原则。它只是基于欧洲战略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苏联的变化，加上东西方关系紧张，密特朗认为有必要加强同美国和北约的合作来平衡苏联在欧洲的军事力量，所谓密特朗外交的"大西洋主义"色彩，主要就是指法国这种政策倾向。这个对外战略重点的确定，是由整个东西方的战略局势所决定的。

密特朗坚决拒绝对他"奉行大西洋主义"和"屈从于美国政府"的指责；认为把他称为"大西洋主义者"十分可笑。他问道："难道不能理直气壮地既拒绝苏联的超武装又拒绝美国的干预吗？难道法国只能模仿一个主子或者一种模式来决定自己的选择，并且放弃多少世纪以来形成的法国自己的传统吗？"[②] 他断然否认选择联盟的问题，说道："我哪一个也不选择。我力图对付双重威胁。"[③]

在"法国式社会主义"中，苏联是"军事扩张主义"，它威胁

---

① 玛格里特·默里：《美法蜜月为什么能继续下去》，〔美〕《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1984年3月26日。

② 《法国对外政策之我见》序，第10页。

③ 密特朗：《此时此地》，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218页。

法国的领土完整；美国是“经济扩张主义”，它威胁法国的经济独立。法国只有在两者均衡之中寻求独立自主。因此，尽管密特朗意识到苏联的威胁在增加，“当前最大的危险是美国远离我们的大陆”，但他认为“我的这种看法丝毫不会改变我对美国有关政策所持的保留态度”。[①]于是，在谴责苏联扩充军备和扩张势力的同时，又有意识地同美国的对苏政策保持距离。

密特朗这种在美苏之间实现均势，在均势之中寻求法国的独立的想法，到 1983 年底，随着欧洲导弹问题的结局逐渐明朗化，冷淡了一段时间的法苏关系又开始升温。

民族独立，曾经是戴高乐制订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这条原则经戴高乐多年的运作已为法国朝野所接受，并被国内外所关注。在美苏两极格局没有大变动的国际大环境，以及面临国内一个强大的戴高乐反对派的小环境下，密特朗在其对外政策中，不可能放弃这一原则。密特朗指出：“民族独立现在依然是我们这样一个国家在世界上采取行动的一根强有力的、决定性的杠杆，一种现代的、而不是过时的工具。”[②]

戴高乐外交中坚持独立性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执意打破美苏的核垄断，坚持发展法国的独立核力量，奉行不依赖于人的独立防务政策。

法国社会党作为戴高乐时期的反对派，曾反对法国拥有核武器，密特朗是中坚人物。直到 1978 年，社会党才改变态度，转而赞同戴高乐制订并被延续下来的独立核力量和防务政策。1981 年密特朗就任总统后，公开宣布法国应当拥有自己的核武器，并奉行现行防务政策。

密特朗在防务战略上也完全接受了戴高乐的理论。他提出了“战略威慑”的“足量原则”。密特朗解释“足量原则”时说：这

① 《法国对外政策之我见》序，第 9 页。

② 同上书，第 12 页。

种战略威慑就是要使强者侵略弱者时付出极高代价，或者是说要使侵略者始终感到风险大于赌注。“这种构想的目的不是要谋求在力量上与对手均等，而是要在对手面前保持一支符合足量原则的反击力量。这就是法国的战略。对于法国来说，军备竞赛表现在质量上……”。[①] 在这种指导思想下，法国坚持不断地加强核武器的质量、威力、准确性。在美苏欧洲导弹之争中，坚决反对将英法核力量计算在内，在拥有欧洲核威慑力量的前提下，支持“全球双零点方案”，即 1987 年 12 月美苏签订的中导条约。

密特朗的“足量原则”，归结到一句话，就是要维护法国由戴高乐制订并延续下来的自己作决定的权力。按密特朗的说法，就是“根据这一原则，我国的防务战略可使我国拥有足够强大的武器库，既足以迫使潜在的敌人尊重我国的独立，又足以迫使我国的盟国考虑到我国的独立”。[②] 他还认为，防御精神和全国团结一致，两者并行不悖。这一独特而合理的观念现在已把大多数法国人团结在一起。

（二）巩固法国在欧洲的地位

密特朗就任法国总统后，接受了在“戴高乐欧洲观”基础上形成的以法德为轴心、以欧共体为主要形式的欧洲联合现实。这个现实使他明白，法国的大国地位和独立是与欧洲联合这个现实不可分的，“法国的独立和欧洲建设是相辅相成的”。[③] 因此，在密特朗的外交原则中，欧洲建设必在其中。他不仅像前任一样，极力推动欧洲联合，而且由于形势的发展变化，显示出更加明显的急迫感。

当然，在密特朗的“法国式社会主义”里，他对欧洲建设的看法自然带有社会党的色彩。密特朗曾表示过：“欧洲将是社会党

---

① 《法国对外政策之我见》序，第 22 页。
② 同上书，第 26 页。
③ 同上书，第 11 页。

的欧洲，否则将存在不下去”。他解释这不是说只接受社会党的欧洲，或者指只有社会党人在欧洲才有地位，而是说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跨国公司阶段，关税同盟和优惠税率已成为一种发展障碍，他怀疑自由主义的欧洲能否经受得了这种压力。① 密特朗从社会党的立场出发，以提倡共同体内国家间“民主化”为由，有意冲淡法德轴心作用。他从社会人道主义出发，要求共同体内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并重，“创造一个真正的欧洲社会空间”。但是，“法国式的社会主义”与欧洲的现实并不相符，在经过一段摸索之后，密特朗只有寻找时机重新启动他的欧洲政策。

1984 年上半年，法国担任欧共体理事会主席。密特朗利用这个机会跑遍了西欧国家。值得注意的是，密特朗推动欧洲建设的行动，不仅局限于某项具体政策或某一个方面，而是从政治、防务和经济各个方面推进欧洲建设，并且特别提出了欧洲联合史上敏感而又屡遭挫折的政治联盟和防务合作问题。

密特朗认为“没有政治联盟就不会有真正的欧洲”，他倾向于政治解决办法有助于推动其他问题解决。1984 年 2 月密特朗积极支持欧洲议会通过“欧洲联盟条约草案”(即斯皮内利草案)。他建议就政治联盟问题进行预备性会谈。密特朗表示：“面对新的形势，应该有一个相应的新的条约，这个条约不是要取代现有的各项条约，而是要扩大到它们所不包括的领域，如政治欧洲方面。法国准备本着这种精神行事。我宣布法国准备研究和维护关于建立欧洲联盟的条约草案，法国赞成欧洲联盟的原则。”② 在 6 月份举行的欧共体枫丹白露首脑会议上，为了加速政治合作，密特朗以“政治第一”为口号，建议成立一个由各国首脑代表组成的，为协调共同体各国对外政策的特别委员会和一个特别秘书处，负责研

---

① 《此时此刻》，第 220 页～221 页。

② 引自让·博托雷尔：《密特朗的欧洲战略》，〔法〕《费加罗报》，1984 年 6 月 23～24日。

究欧洲政治联盟计划。密特朗对欧洲政治联盟的鼓动和倡议，又使人想起了 60 年代初戴高乐的“伏歇方案”和“巴黎政治秘书处”。

密特朗还重新推动了多年名存实亡的西欧联盟的活动，倡议了“尤里卡”计划，还会同科尔，就建立经济、货币联盟和政治联盟，不断地提出建设性意见。

密特朗从政治、防务和经济各个方面全面推进欧洲建设的一揽子计划，其目标是想建立一个“欧洲邦联”。密特朗设想“欧洲邦联”以欧共体为核心，并包括东西欧所有国家。它的前提是欧共体的更高程度的一体化，但参加国仍然拥有自己的主权。它的范围是一个同美国保持联系的“欧洲人的欧洲”。它的目的是使欧洲能成为一支均衡力量独立于世界，当然，法国将在整个过程中继续发挥政治领导作用。

密特朗这个想法，在 1985 年欧共体卢森堡首脑会议上就有所表示，经过几年酝酿后，于 1989 年底新年献词中正式提出。密特朗的“欧洲邦联”设想，从整体上看与戴高乐的欧洲观差别不大，都是以欧共体为核心，以法德合作为基础，建设一个“欧洲人的欧洲”。但是，戴高乐是以主权国家加强合作为前提预想欧洲可以成为一个“邦联”，而密特朗是以深化一体化为前提建设欧洲邦联。在这一点上，密特朗更接近联邦主义者，所以有人又称他的“欧洲邦联”计划是“小联邦，大邦联”。

在这个前提下，密特朗主持修改了罗马条约，扩大了“特定多数”表决制的范围。在他的建议下，经济货币联盟计划将最终建立一个统一的欧洲中央银行。他还主张扩大和加强欧洲议会的权限，组建“欧洲参议院”。在一个不断深化一体化程度，各国主权进一步削弱的欧洲里，各国之间如何相处，主权国家同欧洲共同体如何相处，法国能否维持它在欧洲的地位，都成了有争议的问题。一些国家担心落入法德联手控制的境地，对深化一体化的步骤犹豫不决；法国的反对派则认为法国的优势日益减弱，最终

将被迫跟在德国后面充当一个不起眼的伙伴。

（三）充当第三世界的代言人

法国由于历史和传统的原因，注定了它本身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密切相关。因此，无论谁当政，维护和发展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都是外交的重要一环。

戴高乐的非殖民化政策，改变了法国在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在它的旧殖民属地的存在形式，将直接控制、直接掠取，变成了通过各种协议和影响维护联系获得利益。密特朗对第三世界的政策，仍然是这一政策的延续。但是，他更加着意标榜“法国式社会主义”，因此，也有人冠之以“第三世界主义”。

密特朗的“第三世界主义”有几个特点。

首先，法国处处想充当第三世界国家的代言人。“法国式社会主义”宣扬人权和民主，主张不仅在法国“为少些不正义，多些平等而斗争”，而且在别的国家也要为此而努力。密特朗认为，许多国际冲突的产生都可以从第三世界遭到的不公正待遇和贫穷中找到原因。如果发达国家不重视援助不发达国家改变现状，自己就无法摆脱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他指出：“帮助第三世界，也就是帮助自己从危机中摆脱出来。”①

因此，密特朗积极推动南北对话，希望法国在南北对话中起到穿针引线的作用，并公开宣布将逐年提高对第三世界的援助数额。在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上，密特朗要求缓解穷国的债务负担，他还积极推动了欧共体同第三世界国家续签《洛美协定》。密特朗自认为法国“是最受第三世界欢迎的国家”，他是大国中“唯一被邀请为第三世界辩护的人”，表示法国要发扬光大这个传统政策。

其次，密特朗的“第三世界主义”带有“输出革命”的味道。按“法国式社会主义”既要“与资本主义决裂”，又要“与共产主

① 密特朗1981年9月1日在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会议”上的讲话。

义划清界线”的原则，密特朗公开号召在国际范围内发展所谓“新国际主义”，宣布“支持进步的革命运动”，鼓动和支持那些法国看来不符合民主原则，不尊重人权道义的国家的反对派起来革命。而且在对外关系中，意识形态倾向性十分明显，近者亲，远者疏。

密特朗反对里根政府出兵中美洲，他认为这个地区的各国人民在为经济和政治的双重解放而斗争，而里根却简单地把它归类于苏联鼓动下的共产主义革命。他认为这种斗争与共产主义革命不同，理应得到西方的援助。[①] 他支持萨尔瓦多反对派和尼加拉瓜桑地诺阵线，认为是“有代表性的政治力量”。在非洲的扎伊尔、乍得、多哥和吉布提，法国都有过类似的行动，密特朗的这种行动在非洲曾引起许多国家的不安和动荡。

第三，密特朗的“第三世界主义”经常以军事干预的形式出现。密特朗在“法国式社会主义”的原则下，曾指责他的前任在第三世界国家只注重经济利益，而放弃政治责任。在贫穷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政治责任”往往是要靠军事手段来履行的。密特朗执政后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军事干预”一般有两种形式。一是通过出售军火来支一派、打一派。法国是全世界第三大军火出口国，它的主要销售地就是第三世界国家。二是直接派军队介入第三世界国家内部事务。这在法国的非洲旧殖民地特别明显。法国以保护侨民为由，或是以维持和平为由，或是以受到“邀请”为由，曾经多次向好几个国家出兵干预。

由于法国的实力所限，虽然它对第三世界国家许诺不少，毕竟是力不从心，而且它的“革命输出”和军事干预也带来了不少的麻烦，密特朗的“第三世界主义”到他执政后期也就喊得不那么响了。但是密特朗政府在处理法国与第三世界、特别是与前法属殖民地的关系问题上，总是要把“社会进步”、“政治自由”、

① 《法国对外政策之我见》序，第 9～10 页。

“人权民主”等理想作为其政策的依据。

（四）冷战结束与密特朗外交的困境

雅尔塔体制下的冷战局势维持了40多年，终于随着东欧巨变和苏联解体结束了。这个突如其来的巨大变化，使许多国家对外政策都陷入茫然不知所措的境地，而对于依赖冷战格局才更有特色的法国外交的冲击，相对就更大了。

戴高乐在雅尔塔体制这个基础上制订了法国的外交政策，密特朗仍然是在雅尔塔体制这个基础上延续了法国的外交政策。密特朗曾指出：“我们生活在雅尔塔时代。这个现实迫使我们分清任务和利益的轻重缓急。面对正在瓜分欧洲这块属于我们的土地的两个大国，最重要的是珍惜保持自我的能力。”[①] 密特朗像戴高乐一样，都反对雅尔塔体制，但是戴高乐没有等到这一天。密特朗等到了这一天，他也曾预见到摆脱雅尔塔体制会出现危机，但当危机出现时，他又拿不出真正具有实效的解决办法。密特朗在《此时此地》中是这样说的：“任何一个作为本国的爱国者的西欧人不能不只有一个想法：摧毁雅尔塔会议所定的事情。许多迹象正表明这一点。但是，摆脱雅尔塔不可能不出现危机。我们正处于这样的境地。”[②]

法国外交长期以来是在东西方均势中谋求独立。它既同美国保持了盟友关系，又坚决不做美国的“附庸”，经常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与美国各执一词；它既同西方国家一道，坚持抗衡苏联西进，又与苏联保持了经常性的政治和经济上的联系。这种周旋于美苏之间的相对独立性，与两个超级大国都能说上话的特殊性，是法国独立外交的基础，它有助于法国在国际事务中起到一种独到的作用。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的现行政策已明显向西方靠拢，原来意义上的东西方对峙和均势已不复存在。法国独立外交的现

① 《法国对外政策之我见》序，第12页。

② 《此时此地》，第208页。

有基础动摇了，如何继续推行戴高乐在法兰西民族主义指导下制定的法国独立外交政策原则，成了密特朗外交想解决，但看来又解决不了的难题。密特朗外交陷入了困境之中。

密特朗外交的难点主要有两个：即如何与美国相处和如何与德国相处。

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了国际事务中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的政策丝毫也不掩盖它主宰世界、决定全球事务的战略目的，这与法国外交的战略目标一贯是相矛盾的。密特朗的难题是：第一，既要反对美国主宰一切，维护法国的地位，又不能忽视美国的实际作用。关于冷战后北约的地位和作用，美欧之间矛盾尖锐，法美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法国坚决反对美国试图扩大北约职能范围的改造计划，并明确表示没有返回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的打算，拒绝参加北约“快速反应部队”，对布什的“新大西洋主义”持保留态度。但是，欧洲的现实是，苏联这个正面对手虽然已不存在，欧洲的冲突和动荡反而更加具体化，俄罗斯仍是个潜在的威胁，还有对统一后的德国的担心，使一心想在欧洲起主导作用的法国还无力面对这一切，它不能忽视美国在欧洲的存在。1990 年海湾危机中即是如此。法国一方面支持美国的立场，维护自己在中东的利益，另一方面又要显示自己的独立性，限制美国的影响，发挥自己的大国作用。在危机初期，法国鼓动欧共体出面，想另起炉灶解决危机，未能成功。战争爆发后，与美国又相配合又要拉开距离。战争结束后，又被美国抛在中东和谈之外。结果是，美国捞到大头，法国则收效甚微。第二，法国外交的独立性，历来是侧重表现在相对于美国的独立性。美苏对峙中的均势与非均势的调节，是法国独立外交中一张重要的牌。如今这张牌不起作用了，这不仅削弱了法国独立于美国的实力，而且有可能将法国推向同美国发生冲突而又无助的境地，这是实力不足的法国不愿看到的结果。因此，如何在推行独立外交中与美国相处，实是密特朗外交中一个难以掌握的“度”。

在法国外交中，德国问题历来举足轻重。密特朗外交后期，碰上了“德国统一”这个大难题。从“尊重各国人民的自决权”这一原则的“法国式社会主义”出发，密特朗提不出任何理由反对德国统一。但是，从法国的地位和利益出发，他又极不情愿看到德国统一这个事实。1989年11月，科尔提出了统一德国的“十点计划”，一再表示不反对德国统一的密特朗，在一个月之内奔忙于戈尔巴乔夫、布什、欧共体首脑、东德领导人之间，其关切之情，溢于言表。1990年9月，两个德国同四个占领国外长签署了《关于最终解决德国问题的条约》。10月，法国怀着复杂的心情，看着西德吞并东德实现统一。欧洲共同体，乃至欧洲建设，在某种意义上说，从一开始就是法德共同支撑的事业。法德合作的基础，是两国之间政治与经济的相互需求。长期以来，法国就一直担心德国实力的不断增长导致失去平衡，从而破坏这个基础，使法国失去欧洲共同体这个既可制约德国又可实现法国大国作用的阵地。如今，面对统一后更加强大，而且具有巨大潜力的德国，法国的外交战略还能照样实施吗？

面对难题，密特朗外交也在寻求解决办法。原来在东西方均势中法国特殊地位的作用已经不存在了，密特朗外交的重点突出在欧洲建设问题上。

密特朗决心加速推进欧洲一体化进程。他希望在德国真正崛起之前，实现以欧共体为核心的，在法国影响之下的欧洲经济、政治一体化和共同防务的综合机制，这样，既可以用以制约、防范德国，又可以作为同美国抗衡的资本。密特朗以共同推动欧洲建设为条件赞同德国统一。1990年4月19日，法德两国首脑联名倡议，欧洲经济货币联盟应和政治联盟同时于1993年1月1日起实施。1990年12月6日，密特朗又与科尔联合发表声明，强调政治联盟应包括“共同安全和防务政策问题”。1991年，两国外长和首脑又分别发表倡议和声明，就政治联盟问题提出看法。在法德两国的一再敦促下，欧共体12国首脑于1991年12月9～10日在荷

兰马斯特里赫特举行会议，经过激烈争论，通过了包括政治联盟和经济货币联盟两个条约在内的《欧洲联盟条约》，即《马斯特里赫特条约》。

“马约”的签署是欧洲一体化进程的重要阶段。对于一心超越经济一体化，强化政治一体化，以便发挥法国主导作用的密特朗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胜利。在密特朗的推动下，西欧联盟已正式纳入政治联盟范围内。1992 年 5 月，法德两国决定组建“欧洲军团”，并商讨了建立西欧联盟军队的总体构想。

但是，密特朗协同科尔异常急迫地推进欧洲一体化进程，在国内外都引起了猜疑和不满。害怕法德联手控制欧洲，以英国为代表的部分国家对加速一体化抱冷淡态度。1992 年 6 月 2 日，丹麦公民投票否决马约，打乱了一体化整个进程，给欧洲联盟的前景蒙上了阴影。在法国，围绕马约展开了一场自德雷弗斯案件和欧洲防务共同体问题以来最大的辩论。反对派怀疑密特朗设计的欧洲蓝图能否管住德国，这种以大量出让主权换取的欧洲，法国在其中究竟还能起什么作用。1992 年 9 月 20 日，法国公民投票仅以 51.05%对 48.95%的微弱多数通过马约，英国也表示，要待丹麦第二次投票后才进行最后表决。当然，马约最后是通过了，但这次挫折使人怀疑它的预订目标能否如期实现，放慢速度，限制规模的呼声愈来愈高。这种冲突，1994 年 6 月围绕欧洲议会选举和欧共体委员会主席德洛尔的继任人选问题，又激烈起来。看来，密特朗加快速度的愿望已难以实现了。

无论是从社会党的政治前途还是从密特朗本人的身体状况看，密特朗的总统任期已到尽头。在还不到一年的总统任期内，再加上右翼执政，密特朗是不可能也无力解决他所面临的外交难题了。作为法国外交密特朗色彩的那一部分就要划上句号，但是，不管谁执政，作为戴高乐外交的影子仍将时隐时现地表现出来，——在国际事务中努力表现其独立的风格。问题是，密特朗时代的法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份量，特别是在冷战结束以后的几年，

已显然不同于戴高乐时期；尤其在美国仍执西方世界之牛耳，德国势力和影响咄咄逼人的情况下，法国的影响力相对说来比过去更为有限。显然，戴高乐以后的法国政府，虽然仍习惯地用若干传统宣告的原则指导自己的外交，但是在实际运作上，每每需要更加“随机应变”。因此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很难保持其固有原则的一贯性。

第四节　从西德的新东方政策到德国统一

一　新东方政策思想的形成

新东方政策是西德外交中的一种独特现象，它由西德特殊的国情和外交环境而生成，其主要内容是同西德东部的苏联和东欧国家（包括东德在内）实现关系正常化，从根本上扭转战后以来西德同这些国家长期处于封闭性的、敌对的局面。这一政策的“新”意也即在于此。为了同西德1949年立国以来对苏联东欧国家推行的东方政策相区别，后人遂冠之以“新东方政策”。

新东方政策的代表人物是1966年出任外交部长、1969年出任联邦总理的维利·勃兰特。勃兰特当政期间，西德把这一新东方政策推出并付诸实践。但新东方政策是因应国际环境的变动而在西德逐渐萌起和发展的，是经过了许多人多年的探索和思考而形成的。

阿登纳在其执政晚期已经在考虑要改变对东德的政策。然而，阿登纳终究没有能从自我封闭的东方政策中走出，他始终没有能突破东方政策的两大禁区：承认东德和承认以奥得—尼斯河边界为主要标志的战后边界现状。

自由民主党人士卡尔·格奥尔格·普夫莱德雷尔，早在1952年就表示反对同西方国家签订一般性条约。他认为，这个条约没有考虑到苏联的安全利益，而满足苏联对自身安全利益的需要则

是德国统一必不可少的政治前提。是年 9 月，普夫莱德雷尔向西德外交委员会提出一份备忘录，明确指出：一般性条约排除了同东方国家改善关系的可能性，阿登纳坚持的通过自由选举实现德国统一的要求只会使苏联感到自己的安全受到威胁，不可能坐到谈判桌旁来，从而扼杀了德国统一的前途。对奥得—尼斯河边界，普夫莱德雷尔也有不同看法，他表示，“在这个问题上不能使用武力”，这在当时与阿登纳极端强硬的态度是有明显差异的。

1957 年，因南斯拉夫同东德建交，阿登纳政府第一次运用哈尔斯坦主义同南斯拉夫断交时，当时任驻南斯拉夫大使的普夫莱德雷尔又明确反对断交，他提出一种所谓“向前逃避”的理论。按此理论，阿登纳政府应以积极姿态抢在南斯拉夫同东德建交之前承认奥得—尼斯河边界，并同波兰建立外交关系，这样就可避免与南斯拉夫断交，也可使西德今后在外交上免于陷入被动的困境。

普夫莱德雷尔的东方政策思想与阿登纳一样是以德国统一为最终目标的，不同的是，普夫莱德雷尔为达到这个目标，主张必须照顾苏联的安全需要，同时要与东欧国家改善关系，而为了做到这一点，西德就应该承认奥得—尼斯河边界。普夫莱德雷尔这一基本思想，到 60 年代被德国社会民主党所接受并得到贯彻。

但新东方政策思想的萌芽毕竟已在自由民主党内生成了。进入 60 年代后，自由民主党对新东方政策的构思有了长足进展。其代表人物是沃尔夫冈·绍尔弗和汉斯·沃尔夫冈·鲁平。

绍尔弗原居东德，是东德的自由民主党人，50 年代移居西德，在西德自由民主党内的联邦事务局工作。他先在东方部，后到新闻处，以后专门负责对东方政策的工作。绍尔弗曾十分赞赏阿登纳的强硬的东方政策，但 1961 年的柏林墙事件使他开始对东方政策作新的思考。他意识到，已不能指望西方三大国来实现德国统一，德国统一只能是一个长远的目标，必须经过许多中间站才能达到。因此，绍尔弗主张，作为德国统一的第一步应该是德国的两部分先接近起来。1962 年 3 月 22 日，绍尔弗为自由民主党联邦

事务局起草了一份题为《自由民主党对德国政策的设想》文件，其中即阐述了他的这种思想。

如果说，绍尔弗在1962年对东方政策的构思还只是停留在基本原则和总体框架的阶段的话，那么，数年之后他已有了十分具体的关于一项新的东方政策的设想。

1966年12月，自由民主党的领导人就西德的经济、社会、外交等方面的重大问题进行讨论，最后决定就这些问题制订相应的工作文件，作为自由民主党的政策指南。绍尔弗被指定为起草人之一，专门负责起草对东德的政策文件。1967年1月21日，绍尔弗完成了这一文件，其中包括以下三点重要内容：

1. 东德已成为战后欧洲秩序的一个组成部分。西德既不能用武力方式，也无法以和平方式消灭之。因此，西德政府应该放弃从1949年坚持迄今的单独代表德国的要求，而承认东德为"第二个德国"，并同其举行谈判。在策略上可以先通过某一东欧国家作为中间国同东德进行接触。为此，西德必须：

2. 同所有东、南欧国家建立全面的外交关系，并承认战后边界现状；

3. 两个德国加入联合国，并在对方无外交关系的第三国代表对方的利益。

显而易见，绍尔弗在这里已经突破了阿登纳东方政策的两大禁区——承认战后边界现状和承认东德。但绍尔弗的这份文件并未引起党内的重视。当时自由民主党内的一些高级领导人甚至认为，绍尔弗所思纯属无稽之谈。

紧接绍尔弗文件之后，一位名叫鲁平的政治家以其关于东方政策的新思想引起西德的舆论界和政界的注目。鲁平与绍尔弗同是自由民主党人，任该党司库，他同时还是西德一家冶金公司的董事。他经常有机会去苏联、东德和其他东欧国家访问，并同这些国家的某些领导人接触，这使他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情况和这些国家领导层的想法较之党内其他人有更深的感性和理性的了

解。在绍尔弗的文件被搁置起来后，鲁平于1967年3月在《明星》周刊发表了一篇题为《说真话的时刻》的文章，此文以极大的鼓动性和深刻的彻底性，以敢于说真话的勇气公然打破东方政策上的禁区。鲁平先以耸人听闻的笔调写道：说真话的时刻已经来临，谁若还想自欺欺人，不说真话，谁就将垮台。接着，他指出：

> 真话就是：德国要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负责，它输掉了这场战争并无条件地投降了。
>
> 真话就是：朋友和敌人都一致认为，以1937年为边界的德意志帝国的重新统一既不可能，也不是令人向往的。要求归还家园的权利并非只有德国人才有。……
>
> 真话就是：不承认1945年以来形成的事实，就不会有重新统一。谁要重新统一，谁就必须承认奥得—尼斯河边界，必须承认德国土地上另一个共产党国家的存在及其产生的一切不可避免的结果；
>
> 真话就是：重新统一绝不会是民主德国“合并”到联邦德国来。重新统一对双方都意味着是一种不小的风险。①

绍尔弗和鲁平关于东方政策的新思想当时在西德，特别是在自由民主党内引起了一番轰动效应，尽管这些思想并没有立即被西德政府和自由民主党所接受，但它们已大大拓宽了人们，特别是自由民主党人的思路，最终使自由民主党和新东方政策思想的另一支驱动力量德国社会民主党合流而共同推行新东方政策。

德国社会民主党是个在建党历史上比自由民主党久远，在党员人数上也比自由民主党多得多的大党，长期处于反对党地位。它

---

① 阿努尔夫·巴林：《权力更迭，勃兰特—谢尔时期》，慕尼黑出版社，1984年，第225页。

对东方政策的政见，一开始与阿登纳政府基本上是合拍的。

转折出现在1961年建立柏林墙之后。柏林墙的建立，就对西方三大盟国所抱的幻想破灭这一点而言，感受最深的莫过于当时的社会民主党人西柏林市长维利·勃兰特了。勃兰特后来在撰写其回忆录式的《会见与思考》一书中，把柏林墙作为自己新东方政策的发轫点，他这样写道：

> 1961年拉开的幕布，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空荡荡的舞台。也可以更为辛辣地说，我们失去了在希望破灭之后仍然存在着的幻想。这些幻想是建立在某种东西的基础上的，而这种东西实际上已不再存在了。允许乌布利希往头号西方大国的腿上狠狠踢一脚，而美国只是沮丧地拉长了脸。这三天的经验对我以后的岁月中的政治考虑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被称之为我的东方政策，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形成的。①

勃兰特原名赫伯特·恩斯特·弗拉姆，上中学时就参加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纳粹统治期间，弗拉姆为逃避德国法西斯的迫害而更名为维利·勃兰特。1938年，他被剥夺德国公民籍，流亡到挪威，战争结束后回国，1947年被舒马赫任命为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驻柏林代表。西德建立后，勃兰特又被任命为联邦议会驻西柏林代表。西柏林从此成为勃兰特政治活动的主要舞台。1957年，勃兰特以44岁之年升任西柏林市长。

西柏林处在东德境内，法律上由四大国共管、不属于西德，而实际上其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均与西德密不可分地联在一起，这样一种似是而非的地位使西柏林成为苏、美、英、法之间以及东、西德之间各种矛盾和冲突的交汇点，它也成为东、西方对立的晴雨表。作为这一特殊城市的市长勃兰特最直接、最真切地感受到

---

① 维利·勃兰特：《会见与思考》，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11页。

四大国，特别是被西德视为保护人的美、英、法三大国对西柏林和西德的态度的变化。

勃兰特政治考虑的出发点是对美、英、法三国的幻想的破灭，他同当时的绍尔弗一样认识到，靠盟国来实现德国统一已不可能，而单靠西德一国之力显然也无法实现统一，因此，德国统一是遥远的将来之事，提不到现实的议事日程上来。但勃兰特认为，由于德国一分为二和柏林墙的建立造成的两个德国不相往来的局面应该结束，结束这种局面既可减轻两国人民分离的痛苦，又可使西德在同东德的人员交流中影响东德，使东德逐渐发生转变。1962年，勃兰特在美国哈佛大学演讲，谈到东、西德的关系时，他说道："我们需要建立尽可能多的真正的接触和有意义的联系，……这样一种办法可以使对方发生变化。"①

为了使东德能向西德开放，使东、西德的人员能通过业已筑起的柏林墙继续来往交流就必须同东德实现和解，勃兰特由此引出了自己的第一个新东方政策思想，即承认东德为一个国家。1968年3月，勃兰特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于纽伦堡举行的党代表大会上作工作总结报告时，谈到了他的新东方政策思想。

勃兰特先提出德国统一难以实现的论断："只有通过缓和及克服欧洲的分裂才能克服德国的分裂，这是一个需要坚强的力量和需要时间的过程。因此，我们要完全开诚布公地说：我们国家的统一现在提不到国际政治的议事日程上来。"接着，勃兰特表明了他的想法："我们应该想尽一切办法，按照人民的利益与和平的利益来安排德国两部分的相互并存和相互合作的生活。""两国政府能够，而且必须进行谈判，致力达成不歧视任何一方的协议。"②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勃兰特推行新东方政策前前后后，勃

---

① 维利·勃兰特：《会见与思考》，第94页。

② 汉斯·埃德加·雅恩：《1945年至今的德国问题》，美因茨出版社，1985年，第403页。

兰特的政敌多方攻击他放弃了德国统一的目标。事实上，在整个60年代直至他下台时止，勃兰特即使有放弃统一德国之心也不敢把这种想法公开提出来。应该说，勃兰特只是从当时现实的国际环境中理智地看到，德国统一在短时期内难以实现，因此想另辟蹊径，采用一种立足现实的、与阿登纳强硬的东方政策截然不同的政策来接近东德，其最终目标仍然是要改变东德，使德国在将来得以统一。

正因如此，勃兰特在纽伦堡大会上又提出了一个“两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理论。按此理论，东德虽然是一个独立国家，但它对于西德来说却不是“外国”，因为两个德国的人民同属一个民族。所以，西德只能从国家法而不能从国际法意义上承认东德。所谓“两国一族”的理论是国际关系中常见的某国为求变通而提出一种新理论的表现方式。对德国来说，它毕竟把德国统一的最终目标保留了下来。

勃兰特同样清醒地认识到，要改善同东德的关系，也就必须改善与苏联及其他东欧国家的关系，只有在这样的总框架中，东德才有可能对西德的接近作出积极的反应。勃兰特在纽伦堡党代会上有一段话是专门谈东欧国家的，他表示要决心“继续努力同所有的东欧国家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在那些目前尚不可能建交的地方，也要加强文化和经济的交流”。[①] 关于苏联，勃兰特在美国《外交》季刊1968年第4期上撰文传递了他同苏联改善关系的想法，他在文中表示要同苏联对话，“继续努力改善对我们来说远不是理想的跟苏联的关系”。

而为了同苏联和包括东德在内的东欧国家改善关系，除了承认东德外，还必须承认奥得一尼斯河边界。以勃兰特为首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决心在这个问题上也冲破禁锢。早在1966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就在多特蒙德党代表大会上作为西德的第一个党派公开

---

① 《1945年至今的德国问题》，第405页。

提出“要在边界问题上作出牺牲”。在1968年的纽伦堡党代会上，勃兰特用了更明确的语言说道：

“我们知道，今天，即使承认奥得—尼斯河边界也不会导致同波兰建立外交关系，这是一种现实。现实的情况还在于，有40%在那些地区生活的人是在那里出生的，肯定不会有人再想搞一场新的驱逐运动。还有一个现实是，德国人民也正想并且需要同波兰和解。它想和解，它需要和解，但它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通过一项和约来达到自己国家的统一。由此得出什么结论呢？结论就是，在达成和约以前承认和尊重奥得—尼斯河边界。”[①]

纽伦堡党代会标志着勃兰特及其社会民主党的新东方政策的思想已经成熟并趋于完善，到第二年，社民党就和自由民主党组成执政联盟，共同把新东方政策的思想付诸行动。这里，还有以下两点必须说明。

第一，有一位与以勃兰特为代表的新东方政策思想密切联系在一起的重要人物不可不提到，他就是：埃贡·巴尔。

巴尔早年是西柏林美国通讯台的一名记者。1957年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此后被勃兰特看中，1960年被勃兰特任命为西柏林市情报局局长，从此一直跟随于勃兰特左右。巴尔是一位极工心计而富思想的人物，他在勃兰特新东方政策的构思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后来在勃兰特政府推行新东方政策的过程中，他也是一位关键人物，西德同苏联的谈判就是在他的主导和参与下取得突破的。

巴尔对新东方政策思想的最精彩的表述见于他1963年在图青所作的一次讲演中，他说：

和平战略转用到德国产生的第一个结果便是，那种“要

① 《1945年至今的德国问题》，第406页。

么全部、要么全不”的政策破产了[①]。要么把自由选举作为第一步，要么就拒绝举步，所有这种做法不仅毫无希望地过时了，不现实了，而且对一种和平战略来说也是毫无意义的。肯尼迪说，必须承认并照顾到对方的利益，如果此说正确，那末，对苏联来说，就肯定不可能让别人为加强西方实力的目的而把东占区从自己手中夺走。要转变东占区必须要有苏联的同意。如果我们真的走到了那一步，我们就是向重新统一迈进了一大步。

我们说过，墙是虚弱的标志。人们也可以说，墙是共产主义政权一种恐惧感和自卫本能的标志。问题在于，是否有可能逐渐使这个政权消除其完全正当的忧虑，并且在不冒风险的情况下使边界和墙实际上也得以松动。这需要一种政策，人们可将其归结为一个公式：“以接近求转变”。我深信，我们会有充分的自信去不抱幻想地推行这样一种政策。这种政策与西方的战略思想也是天衣无缝地切合的。若非如此，我们就得等待奇迹出现，而这就不是政策了。[②]

巴尔这一段话可以说构成了西德新东方政策的理论基础，其“以接近求转变”的公式则成为新东方政策的指导思想；

第二，勃兰特作为西柏林市长拥有一定权力，可将其新东方政策的设想运用到实际政策中去，并在实践中不断修正、充实以至完善。例如，勃兰特在柏林墙筑起后作了许多努力，同东德签订了数次关于东西柏林人员来往的协议，使柏林墙并没有完全隔绝墙两边的德国人的来往，勃兰特称自己的这一做法为“小步子政策”。他正是从小步子起步而逐渐登堂入室，终于走上全面推行

---

① 指阿登纳强硬的东方政策，即要么把东德统一过来，要么就不承认它。

② 安德莱阿斯·希尔格鲁勃：《德国史，1945～1982年》，科尔哈默出版社，1984年，第83页。

新东方政策的道路。这种能在实践中试探和检验自己的新东方政策的有利条件是当时自由民主党的绍尔弗及鲁平所不具备的，它也是社民党的新东方政策思想虽萌发较晚却较快地走向成熟的重要原因之一。

1969年10月，德国社会民主党和自由民主党联合组成以勃兰特为总理的联邦政府。这届政府成立伊始即致力于推行两党共同的新东方政策。从1970年至1973年的短短几年中，勃兰特政府先后同苏联、波兰、东德、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签订了国家条约，通过这些条约，西德有保留地承认了欧洲战后边界现状，从而全面打开了同东方的苏联与东欧国家的关系。勃兰特政府在推行其新东方政策过程中，也把手伸向亚洲，于1972年10月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在以勃兰特为代表的新东方政策逐渐走向成熟的同时，西德以赫尔穆特·施密特为代表的具有西德特点的均势战略思想也在形成体系。1969年施密特的一本题为《均势战略——德国的和平政策和超级大国》一书的出版，标志着施密特均势战略思想的完善。

二 施密特均势战略思想的特色

与新东方政策思想不同的是，均势战略思想古已有之，一般说来，均势战略思想通常为强国拥有并实践之，但对力量弱小的国家来说，均势亦同样是一种十分重要的战略。法国著名学者雷蒙·阿隆曾说过："均势政策是以常识为基础的。它是任何一个明智的国家，希望维护自己的独立、免受某些难以抵抗的强国施加的高压而采用的一种武器。"[1] 这一段话对西德是十分适合的。

施密特于1918年出生在汉堡一个工人家庭。1946年加入德

---

① 雷蒙·阿隆：《和平与战争》，转引自赫尔穆特·施密特：《均势战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4页。

国社会民主党，1953 年进入联邦议院。他长期在汉堡市担任行政官员，由于在工作中显示了卓越才能，因而政治生涯一帆风顺。1967 年出任联邦议院德国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主席，1968 年被遴选为社民党副主席。在勃兰特于 1969 年组成的政府中，施密特历任国防部长、财政部长和经济部长之职，成为西德政坛上一名炙手可热、仅次于勃兰特的重要人物。当 1974 年勃兰特因纪尧姆事件[①] 引咎辞职时，西德联邦总理之位已非施密特莫属。是年 5 月，施密特出任西德政府总理。

施密特是一位均势战略信奉者。他曾明确表明自己的观点："从我们自己防务利益的观点来看，欧洲的军事均势仍将是政治稳定的一个必需的条件，而政治稳定乃是我们的安全必须具有的基础。我们只有预先规定均势的必要，才能发展有关将来的欧洲安全体系的有意义的设想。"[②]他又认为，由于联合国在 50 年代和 60 年代表现出来的软弱，使得依靠一种具有世界警察力量和垄断军事力量的世界政府的想法显得既是乌托邦式的，又是超出实际可能的战略所能想象的范围之外的，所以，通过敌对国家之间的均势的不断变动来维护和平，便是一个值得为之奋斗的合理的目标。

现在我们先来看看施密特均势战略的出发点。

施密特均势战略思想首先立足于美苏争霸的现实，他把美苏争霸对欧洲的影响分为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欧洲处在苏联常规军事力量的压力之下，担心苏联向西推进，当时只有美国具有能够彻底摧毁苏联的能力，在这一阶段，美国和阿登纳统治下的西德都深信，西方依靠美国强大的军事力量可以把苏联的攻势遏制住并使其就范。但到第二阶段形势起了变化，苏联到 50 年代末也取得了世界核大国地位，从而打破了到那时为止在苏联常规力

① 1974 年 4 月，长年跟随于勃兰特左右的京特·纪尧姆被揭露是东德间谍，此事在全国引起轰动，成为勃兰特在 1974 年 5 月 6 日辞去联邦总理职务的直接导火线。

② 赫尔穆特·施密特：《均势战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年，第 280 页。

量优势和美国核力量优势之间维持着的均势。这种均势的打破导致了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以柏林危机和古巴危机为标志的一系列紧张事件，而1962年的古巴事件已经预示着第三阶段的到来。在第三阶段，美、苏双方的权力核心人物都意识到，两国除了根本利益的对抗之外，还有着某种并行不悖的利益，这是因为，“核僵持已经使苏联的短期目标和当前利益局限于巩固既得利益。”而“在这一点，它的立场同美国是相同的。……苏联在赫鲁晓夫时期一度暂停实行只冒有限风险的战略之后，这时也和美国一样已恢复实行这种战略。”“肯尼迪的‘和平战略’同1963年莫斯科的禁止核试验条约和苏美两国达成一项防止核扩散条约的认真努力一样，都证明了这一点。”①

施密特均势战略思想的另一重要出发点是，现代武器、特别是核武器的发展改变了传统武器时代的战略态势。

施密特认为，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形成，其决定性的因素并非是它们人口的众多，而是它们的军事实力，这种军事实力不仅在量，而且在质上均超过世界上其他国家，尤其是它们拥有的核武器及其核武器技术的不断更新，使双方都具有了给对方以毁灭性打击的能力，这一方面有效地防止了超级大国之间的军事冲突，另一方面却绝不意味着和平得到了保障。这是因为：1. 苏、美两国的军事力量虽然可能在一定时期达到均衡，但这种均衡不可能持久。施密特对此说道，苏、美都时刻担心对方在武器技术方面取得突破，因此每一方都在一种恐惧心理的驱使下发展新型武器努力不让对方变得比自己强大，以便自己独霸世界。这就引起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军事技术上的竞赛，这种竞赛又引起核力量均势的不稳定，随之产生的结果便是和平的不稳定；2. 即使在美、苏保持核均势时期，也只是防止了超级大国之间的军事冲突，而并未彻底防止战争。现实业已证明，美、苏之间的核均势既未阻止

① 赫尔穆特·施密特：《均势战略》，第37、36页。

一个超级大国与第三国的战争，也未防止第三国之间的战争，“核威慑对付各种形式的侵袭或各种对国家权利的侵犯，并不都是有效的。应该承认，它为可能的核袭击提供了高度的安全，但它绝不总是能制止常规的袭击。它对另一个超级大国的大规模常规袭击可能证明有效，因为这时有升级到核战争的危险，但当另一个超级大国在冲突的地方能取得严格的常规军事力量的优势情况时，这就不是百分之百的肯定了。”[①]施密特由此得出的结论是，相互发动核打击越是变得不可想象，非核战争、常规战争或有限战争的危险就越大。而任何战争对处于两大对立阵营之间最前沿的两个德国来说都将带来毁灭性的灾难。

因此，如何保障西德的安全利益便成为施密特均势战略思想的又一出发点。1974 年 10 月底，施密特出任联邦总理仅 5 个月就去了苏联作国事访问，他在谈及这次访问的目的时明白地说道，这是为了让苏联人知道，“我们要把勃兰特的东方政策继续下去，尤其在经济领域。但他们也应该认清，我们在这样做的时候，不会忽视我们德国的安全利益。”[②]施密特一方面认为，在核僵持时期，苏联对德国问题的政策已变成维持现状的政策，即它“在这个领域的战略已不是扩张的战略，而是维持现状的战略了”。[③]但另一方面，施密特又认定，苏联从本质上具有根深蒂固的扩张主义，因为苏联的历史传统已经决定了这一点。他在稍后于 1986 年出版的《西方战略》一书中写到，1500 多年以来，俄国沙皇一直在“聚集俄罗斯土地”的旗号下占领别国并使其居民俄罗斯化。这种不断扩张、有时是小心翼翼推行的总战略一直为后来的苏联沿用，甚至有所加强，于是，施密特得出结论，苏联今天的扩张主义“3/4来自传统的俄罗斯战略”。

---

① 赫尔穆特·施密特：《均势战略》，第 85 页。

② 赫尔穆特·施密特：《人与大国》，西特勒出版社，1987 年，第 68 页。

③ 赫尔穆特·施密特：《均势战略》，第 37 页。

对于西德应采取的策略，施密特认为，西德既不得不痛苦地面对所有的邻国都倾向于接受德国分裂的事实，但也必须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理解邻国对德国的担心，承担由于纳粹德国发动而又失败了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应负的全部责任。因此，西德应推行一种施密特称之为“维护和平”的外交政策，并应同时将它运用于五个不同领域：

1. 在东面——跟莫斯科和它的盟国面对面地打交道；

2. 在德意志内部关系的领域——打开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关系；

3. 在西欧，特别是在涉及法国、英国和欧洲经济共同体的领域；

4. 在通过北大西洋公约联盟实现的共同防御领域；

5. 在军备限制和武器控制的领域。

施密特这一对西德外交政策的设想，可以说已包含他均势战略思想的两大要素即：均势与缓和。

保持均势乃施密特均势战略思想的核心，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保持均势，是有效防御和改善东西方关系的一个先决条件。”[①]这种均势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和心理诸方面，但首推军事力量方面的均势。

而要保持军事力量的均势，施密特认为，对西方来说，头等重要的是加强西方联盟的力量。他力主加强西德所在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团结合作和军事力量。

为此，施密特又指出，必须保持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存在，因为，“现在没有什么力量可以取代美国在战略力量均势中的角色和作用。”“没有美国在欧洲承担义务，均势是不能保持的。”[②]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施密特极其看重美国在欧洲中的作用，但

① 赫尔穆特·施密特：《均势战略》，第12页。

② 同上书，第10、11页。

一旦施密特认为美国的做法危及或有损于维护欧洲的均势，便会毫不客气地指责美国，坚定地维护自己关于均势的观点和立场。在施密特担任联邦总理的任期内，西德与美国在美国制造中子弹问题上，在美、苏谈判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美国因苏联入侵阿富汗而对苏联实行制裁以及在执行北约双重决议等问题上，发生了一系列摩擦和争吵，使两国关系呈现出以前从未有过的风波迭起的局面。

加强德法合作是施密特均势思想中另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施密特曾自称最初是亲英派，后来转为亲美的大西洋派，而最终变成“一个坚决主张把德法友谊以及德法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的合作放在第一位的亲法派”。他对此自我转变作如是解释：“并非由于我们对大西洋美国伙伴的失望，而主要是因为我越来越看清我的国家在地缘政治中的态势。”[①] 施密特认为，西德的利益只有得到法国的支持方能有保障，而法国要想在欧洲舞台上起领导作用也必须有西德的支持，此外，德法两国单独在两个超级大国面前显得太弱小，但德法联合起来作为欧洲共同体的核心和动力，推动西欧联合的发展，则东可以挡住来自苏联的威胁（当然也必须依靠美国的军事力量），西可以顶住来自盟友美国不时施加的压力，加强西欧独立自主的地位。施密特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在他的任期内，西德同法国的关系出现了自 1963 年德法条约以来合作最密切的时期，两国共同推动了欧洲货币体系的建立，促成欧洲议会的直接选举，还提出了德法军事合作的设想等等。

还需要指出的是，施密特追求的是一种低水平的均势，这是他的均势思想的一大特色。前已述及，施密特意识到，均势难以保持恒久，由于每一方都在担心被对方超过，结果导致军备竞赛，使均势水平越来越高，而这是绝对不符合西德的长远安全利益的，西德虽可一时或相当长时期地因维持了均势而得到安全保障，但

---

① 赫尔穆特·施密特：《西方战略》，西特勒出版社，1986 年，第 72 页。

如若这种建立在火药桶日益增多的基础上的和平有朝一日被破坏，在两大集团军事冲突中首当其冲的西德将难逃灭顶之灾，因此，他希望反其道而行之，即通过各种手段在保持均势的前提下使均势降到最低水平，这样既保住了当前的安全，又最大程度地保障了今后长久的安全，于是，他指出：共同使军事对抗降级并抽掉弹药的引信，不唯应该，而且可能，也是必要的。他又进一步指出："要使在欧洲这里保持均势的任务得到成功，必须在欧洲保持两个超级大国所承担的义务的平衡。剩下来的，则是我们尽力把双方的军备和部署从高水平降到较低的水平。"① 他在1969年出版的《均势战略》一书中还指出，今后将不是无休止地讨论旨在分享核力量的各种方式，而是要共同考虑可能采取的各种办法，以使欧洲军事力量的对垒降到更低的水平。

要使对立双方心甘情愿地把均势水平降下来，显然需要有一个双方能互相沟通的前提，有一个缓和的环境，所以，"缓和"对施密特的均势战略思想来说也是不可或缺的。施密特作如是说："通过遏制以达到安全，是事情的一个方面，而通过缓和达到安全，则是事情的另一个方面。"② 在他看来，缓和不仅能如勃兰特和巴尔所想的那样可以给西方带来向东方渗透的机会，通过接近来改变对方，而且可以使东西方两大对立集团之间保持联系，保留对话渠道，及时沟通情况，这样便可在相互间建立一定程度的信任感和可捉摸感，从而避免因偶发事件引起的军事冲突甚至核冲突。

施密特的缓和的最主要的对象无疑也是苏联。他认定，苏联出自传统的扩张主义难以改变，但又看到，苏联具有辽阔的版图，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传统，特别是具有超强的军事力量，因而西方是征服不了苏联的，"我们欧洲人要去掉这样的错误印象，即以为我们可以征服俄国。我们永远做不到这一点。"施密特由此得出结

① 赫尔穆特·施密特：《均势战略》，第280、248页。

② 同上书，第7页。

论："我们既不要去吓唬它，同它进行一场互相吓唬的斗争，也不要去同它进行一场经济摧毁战。"[①] 1974 年 5 月，施密特在就任联邦总理的开篇政府声明中明确申明，要以北约为牢靠的基础，同苏联与华约国家保持良好的关系。在此后 8 年的任期内，他身体力行了这一原则。他一方面对苏联谋 求军事优势的作法寸步不让，以牙还牙，另一方面则大力加强与苏联的经济合作，以此作为同苏联缓和关系的"信物"，正是在施密特任总理期间，西德成为苏联最重要的贸易伙伴。

施密特也并没有忽视同东欧国家缓和关系。他在执政期间，利用各种经济杠杆大大推进了西德同东欧国家关系的缓和。1977 年 11 月，他在波兰访问时到华沙的"波兰国际问题研究所"作了一次演讲，面对着一大批波兰听众，施密特说道：德国人不能够、也不愿意把争取缓和的事情单单让两个超级大国去干。他接着鼓动说："我在想，对欧洲中、小国家来说，最根本的利益是在于，要为减少紧张作出自己的贡献，而不是仅仅被动地把眼光越过大西洋望着西方，或者朝东方望着乌拉尔。"[②]

均势与缓和，孰先孰后？施密特对这一问题的答案是坚定而明确的：安全即均势先于缓和。他认定，只有在力量均衡得以保持的基础上，缓和政策才能获得成功。"西欧的安全以及我们缓和政策的成败，都取决于东欧和西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包括欧洲内部起作用的力量以及对欧洲有影响的外部力量）能否保持平衡。"[③] 施密特的这种思想，淋漓尽致地体现在他对待 70 年代末东西方关于核武器的一场争论的态度中。

正是在施密特的建议下，北约于 1979 年 12 月作出了一个关于欧洲导弹问题的双重决议。双重决议通过后，在社会民主党内，

---

① 赫尔穆特·施密特：《西方战略》，第 40 页。

② 《欧洲档案》，德文版，西德外交政策协会研究所出版，1978 年，第 26 页。

③ 赫尔穆特·施密特：《均势战略》，第 277 页。

对双重决议持保留态度的却大有人在。然而施密特丝毫不为所动，坚决要求按双重决议的既定方针办，如期部署美国的新型核导弹，为此他甚至不惜以辞去政府总理职务相要挟来迫使他的党对他作出让步。

但另一方面，在美国一味注重于部署导弹而轻视双重决议中的谈判一手时，施密特又力主要保持同苏联对话的渠道，他反对美国在1979年底苏联入侵阿富汗后对苏联实行制裁，因为他深恐苏联因此而拒绝同西方谈判导弹问题。而当1982年美、苏达成所谓“林中散步方案”[①]，施密特认为此方案基本体现了均势原则因而极表赞同时，逆料美国尔后又收回成命，推翻了这一方案，施密特对此大为恼火，不客气地指责美国推行毫无道理的霸权主义。

若将施密特与他的前任阿登纳和勃兰特作一比较，不难看出，施密特的均势战略思想既不同于阿登纳的一味强硬的向西方一边倒思想，也不同于勃兰特的缓和为主旨的新东方政策思想，或者也可以反过来说，它介乎于这两种外交思想体系之间，兼收并蓄了它们的主要特点。施密特把安全即均势放在首位，他强调西方首先必须采取强硬手段，加强自己的军事力量以取得同苏联方面的均势并对苏联形成一种威慑。在这一点上，他接近阿登纳的思想，但施密特没有到此止步，他继续走下去，要求在保持了均势的基础上通过缓和把均势降到最低水平，在缓和这一点上，施密特的想法又与勃兰特相近，但他在缓和的过程中，双眼始终牢牢盯着“均势”，不容均势有丝毫破坏。对他来说，均势与缓和，前者是后者的必要前提，后者则是前者的必要补充，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这就是施密特均势战略思想的特色。

---

① 1982年7月16日，美、苏两国谈判代表团团长会下一起在树林中散步时，达成一个协议方案：美国放弃部署部分新型核导弹，苏联相应地大量削减其SS－20导弹，英国和法国保留它们的现有核武器。后人即称此为“林中散步方案”。

三　统一后德国的外交思考

1990年10月3日，德国实现了国家统一。德国的统一是以东德归并到西德的形式完成的，因此，统一后德国的外交政策便理所当然地沿着原西德的外交路线延续下去，然而，苏联和东欧的剧变、两极格局以及德国统一，使原西德的外交政策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这种变化，必然影响到德国的外交政策，德国对自己的外交政策正在进行新的思考。

（一）德国外交环境的变化

德国统一的一个最直接的结果，便是德国的力量大大增强了。两个德国的合并，使德国成为拥有7910万人口（在欧洲仅次于俄罗斯）、35.7万平方公里领土的中欧泱泱大国。[①]

统一给德国带来的另一个直接结果是，德国的政治地位大大提高了。在德国统一前，苏、美、英、法四大国始终高踞于分裂的德国之上。尤其一直孜孜追求统一德国的前西德，更是在其对外政策上百般顾忌四大国的态度。如今，对德国来说，这种外交上的羁绊几乎不存在了。除此以外，前西德对外政策中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是对东德的所谓“德国政策”，这意味着，前西德的外交政策决策者和推行者，总是要集中很大精力于“德国政策”，并为此而不得不去照顾方方面面的关系，德国统一则抽掉了“德国政策”这个内容，从而大大减轻了德国外交的包袱。

从外部环境看，苏联、东欧剧变及两极格局解体至少从三方面直接影响到德国外交政策的走向。

其一，苏联东欧集团的剧变，特别是苏联的解体，大大削弱了这些国家的力量，这就使本来因统一而变强的德国在欧洲的份量显得更重。

其二，苏联、东欧剧变最后以体制改变的实现而结束。一些东欧国家和从苏联裂变出来的国家纷纷表示要加入欧洲共同体甚

---

① 这两个数字引自阿·霍夫曼编：《德国实况》，德文版，1992年，第7页。

至要加入北约的愿望，西德昔日的一些对立国家现在成为德国潜在的盟国，德国向欧洲东部扩展影响和势力的可能性和现实性顿时增强。这就意味着，德国必须对原西德的东方政策作大幅度的调整。

其三，在两极格局向多极格局的过渡中，欧共体作为多极世界的一极的作用已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而在欧共体中占主导地位的德国便不言而喻地在世界舞台上有了更广阔的活动余地。

上述外交政策环境的变化对德国外交产生的影响可以说都是有利于德国的，它们使德国能更有力地发出自己的声音，更自信地贯彻自己的意志，更强劲地推行切合本国利益的外交政策而不必如过去那样地瞻前顾后。

但是，对德国来说，今天也仍然还有一些不利的因素在制约着它的外交行为。

(二) 制约德国外交的因素

鉴于德国发动过两次世界大战的劣迹，欧洲各国，特别是德国四周的邻国，对德国可能东山再起，重新作乱欧洲的恐惧和担忧之心从未放下。德国的重新统一使它们的这种担心变得更加具有现实性。在德国势将统一和统一之后，关于“欧洲化的德国还是德国化的欧洲”的议论蜂起一时，便是欧洲人这种心理的生动反映。有的国家的领导人公开把对德国的担心宣泄于口，如1990年7月12日，英国的贸易和工业大臣尼克拉斯·里得利在一次同记者的谈话中把欧洲共同体的经济和政治联盟比做是旨在接管整个欧洲的德国的火箭，声言：如若把主权交给欧洲联盟，便不啻把主权交给希特勒。事隔不到两年，与德国隔着一大段路的土耳其的总统厄扎尔也把统一后的德国与希特勒联系起来，他指责德国说：“德国在统一以后变了许多，看来它想干预一切事情。……过去希特勒的德国就是这么干的。”[①]

① 《时代》周刊，英文版，1992年4月13日。

德国对欧洲国家的这种心态明若观火。科尔总理曾十分无奈地感叹说："我国地理位置不利。我们最强大，最勤奋，但也最不受我们的邻居的欢迎。我们就得这么活下去。"① 在另一次谈话中，科尔把德国对自己处境不利一方面的认识说得更透彻："德国是重新统一了，……（但）德国统一并未使德国在世界上的处境变得更好些，而是使它变得更难。所有的问题都提出来了，如地理、历史、经济等等各方面的问题。事实是，其他国家的人不愿意看到德国统一。"②

上述情况表明，并非仅仅是欧洲国家对德国存有疑惧之心，反过来德国对欧洲国家的这种疑惧心理也感到不安和害怕。双方的这种心态无形地制约着德国的外交政策。

从实力条件来看，两德统一虽然使德国的力量大增，但还远远达不到能像美、苏那样的世界大国在国际舞台上行动的地步。统一后德国的经济规模不到日本的一半，只及美国的1/4，它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国民生产总值中只占不到7%的份额。特别是在综合国力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指标即国防力量方面，德国缺少一个世界大国必备的军事实力。德国在统一前作为获取统一的条件，不仅重申不生产和拥有核武器、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而且承诺在3至4年内将兵员减少到37万，这一数字比原先单是西德的兵力还少了十几万。这就使德国根本无法与美国或俄罗斯这样的头等军事大国相匹敌，就是在英国、法国面前也相形见绌。诚然，从长远来看，德国的军事力量可以发展壮大，甚至有可能制造核武器，但从目前来看，德国不敢这样做。这就使德国在安全问题上必须依靠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联盟的军事保护，特别在欧洲地区性武装冲突不断的今天更是如此。

德国正是依据以上所述的外交政策环境对德国产生的积极和

---

① 《明镜》周刊，德文版，1991年第37期。

② 科尔与德国《商报》记者的谈话，《商报》，德文版，1992年2月7/8日。

消极的效应来重新定位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和思考自己的外交政策的。

（三）统一后德国的外交思考

"实现欧洲统一，建立欧洲联盟"是统一后德国叫得最响的口号，它也确实是德国今天在其外交思考中追求的一个基本目标。

1991年，德国外长根舍曾撰文说："德国对外政策只能是极其深刻的欧洲政策，建立欧洲联盟，最终建立在欧共体范畴内的欧洲合众国，……是德国对外政策的一个基本目标。"[①] 科尔总理在谈及欧洲其他国家对统一后德国的不信任和恐惧心理时指出，德国人不应对此加以指责，因为"这就像天气一样，人们无法对它施加影响。""只有一种办法，……德国的统一和欧洲的统一必须齐头并进。如果我们只满足于德国统一，而不再去努力促使欧洲统一，我们就背离了历史赋予我们的重托。这就是我的信念。"[②] 1991年12月中旬，以科尔为主席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在德累斯顿举行党代会，通过了一个长达20页的《德累斯顿宣言》，该宣言明确指出，对统一的德国来说，不可能有在欧共体和大西洋联盟之外的特殊道路，"德国的前途在于统一的欧洲"。

德国鼓吹欧洲的联合和统一并非始于今日。早从50年代起，西德在其外交活动中就一直宣传这一主张。但当时西德鼓吹欧洲统一主要是为了在统一的欧洲中实现德国统一。在统一完成以后，德国更为热心地高举欧洲统一的大旗，自然有其更深层次的考虑。

历史的教训和借鉴无疑对今天德国关于欧洲统一的思考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德国两次发动世界大战均以惨败告终，其教训对德国人来说是深刻的，至少从阿登纳起直到今天的科尔为止，（西）德国历届政府的领导人铭记住了这个教训。1993年2月，科

---

① 汉斯—迪特里希·根舍：《欧洲和美苏首脑会议》，引自德新处1991年8月5日波恩讯。

② 《商报》，德文版，1992年2月7/8日。

尔在一年一度的慕尼黑安全政策会议上作的讲演中强调指出："我们的安全利益是打上了历史经验的印记的，那就是：德国的特殊道路将不可避免地走向政治上的孤立，从而误入歧途。"[1] 在另一次讲话中，他说了同样意思的话："如果我们把自己仅仅局限于国家民族的基点上，那么我们德国人将会失去我们的未来。"

这种历史的训谕古已有之。早在17世纪，法国著名的外交家、国王亨利四世的重臣苏利就曾依据法国自身的利害关系提出一种理论说，国家的强盛有其限度，超过这个限度，这个国家就会招致敌人和妒忌者联合力量的反对。因此，一个国家"与其用一些自己力所不能及的计划而为自己招来难以消除的仇恨和敌意，不如取得出于共同利益而与它紧密联系——这是最可靠的联系——的朋友和同盟者。"[2] 我们若把科尔关于历史经验印记的一席话与苏利的理论联系起来看，就不难理解今天德国主张欧洲统一和欧洲联盟的用意。

当然，德国鼓吹欧洲统一，并非仅仅是消极地为了应付欧洲其他国家对德国的疑惧之心，它还有着更深一层的积极进取的动机，这就是，借欧洲之联盟进一步提高和加强德国的地位。因为：1. 在欧共体范畴内实现的欧洲统一将加强欧洲在世界上作为一极的实力和地位，而在欧共体中居主导地位的德国必将因水涨船高而在世界上具有更加重要的份量；2. 如前所述，德国单凭一国之力难以同美、日匹比，但德国以欧共体作依托便足以同它们相抗衡了；3. 世界经济区域化和集团化正呈现出越来越强劲的势头，这既是世界各国相互依存性不断增强的结果，也是各国为适应激烈的国际竞争而作出的抉择。这一世界发展大势促使欧共体进一步发展自己，在已有的一体化的基础上深化和扩大。作为欧共体

---

① 德国联邦政府新闻局：《新闻公报》，德文版，1993年2月10日。

② 〔法〕苏利：《国家经济的原则》，转引自〔苏〕波将金等编：《外交史》第1卷，第340页。

主体力量的德国焉能不去推动这一进程。

综上所述，可见德国高举欧洲统一大旗，既从形式上维持了原西德对外政策的连续性，减轻欧洲其他国家对德国的不安全感，又顺应了世界潮流的发展趋势，同时可获取提高自身地位和力量的实际利益，可谓一举多得。当然，德国的欧洲统一目标能否实现，或在多大程度上，需多长时期才能实现，今天很难作出定论，它取决于其它多种多样今天已知的和未知的因素。

德国外交思考中的第二大内容是建立一种全欧安全体系，在此体系中，德国毫无疑问要扮演主要角色。

东欧剧变一度曾使西方国家欣喜不已，以为从此资本主义在欧洲一统天下，欧洲将太平无事了。1990年11月，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在巴黎举行首脑会议，通过一个“新欧洲巴黎宪章”，宣告“欧洲对抗和分裂的时代已经结束，欧洲各国今后的关系将建立在彼此合作和尊重的基础上”，“欧洲正从过去的遗产中解放出来”，“进入一个民主和平和团结的新时期”等等。然而事实粉碎了这些美好的宣言。欧洲的安全问题以另一种更直露的方式表现出来，原先被冷战的大幕掩盖住的各种矛盾，诸如民族矛盾、宗教矛盾和国与国之间的领土纠纷等等，演变为经久不息、难以遏制的武装冲突。这些局部地区的战争以及大量潜在的战争因素严重地威胁着欧洲的安全。这表明，欧洲仍然需要一个安全体系。

什么样的安全体系呢？在德国看来，原来以北约为支柱的西欧安全体系显然已不能适应今天欧洲的形势。因为第一，原北约的职能主要是对抗以苏联为主帅的华约，如今华约与苏联的解体使这一职能失去了对象；第二，北约从其成立之日起就带有一种提防德国的色彩。40多年前的1950年，北约第一任秘书长伊斯梅勋爵曾这样说过，大西洋联盟的目的就是，让苏联人呆在外面，德国人呆在下面。此后，随着西德在联盟内作用和地位的加强，西方国家不再提起这个目的，但大家心中有数，心照不宣而已。统一后的德国当然不会喜欢具有这种潜在反德功能的北约。此外，从

实践上看，北约在冷战后的海湾战争中也表现得软弱无力。

因此，德国需要一种新的全欧安全体系。在这个体系内，北约仍然存在，但其职能要调整。在这方面，德国已经在 1991 年成功地与其他北约国家一起制定了北约的新战略。是年 11 月 7 日和 8 日，北约国家首脑在罗马开会，提出新的战略方针，其主要内容有二：一是调整军事力量的结构，二是加强政治职能，决定建立“北大西洋合作委员会”，把冷战时期的敌对国家囊括进来。1992 年 2 月 10 日，由苏联解体衍生出来的独联体 11 个共和国加入了这个合作委员会。扩大欧洲安全体系的范畴是符合德国利益的，因为它可以利用自己地处中欧的战略地位比其他西方国家更多地向欧洲东部扩大自己的影响。这也是为什么德国对东欧国家如匈牙利和波兰想加入北约的愿望表现得比西欧其他国家更为积极的原因所在。为此，德国也积极主张要发展原有的欧安会的结构，使这个松散的组织具有更多的实质内容。

但所有这些还不够。为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减少美国在欧洲的影响，从而更突出德国在欧洲防务上的作用，德国顺理成章地认为，欧洲必须进一步加强自主防务。1992 年 4 月 1 日，德国外长根舍在西欧联盟举行的题为“欧洲新的安全秩序”的讨论会上明确宣称，作为长期目标，应建立一支欧洲联军，它将是欧洲最好的安全与稳定的保证。1992 年 5 月 22 日，德国同法国决定组建德法联军，两国为这支联军确定的首要任务是，在西欧联盟和北约的范围内保卫欧洲。这支联军向所有的欧洲共同体国家敞开大门，比利时和卢森堡已声称准备加入，西班牙也表示将考虑参加的可能性。从长远看，这支德法联军很可能发展成为欧共体的一支欧洲联军。

德国外交思考的又一重大内容是要从欧洲走向世界，充当世界性大国，在世界范围内显示力量和发挥作用。德国统一后，德国领导人在多种场合不厌其烦地宣称，德国要在世界上承担更大的责任，使德国在世界政治中占有相称的地位。例如，1992 年 5

月，科尔在美国访问期间发表讲话说："我们德国人今天作为统一和主权国家在欧洲和全世界担负着越来越大的责任。"在这同一次讲话中，科尔接过美国总统布什提出德国与美国成为领导伙伴的说法，称："我们接受布什总统要我们当'领导伙伴'的邀请"。[①]德国新外长金克尔在1993年自由民主党的一次讨论外交问题的会议上说得更加直接了当："德国有权要求超出欧洲的范围，在全球从政治和经济上维护自己的利益和履行自己的责任。"[②]

德国的具体行动迄今主要表现在：

1. 准备修改宪法。德国现有的基本法制订于1949年。当初西德的基本法制订者们之所以坚持制订的是基本法，而不是西方占领国要求的宪法，就是为有朝一日德国统一后制订正式的宪法埋下伏笔。今天德国实现了统一，修改基本法本是题中应有之义，但德国对修宪还赋予一种更深层次的含义，正如科尔总理1991年5月28日会见一日本新闻代表团时谈及德国要求修宪之时所说：修宪"不仅是为了能够与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合作，也是为了将来能够实现欧罗巴这一目标。同时，为了使德国在世界政治中占有相称的地位，也应修改宪法。……"[③]

2. 与修宪相联系，德国要求派兵海外，参与解决国际争端。德国基本法第87条第1款和第24条均限制德国向国外派兵。德国在统一伊始面对南斯拉夫和世界其他地区的众多武装冲突一开始表现得很克制。海湾战争期间就顶住了美国的压力没有出兵，只是出了一笔钱。后来，在1992年5月，应联合国要求，也只是派了130名非军事武装人员的卫生兵去柬埔寨参与联合国维护和平行动。德国国内对向国外派兵一事争论很激烈，但争论的焦点并非是否派兵，而是是否可以在修宪之前派兵。1993年4月21日，

① 德国联邦政府新闻局：《新闻公报》，德文版，1992年5月5日。
② 《商报》，德文版，1993年9月19日。
③ 转引自〔日〕《读卖新闻》，1991年5月29日。

德国联邦议院终于在尚未修宪的情况下，以 341 票赞成，206 票反对，8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向索马里派兵 1640 人以援助联合国为重建该非洲国家的行动。金克尔外长对此发表谈话说，统一后的德国对全球负有新的义务。他呼吁所有的德国人以最严肃的态度来找到一种能使德国发挥作用的办法。

3. 争取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冷战结束后，日本和德国都以联合国的现状已不能适应冷战后世界的新形势为由，提出要取得安理会常任理事席位的愿望。德国积极通过各种活动，争取其他国家对它这一要求的支持。1992 年 5 月 5 日科尔在美国访问时，提议将联合国的计划开发署、人口活动基金会及妇女发展基金会三个机构由纽约迁往波恩，表示德国将对联合国提供优惠条件。

（四） 德国外交的动向和特点

从统一后德国的外交思考可以大致看出德国外交在今后一段时期内的动向。

首先，德国外交将呈现出一种全方位的特点。西德从 70 年代起推行新东方政策以来，其外交活动余地大大被拓宽，使它从原先偏隅国际舞台的西半部走到整个国际舞台上来。但是，它毕竟受到两极格局和国家分裂的束缚和限制，用科尔的话来说便是："直到 1990 年 12 月德国重新统一之初，我们总有遁词，就是说，我们国家是分裂的，因此不能完全履行我们的国际责任。现在不能这么说了。""我们今天不能躲避国际责任。"[①] 如果说，统一后的德国极想从欧洲走向世界的愿望产生了推行全方位外交的需要，那么，统一后德国实力的增强客观上又为此创造了有利条件。事实上，今天德国全方位外交的势头已经显示出来。

德国显而易见地在加强同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欧洲东部和东南

① 科尔 1993 年 2 月 17 日答日本电视台记者问，转引自德新处波恩 1993 年 2 月 19 日讯。

部地区的联系。它先后同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和匈牙利等国通过谈判解决与这些国家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消除发展双边关系的障碍，并同它们分别签订了睦邻和友好合作条约。并给这些地区的国家提供了数量可观的援助和贷款。从 1989 年到 1992 年，德国为所有中欧、东欧和东南欧国家提供了 2050 亿马克的援助，此数额为西方国家总共向这些国家提供的援助金额的一半。德国还利用自己在欧共体内的地位，努力施加影响，使波、匈、捷三国与欧共体签订了联系成员国条约，成为欧共体的外围国。值得一提的还有，1992 年 3 月，德国同丹麦、瑞典、芬兰、挪威、波罗的海三国、俄罗斯、波兰商议，决定成立一个"波罗的海国家委员会"。此举既是德国在欧洲北部和东部扩大自己影响的步骤，又可以说是德国全方位外交的一环。

德国的全方位外交最引人注目地体现在它的亚洲政策上。两极格局解体后，亚洲在全球几大洲中呈现出政治相对稳定，经济生气勃勃的一支独秀的局面，这就使本来想在亚洲拓展影响的德国更加重视其对亚洲的政策。1993 年 2 月 18 日至 3 月 3 日，科尔对印度、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日本和韩国等五国进行了一次大规模访问。同年 11 月中旬，科尔在事关他本人和他的党前途命运的联邦议院大选迫在眉睫之际，毅然到中国访问，充分说明了德国对发展同亚洲地区关系的重视。科尔自己在 1993 年 9 月 26 日的德国"星期日世界报"上撰文说：在政治领域同亚洲合作，早就是德国全球政策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亚洲国家由于在世界政治中的份量，在解决全球问题方面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德国在各方面都需要加强同亚洲的合作。

德国的全方位外交，一如原西德的外交政策那样立足于其西方政策，这是由德国的地缘政治条件和将近半个世纪的政治与经济的历史纽带所决定的。具体说来，德国的外交将表现出联合法国，拉住美国，稳住俄罗斯的特点。

德国在地理上脱离不了法国，德国要搞欧洲政治联盟和经济

联盟，也脱离不了法国，德国想在美国面前提高自己的地位，同样需要法国的配合，德国要想跻身于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行列，仍然需要法国关键的一票。因此，尽管人们今天常喜欢用德国地位上升，法国表示担忧来预言德法矛盾将加剧甚至说德法关系会破裂，也尽管今天在德法关系中确实出现一些矛盾，但可以肯定，在今后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联合是德法关系的主流，联合法国是德国对法政策的主流。1992 年 9 月，在欧洲发生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时，德国置英国、意大利等国不顾，而对法国情有独钟，唯援手法国帮其度过了难关，就是德国极其重视同法国的关系的例证。

德国地位的加强，必然会增加对从大洋彼岸插足到欧洲来的美国的不满，这一点，从过去几十年的德美关系的互动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但德国目前还离不开美国，因此还要拉住美国。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德美经过 40 多年的结盟，在政治和经济上密切相连。德国企业在国外投资最多的国家就是美国。这种密切的联系不仅使两国的关系不可能截然脱钩，而且事实上还造成双方在许多领域有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需要。其二，欧洲的安全，仍然需要借助美国的力量来保障。德国想建立的全欧安全体系绝无可能在短时期内成功。现实生活证明，在解决海湾战争、前南斯拉夫内战这些直接或间接关联到欧洲和德国安全利益的冲突中，欧洲国家仍然需要美国的参与和施加影响。其三，美国目前在欧洲的存在，有助于遏制欧洲其他国家对德国的恐惧之心。德国在尚未完全塑造好自己在欧洲的形象的今天，需要有一种安定的国际心理环境。

苏联的解体，使德国感到去掉了一个最严重的威胁。然而，作为苏联事实上的继承国的俄罗斯并不能使德国完全放下心来。对俄罗斯今后的发展前途来说，今天还有许多不可知的因素。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俄罗斯将是欧洲举足轻重的大国，尽管俄罗斯现在有着重重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困难，但它的潜力还在，它仍然

是世界上国土辽阔的国家，世界上数一数二的核大国。还有一点也是肯定的，那就是俄罗斯不可能被一体化到以德国为主导的欧共体中去，这意味着，无论作为朋友或对手，俄罗斯将是处在德国所在联盟集团之外的一个强大实体，在欧洲发挥其重要的影响。1992年12月，科尔访问俄罗斯时，德国最有影响的报纸之一《法兰克福汇报》撰文道出了德国对俄罗斯的心态："俄罗斯太重要了，而且在目前的情况下，它还是非常捉摸不透的。"[①] 因此，在俄罗斯的发展前景尚不明了的今天，德国对俄的政策就是把俄罗斯稳定住。一方面使俄罗斯在国家制度上与西方趋同（西方人总以为，具有西方民主制度的国家之间不会打仗），另一方面努力改善和加强同俄罗斯的关系。德国在这样做的时候所采取的一个重要手段便是提供经济援助。通过这种经援，既稳定俄罗斯国内不稳的政局，又施加德国的影响。据统计，1989年至1992年，德国对前苏联地区的援助达800亿马克，其中大部分给了俄罗斯。德国向俄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规模在西方诸国中遥遥领先。

在表现形式上，德国的外交在一段时期内会呈现出灵活多变，时而韬光养晦，时而显露峥嵘的特点，用德国有权威的"德国外交政策协会研究所"一位研究人员的话来说就是"德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特点是变化不定"。

第五节　英国"三环外交"的调整

丘吉尔的"三环外交"思想对于英国战后的对外政策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和影响。但是，在进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第二个10年以来，随着英国实力的相对衰落及其内外环境的发展变化，英国不得不对其在全球范围内承担的广泛义务和"责任"实行收缩，并对其外交政策目标及其轻重缓急次序加以调整，被迫放弃大

① 《法兰克福汇报》，1992年12月17日。

国全球外交，实行重点面向欧洲的转变。这时“三环”还是那三环，但英国在每一环中的地位已大不如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一　导致调整的诸因素

（一）从“帝国环”的撤退

战后初期英国的帝国政策是将“撤退”与“挖壕据守”相结合。这就是说英国一方面从印度次大陆、巴勒斯坦这些事实上已难以继续控制的地方迅速撤退；另一方面，在远东、非洲和加勒比海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则步步为营，尽量将剩下的殖民地领土继续置于英国的统治和影响之下。但是从50年代后期开始，英国实力衰落的趋势日益明显，为适应形势的变化，英国推行迅速从殖民地全面撤退的战略。英国首相麦克米伦1960年2月在南非发表演说称：“变革之风已经吹遍这个大陆，不管我们喜欢不喜欢，民族意识的这种增长是个事实。我们大家都必须承认这是事实，并且在制定国家政策时把它考虑进去。”[①] 从60年代开始，英国政府大大加快了英属殖民地的非殖民化进程。

在承认民族独立已大势所趋的同时，麦克米伦等最关心的则是这些新兴国家对东西方两大阵营的选择，他否认这种选择完全是主权范围内的国内政策，他说：“我们相互之间有时可能很想说‘管你自己的事情’，然而近来我本人很想把这句老话扩大为‘管你自己的事情，但也得注意它怎样影响我的事情’。”尽管英国不得不放弃对其殖民地的直接统治，但仍试图通过一些政治和经济手段来对以前的势力范围施加间接影响，但这种影响在以后的岁月里亦日渐式微。

英帝国殖民体系的瓦解，给英国的政治经济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英国在丧失了帝国之后，已成为一个与法国、西德、日本并列的中等国家，其经济实力也日益落在这些国家后面。60年

---

① 《麦克米伦回忆录》（5），商务印书馆，1976年，第190页。

代末英国外交部一份权威性报告中，提出“英国外交的集中地区”的概念，并把此作为英国外交理论的一个重要部分。其主要内容是：“二等强国”英国再也不要像一等强国那样行事了，为此英国外交政策应分出优先次序，重大利益就应该放在“集中地区”，次要利益只能放在“外边地区”，集中地区则包括西欧和北美。[①]到70年代末，英国上层内部又提出一份重要的理论性文件，明确了大幅度调整“三环外交”的理论思路，英国必须在新形势下对西欧领袖、英联邦首脑和享有特权的美国伙伴三个角色作出选择。对英国战后长时期忽视实力衰落的作法提出严厉批评，并断言未来十数年间英国的实力和影响难望增长，英国的出路只能是加入西欧中心，以最优先的地位发展同西欧邻国的关系。[②]这些观点反映出英国决策层十年间思想变化的大致脉络。

与英帝国的非殖民化进程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还有英国防务从苏伊士以东撤退的问题。从英国本土经过直布罗陀和地中海，穿过苏伊士运河、红海和印度洋，到达南亚次大陆的交通线，是英国通往当年英帝国最大的殖民地——印度的海上通道，被称为大英帝国的“生命线”。二战结束后，伴随着印、巴、缅、锡的独立，英帝国失去了印度这个帝国防务体系的重要支柱，苏伊士以东防务也失去了它当初存在的根据和重心。形势迫使英国政府不断撤退和减少海外驻军，并最终于1968年1月决定放弃苏伊士以东的防务。对英国在世界上的后撤趋势，英国学术界也作了一些理论阐释，像F. 诺瑟治和G. 弗兰克尔等都在自己的专著中较详尽地分析了英国战后以来外交上的变动，认为英国适应其在世界事务中比重不断下降的问题乃是英国外交决策的中心问题，英国外交的“欧洲化”和从海外帝国向内收缩正是英国作用减退过程的不

① 《国外代表委员会评论报告，向议会提出的文件第4107号》，1969年7月。转引自马德佐耶夫斯基等：《英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354页。

② 《国外代表评论政策评论中心报告》，1977年，出处同①，第355页。

可逆转的后果。

在英帝国殖民体系解体的过程中，大批的前英属殖民地附属国加入了英联邦。但事实上，即使在英联邦内，英国的影响也是在不断下跌的；它不仅不再能任意地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英联邦国家；相反，英联邦却一再被一些亚非英联邦国家用作批评和反对英国政策的论坛。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国内对英联邦的态度和看法发生了重要变化。有人认为英联邦对英国与其说是一笔财富，倒不如说已变成一项债务和负担。同时，作为英联邦经济联系重要杠杆的英联邦特惠制，从50年代中期开始逐渐走向瓦解。英国经济的脆弱和不断爆发的国际收支危机，也使英镑区于60年代末70年代初寿终正寝。在维系英联邦的经济基础受到严重削弱的情况下，英联邦的内部关系变得更加涣散。帝国解体，英联邦对英国的意义和作用急剧下降，促使英国逐步把同欧洲建立更密切的联系放在了对外政策的首位。

（二）英美关系的重要性下降

所谓英美特殊关系本来就是英国的提法，它特别强调其“特殊”以提高自己的地位；美国虽然也提，但远不及英国为甚。它主要反映了英国借助美国力量实现自己战略需要的愿望。因此战后绝大多数英国政府都把保持所谓英美特殊关系，作为维护英国大国地位的一种手段。但是，随着英国经济、军事实力的下降和国际局势的变化，英美关系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与作用日趋下降，与美国同其他西方国家的双边关系相比，英美关系的“特殊性”也在逐渐减弱。

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战争曾给英美关系造成严重的损害。美国不理会什么英美特殊关系而多方向英国施加压力，英美关系一度相当紧张。英国首相麦克米伦决意把修好英美关系作为英国外交的首要任务，提出建立互相依赖的“真正伙伴关系”。英美核合作伙伴关系的恢复和发展，就是麦克米伦执政时期的一大成就。1958年在美国国会通过有关法案后，两国政府签订了在原子能用

于防务需要方面进行合作的协定，允许英国在一定范围内接触美国的核机密，可以向美国购买核武器部件和核武器系统。作为交换，英国向美国提供更多的军事基地。

英美的核合作关系给英国造成的后果和影响是矛盾的、复杂的。它无疑有助于英国作为一个核国家参加大国俱乐部，但是也大大加强了英国对美国的依赖。

麦克米伦时期英美关系的恢复和发展，曾被人形容为战后英美“特殊关系”史上的“小阳春”。麦克米伦把英美的紧密联盟和密切合作视为一种全局性的战略。国内有些人曾指责英国的核政策和英美特殊关系，说英国会由此卷入美苏的巨大争端中去。麦克米伦坚持认为，只有这样，英国才能在世界事务中获得权威。同时英美之间的相互依赖也是非共产主义世界有效防务的坚实基础。他还认为由于英国仍有许多国际性问题需要解决而国力日减，又位于仍处分裂状态的欧洲，所以得到美国的支持就事关重大了。工党威尔逊政府上台执政以后，对苏联在欧洲以外地区的威胁远不像美国看得那样严重，因此对于美国在捍卫西方全球战略利益的旗号下所采取的行动配合乏力。特别是在越南战争问题上，英美时有不谐之音。鉴于英国国内和工党内部存在着强烈的反对越战的情绪，威尔逊政府不仅拒绝派象征性部队，而且还竭力在美、苏和越南之间进行斡旋，试图促成越南问题的和平解决；威尔逊甚至劝告美国人避免进一步卷入东南亚。美国总统约翰逊反唇相讥：“我不会告诉您怎样去料理马来西亚事务，您也不必告诉我们怎样去处理越南问题。”[1]

正当美国深陷越战泥沼、急需盟国支持的时候，英国政府又作出了从苏伊士以东撤退的决定。威尔逊政府的这一决策，直接危及和降低了英国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作用和地位。在美国看来，

---

① 戴维·桑得斯：《失掉一个帝国，找到一个角色》，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90年，第175页。

英国从苏伊士以东撤退，是一种有损西方战略利益的严重事态。它不仅使美国在越南处于一种完全暴露、无掩护的状态，而且使美国在道义上也陷于进一步的孤立。这不能不使英美特殊关系受到削弱和损害。

希思较之威尔逊更侧重于西欧，他将英美“特殊关系”变为“自然关系”。他认为惟有“自然关系”的表述，才能证明英国并不乞求美国的特别优待也不强求特殊照顾，应只限于英美关系中的那些联合因素，而这些因素乃是不可变更的历史的一部分，即共同语言、相同的法律和其他传统、家庭联系及两次大战中的友谊等。从英国的繁荣、安全和威信考虑，就应该把同西欧邻国的关系放在英美关系之前。当 70 年代初美国抛出自己的货币政策时，希思就直言批评说：美国的这种作法“可能使整个西方世界受到损害”。[①] 但当 1974 年英国经济危机和世界性石油危机并发时，英国又发现欧洲单独行动难以奏效，英国在能源方面更离不开美国的支持。在新一轮工党政府里，卡拉汉发表了“架桥者”的提法，即英国应在西欧和美国之间起某种“架桥”的作用。[②] 卡拉汉认为，西欧和美国应建立更密切的合作，欧美军事联盟的生命力实际上直接取决于它们在贸易、财政、能源和其他政治、经济问题上的合作。欧共体单个成员国都应既在双边也在多边基础上发展同美国的关系。

英美关系中的这些曲折，固然与英保守党和英工党的不同政策取向有关，但从根本上说反映了英国在美国的国际政策中的地位已非昔日可比。英国仍需要在国势日衰的趋势下尽量表现自己在国际事务中的“大国”形象。但是英国是不可能离开美国的，美国也不能不把英国视为它在欧洲的第一盟友。

---

① 《泰晤士报》，1972 年 1 月 25 日。

② 〔英〕《现况调查》，伦敦，1975 年 12 月，第 473 页。

（三）英国的欧洲政策

英国经济贸易利益向欧洲的转移和集中，是促使英国对外政策从大国全球外交向重点面向欧洲转变的一个根本原因，特别是欧共体的建立极大地扩大了西欧内部市场的容量，为英国扩大向西欧的出口提供了机会和可能。

英国这样做，当然并不仅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政治、外交上的需要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因为如果英国同西欧联合进程的联系被切断，未来世界外交活动的渠道就有可能绕过英国而从欧共体通过，从而给英国的大国地位造成严重的威胁。特别是在欧洲一体化过程中不断加强的法德接近和联合，更使英国感到担心和害怕。麦克米伦1960年3月在会见美国总统肯尼迪时曾表示，如果出现法德联盟的情况，英国从长远考虑将不得不在周边地区组织领导一个联盟，他甚至提到了历史上同俄国结盟反对拿破仑的类似事例。麦克米伦当时还认为，60年代以后的最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调整英欧关系。他把欧共体看成拿破仑时代以来欧洲大陆主要国家第一次结成的具有政治性质的经济集团。这个集团虽不是特别针对英国的，但可能把英国排斥于欧洲市场和欧洲政策的协商之外。他明确提出不管英国喜欢与否，共同市场都将存在下去，这是一个客观事实，英国要想永远充当反对派，不但会遭到欧洲大陆人的联合反抗，还会落入苏联的圈套。然而麦克米伦同其他英国领导人一样，对英国进入这样一个多少有些政治倾向的经济集团不无忧虑。他觉得问题的关键是，如何使英国既在经济上与共同市场一起生存，又能将其政治影响引导到使英国不受损害的方向上去。所有这些都证明，欧共体对英国的主要症结，不是纯经济的，而是在于如何处理欧洲政治方面的问题。针对英国当时的反德情绪，麦克米伦另一个重要观点是要从根子上铲除这些猜疑和恐惧，就只有以必要手段积极促进欧洲联合，让英国人民相信孤立主义已不切合实际，德国的恢复不可避免，唯一的方法就是使德国经济和军事力量用于欧洲联合的共同目标上。

总之，众多的因素促使英国决心调整它的欧洲政策，申请加入欧共体。尽管英国把同西欧其他大国的关系上升到更重要的位置，但英国也没有简单地把“三环”外交变为“一环”外交，英国外交的集中地区仍然包括世界政治的所有主要中心，只不过所侧重的份量不同了。应该从这一角度来把握和认识英国外交战略的“欧洲化”概念。而且英国外交往往把重点放在达到过渡性的目标上。1978年年中，欧文就公开反对西欧在共同体基础上形成邦联或联邦，声称英国按照自身文化的久远传统及政治思想办事，不同意把不成熟的硬性规定的关于欧洲未来模式的概念强加给共同体成员国。[①] 由此看出英国独特的社会—心理特点对泛欧思想意识形成一种天然的阻碍。

二 所谓“欧洲派”和“大西洋派”

英国政治在欧洲大陆政策上历来有所谓“欧洲派”与“大西洋派”之分，这是英国特殊的政治文化的反映。

英国是欧洲国家，本是毫无问题的；但是它又有别于欧洲大陆国家。从政治上讲，它在与美国的关系和在广袤的海外的联系这两方面上，比任何欧陆国家都有广泛得多的依托。这即特指所谓“英美特殊关系”和英联邦。英国在制定欧洲政策时，这两个方面的因素是不能不考虑的，就是说必须要在三个环节上摆平。欧洲共同体出现后，英国就必须有个次序上的选择。所谓“欧洲派”和“大西洋派”之说就是这样产生的。

在“欧洲派”看来，英国应该把同欧陆国家的关系放在优先地位，特别在欧洲共同体已显示出其可观的实力和影响之后，英国更不应置身其外，英国如失去了在欧洲大陆的地位，英国无法在欧洲立足，则英美关系和英联邦两者均不足恃。希思在麦克米伦政府内任枢密大臣时于1961年5月曾说：“现在在欧洲大陆上

① D. 欧文：《人的权利》，伦敦，1978年，第27～28页。

我们面对着一个巨大的国家集团，其规模只有美国和苏联可与之相比。随着它的经济实力不断增长，它的政治影响也在不断扩大。"[①]他在1971年10月英国保守党年会上又说："我们的各项政策是建立在对英国今天在世界上的地位进行清醒的、新的和现实主义估计的基础上的。"[②]

所谓"大西洋派"则更看重同美国的关系，认为大西洋两岸的关系更重于与欧陆的关系；担心英国加入欧共体会损害英美关系，从而会削弱英国在欧洲的独特地位。

这两种意见实际上只是侧重点的不同，而不是相互排斥的；都表明英国已经失去了19世纪时期的地位，在对外关系方面显出它的被动处境。

麦克米伦、威尔逊、希思三届政府三次申请加入欧洲共同体，都反映出这种处境。

英国即使是在下决心要加入欧共体的时候，它的心情也是矛盾的，因为英国不愿用牺牲英美"特殊关系"和削减同英联邦的经济纽带作为获取欧共体成员国的代价。而且英国是一个工业比重较高的国家，而当时欧共体的农业补贴很高，英国付出的会费的一部分等于要落进农业比重比较高的国家的腰包里。这是英国政府——无论是"欧洲派"和"大西洋派"——都不能接受的。所以希思政府在被接受为欧共体正式成员国之日起，就已埋伏下日后的艰巨谈判。希思的想法是，先要在原则上、政治上解决问题，在进了大门以后再去磋商技术性的细节问题。

上述这些情况也就决定了英国在欧洲政策上的悖论式的思想：

一是它必须确定它是一个欧洲国家，必须加入欧洲联合的进

---

① 转引自F. S. 诺塞治：《实力的衰落，英国对外政策1945～1973》，乔治·阿兰—安温图书公司，1974年，第337页。

② 希思1971年10月16日在保守党年会上的讲话。

程，在这个历史进程中不能没有英国的脚印，而且要保持英国作为“欧洲统一”旗手的形象——丘吉尔就曾是早期欧洲统一运动的鼓吹者。即使是在50年代英国同欧洲共同体“顶牛”的时候，英国也不曾放弃过“欧洲统一”的口号。

再是它必须是欧洲的一个有特殊地位的国家，必须从英国的海外利益出发在欧共体内享有特殊的政策利益。因此，它一向倾向于使欧共体的权力不要那样集中，机构要尽可能松散一些。50年代组织自由贸易区的思想一直有意无意地支配着英国决策者的思想。

从麦克米伦到威尔逊，再到希思，这两点悖论式的思想一直萦绕不去，而且直到今天，虽然表现的程度不同，但始终有它的影子。在撒切尔夫人执政期间就更突出了——这将在下面加以探讨。

三 撒切尔主义

撒切尔夫人执政时期（1979～1990）的英国外交，就其基本政策目标而言，与战后历届英国政府保持了明显的连续性。但撒切尔夫人在政策重点和外交风格上，赋予它某些新的特点，给它打上了“撒切尔主义”的印记。

（一）重新回到英美“特殊关系”

就政策目标的次序安排而言，撒切尔政府（尤其是撒切尔夫人本人）特别重视英美关系。撒切尔时期的英美关系，一改70年代以来两国关系日趋疏远的状况，由希思称之为的“自然关系”重新又回到了昔日在英国对外政策中占中心地位的“特殊关系”。撒切尔夫人认为，保守党的对外政策应当建立在英美深刻的谅解基础之上，建立在英美盟国关系之上，她把此作为盎格鲁—撒克逊传统的一部分，也作为对北约承担义务的一部分。这里有两个方面的因素特别值得注意。首先，英国尽管加入了欧共体，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对其实际效果所产生的失望，以及同法国等欧共

体伙伴之间的利害矛盾，使它难以成为一个全心全意的“欧洲人”。另外，就欧共体的性质而言，它主要是一个经济组织，西欧的安全和防务以及东西方关系这样一些重大问题，仍是通过大西洋联盟来协调的。而英美之间的防务伙伴关系对英国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在这种情况下，撒切尔政府自然不会把重振英国大国地位的希望，寄托在发展同西欧大陆的联合上。

其次，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推行的新右派内外方针与撒切尔夫人倡导的新保守主义指导原则十分接近。里根1981年入主白宫后接待的第一个外国客人就是撒切尔夫人。在会晤中里根说，为了保卫自由，英美将“肩并肩地站在一起”。撒切尔夫人回答说：“我们两国一致认为，我们首要的责任是保卫我们自己的自由；第二个义务便是努力拓展自由的疆界，以便使其他民族也能够有权力选择自由。”[①] 他们的经济政策思想也有许多相同和近似之处：都崇尚自由市场经济，奉行货币主义方针，主张减少国家干预，扩大个人自由。总之，这种意识形态上的共同使命感和内外政策上的广泛一致性，使撒切尔夫人执政期间的英美关系又密切起来。

当然，英美关系的基础仍是英美两国对苏战略的一致。70年代末的国际事态发展，是推动撒切尔政府支持美国对苏联推行强硬政策的直接诱因。在伊朗人质危机和阿富汗事件中，英国是美国行动最积极的支持者。

在推动制定北约关于中程核武器现代化决议、部署美国巡航导弹和实施北约关于增加防务开支的决定等方面，英国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通过影响美国来影响世界”，被认为是战后英国外交思想的一个重要原则。[②]撒切尔夫人外交在这方面表现得尤其明显，1983

---

① 雨果·扬：《我们中间的一个》，潘图书公司，伦敦，1990年，第250～251页。

② 阿尔弗雷德·格罗塞：《战后欧美关系》，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第395页。

年里根总统正式宣布了战略防御计划（SDI)。撒切尔夫人认为战略防御计划，将会使欧洲的威慑平衡变得不稳定，担心它会给英国的三叉戟导弹计划带来不良的影响。但是又认为说服里根放弃研究计划是无意义的，最好的办法是在支持美国进行研究的同时，对其施加影响。为此她通过会谈同里根达成了四点共识：(1) SDI的目的不是为了取得优势，而是考虑在苏联取得进展的情况下保持均势；(2) 这一计划旨在进行战略防御武器的开发研究，有关部署的问题留待以后进行谈判；(3) SDI是要加强，而不是损害威慑力量；(4) 谈判的目的在于降低双方进攻性武器系统的水平，从而获得安全。这些协议既支持了美国政府的立场，顶住了苏联的攻势，又兼顾了英国和西欧的愿望与利益，为制约美国提供了依据。难怪人们认为，这是里根提出战略防御计划以来，欧洲在这一问题上所取得的最重要的政治成就。[①]

（二）撒切尔时期的欧洲政策

60年代末70年代初英国对外政策完成了重点从大国全球外交向欧洲的转变。英国通过欧共体、欧洲政治合作机制、北约欧洲集团和西欧联盟等多种正式和特定的安排，在经济、政治和安全方面，努力发展同西欧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和合作关系。英国已无可挽回地卷入了欧洲一体化进程。撒切尔夫人1979年执政后，表示要推行一种建设性的欧洲政策，谋求扩大英国在欧共体中的作用和影响，要使英国居于“欧洲的主流和中心地位”。撒切尔夫人强调，英国应利用欧洲的整体效应，在外交方面采取主动行动，通过欧洲联盟的逐步发展，使英国自身的特点变为一个强点，而不是一个弱点。

但是英国在欧共体中地位和作用的转变，并不平静。在撒切尔夫人执政的头5年中，英国围绕欧共体预算摊款份额和共同农业政策问题，同法国等欧共体伙伴进行了持续而激烈的斗争，以

① 彼德·詹金斯：《撒切尔夫人的革命》，潘图书公司，1989年，第297页。

至于大陆欧洲国家普遍把它看成是一个半心半意的成员，国内许多公众也怀疑英国是否值得继续留在欧共体之内。

英国是一个迟到的欧共体成员国，当它加入欧共体时只得接受既成事实，“对于共同体根本基础结构的创立，已不能施加多少影响了。”[①] 那些在英国缺席时创立的基础结构，当然不可能充分反映英国的观点和利益。在欧共体现行的财政预算制度和共同农业政策下，英国在经济上是吃亏的。撒切尔政府在这些问题上采取强硬态度，正是考虑到英国公众的情绪和党派斗争的需要，以表明它是在捍卫英国的民族利益。有人把撒切尔夫人比作英国的戴高乐。的确，她在欧共体内为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进行顽强斗争的时候，有些像当年的戴高乐。不过她与戴高乐又有着重要的区别，她并不像当年戴高乐那样试图谋取一种独立于超级大国的中间地位，相反她公开宣称，她的党是亲美的。[②]

鉴于撒切尔夫人所表现的不妥协态度和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人们通常把她看作是一个反欧（共体）主义者。其实，正如英国《金融时报》评论员伊·戴维森说的，尽管撒切尔夫人“本能上”是亲大西洋主义的，但客观形势使得她的政府逐步而不可挽回地加强了与大陆欧洲的联系。[③] 1984 年在枫丹白露举行的欧共体首脑会议被认为是一个分水岭。英国政府在这次会议期间向各国提交了一份题为《欧洲的前途》的文件。通过呼吁建成一个真正自由的内部统一市场，英国第一次为确定欧共体的未来议程做出了重大贡献——1992 年建成欧洲大市场被作为欧共体的首要目标确定下来。[④] 英国还表示愿意与西欧其他国家建立更为合作的关系，主张使欧洲一体化在更广泛的领域内取得进展。枫丹

① 爱·希思：《旧世界新前景》，商务印书馆，1973 年，第 27～28 页。

② 撒切尔夫人 1984 年 10 月在保守党年会上的讲话。

③ 《金融时报》1987 年 4 月 2 日。

④ 彼德·帕德：《撒切尔时期的英国对外政策》，菲力浦·阿兰出版公司，1988 年，第 41 页。

白露会议就英国的预算摊款回扣问题达成的协议，消除了英国同其他欧共体国家长期发生摩擦的一个热点，使英国能够以更为积极的态度去参与欧共体的建设。

这里应该指出，英国态度的变化，是与欧共体自身的发展以及英国国内公众舆论倾向的变化密切相关的。首先，随着欧共体的进一步扩大，欧共体内部变得更为多样化。这一趋势实为英国所欢迎。随着时间的流逝和事态的发展，英国在某些问题上的观点和主张（如有关共同农业政策的改革问题），已得到越来越广泛的支持和承认。法德轴心尽管仍然是欧共体的核心和“发动机”，但英国在某些问题上的意见越来越受到重视。其次，欧共体的中心议程已转为如何解决欧洲工业的生存和经济的健康发展问题。70 年代后半期以来，在世界经济、货币和能源危机的影响下，欧共体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各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严重阻碍了内部统一市场的形成和发展。进入 80 年代后，美国和日本高技术的飞速发展和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异军突起，使欧共体面临一系列严峻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欧共体就把注意力转到了完成内部大市场建设和发展新技术方面上来。英国长期以来一直强调欧洲联合进程应以完成欧洲内部统一市场建设为优先目标。欧共体工作重点的这一转变正符合英国的利益与愿望。另外，欧洲政治合作的进展，特别是 80 年代以来西欧国家关于防务合作的讨论，使英国同法国、西德一起处于欧洲舞台的中心，有可能扮演一个较为显赫的角色。与此同时，随着英国社会经济生活越来越深地卷入西欧一体化进程，英国国内政治舆论对欧共体已变得更能容纳。所有这一切都促使英国对欧共体的建设和西欧联合抱更为积极合作的态度。

撒切尔政府虽然以比过去更为积极的态度投入了欧共体的建设，但在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欧洲以及如何建设的问题上，则与其他大多数欧共体伙伴之间仍然存在着深刻的分歧。撒切尔夫人主张建设的是一个“自由企业的欧洲”，实际上只是一个大自由贸易

区。她认为“独立主权国家间自愿积极合作是建设一个成功的欧洲共同体的最好途径”。[①] 撒切尔政府强调欧共体在活动中应遵循“辅佐性”原则，它小心翼翼地维护英国的主权，时时警惕地注视着布鲁塞尔任何的集权化倾向。撒切尔夫人曾竭力反对修改罗马条约，主张保留一致通过的原则。她在欧洲建设的方针问题上同欧共体执委会主席德洛尔发生了尖锐的争论。1988 年 9 月撒切尔夫人在布鲁日欧洲学院发表演讲，提出欧洲建设的五项原则。她主张建设一个基于主权国家联合基础上的欧洲，反对德洛尔建立一个联邦主义的统一的欧洲。在 1990 年 10 月举行的欧共体首脑罗马会议上，她不顾其他欧共体伙伴一致同意从 1994 年开始实施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第二阶段计划的立场，以 1：11 的票数单独反对建立统一的欧洲中央银行和设立单一的欧洲货币；在此之前，她还在 1989 年 12 月举行的斯特拉斯堡会议上，以同样的方式反对制定欧洲统一的“社会宪章”。

英国在欧共体内的这种空前孤立状况，使英国内阁和执政党内温和的“欧洲派”人士深感焦虑不安。他们担心英国有可能被完全排除在欧洲急剧变化的进程之外，从而失去对其施加影响的机会与可能。为此外交大臣杰弗里·豪挂冠而去，以此表明与撒切尔夫人划清界限，并进而引发了一场全面的政府危机。撒切尔夫人也在这场危机中于 1990 年 11 月被迫辞职下台。

英国内部在欧洲政策上的纷争，是其外交在急剧变化的欧洲和世界形势中面临困境的一种表现。首先，随着冷战后时代的到来，军事力量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下降，经济因素在决定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时的重要性上升。英国在冷战年代借助其军事力量和它在东西方与欧美之间特殊的地位所具有的影响和重要性，不可避免地日渐下降。经济上强大而又居欧洲剧变漩涡中心的德国则地位上升，成为人们竞相争取的对象和合作伙伴。随着人事的

① 撒切尔夫人 1988 年 10 月 14 日在保守党年会上的讲话。

变迁，尽管美国领导人一再保证英美特殊关系将继续稳定发展，但人们已清楚地看到，不论是布什同撒切尔夫人之间，还是布什或克林顿同梅杰之间，显然都不具有里根同撒切尔夫人之间那样亲密的关系。美国在重建欧洲新秩序中又把重心放在争取德国和支持迅速发展的欧洲一体化进程上，希望英国既是美国的一个忠实盟友，又是一个全心全意的"欧洲人"。这样，英国又一次面临如何安排它的对外政策重点的考验：在英美关系有可能变冷、重要性下降的情况下，是否应该在其对外政策"三角架"中更多地依赖和借重欧洲这条腿？其次，苏联东欧剧变和德国统一的实现，为英国和西欧既提供了机遇也提出了挑战。在探索欧洲新格局时，大多数西欧国家和相当一部分英国人士主张加速西欧联合进程，在深化欧共体一体化的基础上发展全欧合作，以联合的欧洲制约统一而强大的德国。这就要求英国抛弃对昔日世界大国地位的怀恋，放弃部分国家主权，以积极合作的态度参加到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去。因此英国的欧洲政策急需调整以适应这种变化了的形势。

结　束　语

这本书所述内容大体上截止于本世纪 80 年代末，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雅尔塔格局”彻底瓦解之际。这样，本书就囊括了从 18 世纪末法国革命以来 200 年上下的西方大国在外交方面的主要政策实践和指导思想。这两个世纪是西方各大国在羽翼丰满之后竞相向世界迅跑的时期，各方面都发展得很快。这两个世纪的阶段性和脉络非常分明：拿破仑战争、维也纳和会、大国同盟、普法战争、巴尔干冲突、第一次世界大战、巴黎和会、俄国革命、希特勒崛起、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一段是长达几乎半个世纪的“雅尔塔格局”。从外交思想的层面上看，这 200 来年可以分几大段：（一）19 世纪，其特征是欧洲列强的“力量均势”，到下半叶开始发生变化，“均势”的内容已有不同；（二）自 20 世纪起，“力量均势”的理论和实践逐渐成为过去，其中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是西方外交的彷徨时期；（三）自 1945 年以来至 80 年代末是东西两极体制时期，这一时期支配西方外交思想的杠杆是东西方关系。

外交，是功利性很强的政治。本书所叙述的，都是围绕着上述这一系列事变展开的。外交，常是随着形势的变动和本国的需求而有变化，所以，任何国家的外交都一定尽可能地具有应变性。这本书所讲的，无非就是西方外交从总体上看各个时期的特征，有关国家面临的共同性问题，并试图在此基础上展示这些国家的政府是怎样依据不同时期和不同处境而制定政策的。我们体会，有

些事情所反映的思想内涵，比较容易看出来，因而也比较容易形诸文字，例如美国的外交思想，每个历史阶段的思路都比较清楚；在欧洲，诸如俾斯麦的政策、戴高乐主义、德国的“新东方政策”、英国的“三环”观念，以及俄国的政策等等之类的大关节，也都比较容易使人感觉到主事人是怎样想的和为什么会这样想。但是大量的平常的外交活动，就不见得件件都能发现是什么样的思想在起指导作用。而从西方的外交共性看，若只着眼于眼花缭乱的多边外交活动；今天一个会，明天一个会，签了何种条约，作了什么样的“表面文章”等等，则终于无非是一堆“大事记”而已，我们的工作则要从这些“大事记”的材料中理出几条西方外交不同时期的指导思想。

要言之，外交思想是方向性的，是解决一定时期内的方向问题的。例如，“冷战”时期的外交，无论在实际的、具体的运作上怎样灵活处置，观念上总是摆脱不了东方和西方的分野这个大框架。戴高乐主义的一个特点是向美国闹“独立性”，有时关系搞得十分紧张，但是立足点还是在“西方阵营”。美苏关系数度缓和，赫尔辛基会议标志着东西方关系的接近，但是，总是西方为一方，东方为另一方，互为“对立面”。这是当时外交的一个总的“规定情景”。当然同样必须看到，这个东西方关系的大框架，绝不总是以同样不变的态势和水准在起作用的。若以 10 年为一个单元，则 60 年代不同于 50 年代，70 年代不同于 60 年代，到 80 年代则东西方的框架便岌岌可危。到 80 年代末，大框架便完全拆散了。这几个时期的不同，要求执政者调整思路，适时地转变原来的方针；当然，外交思想取向的变化又会反转来推动局势发展。例如尼克松主义因时局的变化而形成，同时尼克松又反转来推动了 70 年代上半叶的缓和势头。

下面想简略地讲讲本书的“后续”问题，以便不致使人有历史戛然止于 80 年代末的印象。

进入 90 年代以来，西方各大国，首先是美国，都在根据新的

国际关系格局来思考问题。概括起来说，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后，西方为自己提出了两大问题：（一）强化西方大国的“世界存在”，在观念上把全世界的大事都放在西方的关注之内。（二）以经济“全球化”的观点统揽国际关系，并以此为调节对外关系的杠杆。

西方对新局面作出的带有总结性的重要反应，表现在1990年11月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在巴黎举行的特别首脑会议上。那时苏联还没有解体，但正在经受着剧烈的摇撼；而德国的最后统一，则为欧洲战后时期彻底画上了句号。这次会议宣告“欧洲对抗和分裂的时代已告结束”，因此具有在全欧范围内重新安排国家关系的意义。这是一次在战后欧洲第一次不以集团对立的姿态出现的国际会议。欧洲虽然没有像一些政治家乐观地认为“欧洲变成了一个”，但总是掀开了欧洲史新的一页。会议通过的《新欧洲巴黎宪章》特别从“价值观”（意识形态）的层面宣告欧洲东西两部分在文化上的认同。

当时西方各国一方面对苏联东欧的剧变喜形于色；另一方面更急于收拾局面，创建一个代替东西对立格局的新体制。它们首先需要稳定自己，“再步调一致”地去“接纳”东欧。领头的作用又落在美国肩上，布什政府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西方盟国先拢起来，这就是布什政府提出的“新大西洋主义”。而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自1990年到1994年举行的3次首脑会议，更能看出西方在用什么思想取代东西方的总框架。1990年第一次伦敦首脑会议提出要“改造”北约，即使之从“军事政治组织”转为“政治军事组织”，突出了它的政治职能，表示东西对峙之势已不存在。1991年罗马首脑会议进一步明确北约的政治职能和干预世界热点地区的责任，表明西方要在世界政治中起主导和支配作用；北约在向一个世界性“集体干预”的组织转变。

第三次首脑会议于1994年1月在布鲁塞尔举行，这次会议的主题则是设法以某种形式把俄国和东欧国家纳入北约的规范之

内，同俄罗斯和东欧国家以及其他非北约成员的欧洲国家建立所谓“和平伙伴关系”，以渐进的、灵活的方式把北约的覆盖面扩大到整个欧洲和北美，并发挥干预世界事务的“职能”。

因此，从北约的这三次首脑会议来看，似乎有某种松散的新型的以西方为核心的“神圣罗马帝国”的影子悬在那里，以此在世界政治上起居高临下的统领作用。当然，只有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具有牵头的资格；欧洲各大国也在里面占据与其国力相当的位置。意图是使这种“西方同盟”成为左右世界政治的枢纽，把世界性问题以及东西南北的大问题通通纳入壳中。这就是说北约的性质有所改变，它变成了一个统察世界动向的政治和军事集团。

这种考虑诚然带有很大成分的主观性：一则美国的建立“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的梦幻不可能实现，各国还有各自特殊的关注点；再则，世界各地各民族将有新觉醒和新发展。所以，这种意图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是很有问题的。但不可否认，这是欧美各大国，特别是美国，观察世界新局面的新思想。它既不是“力量均势”，也不是“东西方关系”，而是以西方为主体的“全球主义”。它的实质是要建立某种西方的“强权政治”。

事实上，最近几年以来的势态足以表明，几个西方强国确实是有意“以天下为己任”，到处插手，摆出要总揽世界全局的架式，尽管举措并不、也不可能一致。海湾战争、索马里战争、波黑战争，乃至小到海地、卢旺达，处处都显示了西方的存在和作用。中东的和平进程，特别是最近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以色列和约旦的谈判，美国都充当了第三个“当事人”。

进入 90 年代以来，经济（包括科技）问题在外交中的比重，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空前强劲，成为左右国际关系中越来越重要的因素。这种情况当然不是到了 90 年代才开始的，而是随着相互依赖关系的发展而发展的。然而不可否认，东西方对峙体制的瓦解从政治上大大地推进了人们对“全球化”趋势的共识。世

界经济有如一张大网，世界上任何地区都不可能从中漏掉。经济（科技）的冲击波是不分国界的，任何一个国家在对外关系中都不能不优先考虑经济问题；国与国之间办交涉、开谈判，往往是着眼于经济、或最终是为了经济。如果说，在历史上外交史曾和战争史几乎胶着在一起；那么近一二十年的态势已经表明，而且今后将愈加明显地表明，外交将和世界经济绞在一起。

当然对此不宜作胶柱鼓瑟的理解，以为经济关系会亦步亦趋地决定外交举措。因为，在某些重大国际问题上，"经济外交"与"政治外交"并无内在联系，不一定相互之间都有关联和影响。例如，欧美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互不相让，对立甚烈，但是并不影响它们在北约领域里的磋商和配合。

现在，临近本世纪的末尾，愈来愈多的人意识到在"全球化"趋势进一步发展的情况下，21世纪的世界将更加面临头绪繁多的局面和激烈的斗争。美欧日的角逐、太平洋地区的崛起、中国在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吸引力、俄罗斯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重要地位、南北矛盾的尖锐化，等等，西方外交都不能不给以紧密的关注。

为此，西方政治外交界、经济界、学术界、舆论界的头脑空前地活跃起来，纷纷对未来形势的发展作出预测和构思对案。

此外还有一个问题是不应忽略的，就是今后西方的外交思想可能更加强调意识形态的内涵。某种新的"西方中心主义"正在明显地表现出来。西方认为苏联和东欧的解体，从根本理论上说，是西方民主的价值观和自由经济体系的"胜利"；福山关于"历史终结"的书、亨廷顿的所谓"文明的冲突"等等，不管在枝节问题上在表述上何等不同，不管在处理问题的方法上何等不同，都反映了一个相同的观点或情绪，就是把西方作为先进文明的代表，并把非西方文明所属的国家和民族视为西方的对立面和"异类"。因此它们所说的"国际合作"、"集体干预"以及"国际新秩序"等等都是以西方为中心的；它们所提出的解决世界政治和经济问题

的方案，都先通过几个大国的磋商而后提出。现在习用的“国际社会”的涵义，在西方说来，实质上就是以有着共同哲学、文明背景的西方国家为主所组成的“社会”。真正的“国际社会”并不存在。

如前所示，历史是有阶段性的，所以可以有阶段性的终点。但是历史本身是没有终点的。国际政治的研究同样是没有终点的。80年代末就是一个阶段性的终点。至于90年代以后，已证明肯定是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新时期必定带着新问题。进入新的时期不过几年，许多具体情节如何发展，确实如人们常说的，“有待进一步观察”；现在只能划一个大体上的轮廓。至于进一步的工作，那应当属于下一步的研究范围。

部分参考书目

外文参考书目

肯尼思·沃尔兹：《人，国家和战争——一种理论分析》；Kenneth N. Waltz，“Man，the State and War ——a theoretical analysis”，Colunbia University Press，1954

麦克·亨特：《意识形态和美国对外政策》；Michael Hunt ，“Ideology and U. S. Foreign Policy”，Yale Press New Haven and London，1987

黑格尔：《历史哲学演讲录》；Hegel，“Philosophy of History”，Dover，New York，1956

约瑟夫·法兰克尔：《英国对外政策》；Joseph Frankel，“British Foreign Policy”，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5

艾登：《全程》；Anthony Eden，“The Fuel Circle”，London，1961

阿尔弗雷德·格罗塞：《法国对外政策》；Alfred Grosser，“Affaires extérieures，La Politique de France”，Flammanion，Paris ，1984

爱德华·科兰克肖：《俾斯麦》；Edward Crankshaw，“Bismarck”，Viking，New York，1981

阿莱克西·德·托克维尔：《美国的民主》；Alexi De Tocque Ville，“La Démocratie de l' Amérique”，Robert Lafon，Paris ，1986

大卫·汤姆逊：《拿破仑以来的欧洲》；David Thomson，“Europe Since Napoleon”，Penguin Books，1957，1980

瓦尔特·拉菲伯：《美国时代》；Walter Lafeber，“The American Age”，W. W—Norton，New York，1989

丘吉尔：《英语人民的历史》；W. Churchill, "History of the English－Speaking Peoples", Greenwich House, New york, 1955

《丘吉尔著名演讲集》；"Winston Churchill's Famous Speeches", Cassel, 1989

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W. Churchill, "The Second World War", Cassel, London, 1967

乔治·博尔多诺韦：《拿破仑》；Georges Bordonove, "Napoléon", Editions Pygmalion, Paris, 1978

R. A. 卡利：《维也纳会议以来的欧洲外交史》；Rene Albrecht Carrie, "A Diplomatic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the Congress of Vienna", Methuen, London, 1961

M. 贝洛夫：《力量均势》；Max Beloff, "The Balance of Power", George Allen－ Unwin, 1968

约·克拉科：《英国外交与对外政策 1782～1865》；John Clarke, "British Diplomacy and Foreign Policy 1782-1865", Unwin－Hyman, 1989

詹·乔尔：《英国和欧洲，从皮特到丘吉尔，1793～1940》；James Joll, "Britain and Europe, Pitt to Churchill, 1793-1940", Adam－ Charles Black, London, 1961

M. 卡尔波维奇：《俄罗斯帝国 1801～1917》；Michael Karpovich, "Imperial Russia 1801-1917", Holt－ Rinehart Winston, New York, 1960

J. N. 韦斯特伍德：《忍耐与尽力，1812～1986年的俄国历史》；J. N. Westwood, "Endurance and Endeavour, Russian History 1812-1986",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托马斯·潘恩文集》；"Basic Writings of Thomas Paine", New York, Willey Book Co., 1942

儒尔·巴特利特：《美国外交录》；Bartlett, "The record of American Diplomacy; Documents and readings in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 New york, Kropt, 1964

《亚当斯回忆录》；"Diary and Autobiography of John Adams", The Belkrap Press of Haward University, 1961

J. G. 尼科莱：《亚伯拉罕·林肯：一部历史》；James G. Rarclall, "Lincoln the President", New York, 1945

艾里奇·埃克：《俾斯麦与德意志帝国》；Eyrich Acker, "Bismarck and The Germany Empire", New York, 1968

路德维希·莱纳尔斯：《俾斯麦的崛起》；Ludwich Lilaes, "The Rise of Bismarck ", Munich, 1956

阿道夫·希特勒：《第二本书》；Adolf Hitler, "The Second Book", New York, Geluof Pr., 1988

塞巴斯蒂安·哈夫纳：《希特勒的含义》；Sebastian Havener, "The Mean of Hitler", Harvad Pr., 1979

霍华德·比尔：《西奥多·罗斯福和美国上升为世界强国》；Howard K. Beale, "Theodore Roosevelt and the Rise of America to World Power",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Press, 1984

马格里特·里奇：《麦金莱时代》；Margaret Leech, "In the Days of Mckinley", New York, Harper Brothers, 1959

阿瑟·林克：《伍德罗·威尔逊文件集》；Arthur S. Link,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2

《外交家威尔逊》；"Wilson the Diplomatist; a look at his major foreign policie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Press, 1956

K.W.汤普森：《温斯顿·丘吉尔对世界事务的看法》；K.W. Thompson, "Winston Churchill's World View", Louis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3

F. S. 诺瑟治：《英国对外政策中的自由与必然》；F. S. Northedge, "Freedom and Neccesity in British Foreign Policy", Weidenfeld Nicoloson, 1972

让·莫内：《回忆录》；Jean Monnet, "Mémoires", Fayard, 1976

迪特尔·勃鲁门维茨：《康拉德·阿登纳及其时代》；Dieter Blumenwitz, "Konrad Adenauer and Seine Zeit", 1976

阿努尔夫·巴林：《权力更迭，勃兰特—谢尔时期》；Arnulf Baring, "Machtwechsel, Die Aera Brandt—Scheel", Munich, 1984

赫尔穆特·施密特：《西方战略》；Helmut Schmidt, "Eine Strategie fuer den Westen", 1986

密特朗：《法国对外政策之我见》；Francois Mitterrand, "Réflexions Sur la politique extérieure de la France", Fayard, 1986

彼得·詹金斯：《撒切尔夫人的革命》；Peter Jenkins, "Mrs Thatcher's

Revolution", Pan Books, 1983

克·图根哈特，威廉·华莱士：《90年代英国对外政策选择》；C. Tugendhat and W. Wallace, "Options for British Foreign Policy in the 1990 s", London, 1988

阿瑟·施莱辛格：《世界强权的动力，美国对外政策历史文献》；Arthur M. Schlesinger, "The Dynamics of World Power: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1973

乔治·凯南：《回忆录》；George F. Kennan, "Memoirs, 1925-1950", Boston, 1972

罗伊·麦克里迪斯：《国际政治学中的对外政策》；Roy C. Macridis, "Foreign Policy in World Politics", Prentice—Hall International, 1989

F. H. 欣斯利：《权势与和平，国家间关系史上的理论与实践》；F. H. Hinsley, "Power and Pursuit of Peace, Theory and Practice in the History of Relations between Stat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中文参考书目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5年。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

《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75年。

马克思：《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人民出版社，1979年。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82年。

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商务印书馆，1991年。

斯图尔特·休斯：《欧洲现代史》商务印书馆，1984年。

斯蒂芬·茨威格：《昨日的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三联书店，1991年。

维克多·雨果：《悲惨世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

罗斯：《拿破仑一世传》，商务印书馆，1977年。

勒费弗尔：《拿破仑时代》，商务印书馆，1978年。

《关于拿破仑》，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1975年。

塔尔列：《拿破仑传》，商务印书馆，1976年。

《拿破仑文选》，商务印书馆，1980年。

福尔：《拿破仑论》，商务印书馆，1990年。

《拿破仑书信文件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

《华盛顿选集》，商务印书馆，1983年。

A. J. P. 泰勒：《争夺欧洲霸权的斗争 1848～1918》，商务印书馆，1987年。

亨利·赫坦巴哈：《俄罗斯帝国主义》，三联书店，1978年。

巴巴拉·杰拉维奇：《俄国外交政策的一世纪 1814～1914》，商务印书馆，1978年。

北京大学历史系：《沙皇俄国侵略扩张史》，人民出版社，1979年。

俾斯麦：《思考与回忆》，东方出版社，1985年。

艾伦·帕麦尔：《俾斯麦传》，商务印书馆，1982年。

科佩尔·S. 平森：《德国近现代史》，商务印书馆，1987年。

威廉二世：《德皇雄图秘著》，杭州光华编译社，1916年。

C. E. 布莱克：《二十世纪欧洲史》，人民出版社，1983年。

希特勒：《我的奋斗》，上海黎明书局，1935年。

朱庭光：《法西斯新论》，重庆出版社，1991年。

弗里德里希·梅尼克：《德国的浩劫》，三联书店，1991年。

沃尔特·C. 兰格：《希特勒之谜》，新华出版社，1990年。

罗伯特·佩恩：《希特勒秘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

戈登·A. 克雷格：《德国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年。

特尔福德·泰勒：《慕尼黑——和平的代价》，新华出版社，1984年。

亨利·佩林：《丘吉尔传》，东方出版社，1988年。

麦克米伦回忆录：《指明方向》，商务印书馆，1976年。

丘吉尔：《英语国家史略》，新华出版社，1985年。

丘吉尔：《欧洲联合起来》，商务印书馆，1977年。

《阿登纳回忆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

罗伯特·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商务印书馆，1980年。

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求实出版社，1988年。

《杜鲁门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64年。

乔治·凯南：《美国对外政策的现实》，商务印书馆，1958年。

约翰·鲁滨逊比尔：《约翰·福·杜勒斯》，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

年。

文森豪威尔：《白宫岁月：受命变革》，三联书店，1978年。

戴高乐：《战争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81年。

《希望回忆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

约翰·肯尼迪：《扭转颓势》，三联书店，1976年。

阿瑟·施莱辛格：《一千天：约翰·肯尼迪在白宫》，三联书店，1981年。

约翰·肯尼迪：《和平战略》，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

维利·勃兰特：《会见与思考》，商务印书馆，1979年。

赫尔穆特·施密特：《均势战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

《美国对外关系：二百年美国对外政策文选》，南京大学出版社，1976年。

爱·希思：《旧世界新前景》，商务印书馆，1973年。

亨利·基辛格：《白宫岁月》，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

威廉·富布赖特：《跛足巨人》，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

吉米·卡特：《保持信心》，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年。

赫德里克·史密斯：《里根和里根总统》，商务印书馆，1982年。

罗纳德·里根：《里根自传》，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

米歇尔·曼德尔伯姆：《里根与戈尔巴乔夫》，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

密特朗：《此时此地》，商务印书馆，1982年。

阿·格罗塞：《战后欧美关系》，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

何春超：《国际关系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84年。

陈乐民：《战后西欧国际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

《“欧洲观念”的“历史哲学”》，东方出版社，1988年。

《东欧巨变与欧洲重建》，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

冉隆勃、王振华：《当代英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

王振华：《英联邦兴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

周荣耀：《当代法国》，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

《戴高乐评传》，东方出版社，1994年。

刘绪贻、杨生茂：《战后美国史》，人民出版社，1989年。

吴成平：《世界现代史大事记》，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

《美国的历史文献》，三联书店，1989年。

部分人名中外文对照

Acheson, Dean	艾奇逊
Adams, John	亚当斯
Adenauer, Konrad	阿登纳
Alexander I	亚历山大一世
Ali, Mohammed	阿里
Aquinas, S. Thomas	阿奎那
Attlee	艾德礼
Baldwin	鲍德温
Balfour	贝尔福
Benes	贝奈斯
Bevin	贝文
Bismarck	俾斯麦
Blaine, James	布莱恩
Blum	勃鲁姆
Brandt, Willy	勃兰特
Briand, Aristide	白里安
Brzezinski, Z. K	布热津斯基
Bush, George	布什
Callaghan	卡拉汉
Canning, George	坎宁
Carter, Jimmy	卡特
Castlereagh	卡斯利雷

Catherine Ⅱ	叶卡特林娜二世
Chamberlain, Austen	张伯伦，奥斯汀
Chamberlain, Joseph	张伯伦，约瑟夫
Chamberlain, Neville	张伯伦，尼维尔
Christopher	克里斯托弗
Churchill , Winston	丘吉尔
Clemenceau, Georges	克雷蒙梭
Clifford, C. M	克利福特
Crowe, Eyre	克劳
Daladier, Edouard	达拉弟
De Gaulle	戴高乐
Delors, Jacques	德洛尔
Disrali, Benjamin	迪斯累利
Dulles, John	杜勒斯
Eden, Anthony	艾登
Eisenhower, David	艾森豪威尔
Franco	佛朗哥
Frankel, Joseph	法兰克尔
Frederick I	腓特烈大帝
Fubuyama, Francis	福山
Fulbright, J. W	富布赖特
Garfield, J. A	加菲尔德
Gefferson, Thomas	杰弗逊
Gladstone, W. E	格莱斯顿

Gorbachev	戈尔巴乔夫
Gorchakov	哥尔查科夫
Grosser, Alfred	格罗塞
Hamilton, Alexander	汉密尔顿
Hardenberg	哈登堡
Harriman, E. H	哈里曼
Harrison, Benjamin	哈里森
Hay, John. M	海
Heath, Edward	希思
Hegel, G. W. F	黑格尔
Henri IV	亨利四世
Hitler	希特勒
Hobbes, Thomas	霍布斯
Hunt, Michael	亨特
Huntington, Samuel	亨廷顿
Jackson, Andrew	杰克逊
Jay, John	杰伊
Jefferson, Thomas	杰斐逊
Johnson, Andrew	约翰逊
Kant, Imanuel	康德
Kennan, George	凯南
Kennedy, John	肯尼迪
Khrushofev, Nikita	赫鲁晓夫
Kissinger, Henry	基辛格

Kohl，Helmut	科尔
Lansing，Robert	兰辛
Lasen，Charles	拉森
Lincoln，Abraham	林肯
Lippman，Walter	李普曼
Locke，John	洛克
Lodge，H. C	洛奇
Macarthy	麦卡锡
Macmillan，Harold	麦克米伦
Madison，James	麦迪逊
Marshell，George C	马歇尔
Mckinley，Willian	麦金莱
Metternich，K. Van	梅特涅
Mittrrand，Francois	密特朗
Monroe，James	门罗
Molotov，	莫洛托夫
Monnet，Jean	莫内
Mussolni	墨索里尼
Napoléon	拿破仑
Napoléon Ⅲ	拿破仑三世
Nixon，Richard	尼克松
Paine，Thomas	潘恩
Palmerston，Henry	帕麦斯顿
Peter the Great	彼得大帝

Pierce，Franklin	皮尔斯
Pitt，William（the younger）	小皮特
Poincaré，Raymond	普恩加莱
Reagan，Ronald	里根
Reynaud，Paul	雷诺
Ricardo，David	李嘉图
Richelieu	黎塞留
Robespierre，Maximilien	罗伯斯庇尔
Roosevelt，Theodore	罗斯福
Rousseau	卢梭
Salisbury	索尔兹伯里
Schmidt，Helmut	施密特
Schuman，Robert	舒曼
Seward，W. H	西沃德
Shultz，George	舒尔茨
Smith，Adam	斯密
Stalin	斯大林
Stimson	史汀生
Sully	苏利
Sumner，William	萨缪尔
Taft，W. H	塔夫脱
Talleyrand－Périgord	塔列朗
Thatcher，Margaret	撒切尔
Thiers，Adolphe	梯也尔

Tocqueville, Alexi de	托克维尔
Truman, Harry	杜鲁门
Voltaire	伏尔泰
Walpole, S. H	沃尔波尔
Washington, George	华盛顿
Wellington, Arthur	惠灵顿
William Ⅱ	威廉二世
Wilson, Woodrow	威尔逊